

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观恒丛书

经略译丛 施展／主编

维特伯爵回忆录

[俄]维特伯爵 /著　　肖 洋　柳思思 /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The Memoirs of Count Witte

维特伯爵系沙俄帝国末期的朝廷重臣，开明派政治家、改革家，直接参与了沙俄帝国的诸多外交政策、经济与政治改革方略等的制订。李鸿章对俄交涉中的对手便是此人；日俄战争后，正是维特伯爵代表战败的俄国与日本进行和谈，结果出乎全世界的意料，创造了战败国赢得外交胜利的奇迹。

维特伯爵忠于沙皇，但深切地认识到俄国问题是根本性的体制问题。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美国的崛起已经让欧洲相形见绌，欧洲正在丧失世界领导者的地位。为此，他提出以俄、德、法三国为中心的欧洲联合，使欧洲重返世界领袖的地位。

本书的译介当可帮我们更好地理解俄国这个北方强邻，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世界格局。



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观恒丛书

经略译丛

The Memoirs of Count Witte

维特伯爵回忆录

[俄]维特伯爵 /著　　肖 洋　柳思思 /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特伯爵回忆录/（俄罗斯）维特伯爵著；肖洋，柳思思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5
（经略译丛）
ISBN 978-7-5093-2808-8

Ⅰ.①维… Ⅱ.①维…②肖…③柳… Ⅲ.①维特，S.Y.（1849~1915）-回忆录 Ⅳ.①K835.12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9494号

策划编辑 周林刚　　封面设计 蒋 怡

维特伯爵回忆录
WEITEBOJUE HUIYILU

著者/（俄）维特伯爵
译者/肖洋，柳思思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640×960毫米 16　　印张/21.5 字数/247千
版次/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 ISBN 978-7-5093-2808-8　　定价：56.00元

北京西单横二条2号 邮政编码100031　　传真：66031119
网址：http://www.zgfzs.com　　编辑部电话：66067024
市场营销部电话：66017726　　邮购部电话：66033288

"观恒丛书"总序

《易经》"观"卦，坤下巽上，其象辞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朱子注曰："观者，有以示人而为人所仰也。"意谓治国当秉德性，应天道，一本自然，如顺谷风行。

然则，天道为何？孔子曰："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礼记·哀公问》）故知，天道流行，然天道亦有恒。

《易经》"恒"卦，巽下震上，其象辞曰："刚上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意谓观恒而可知天道，此为政之本。

然则，何以治本？孔子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爱与敬，其政之本与?"（《礼记·哀公问》）

爱与敬，中华为政之本，然西人亦不悖此道。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太福音》5：43－44）

中华大道隆兴数千载，惜乎近世国运日蹙，然晚清士人清醒者亦所在多有。其慨叹天道流转，"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

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郭嵩焘日记》（三）]

天道流转不忒，中国再度勃兴。奈何今下世风浇漓，人心不古；为政之道，多所毁弃。少有惕励观恒之沉潜，惟闻“大国崛起”之亢奋。《阿房宫赋》可为警醒当下之盛世危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观恒行道，先当有郁郁之文。本丛书拟集中外经略之书，议古今为政之道，论在中国，旨在天下，以为一快。

是为序。



"经略译丛"序言

"经略"一词，最早出于《左传·昭公七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西晋杜预注之曰："经营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经略。"

由此可知，在古代，经略者必定是以天下为一毂，以四海为一家的。对于古代中华帝国是如此，对于古代西方帝国也没有差别——古代罗马帝国一统天下自不必说，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从理念上来说也是一个旨向全世界的普遍帝国。之所以如此，概因帝国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它是一种文明的道德理念的承载者，不拘限于特定领土，亦不拘限于特定人群，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进入中世纪晚期，西方开始经历一种深刻的历史变化。名义上大一统、至此已延续数百年的神圣罗马帝国系由种种复杂的封建契约关系捏合在一起，其各个封邦彼此之间有着激烈的竞争，在封邦夹缝中还有着各种各样的自治城市。这些因素缓慢但坚定地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现代法权治理的初萌。百衲布般的帝国无法整合这些新事物，一些强大的封建王公便在与市民阶层结盟的基础上，开始了现代领土国家的建立。这些新的政治体在理念上来说仍然是帝国的附庸，亦要受到天主教会的挟制，其作为绝对自立的事物无法获得一般认可。于是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对这种独立于帝国与宗教之外的，对应于特定的领土以及特定

的人民，高度世俗化的全新政治组织形式进行正当性论证。该种组织形式就是现代国家。他们的论证与强大王公的需求一拍即合，现代国家的质料与形式便全面地出现了，政界与学界的沟通与联动，是一种区别于帝国的、目标有限的“经略”。所以，“国家”（Nation-State）是一种西方特殊性的产物，相当程度上也是人为的产物，而并非出于自然的人类一般组织形式——反倒部落和帝国才是出于自然的人类一般组织形式。西方建立了“国家”之后，开始对外扩张，并因此而将“国家”的理念传播到非西方地区，及至二战后的非殖民化进程在世界上普遍建立了“国家”，以致我们通常都以为“国家”才是人类政治组织的常态，这是一种深刻的误解。

该一误解对国人带来的一个负面后果就是，我们经常会以为“国家”无需维持而自然存在，以为天灾、人祸、战争、动乱，都不会取消“国家”作为一个自在主体的地位，所以，就政治问题而言我们只需关注政体。若持此种认识，实不足与论“经略”。须知，从普遍帝国当中脱颖而出的“国家”是近代政治当中最为基础的东西，其作为一个人造物恰是需要最高级的政治技巧来卫护的。政体的改革与变迁不过是二阶政治问题，若离开了“国家”这个一阶政治问题，则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国家”**，这是最大的**“政治”**！对于“国家”的经略，方为现代世界最为根本的经略！

对于何谓国家，国人尚多懵懂；对于国家该当如何经略，则更是需要深刻的反思。西方各国近代以来的大政治家，莫不是政治实践当中“国家学”的绝顶高手，看看他们是如何经略国家的，对于我们必会大有启发。非西方国家也有一些深谙现代经略之道的政治家，在他们的苦心经营下，自己的国家也在世界上获得了一席之地，这些人的作为，也必值得我们认真借鉴。西方的国家理论我国已多有译介，但是对于西方以及非西方的大政治家们的

经略之道，则仍是关注有限。

虑及于此，我们选编了这套“经略译丛”，选辑的标准或是近代以来国外重要的政治家，其本人的著作，体裁不论；或者是对近代某些大国之总体战略筹谋的析解书籍。虽然所选书籍体裁不尽一致，但有一个旨向是一致的，那就是，选辑之书要能反映出作为个人之大政治家或作为整体之大国的政治思考与实践，从中能够读出其经略之苦心，以为我们的镜鉴。希望本套丛书的翻译出版能够在帮助国人理解现代国家经略这一问题上有所助益。



维特伯爵夫人序

我仔细思考了一番才决定为先夫的回忆录写序文。先夫在世时很重视这部著作，作为妻子，我对于它的评价难免抱有偏见，读者对此也未必有什么兴趣。然而，我必须承认，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向美国社会表达感激之情。在朴次茅斯会议期间，美国政府、报界与全体美国人民曾对先夫维特伯爵表示同情，并且美国近期的声明显示它决心在俄国暂时力量不足的危急时刻保护俄国明确的利益，表明了美国的善意态度绝非偶然为之。

我想向读者解释先夫认为他的这本著作对于他是十分重要的。我也想谈谈是什么促使他把他的思想与往事写成一部在他本人和同辈在世时不打算出版的书。先夫对待君王既不阿谀奉承，对待民众也不讨好煽动。虽然他是一个贵族，却并不袒护贵族阶级的特权，而他政治活动的目标主要是凭借着他的一身正气去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始终与大多数俄国知识分子所醉心的不切实际的“民粹派”不同。他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他反对自由主义分子企图一下子重建全部政治制度的努力，他也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因为他反对当时统治俄国的官僚们鄙俗和落后的政治思想。先夫曾经一再对他亲近的人说：“我既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仅仅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我不能只因为一个人的思想和我不一致就把他流放到西伯

利亚去，我也不能仅仅因为一个人不和我在同一个教堂里做祷告就剥夺他的公民权。”

因为这一原因，先夫在各个派系里都有许多敌人。在朝廷上，在保守派中，在自由派里，在民主党派中到处都把维特伯爵看成是“圈子之外的人”。他试图完全按照自己理解的方式为祖国效劳，那就是他始终只有很少同伴的原因。实事求是地说，先夫非凡的政治才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上，他的这一才能受到大俄帝国各层各界的重视。然而，如上所述，没有另一个政治家像我先夫那样受到这么多的各式各样的反对、甚至是顽固激烈的攻击。朝廷方面责骂他属于共和派，激进派却说他想为了皇帝的利益而罔顾人民的权利。地主阶级说他想为了农民的利益而让他们破产，而激进派却谴责他怀着为了地主的利益而欺骗农民。先夫作为俄国历史新开端的10月17日宪法的作者遭受了过度的阴谋和诽谤；另一方面，不能轻易地把大政治家的复杂与多方面的性格化成一个简化的公式，因此就容易引起一些误解，有时这种误解是出于真诚的。

先夫不愿通过公开的报纸、文章与反对者进行争辩，驳斥诽谤或消除误解。他不会参加下流的争吵来降低他的身份。除此之外，旧政权的检查程序，对于沙皇的总理大臣比一个普通公民严格得多，同时他又不愿伤害同僚的感情，所以先夫不能公开表达他的全部思想。因此，他决定将他的行为与行为的影响交付下一代人去评判，于是写出了这部回忆录。

先夫只是在国外疗养的夏季或冬季几个月的休假期间才有时间来写他的回忆录。他总担心圣彼得堡的石岛街寓所的书房会受到秘密警察的监视与搜查。他们在任何时候对他的房子进行搜查，就会把他的手稿抢夺走，他知道许多当政的人对于他的著作直接利益相关。所以这些手稿便始终以我的名义储藏在一家外国的银行里。先夫担心，一旦他逝世，朝廷与地方当局就会设法占有他

所保存的档案，因此他要我及时把这部回忆录妥善地保藏起来。我依照他的嘱咐，把这些稿件从巴黎移到巴荣讷，用别人的名字存在银行中。事实证明他的谨慎并不是过虑。1915 年 2 月，他刚刚去世，当局就把他的书房封闭，搜查并拿走了他的全部文件。其后不久，大本营司令侍从武官长奉了皇帝的命令召见我，说是皇帝看过了我丈夫所作回忆录的目录，对于此书很感兴趣，想阅读一遍。我回答说，很抱歉，这部回忆录存放在国外，无法呈给皇帝。这位皇帝派来的使者当时没有坚持要这部书，但此后不久，俄国驻巴黎的大使馆又派人到我们的比阿里次别墅，趁我不在之时进行了一次很仔细的搜查。他是在寻找这部回忆录，如我之前所述，那时这部回忆录正安稳地存放在巴荣讷银行的保险柜里。

这部回忆录没有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件，因为它是在 1912 年完成的。在这里，我要对于那些把维特伯爵说成是一个亲德派的谣言说几句话。这种谣言是缺乏依据的。在政治上，先夫是没有偏心的，他只受理智的支配。对于任何国家或民族，他不怀有特别的喜爱或憎恶。他认为他的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其他一切事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仅仅是一个亲俄的人。他确实是最坚决反对战争，尤其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说这场战争的结局对于俄国来说，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也将毁坏欧洲的秩序达一百年之久。早在战争打响之前，他就极力主张俄国应大力促进德国与法国重归旧好。战争初期，他就非常忧伤，并表示赞成立即召集一个和平会议。他会对他的朋友们说：“既然他们已经开始了那种疯狂行为，就让军队去打吧，但是让外交家们立即开始他们签订和约的工作”。这种情况可能招致了先夫具有亲德的趋向的种种非议。我不知道他对大战的一些见解是否正确，我只知道他的思想和感情是对俄国充满热爱的，而且他希望全世界繁荣和安宁。

维特伯爵夫人

1920 年 10 月 1 日于布鲁塞尔

目 录



第一章　我的青年时期与早年经历

我 1849 年出生于第比利斯。我父亲的名字是尤利（尤利乌斯）·费多罗维奇·维特，祖籍是波罗的海地区，属于普斯科夫省的贵族，但他的祖先是德国人，移居于波罗的海沿海省份，当时该地属于瑞典。我的母亲是纯粹的俄罗斯人。她是叶莲娜·巴甫洛夫娜·多尔戈鲁基公主，即那个古老高贵的氏族最后一个代表的女儿。我的外祖父是安德烈·米哈依洛维奇·法捷耶夫，他曾担任过萨拉托夫省的省长，最后任高加索总督府总务厅的高官。外祖父母举行婚礼时，他们以一个古老的十字架祈福，按照家族的传统这属于切尔尼戈夫的米哈依尔，米哈依尔是中世纪俄国的一个王公贵族，被一个鞑靼汗杀害后被正教教会追认为圣徒。

外祖父任省长期间，我父亲已经在普鲁士学习了农业学和采矿学，并以农艺学专家的资格来到萨拉托夫。他在那里爱上了我的母亲并与她结为夫妻。我父亲生来就是一个路德派教徒，而我母亲的家庭则是东正教徒，他不得不皈依东正教，因为这是维持这项婚姻的必要条件。他完全融入到我母亲的家庭里，而与维特家族仅保持很少的联系。当我的外祖父应高加索总督沃隆佐夫公爵的邀请去高加索时，他也陪同去了高加索并被任命为该省国家财产局局长。我的外祖父母对于我的幼年生活影响很大。外祖母是我的第一个教师。她不但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女人，还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植物学家。她收集了许多高加索植物的标本，对每一

种植物都附加科学说明。她教我读书，也教我东正教教会的信条与基本教义。她年已老迈并已瘫痪，因此她每次来到孩子们的屋里，不得不依靠仆人们用车推送，坐在安乐椅里讲课。因为她不能动，我只好手捧着启蒙课本，跪在她旁边，听她给我读里面的故事。她也依照这样的方式教导我的两个哥哥，亚历山大和鲍里斯。外祖父最喜欢我，他逝世那年刚好七十岁，这对于我的人生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长兄亚历山大选择了军旅生涯，在上次土耳其战事中受伤很严重，他官任少校，是一个勇敢、谦逊且可爱的人。在他所在的团里，人们对他还记忆犹新，有几首流行的军歌都是颂扬他的军功的。我非常爱他，在他负重伤期间，我精心看护他。我记得他常对我讲他作战的经验，也讲他在一次与人决斗时如何把对方打死。鲍里斯哥哥的阅历则显得平淡无奇。我的两位姐姐中的一位已于两年前（1909 年）去世了。

我外祖父家的几位成员在一些方面较为出名。有一个嫁给上校的姨母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她的长女就是知名的神道家——勃拉瓦茨基夫人。我的这位表姐——叶莲娜·彼得罗夫娜的个性与经历，值得在此稍作介绍。

这位表姐比我年长很多，所以关于青年时代的她我已没有什么回忆了。我听闻在她的母亲韩夫人死了以后，她和她的妹妹与我的外祖父住在第比利斯城。她按照这个家庭的惯例，很早就结了婚，嫁给埃里温省的副省长勃拉瓦茨基，住在埃里温城，但不久之后，她就离开了她的丈夫，回到外祖父身边。在外祖父宽敞的住宅里，外祖父一见到她，便立刻决定尽快把这个麻烦的女人送到她自己的父亲那里去。那时她的父亲是驻圣彼得堡某军队的炮兵上校。高加索地区那时还没有铁路，要把她送往首都并非易事。外祖父想了一个办法，从家里的一大群奴仆中选出了两男两女，其中包括外祖父的管家，护送这位未来著名的神道家乘着宽

敞的四匹马拉的马车到波提去。本来打算从波提用船把她送到与俄国内地有铁路可通的港口，但当他们到达波提时，港中停泊着几艘轮船，其中包括一艘英国的船。据说，勃拉瓦茨基夫人立即和这艘英国船的船长套近乎。简而言之，一天清晨，护送的仆人惊讶地发现这位夫人和行李已经不翼而飞。原来她偷乘了英国船到君士坦丁堡去了。

她传奇的经历后来发展如下：在君士坦丁堡，她在马戏团里当骑手。当时最著名的歌剧低音演唱家之一——米特罗维奇和她有了一段恋情。她后来退出了马戏团，跟着这位歌唱家到他即将演出的另一个城市去。不久，外祖父接到米特罗维奇的信，宣称他已与叶莲娜结了婚，并自称"外孙女婿"。这位著名的低音歌唱家显然并不因为她尚未与她合法的丈夫——埃里温副省长正式离婚而感到为难。过了几年，这位表姐又给外祖父母带来一个新的"外孙女婿"，一个来自伦敦的英国人从美国寄信来说他已和这位表姐结了婚，他带着她在美国旅游。不久之后，她又在欧洲出现，成了六十年代著名的降神者休谟的得力助手，以后家里又得悉她两段耀眼的经历。他们从报纸上得知她在伦敦和巴黎开了钢琴演奏会，后来又成了塞尔维亚的米兰王所供养的皇家歌咏队的经理。

十多年之后，这只误入歧途的羊，也许对于她的冒险生活感到厌倦了，决定回到她的家乡。她居然在这个时期获得了我外祖父的许可，回到了第比利斯。她承诺要改变她的作风，甚至回到她的合法的丈夫那里去。就是在这一次她回家的时候，我才初次看见她。这时她已饱经风霜，形容憔悴了。她那当初美貌的脸庞上已刻下了奔波放荡的一切痕迹，她的体形也因为早年发胖而变形。此外，她不大注意仪表，喜欢穿宽大的晨装，而不爱着精致的服装。但是她的一双眼睛却很有特点，她有一双很大的宝蓝色的眼睛，当她兴奋地说话时，她的眼睛以一种难以形容的方式闪闪发光，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特别的一双眼睛。

就是这个表面上已经不再美貌的女人使得第比利斯社交场的许多人晕头转向，她靠在我们的家里举行灵感的降神会而做到了这一点。我至今仍记得，每天晚上，第比利斯社交场的一些重要人物都在我们家里集会并围绕着叶莲娜·彼得罗夫娜。在这些客人当中有沃隆佐夫——达什科夫伯爵，奥尔洛夫——达维多夫伯爵以及从两个京城纷纷跑到高加索来寻乐和冒险的纨绔子弟。降神会一开就是整个晚上。我的这位表姐不仅用敲桌子、招魂与念类似通神的咒语以显示力量。有一次她使隔壁一架明明盖着的钢琴发出声音，仿佛有双看不见的手在弹琴。当时我在现场，这是应一个客人的要求表演的。虽然我当时年纪很轻，却对于这些戏法颇不以为然，只把它们看作是一些骗人的把戏。这些降神会都是瞒着我外祖父母举办的，我的父亲很不赞成表姐所做的事情，我认为勃拉瓦茨基夫人的法术一定是从休谟学来的。

勃拉瓦茨基夫人与她的丈夫和好了，以致在第比利斯安下了家，但这也未能引导她走向正路。有一天清晨，她在街上又被米特罗维奇勾搭上了。这个著名的低音歌唱家这时在艺术和其他方面正在走下坡路，他在欧洲出了一阵风头之后，不得不接受第比利斯的意大利歌剧院的聘请。这位歌唱家显然毫不迟疑地要求和我的表姐重温旧梦，并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这段丑闻的结果是勃拉瓦茨基夫人和这位低音歌唱家一起离开了第比利斯。他们来到基辅，这时年近花甲的米特罗维奇在他的“夫人”指导下开始学用俄文唱歌，他成功地演唱了如《为沙皇祝寿》、《人鱼公主》等俄国歌剧，当时基辅的总督是顿杜科夫·科尔萨科夫公爵。他长期在高加索任职，曾在叶莲娜·彼得罗夫娜的少女时代就认识了她。我不能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性质，只是有一天清晨，基辅市民发现满街的门上和电线杆上都贴着一张传单，上面写着一些让这位总督感到非常难堪的打油诗。原来这些小诗的作者不是别人，就是勃拉瓦茨基夫人，于是这一对“恋人”不得不离开

了基辅。

此后从敖德萨传来消息，她与她的忠实的低音歌唱家伴侣出现在那里。当时外祖父母和我的父亲已经在第比利斯相继去世。我们全家搬到敖德萨居住，我的哥哥和我就在当地的大学读书。这一对奇怪的伴侣在经济上陷入了窘境。因此我这位多才多艺的表姐开了一家墨水厂和零售店，又开了一家卖假花的铺子。那时她常来看望我的母亲，我也上她店里去过几次，因此与她熟悉起来。她对于各种不同的技能与知识的学习能力是如此之强，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像。她在这方面的才能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她是一个无师自通的音乐家，居然能在伦敦和巴黎开钢琴演奏会，尽管她完全不懂音乐理论，却曾指挥过一个庞大的乐队。同时，尽管她根本没有认真学过任何外国语言，她却会很流利地说几种语言。她作诗的技巧，也令我惊奇。她能很随意地写出很长的气势宏大的诗篇，她也能写出各种题目的散文。她能说出种种荒诞无稽的名人轶事，并具有使她的听众和她自己着迷以致相信所有她所说的才能。她无疑有着一种文学的天赋，莫斯科的编辑卡特科夫是俄国新闻史上的名人，曾对我说十分赞赏她的文学天才，因为她在他的杂志《俄罗斯导报》投过的题为《来自印度的丛林》的几篇故事稿证明了她的文才。

勃拉瓦茨基夫人在商业和工业方面的经营，其结果自然是悲惨的失败。这时米特罗维奇接受了开罗一家意大利剧院的聘请，两人就动身去了埃及。这时，他们的情况是相当糟糕的，他像一只没有牙的狮子，长年在他的情妇——一个肥胖而邋遢的老妇人的脚下。在非洲海岸外，他们的船遇到了风暴，所有的乘客都掉进了海浪里。米特罗维奇救出了他的情妇，自己却被淹死了。勃拉瓦茨基夫人走进开罗城时，穿着一条湿透的裙子，一无所有。她是如何摆脱困境的，我无从得知，她之后又在英国出现，成立了一个神道会。为了加强这个新信仰的理念，她旅行到了印度，

在那里研究印度人的神秘学。从印度回来之后，她成为许多热心于神道的人的中心人物，作为公认的神道学家居住在巴黎。不久，她病故了，但神道学的传道还是很盛行。

让那些怀疑宇宙源于精神、怀疑人有独立灵魂的人们去评价勃拉瓦茨基夫人的人格吧。她在世时，她的灵魂无疑是依赖于她有形的肉体。不知道这灵魂是从幽冥世界的哪一个特殊领域来的，也许是天堂，也许是地狱。总之，我觉得在这位非凡的女人身上具有某种鬼魅的东西。

当我回忆我的青年时代，我清楚自己是在绝对忠君的氛围里成长的。我记得的最早的一件事，就是在那间保姆陪着我的屋子里，忽然来了许多亲人，他们都在放声大哭，原来是听到皇帝尼古拉一世逝世了。只有丧失了十分亲密的朋友才能使人如此痛哭流涕。我对于我所为之效力的皇帝、以及一般而言对于君主制的忠诚，一定是源自于一种遗传……

我的双亲对于我幼年的教育很舍得花钱，雇佣了一些佣人、保姆与老师，他们自己却不大关注我们。结果我们就不能确保不受任何腐化行为的影响。小时候我就看见了奶妈（母亲自己不喂奶）、保姆和她们各自有时喝醉了的丈夫之间的丑恶行为。我哥哥鲍里斯比我大一岁，当我们长大了一些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是一个爱喝酒的退伍的高加索人，后来又请了一个法国的退伍海军军官来管教我们。不久，当局因为他的桃色新闻而把他放逐了。我们又请了一个瑞士先生，他却贪恋我们的保姆，于是父亲从多尔帕特又请来一个德国老师来代替他。保尔松先生教我们多门功课，其中有历史、地理和德语。由于某种原因，我没有从他的德文教学中学到什么，实际上我始终没有学说德语。相反我很早就会说法语了。事实上，我觉得说法语比说俄语还省力。

为了进大学预科学校（大学之前的中等学校），我的父母便同时请了当地正规的预科学校的几个教师来为我们准备入学考试进

行补习。我们终于被录取为未经考试入学的四年级（一共是七年毕业）的学生，每年升级也无须考试。我根本不去读书，经常逃学。教师们纵容我，部分的原因是考虑到我的家庭背景，部分因为他们对于我的学识或品行都不用负什么责任。我那时的精力都耗费在音乐上，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到当地音乐学校上课。此外，鲍里斯和我都热衷于户外运动，我们常出去骑马，在罗斯季斯拉夫舅舅的提议下，我们又学习了击剑。毕业考试时，没有一门功课我能写出像样的答案。尽管如此，我仍然领到了毕业证书，可以凭此进入大学。不过毕业证书上标注了一个很低的品行分数。当时，我快满 17 岁了。

我该离开童年和少年所居住的地方，到远处有大学的城市去读大学了。我进入生活中的一个新阶段。我回忆起来，那些年的生活是很富裕而且自由的。要说明我们的生活方式，只需提出一点就够了，我家雇佣着 84 个仆役。不用说，我家是社交聚会的场所，来的人如格鲁吉亚的大主教伊西多，他常在我家吃饭。

我父亲起初想把鲍里斯和我送到基辅大学去，但最后他选定了在敖德萨成立的一所新大学。那年秋天，父母带着我们出发去敖德萨。到那里才发现我年龄太小，大学不收，此外我的操行成绩低也是障碍之一。因此父母决定让我再在当地的黎希留预科学校读一个学期。父母回第比利斯去了，我们单独留在敖德萨。

这时，我突然发觉哥哥和我都没有什么正经的工作，要是这样浪荡下去，早晚我们注定一事无成。这是我第一次发现我具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与坚强的意志与决心，我以后都一直保持着这两点优势。我想出了一个具体的行动计划。我们两人应当离开敖德萨，因为此地吸引人的事物与诱惑很多，不适合认真读书，而应当到基希涅夫去，那里对于我们来说十分陌生，我们将请几位可靠的预科学校教师当家庭教师，用心读书，直到再一次通过毕业考试为止。我说服我哥哥去共同实行这个计划，我们两人就到基

希涅夫去，经过六个月的努力用功，我们获得了当地预科学校的毕业证书。于是我们回到敖德萨来，进入了大学读书，如果我没有记错，那是在1867年，我在物理数学系注册人学。

大学第一年念完，我们就动身回第比利斯，想在家里过暑假。在波提我们遇到了一个亲戚，他告诉我们父亲已经突然去世的噩耗。父亲的突然去世竟然使得家庭的经济全面瘫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总督巴里亚廷斯基屡次企图开发高加索的自然资源，他请了一个德国巴登邦驻敖德萨姓利佩的领事专营炼铁。这个德国人建起了许多铸铁场，但是不久就死了，剩下一个烂摊子。总督建议我父亲接管，因为我父亲曾在普鲁士学过采矿，因此，他去接管了这些铸铁场，为了发展炼铁事业，他不得不把他私人的钱投进去。因为我父亲自己并没有钱，他借用了我母亲的资本，当然这是经过她允许的。这样他把母亲所有的钱都花掉了，而且还负了一大笔债。当时有一种非正式的谅解，就是政府早晚都要接办这些铸铁场，可以偿还我父亲所有预付的资金。但是父亲突然死了，这个谅解一点也没有用处。父亲产业应负的债务是如此之大，以致于我们只好放弃继承权。因此，我们一家变得家徒四壁，只有总督赠给母亲的一点抚恤金与外祖父遗留给罗斯季斯拉夫舅舅、而舅舅又慷慨地转赠给母亲的一小笔钱。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年秋天我们决定最好把全家搬到敖德萨去住。亚历山大那时已经在军队中任职，只有他继续留在高加索。这种突然从富裕变为贫困的情况让母亲非常痛苦。我们的处境确实也面临困境。幸亏每月有50卢布的津贴，我哥哥和我才得以完成我们的学业。

在大学里，我废寝忘食地学习，所学的各科都颇有造诣。我非常熟悉这些科目，考试时轻松应对，根本用不着特别准备。我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无限小的数量论》。这篇论文在概念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因有高深哲学的观点而显得颇有新意。两年以前，我在巴黎一家书铺的橱窗里看到了这篇论文的译本。我本来准备

再写一篇天文学方面的论文，但是因为爱上了一个女演员，便毫无心思去写科学论文了。

在大学的几年中，我没有空余时间去关注政治。一般来说，我总是恪守忠君原则与基督教教义，这源于我幼年所受到的教育。由于这个原因，我不参加普通的学生团体，在那些年代，学生团体是受极端政治思想与无神论唯物主义哲学影响的。可是我的认真读书获得了同学们的尊敬。尽管我非常支持君主政体，却被选入了管理学生的基金委员会，这本来是一种很正常的储蓄基金，后来竟被认为是一个危险的机构而遭到了封闭，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包括我在内，都被带去审讯。检察长奥尔洛夫提起公诉，以流放到西伯利亚来威胁我们。后来我们得到了贵族团体——英吉利会的援救。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奥尔洛夫请求参加该会，但遭到拒绝。大臣打听原因，人家告诉他说，官员们反对奥尔洛夫对学生提出的荒谬的控告。结果，我们没有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穷乡僻壤去，而最终只是被地方法官判处每人罚款二十五卢布。

敖德萨大学的教授中有生物学家麦奇尼科夫与谢切诺夫等人，他们后来举世闻名，但相对来说数学系的教师并不突出。我们只有一个具有最纯粹与最高深的数学思想的颇具天赋的教授，但他是一个大酒鬼，尽管他有这个缺点，他还是对他的学生们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就是他的得意门生，在某种程度上也曾经是他的助手。

回想我当学生的那些年代，我不禁十分感谢我的母校。我非常尊重大学的学术研究与大学生活。按照大学一词的定义，就是致力于研究在一定时间存在的人类的全部知识，这就使学生按照他所专攻的一门学问，过着一种与科学发展的主流知识方面相接轨的生活。但是大学的学术生活必须有完全的自由，我并不想宣扬那种大学的假“自由”。假“自由”会把大学校变成为受澎湃的

激情、谎言与恶毒的讥讽毒害的政治论坛。一所真正的大学是鼓励开明思想的最好中介，开明思想是成果丰富的科学工作与其他一切建设性活动所需要的前提条件。

离开大学时，我决定准备过一辈子学术的生涯，特别是想去担任一名理论数学的教授。我母亲和罗斯季斯拉夫舅舅都很不赞成我的想法。他们认为一个贵族去当教授是不适宜的。最后，舅舅说服我接受一个挂名职务，当敖德萨总督科采布伯爵衙门的官员，同时仍继续我的学术研究。因为这种关系我时常出入伯爵府，在那里我结识了当时的交通大臣弗拉季米尔·鲍勃林斯基伯爵，他显然是听从法捷耶夫将军的意见，一再对我劝说在铁路上任职有很大的好处。我被他的话打动了，我告诉他我将放弃我的学术生涯去参加一个取得铁路工程师学位的考试。出乎我的意料，鲍勃林斯基伯爵对于我的这个打算竭力反对。在他看来，工程师这个等级简直是一大罪恶。他说，政府的铁路事务并不需要精细的专家，只需要受过高等普通教育的人，最好是有数学素养的。他劝我在实践中学习铁路建设事业的技术细节，不必专注于通过理论著作来获得学位。我听从了他的意见，便进入敖德萨政府的铁路机关去工作。

我穿上一身铁路人员的军事制服，这身衣服在当时代表着一定等级。我开始从最基本的做起，从铁路上各种主要的日常工作中来学习铁路事业。我卖过客运车票，研究过货物运输，做过副站长、正站长和列车上的稽查。六个月的实习之后，我升任运输科科长。

在那些年里，铁路由私人来运营获得了政府的高级官员的赞成，因此敖德萨铁路就移交给海军大将契哈切夫所主办的“俄国轮船商业公司”。这个新公司把一个颇具才能的运输科科长解雇了，只因为他是犹太人，而任命我去接替他的工作；铁路工程师翁格恩—施特恩贝格男爵被任命为铁路经理。这个新公司成立后

不久，就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故，在俄国铁路事故史上被称为“捷列古尔车祸”。

一条叫作捷列古尔的峡谷位于波多利亚省与赫尔松省交界的地方，一条铁路沿着这个峡谷铺设，向着三个不同的方向伸出三条支线。1875 年 12 月的一天，就在距离敖德萨 186 俄里的那个地点发生了一件悲惨事故，造成多人死亡。有一段铁轨已经拆卸下来去维修。可是，该处没有设立警告危险的标志，邻近的车站也没有接到拆修路轨的通知。草原上刮起铺天盖地的大风雪，铁路工人们到路旁的小屋里去暖和一下，喝点热茶。正当此时，一列满载着新募集的士兵驶往敖德萨的火车开足马力向这个地方开过来。经过拆去路轨的地方时整列火车摔到峡谷里去了。在列车滑下去的时候着了火，大风煽着火焰将列车的一部分烧成了灰烬。我们立刻得到了关于这次车祸的消息。翁格恩—施特恩贝格男爵随同我乘一列专车奔赴肇事地点。我们发现大部分新募的士兵已被烧死，那些受伤的人已送往医院。我不记得具体的死亡人数，但死难者一定超过了 100 个。

这场灾祸引起了广泛关注。那时候的舆论深受那种自由主义精神的负面影响，主要是憎恶那些地位或财富显著的人。这是一种鼓舞革命群众的精神，对于在几年以后谋杀像亚历山大三世那么伟大的皇帝是负有责任的。因此，为了平息民愤，必须找出一个替罪者，尽管那些官员对这场车祸只负有间接责任。结果把责任推到敖德萨铁路公司的经理，海军大将契哈切夫和我的身上，因为一般人认为我是管理这条铁路的中心人物，其实完全不主管铁路维修。自然，那个真正的罪犯，即负责修路的人也受到审讯，但他神智不清，逃跑了。起诉显然是缺乏公正的，蓄意要制造一种印像，使人觉得司法当局完全充满了自由主义的精神。因为本来我们两人并没有犯罪行为，也不能证明我们两人与那真正的犯人是共谋犯罪，敖德萨地方法院的检察官拒绝批准起诉书。于是

这个案子又移交给卡美涅茨刑事法庭，这是一个旧式的法庭。在那里，我们被判处四个月的监禁。

这时，俄土战事爆发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带着一批精干的人员来到基希涅夫。他对我说，只要我能顺利地运输军队，他可以在皇帝面前替我求情，撤销对我的判决。为了把这个事件述说完整，我想多说几句。当俄土战争结束时，我接到了陆军大臣发来的一封电报，说考虑到我们的服务可嘉，契哈切夫和我二人可以免除被判处的监禁。因此，我和我新婚的夫人就来到了彼得堡。有一天夜里，我的听差把我唤醒，告诉我有宪兵队的一位军官，带着一小队警察突然冲进屋来要找我。他们把我带到警察局，又从那里送到冬宫。在这里我才明白我为什么忽然被捕，看来司法大臣曾向皇帝报告撤消我们的判决是不合法的。皇帝可以特赦，但不能取消法院的判决。司法大臣指出，因为在捷列古尔事件上一个人也没有受到处罚导致了舆论大为不满。皇帝于是采取折衷的办法，下令将我拘留在警卫室两星期。此时我正从事起草关于铁路野外管理的章程。此外，我还在巴拉诺夫伯爵的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巴拉诺夫报告皇帝，说他实在离不开我，于是允许我白天可以自由，晚上却要回到警卫室去过夜。

当1877年俄土战事爆发时，我实际上就是敖德萨铁路的领导。因为这条铁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便直接受现役军队总司令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指挥。我的特别任务就是运输军队去前线。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成功地组织运送了大批涌往南方去参加切尔尼亚耶夫将军的部队的志愿兵。那时候，我是信仰"斯拉夫主义"的，我憧憬着能够占领君士坦丁堡。事实上，我是敖德萨斯拉夫民族协会的副会长。我们特设了一个事务所，专门管理运输志愿兵的工作。说也奇怪，在那个事务所工作每月净赚二十卢布的职员中，有一个人由于帮助保加利亚的国王斐迪南登位有功，结果成了保加利亚的内阁总理。这人就是斯蒂芬·

斯塔姆布洛夫。

把大军运上前线，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国的铁路运输效率非常低。虽然我们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制定的运输军队的计划，但因为车辆不够，所以各项计划无法实行。尽管如此，我通过努力奋斗与深思熟虑所想出来的行动使得我顺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面对机车严重缺乏的情况，我采用了美国早已实行并且现在仍以“美国制度”著名的行车制度。这项制度是机车的司机轮流换班使得机车日夜不停地开动。此外，出于紧迫的需要，我还在技术方面引用了其他改良的办法。

俄国西南地区的各条铁路是没有赢利的。俄土战争之后，包括敖德萨铁路在内的三条铁路公司合并组成西南铁路公司。我被任命为新成立的铁路公司的开发部主任。因为我的办公处设在圣彼得堡，所以我就居住在京城，遇到了斯皮里多诺夫夫人伊万年科氏，她长得非常美丽。我在敖德萨遇到她，她的丈夫是个品行放荡的人，换而言之是个一无是处、一事无成的人。她与他分居以后就住在敖德萨。在我的帮助下，她和她的丈夫正式离了婚，然后陪同我一起来到圣彼得堡。出于顾及我的夫人的感受，我收养了她的独生女为养女，但是立下了这样的协议，就是即使我们结婚后无后，她也不能成为我的继承人。

在那些年里俄国私人经营铁路正在蓬勃发展。这一时期，一些铁路大王手中聚积的巨额资金在不断增长。我曾认识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如古博宁——个具有许多常识的朴实农民，老波利亚科夫——个犹太教长，当代金融界和铁路界的领军人物，冯·梅克——个呆板的德国人，以及杰尔维兹，他那令人难以致信的巨额财富使杰尔维兹几乎迷失了自我，他在意大利建筑了一家宏大的公馆，其中养着一个表演歌剧的完整歌剧团只专程为他自己一人表演。

西南铁路公司的总裁勃利奥赫的发迹过程是相当惊人的，他

实际上就是一个卑贱的、完全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犹太人，原是一个铁路的小承包人。当他成功后，他就明智地意识到需要出国留学，然后他到德国的一所大学上学，回到俄国后，他以改信天主教作为代价娶了一个美丽的交际花。他在华沙定居后，开始修筑铁路。当我在西南铁路公司工作的时候，后来的财政大臣伊凡·阿列克谢维奇·维什涅格拉德斯基是就是他在圣彼得堡的代理人。后来，勃利奥赫对于修建铁路完全失去了兴趣，开始从事一些学术和政治活动。他出版了几本研究著作，其中有一本是《俄国铁路史》，其实这些书都是用他的名义出版的，而真正的作者是他聘请的专家。他又摇身一变成了宣扬和平主义的人士。我听说在亚历山德娜皇后和皇帝结婚后不久他就竭力劝她信仰和平主义，但是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名义上维什涅格拉德斯基是西南铁路管理处的经理，他在上司勃利奥赫面前的阿谀奉承的行为令我感到非常吃惊。实际上，因为维什涅格拉德斯基时常忙于许多其他事情，西南铁路的行政事务都是由一位名叫克尔别兹的青年工程师和我两个人负责。我除了供职于西南铁路管理处以外，还参加了巴拉诺夫伯爵的铁路委员会，实际上，我是该委员会的领导人物。起草了一份铁路章程算是该委员会唯一看得见的成就，这份章程几乎完全出自于我之手。尽管我受到交通大臣的反对，但这份章程则成了固定的规则，至今仍然产生效力。

同时，铁路营业连续有亏损情况。因此公司决定调我到基辅去，寄望于我能在那里帮助改善亏损的情况。我到了基辅，以集中管理为基础把整个铁路的管理工作进行了改组。公司想把我任命为这条铁路的经理，但政府以我没有铁路工程师的学位为借口不批准这项任命。到达基辅以后不久，维什涅格拉德斯基被任命为财政大臣，西南铁路公司经理则由安德烈耶夫斯基继任。因为这个新经理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公司又向政府提请批准任命我

为经理，这一次政府让步了。在这样一个大铁路体系里，我是第一个没有受过专门工程教育的经理。

亚历山大二世皇帝遇刺时（1881 年 3 月 1 日），我在基辅，这个灾难性事件给我的影响非常之大，当时，我写了一封饱含激情的信给法捷耶夫将军。我在那封信里说政府在镇压革命党的过程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它把太大的飞弹投向太小的敌人。对这些革命党徒，我们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通过成立一个秘密的组织，用同样性质的反击来应对每一项恐怖的行动。我说，要是试图以整个国家机器的力量去征服敌人，就会像以大汽锤去敲碎一粒尘埃一样白费力气。

几天之后，舅舅告诉我说，我的信已转呈陛下，我可能会被陛下召见。不久，宫廷大臣约请我到圣彼得堡去同他面谈。在谈话过程中，他询问我是否仍坚持我致法捷耶夫将军信中所表达的见解，我肯定答复之后，他就将我介绍给他的副官舒瓦洛夫伯爵。这位伯爵把我带到他的宅邸，一进他的书房，他就拿出一本圣经来，说已按照我信中的建议成立了一个名叫“神圣兄弟会”的秘密组织，并要我对这个秘密组织宣誓效忠。我很惊异而狼狈地完成了宣誓的仪式，心里暗暗后悔，因为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轻率鲁莽的事情。于是，舒瓦洛夫伯爵宣布我已被任命为基辅地区的主要组织者，也告诉我关于这个组织的一些秘密。每一个会员要组织五个人的小组，小组与小组之间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神圣兄弟会”是一个极为严格的秘密团体，很像中世纪威尼斯的一些秘密结社。舒瓦洛夫伯爵交给我一本密码，对我解释了会员们使用密码的规则，于是我立刻回到了基辅。

事隔不久，我奉“神圣兄弟会”的命令去了巴黎，并说在那里我将得到进一步的指示，我服从了这个命令。我在巴黎接到了信件通知，一个名叫波梁斯基的会员住在我所住的旅馆（大剧院对面的大饭店），他负责暗杀两年前企图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的

那个革命党徒哈特曼。我认识波梁斯基，他是乌克兰军团的一个勇敢军官。我以前在敖德萨遇见过他，那时他和一群女演员在一起。用暗号表明了彼此的会员资格以后，波梁斯基和我打了招呼并说了如下一番话，使我大吃一惊。他说："如果我不能干掉哈特曼，你来到巴黎是为了干掉我对吗？我告诉你，我已经接到圣彼得堡来的暂缓执行的指示，所以我现在还没有杀他。这也许和你来到这里有关系。但是让我们明天清晨五点钟就起床，我将向你证明，我能够随时杀死哈特曼。这件事全权由我来决定。"

第二天清晨，我们动身到拉丁区去，在一所房子前的街上停下来，我的同伴吩咐我去负责监视这所房子，等了很久之后，我们看见哈特曼从大门里走出来。两个在附近徘徊的带枪的流氓跟着他。过了一会儿，这两个流氓回来了，向波梁斯基发脾气，说他们两人不想干了，因为这个任务实在让人厌烦。看来他们是我的同谋者雇来的，命令他们故意同哈特曼挑起一场争吵，然后在争吵中把他杀死。可是波梁斯基总是不发出最后的命令，他们两人就愈来愈不耐心了。波梁斯基宽慰这两个刺客一番，对我解释说不杀哈特曼的命令是前任驻希腊大使的公子左格拉夫发出的。波梁斯基建议说："让我们去'勒·瓦森'餐厅吧，左格拉夫会在那里，他告诉我说他正盼望得到圣彼得堡来的消息。"

我们在餐厅找到了左格拉夫。他告诉我们说，高级副官维特根施泰因即将来巴黎解决这件事，这是最后一着了。我立即对我的同伴们说，我不想在巴黎等维特根施泰因了，于是我乘了下一班的火车回到基辅，这件荒唐的事情使我感到非常厌恶，而且我还听说各式各样的社会渣滓与抱有往上爬的野心的一些人为了攀附上权贵，都在踊跃地加入秘密的"兄弟会"。事实上，"神圣兄弟会"闹得满城风雨，大家都在纷纷谈论它。我觉得有必要采取措施去尽快结束它。

因此，我写信给沃隆佐夫—达什科夫伯爵，说秘密会的存在，

我也应该担负一部分的责任，但是它已经很快地堕落了，其现况已经变得难以容忍。我写道，尽管面临这样的局面，既然我已经对“兄弟会”宣誓过要效忠于它，我觉得退出“兄弟会”是不合时宜的。为了挽救这个局面，我建议应将该会的章程与会员名单全部在《政府公报》与其他报纸上发表，这样，那些不是真心实意为会旨而献身的会员就可能因为害怕遭到革命党徒的报复而自动退出，这样该组织就可以得到彻底的清洗。我在这封信的末尾声明，我愿意用一个月的时间等待答复，届时如果没有答复，我就不再认为我是“神圣兄弟会”的会员了。经过一个月后杳无回音，我便将密码和在我手中存着的其他材料退回该会，从此就结束了“神圣兄弟会”这一荒唐的事情。

我想在这里记录下关于 80 年代早期的另一桩事件的回忆，那就是我在基辅与敖德萨目睹的反犹太暴动。对于这种屠杀犹太人的事件，必须承认当时政府的处理态度是正确的。当局并没有鼓动人民去反对犹太人，这是正确的。暴动是自发的，这些暴徒的非法行为立即被政府严厉地镇压。敖德萨总督科采布将军对暴动者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包括用刺刀进攻暴徒，结果骚乱被成功地镇压了。

我现在继续谈谈我在西南铁路当经理的活动。实事求是地说，我幸运地得到了许多优秀的铁路员工的帮助，他们成为了我的助手。因为俄国的西南部是为数众多的犹太人和波兰人，所以他们中有好几个是犹太人与波兰人。近年来，由于产生了极端的民族主义政策，许多这样很有能力的人才都被开除了，这样做毫无益处，我付出的努力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铁路的财政情况很快获得了改善，公司不但没有亏损，而且不久就可以支付相当丰厚的股息。

我在基辅的活动，还包括不时创作一些文学著作。有时我会撰写一些文章投稿到如卡特科夫的《莫斯科新闻》和阿克萨科夫

的《罗斯报》等，我也参加创办了一份基辅日报，在这个报纸上我组织了关于铁路和财政问题的辩论。我提倡铁路私有私营，反对政府干预铁路事务。这些讨论的结果促使我决定详细制定出铁路税务原则的理论。这个理论也能够在我写的一本名为《铁路税则原理》的书中体现，这是我在马连巴德治病疗养时所写的。以后这本书的几次再版，我都陆续加以修订，据我所知，铁路税则的专家们至今还在用这本书作为工作指南。

我记得亚历山大皇帝登基后不久就出巡基辅。他由直系家属与他的两个弟弟弗拉季米尔亲王和阿列克塞亲王陪着他。当皇帝回京时，我因职位的关系也与皇帝同乘一辆火车。火车出发之前，皇族乘客们集聚在候车室中，当时皇储和太子格奥尔基都是非常顽皮的小孩，他们在很多着装华贵列队欢送皇室贵宾的人群中跑来跑去。看到这种情景，弗拉季米尔亲王就逮住了他，打了他的耳朵一下，说道："听话，乖点"，这个男孩就是十三年之后全俄罗斯的君主。他们的保姆一路上一直不停地为这两个孩子担心受怕。只要火车一靠站，他们就马上跳下车，跑去看火车头，我也时常担忧他们是否会被遗忘在某个车站上。此后，我以西南铁路经理的身份还两次陪同皇帝在南方旅行，一次是他在布列斯特与比亚威斯托克的车站附近检阅演习军队，一次是1888年夏天他旅行到雅尔塔。照例是由交通大臣拟定御用列车的时间表，无须征询地方铁路当局的意见。我在当时接到的时刻表，御用列车在罗夫诺站与法斯托沃站之间的一段路程内将以一种相对安全的速度行驶。事实上，在列车到达几小时以前，我才接到电报通知说御用列车不是轻便列车，而是由许多大而重的车厢组成的。这样一列火车，按照时间表上所要求的速度行驶，需要用两个运货机车。我完全意识到，这样重量的列车以这样快的速度驾车非常危险，只要铁路的任何地方稍有差错就会带来翻车的危险。尽管如此，除了遵照规定的时间表以外，我也别无他法，我在罗夫诺上了车，

驶向法斯托沃。我在交通大臣的车厢里过夜，这节车厢在列车的末端，与其他车厢不相连。别的人都进入了梦乡，我却躺在那里一直提心吊胆，深怕会出现什么意外。

当我们安全到了法斯托沃，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回到基辅时，我向交通大臣呈交了一份报告，说我不愿造成有损尊严的事，并已经遵照御用列车的时间规定开车，但我认为以如此高的速度开车是不行的，而且极不安全，并且我引证了技术上的资料来说明我的观点。最后我声明，如果御用列车向北运行的速度不降低到符合安全标准的程度，我将对其不负任何责任。交通大臣复信说，时间表可以照我的愿望进行修改。

我搭乘御用列车往回开的时候，我发觉所有的人似乎对我都有点侧目而视。沃隆佐夫—达什科夫伯爵本和我家早有交情，并且从我童年时起就很了解我，这时竟装作不认识我。后来交通大臣，高级副官钱里文走来向我说道："陛下命我告诉你，他对于西南铁路的服务非常不满。"我这才明白刚才人们为何对我如此冷淡。

我正想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解释，皇帝走到我们面前对我说道："你想解释什么？在别的铁路线上，我也以同样的速度行驶，什么事也没发生，只有在你们的路上不能开快车，难道只是因为这是犹太人的铁路？"（皇帝暗指铁路公司的一把手是个犹太人。）皇帝说完就走开了，我们与交通大臣继续那令人不快的谈话。他的主要论点是皇帝曾在其他路线上以同样的速度行驶，并无一人表示反对。我终于再也按捺不住，鲁莽地抗议道："大臣阁下，别人喜欢怎么干就怎么干，但我不想使皇帝的性命遭到本可以避免的危险，以这样快的速度开车，很可能将折断他的颈骨。"

皇帝当然也听到了我的话，他显然对于我粗鲁的态度很不高兴，但他默然不语。就以往的事实来看，由于我的性情与天生的耿直，我可以说，只有在亚历山大三世面前我才毫不拘束地表达

意见，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秉性锋利与直言快语是尼古拉二世皇帝为何对我疏远的原因，而我的性格的这些特点在我作为大臣为亚历山大三世皇帝服务的时期从未引起他的不快。在这个方面，也如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现在的皇帝与他那威严的父亲是截然不同的。

过了两个月，到了10月16日夜间，我接到了御用列车正开往法斯托沃的电报通知，皇帝将从该地前去基辅。我立刻下令让一列专车准备开往法斯托沃。但御用列车路线更改的电报在我还未离开基辅时又传了过来。不久之后，我就知道了这次突然改变的原因。过了几小时，我又接到第3个电报，命我立刻到哈尔科夫去，以专家的资格调查刚才御用列车肇事的原因。于是我直赴哈尔科夫，由该城转赴出事地点，即属于哈尔科夫省的博尔基村庄附近。

这次调查证明了博尔基事件正是我陪同御用列车从罗夫诺到法斯托沃时所一直担心发生的事情。我推断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御用列车由两个货车机车牵引，以我之前所竭力反对的快速行驶。货车机车本来就不适合高速行驶。只要速度过快，这样的机车就会摇摆，此时如果有松动的铁轨，列车就很容易冲出路基而摔毁。这次事件正是这种情形下发生的。列车脱出铁轨滑下堤去了。造成了21死亡，37人受伤。皇帝和他的家属在出事的一刹那正在餐车里。这节车厢完全撞碎了，整个车顶掉在他身上，幸亏他的力气大，他以背支撑着车顶，因而餐车里其余的人得以安然无恙。面临这样严重的危险，他依然十分镇静，没有失去绅士的风度。

在写调查报告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把罪责归因到负责拟定御用列车行程时间表的交通大臣和负责视察该车的舍尔瓦勒男爵两人身上。结果这两人后来很快就被迫辞职了。值得一提的是皇帝同他们分离时并没显示出应有的厌恶。他们之所以辞职是因为博尔基事故引起了群情激愤。皇帝也罢免了铁路管理局局长的职，

因为皇帝认为他应对这次事故负主要责任。

此番变动后不久，财政大臣维什涅格拉德斯基邀我担任新设置的铁路事务局局长。这个邀请完全在我的意外之外。这个局是按照我参加巴拉诺夫委员会时所制定的章程而作为财政部的一个分支机构建立的。全国铁路的财务由它来管理，这个局管理着全国铁路系统的经济方面，其中包括尤为重要的运价领域在内。

我告诉财政大臣，我不愿意因为一个局长的政府职位而放弃自由而优裕的私营公司的职位。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回答说，这是皇帝本人的意愿，皇帝打算提升我任更高的政府职位。可能是由于亚历山大还没有忘记由于我受了钱里文将军斥责而发生的那件事。维什涅格拉德斯基的信中还引了皇帝的话以示皇帝坚持任命我去担任该职。皇帝说，“就是那个生性耿直的人，他几乎当着我的面就对交通大臣说结果会折断我的颈骨，但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他的话应验了。我的意思是要大力提拔那个人。”

我赶紧通知财政大臣，说我当然不愿违抗皇帝的旨意。但我请求他报告皇帝，说我现在的年俸是5 万多卢布，此外别无其他收入，而一个局长的年俸只有8 千卢布，难以充分维持我的生活。皇帝同意除了局长的本薪8 千卢布之外，用他私人的资金再津贴我 8 千卢布，于是我便接受了这项任命。因此从 1888 年起，我便成为了一名政府要员。

我因为职务的关系，必须住在圣彼得堡。因此，我与我的妻子又迁到了首都。相对于基辅来说，我们的日子不能过得像那样优裕，又因为我们两人都不适宜北方的气候，这次变动完全不合我妻子的心意。我刚到圣彼得堡就与其他几人一起在加特奇纳行宫受到了皇帝的召见。皇帝说他见到我很高兴，他尤其欣慰我已接受了新设置的局长职位。皇帝和我们这批人中一个穿上校军服的削瘦的人谈了很久。他们所谈的主题，我后来得知是各种合理减肥的办法。大概皇帝对他日渐加重的体重很着急，这个上校以

前是很胖的，那时皇帝就认识他，所以留住他并向他追问他是如何在减肥方面获得成功的。

铁路事务局下设财务处和运价处。除此之外，还有与该局有关的一个运价委员会和一个运价事务会议，前者负责审核各铁路公司提出的运费价目表，后者是在财政大臣主持下处理需要立法机关批准的运价问题。作为铁路事务局局长，我的主要工作便是消除与整顿当时在运价规定方面存在的各种紊乱状态。运价的最高限度由运价条例规定。当时大半以上的俄国铁路都集中在私人手中，在这个最高的运价限制之外，那些铁路公司可以为所欲为。为了竞争，这些公司采取了大量降低运价的办法，既然国库保证了一部分对铁路投资的利润，结果造成了国家或俄国纳税人蒙受损失。他们订出了各种秘密运价，因为各铁路公司反正不必公布它们的运价，任意采取各种做法增加紊乱的状况。

为了结束这个混乱可悲的局面，我引进了政府管理铁路运价的制度。最初私营公司抱怨我在调整运价的努力是在损害他们的权利。但实际上不久之后，他们就醒悟到我所引进的规则对他们来说也是有利的，他们对我的质疑才消失了。我所实行的运价规定终于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扭转了铁路四千八百万卢布亏损，并且这些规定至今还有效。

1892 年初，更让京都政界人士大感惊异的事情就是我被任命为交通大臣。在这里，我应该先说说我前任的几个交通大臣。在博尔基事件发生时，交通大臣是波西耶特，只因为他是阿列克塞亲王的海军教官，他就被任命担任这个职位。他很诚实，但非常愚昧。他对于铁路事务几乎是一窍不通。他在视察铁路时，只限于检查盥洗室，如果他发现盥洗室不清洁，他就大发雷霆，但是如果盥洗室是清洁的，他就满意而归，再不视察别的地方。在我以前的两位大臣是保克尔和丘别涅特，后者是一个官僚，对于铁路事务也是一无所知。他任职时期，铁路运价最为腐败。他派某

个由他任命的文德里希上校去消除货运混乱状况，但结果是这个上校的活动却使紊乱情况严重到了极点。

当我担任一个新职时，我通常不愿意大量变动人事。不过这次我却坚持必须把文德里希上校免职。这人在1905年革命期间因为得到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提携而展露头角。这些年来，他在铁路上滥用威权，开除了很多人，并出了种种邪恶的点子去镇压铁路工人的反抗。我任命了两个富有经验的铁路局长与几个地方上的铁路人员。对于全国公路和水路的情况，我的了解也很浅显，但我认为在管理交通部的局里滋长着懈怠与腐败的风气。我发起了一个反对这些腐败行为的运动，但因为我的任期很短，所以我的努力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我对博尔基事件仍记忆犹新，所以我拟定了一套新的行车规则来保障御用列车的安全。虽然这些规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帝侍从们的舒适，但却立即获得皇帝的赞同与许可，直到今天还在实行着。

虽然在这些年里我在京都受到公务的束缚，但我的生活并非完全固定不动。1890年秋天，我陪同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大臣到突厥斯坦旅行。我们视察了里海沿岸的铁路线并游览了撒马尔罕。这些地区富有的天然资源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像，那时候这些资源还完全没有开发。从那以后，棉花工业在该地区已逐渐发展开来，但是珍贵的矿藏资源还一直埋藏在突厥斯坦的土壤中。

我们又游览了里海沿岸的木尔加布，那里是皇室领地。政府正计划让这里的大片地产试种棉花与其他经济作物，引阿姆河的水来灌溉是为了使土壤肥沃。由于此地的水源稀少，人民向来非常珍视水，所以引水灌溉的工程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了这个原因，农业试验工作遭到当地人民的极端敌视，他们以为俄皇不但占领了他们大量的上地，现在又企图夺取他们的水资源。他们感到非常苦恼。当然，这方面的情况无论是想要创设木尔加布农业试验的亚历山大二世或是亚历山大三世都不了

解。我们传电报给宫廷大臣说明原因，向他报告木尔加布草原的灌溉可能有利于棉花的培植，但当地人民与地方总督对于这个计划已采取敌对态度，原因在于木尔加布领地的灌溉会使当地的可用水源急剧减少，而当地人民生活所依赖的农业将受到危害。我怀疑皇帝根本看不到这份电报。

在我们赴突厥斯坦的途中，我们游览了高加索，我陪我的妻子在基斯洛沃德斯克住了两天，她正在那里治病，这是一个有名的疗养胜地。我们离开的时候她非常高兴，觉得她很有希望恢复健康。我们约定在大约同一时候回圣彼得堡。但后来她治疗完毕后并未直接北返而去契尔尼哥夫省去看望她的哥哥，她写信告诉我她在那里生活地非常快乐。这时我已返回圣彼得堡了。可是，在我到达那里后不久，就接到了一个说我的妻子因为心脏病突发在基辅逝世的电报了，我于是赶赴该城料理她的后事。

我的妻子过世后约一年，我见到李萨涅维奇夫人，不久之后，她就与她丈夫离异而与我结婚。我心里明白皇帝会认为一个政府大员要娶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是不合适的，所以在我结婚之前就想要辞去大臣的职务。然而皇帝对于我这次结婚的情况非常清楚，他认为我的行为并无什么不妥，并且对我以辞职维护皇帝的信任表示敬佩。尽管如此，宫廷同僚对我的婚姻一直不予理解，直到1905年我的妻子才可以参与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

作为交通大臣，我在1892年春天沿伏尔加河作了一次长途的游历，由于当时此地流行着霍乱病，为了视察疫区各省所采取的各项防疫措施，我奉皇帝之命做了这次巡视，我的行踪遍布每个城镇、每个村落，视察医院和药房，与病人密切接触。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地缺乏医生。医科学校的高年级学生担任了几乎所以的医疗工作，必须提到的是，俄国学生们为这项英勇的工作不惜贡献出他们的精力和生命，俄国学生因此获得了荣誉。我不断地给皇帝写报告，到我返抵圣彼得堡时，皇帝说他听到学生们的这

种自我牺牲、为国服务的精神感到非常高兴，又说他们这样的行为证明了他们是知识界中心灵最高贵的成员。在皇帝刚继位时，他曾对学生团体怀有敌意，认为它们是民变和革命的源头，这次事件过后，学生团体在它心目中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我担任了约为6个月的交通大臣。在8月份我被任命为财政大臣。行文至此，我接下来想简略地叙述一下亚历山大三世皇帝的性格与这位伟大的君主统治时期的俄国情况。



第二章　我对亚历山大三世的回忆

非常不幸的是，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时期很短，仅仅只有13年，但这也丝毫不能抹杀他高尚卓越的品格与表现。在他逝世那天，他的这种品格赢得了全世界的敬意。但是与他同时期和后代的俄国人，却对他并不是很尊重，许多人完全是以轻蔑的眼光看待他的朝代，鉴于他早年承受的不幸与登基时可悲的环境，这样的轻视更是对他的不公平。

在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由于他的哥哥尼古拉是太子，因此老皇帝对亚历山大三世的教育与培训并没花费太多心血。此外，家庭环境对他也很不利。当他父亲60岁时，很多成年的子女都已三代同堂，这对这位未来的皇帝的敏锐的道德感是种严重的伤害。当时对商业团体出卖特权和租让权以谋私利的行为在政府要员中尤为盛行，尤其是亚历山大二世那出身低微的皇后，即尤里耶夫斯基公主也参与其中，他认为这侮辱了他的耿直与诚实。

此外，再想一想当时混乱的国情。虽然亚历山大二世是一位伟大的解放者，但他在位的后期全然不理会改革的事项，把一些自由主义的人士都赶进了革命党人的队伍，所以当这位皇帝开始关注政治的时候，他所见到的是充满极端激进思想的政党，因而他强烈地感到，必须采取严酷的手段来镇压反动运动。他的老师波别多诺斯采夫一度鼓励这位太子采取这种态度。

此外，对土耳其的战争虽然表面上以获得了军事胜利而结束，

但却削弱了国家继续发展的能力。这场战争的取胜更大程度上是依靠数量上的优势而非战略战术的优越，俄土两国订立了一个对俄非常有利的条约，只是这些胜利的成果的一部分被柏林会议所剥夺。因为担忧对奥作战会牺牲过重，俄国勉强答应了取消与土耳其所签订的有利于俄罗斯的圣斯特法诺条约，这种耻辱留给未来的亚历山大三世皇帝的印像是痛苦而长久的，他在这次战争中还曾担任过一支派遣军的司令。

当时的财政大臣赖特恩曾致力于建立俄国的金属本位制，想借此把银卢布的币值提高到法定价格，因为自塞瓦斯托波尔战争以来银卢布币值一直很低。这次战争使赖特恩的工作以失败告终，带来了我国金融停滞发展的 20 年。到 20 年后我担任财政大臣时，帝国的币制才建立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之上。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连续发生的恐怖事件一直困扰着亚历山大二世执政的后期，1881 年 3 月 1 日皇帝本人被炸死。据说，亚历山大三世必须在沾染着他父亲的血的宝座上即位，而这次骇人听闻的事件为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我不否认亚历山大三世所受的教育程度有限。但我却不能同意有人把他看成冥顽愚昧之辈。他也许不够聪慧敏捷，但无疑具有包容心与同情心，这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远胜于精于权术。

在皇室和贵族中，最为勤俭节约的人要算亚历山大三世皇帝了。他给俄国人民树立了一个理财家的好榜样，而他勤俭节约的作风对于解决俄国的财政问题给予了难以估量的帮助。如果不是皇帝自己竭尽所能地计划对于国库的支出并且制止了浪费人民辛苦积累起来的公共基金，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和我恐怕永远难以在稳定国家金融的工作上有所成就。

亚历山大三世既在个人生活上勤俭朴素，又在政府经费上精打细算。他非常痛恶奢侈浪费，而选择过一种简单朴素的生活。当他吃腻了他自己的菜饭的时候就要吃一顿一般士兵的或是普通

猎人的饭菜。这种节俭有时不免过度。御膳确实是相当简陋的，而宫廷司仪官的伙食有时简直差到有损健康。亚历山大三世在衣饰方面也是极端简朴的。有一次我陪同他乘火车旅行，得到一个令我惊讶的证据。当时我身负重任，所以常常失眠，多次瞥见皇帝的侍仆在缝补皇帝的裤子。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不给皇帝换一条新的裤子而要屡次这样缝补旧的。他回答说："我是想要换新的呀，可是皇帝不允许。他坚持要把衣服穿到完全不能再穿为止。他的靴子也是这样。他不但坚持能穿多久就穿多久，并且不肯穿价钱昂贵的皮靴。如果我给他拿漆皮靴子，他就恼怒地把它扔到窗外去。"这位皇帝不喜奢华，而且也厌恶华丽的房屋。因此他从来不住冬宫而常常住在简朴的安尼奇科夫宫或加特奇纳宫。他住几间小屋，在那里过着俭朴的生活。他能够容忍朝廷的奢侈，仅仅是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礼节，但他时时刻刻在渴望着另外一种简朴生活方式，并且在他的私生活中为他自己创造出这种方式。

对于整个皇族而言，亚历山大三世就是一位真正的族长，全族人对他既尊敬又惧怕。他认为皇室成员无论在私生活或社会生活方面，都必须为全国树立一个道德的楷模。像现在的俄国亲王在国外的放荡行为在他在位时是非常罕见的。而皇室成员犯法一定会引起皇帝大发雷霆。廷臣中的任何人如果重婚都会引起皇帝的严重不满。

亚历山大三世的私生活是无可指责的，他的家庭也是有虔敬信仰的旧式俄罗斯家庭的极好典范。他是一个严厉的父亲，在他面前，孩子们虽然不至于恐惧，却总是感到拘束难安，只有他最宠爱的儿子米哈依尔却是例外，他不但不觉得拘束反而更随意起来。这种情形可以从一个内侍告诉我的一件趣事中可以看出。一个夏天的清晨，亚历山大三世正在花园里散步，这孩子的无礼怠慢使他感到不耐烦，他突然拿起放水的皮管来淋了米哈依尔一身水。没有再发生什么插曲，他们就一同去进早餐，这孩子把他湿

透了的衣服更换了。餐后，皇帝到他的书房去办公，照着平日的习惯，偶尔把身子探出窗外，而这时竟意外地从上面的窗口泼下来一股水，原来是米沙*预料皇帝会在窗口露面，所以在那儿提了满满一桶水趁机倒下来。毋庸置疑，只有米哈依尔才敢想出这个招，也只有他这样做了而不会受到惩罚。

作为一位君主，亚历山大三世对于他的臣民的繁荣与福利以及大俄帝国在国际上的威信曾作出重要的贡献。首先，他实施了有效的措施重新整顿了军队，这些军队在七十年代因为对土耳其作战曾陷入了混乱的局面。当我由他任命为铁路局长以及后来任大臣期间，实际上铁路修筑已经停止了好几年，在这一情况下，我们又继续开工并且得到了很好的成果，并制定了未来发展的规划。复兴俄国金融也在亚历山大三世时期成为可能。我以财政大臣的身份参与其中而倍感荣幸。亚历山大三世去世以后，他在财政上的良好影响一直都在发挥作用。事实上，就是因为这种影响，在他死后我的地位才能保持 8 年并最终完成了这项工作，实际上，尼古拉二世并不能欣赏我的努力，他之所以任用我只不过是出于他的先父对我的信赖。

我现在要谈的是对于那些认为亚历山大三世是无能而愚昧的人的一个有力的反驳。这里我所指的就是俄国保护关税制度的建立，这是为了鼓励和促进俄国的制造工业。由于亚历山大三世的明智，虽然他不具备专门技术知识，但他对于基本情况的了解绝对清晰，而许多具有专门技术学识的人却对此认识模糊。他很了解为了俄国经济享有普遍而持久的兴盛，俄国必须生产自身的工业产品和农产品。鉴于保护政策对于创立和发展工厂非常重要，他坚持建立一个适当的关税制度。因为这项计划遭到国内统治阶级和知识阶层的强烈反对，因此，他的这项努力需要坚强的信念

* 米哈依尔的昵称。——译者注

与决心。只有像亚历山大三世这样一个具有罕见的智慧与毅力的君主才能完成这样的事业。这位皇帝的成就对于俄国来说是一项伟大的贡献，正如俄国工业的突飞猛进所证明的一样，俄国在不远的将来其制造业领域也将跻身于世界先进大国之列。

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期间所通过的法案中，有两项几乎遭到了普遍的反对。其中之一是用1884年的大学校规代替过去60年代的大学校规。这项校规是由托尔斯泰伯爵和一群极端保守者的建议而通过实施的。我个人认为通过这个校规是十分错误的。颇具讽刺的是，连波别多诺斯采夫这位比托尔斯泰伯爵更为保守的前任教授，在国务会议与另外一次他所主持的私人会谈中，也对这项校规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不过，这项措施并未引起骚动，亚历山大三世治理时期的大学生活一般说来是很平静的，只有当他即位之初，几位杰出的教授，包括著名的麦奇尼科夫，因为当时的教育大臣杰利亚诺夫伯爵认为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太严重而被解除了职务。

亚历山大三世遭受非议的第二件事是地方长官制度，这种制度导致了农民永远不成熟而需要家长式的监护的政策。这个意见我认为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对将来造成了一些灾难性的后果。这项措施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我敢断言，皇帝的本意是极为善良的。他对农民怀有深深的同情。他与他们既同乐又分忧，保护无依无靠的弱者，从而实现了基督徒君主的理想。

亚历山大三世终于意识到主要是由于他父亲反复无常的性情引发了前朝末年四处发生的骚乱，他开始改变了他的想法。他相信事实上，俄国距离发生一场革命的时期还很遥远，因此他的思想和行为愈来愈开明了。如果亚历山大三世活得再长久一些，我坚决相信，他会开创一个充满着自由主义的时代，但是在他还没能达成这点之前，上帝就把他带走了。

在亚历山大三世当政的整整13年间，帝国拥有了长期的和平，

这是他为国家做出的主要功绩。这位皇帝怎样看待战争，可以从以下他对我讲的有关边防的一次报告来说明。

他说："我曾经参加过真正的战争，亲眼看到了军事行动带来的恐怖。我认为我有这种体验是非常幸运的。在得到这种经验之后，不但一个君主永远不想打仗，而且要用一切正当的手段来使他的臣民免受武装冲突带来的苦难与恐慌。当然，如果有别国强行以战争的形式进行挑衅的话，我将接受这个挑战，我相信这种流血斗争所招致的咒怨与犯罪将会落到挑衅者的头上。"

这些话绝非泛泛之谈。亚历山大三世非常嫌恶国际交往中的巧言令色与秘密外交。他的耿直诚实不允许耍这些花招。由于这个原因，在他当政时期别国的皇室贵宾很少访问俄国。这个强大的巨人如此温文尔雅使欧洲感到困惑，一直怀疑他不一定在什么时候会出语惊人。的确他这人较为沉默寡言，不过他说出来的话是举足轻重的。全世界都信赖且尊敬他。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他不是在追求征服别国的领土。他是太谦和、太热爱他的臣民了，他不想以人民的生命和幸福为代价为自己换取辉煌的战功来粉饰他统治时期的史册。亚历山大三世是十分伟大的，他相当成功地采取了一种带来荣誉与和平的政策。他从未牺牲过帝国一丝一毫的权益。反之，他却以他的英明果断，把俄国从衰败提升到一个值得羡慕与钦佩的地位，而这一过程并未使俄罗斯人流过一滴血。

亚历山大三世在历史上被称为"和平缔造者"，这个称号并不出自人民之口。这个称号的第一次出现是在他死后不久他儿子发布的一份诏书中。尼古拉皇帝很不喜欢这个称号。他有一次对我说："这个称号并不适合我的父亲，沃隆佐夫—达什科夫伯爵把出现这称号的法令给我看，我不加思索就签字了。"事实上，亚历山大三世的伟大并不在于他是一个"和平缔造者"，而在于他那磐石般的坚定意志和耿直的品性。

在内政方针方面，亚历山大三世处理起来也如同他的对外政

策一样是卓越而开明的。对于帝国的非俄罗斯种族，他的态度是宽宏大量且富有同情心。他并没有放弃俄国历来的观点和传统，同时他本性的善良使他认识到这些人必须获得维持正常生活的权利，因为他们既然加入了帝国，就应该获得理应享受的待遇。他当然最爱俄国人，但他对于其他臣民也非常和善。这可以从他对待波兰的态度中得到证明。当他视察波兰时，他显示了令人钦佩的善意，而对那些分裂分子，则采取断然打击的态度。曾在亚历山大三世时期任波兰总督的古尔科和德廉杰恩也体现出同样的态度。他们的施政很公正，在宗教方面避免任何引起仇恨与不能容忍异端的强硬办法。其结果充分证明了这项政策是正确而恰当的，因为当时波兰人都很忠诚，而且时至今日当忆起亚历山大三世和他所派遣的总督们时对他们仍怀着尊敬的心情。如果这位仁厚爱民的君主活到现在，看见那些俄国臣民遭受狂暴迫害后，一定会十分愤怒地站起来反对的。

对俄国来说，最大的不幸是亚历山大三世的当政时期较短。他的体力到了 80 年代晚期开始逐渐衰落。他的面色带着贫血似的苍白。1894 年复活节那天，冬宫中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迷信的人们认为这是一个不吉祥的征兆。在复活节的清晨，宫廷照例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朝见。忽然之间，宫里所有的电灯突然熄灭，一切仪式只好在烛光下进行。这时，皇帝患重病在身，特别是在我上文提到的博尔基事件以后，他的病情逐渐恶化。在 1894 年的夏天，我最后一次觐见了皇帝陛下，那时我去向他报告摩尔曼之行的经过。他憔悴的面容在会见时给我留下了伤心的印象，因为我向来钦佩他的品格，并无限忠诚于他。

皇帝的病之所以日益加重无疑是因为他向来极端反感用药物医疗，这是皇族中一个很普遍的癖好。莫斯科著名的教授札哈林被召到圣彼得堡，他宣称皇帝患肾脏炎。于是不久皇帝到雅尔塔请著名的德国专家莱登诊治。这两位医生后来都告诉我，虽然从

性情看来，皇帝是很愉悦平和，但他对医药缺乏信心。他是一个很难对付的病人。

就在皇帝到雅尔塔去以前，因为有事务要处理，我必须出国到维希去，我在那里停留了几个星期。当我回国时，我照例立即呈报皇帝，请求他允许我恢复财政大臣的工作，并很快接到他正式批准的复电。皇帝逝世后不久，我到朝廷寻找这个电报的原稿，因为如果那是皇帝亲笔的笔迹，我想留做纪念。果然是皇帝的笔迹，现在这份稿件被我保存在我的公文卷宗中。虽然电稿写成的十日后他就去世了，但当时的笔力却仍然很劲健。这是这位皇帝与我的最后一次通讯联络。

当亚历山大三世垂危的时候，他很急切地盼望太子早日完婚，于是他派遣太子去迎娶达姆施塔特公主并且很焦急地等候他们的归来，据说当新夫妇归来的时候，他非常高兴，尽管他曾一度拒绝同意他们的结合。

从雅尔塔传来皇帝病危的消息的日子是10月19日那天，于是朝廷下令在喀山大教堂举行一次特别的祈祷会为皇帝祈福，人们聚集在教堂里为皇帝的健康虔诚祈祷，其中包括学生在内的各阶层的人。第二天，皇帝逝世的噩耗传来。他死时镇定自若，所惦念的只是他所挚爱的人们的幸福。

从雅尔塔将皇帝的遗体运往圣彼得堡的途中在莫斯科乌斯片斯基大教堂中停放一日供人民瞻仰，当地居民聚集到这个教堂来向他们令人敬仰的君主作最后的致敬。当遗体到达北都时，曾举行了一次庄严肃穆的送丧仪式，从车站到圣彼得与保罗大教堂。仪式既感人至深又庄严朴素，体现出亚历山大三世朝代的特色。那天我通宵在大教堂和众人守护皇帝的遗体，看见人们蜂拥而至来向他们爱戴的君主做最后一次致敬。

皇后在那些悲痛的日子里意外地坚持了下来。只是当总主教的殡仪讲道快结束时她痛哭了一会儿，有点声嘶力竭地喊到：“这

够了！够了！够了！”当过了一会儿我去看她时，她却很平静地接待我，尽管从1892年我那次结婚以来，她确实曾经对我相当冷淡。我还记得这次她对我说：“皇帝逝世，我相信你一定会深感悲痛，因为他确实喜欢你。”

亚历山大三世在他的短短的统治期间里赢得了全世界对他的尊敬和感激。他致力于欧洲的长久和平。当他生命垂危时，欧洲大陆的人都为此感到焦虑不安，到他逝世时，人人都感到他那强大的力量已经离开了人世。他死后，包括极端的激进派在内所有各个党派，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他。的确，亚历山大三世是一个伟大的君主，他的功绩足以匹配他的高位，因为在帝国中，他无疑是最高尚的人物。



第三章　我任财政大臣时期的工作

在俄国还没有从1891年可怕的饥荒中恢复过来的时候，我就担任了国家的财务大臣一职，俄国那年的农作物产量降到了19世纪后半期以来的最低水平。国库实际上空空如也。当9月20日（俄国的结帐日）临近的时候，国库监督报告我说官员的俸禄与士兵的军饷都已经支付不出来了。除了再印发几百万卢布的纸币以外，别无他法。纸币印发后，年老的前财政大臣邦格来找我，断言我走的道路必然使俄国迈向毁灭。我向他解释说，这只是一种暂行之策，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政治家怀疑地摇摇头。

在详细叙述我任财政大臣的经历之前，我想谈一谈我的前任官员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在1892年的前半年，他患了中风病。虽然他很不情愿放弃他的职务，他却同意请病假，期待能够早日恢复健康。部中政务就自然由他的幕僚特尔纳尔（一个智商很有限但道德很高尚的德国人）全权处理。但在这一过程中，维什涅格拉德斯基的健康状况并没有获得改善，于是当他销假以后，他提出了辞呈而被任命为国务会议的议员，两三年后他又因为一次中风而丧命。就在他的辞职后不久，我被任命为他的继任者（1892年俄历8月30日，西历9月11日）。

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十分熟悉他的工作。他既谨慎又精明，但缺乏应对大量事务时所必需的远见。他处事的方式可以从下面的

事件中略知一二。我被任命为财政大臣不久，亚历山大三世皇帝拿来戚昂的一篇奏折给我看，上面的内容是奏请劾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因为他在法国签订借款协定时，接受了罗特希尔德银行五十万法郎的贿赂。尽管这份文件附有该银行账簿的抄件，表明曾付给维什涅格拉德斯基这一数额款项的资金，不过我向皇帝表示，我不愿相信这项奏劾。我说我不能相信一个俄国财政大臣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因为他如同住在一间透明的房子里一样，他的一举一动都时常受到幕僚的监视。皇帝也同意我的意见，对奏劾置之不问，那份文件由我保管。

首先我来简短地谈谈为什么这个人要弹劾维什涅格拉德斯基。戚昂原本是犹太人，曾经在著名的谢切诺夫手下任生理学教授，在80年代初期邦格任财政大臣时到财政部任职。那些年来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英国，小部分是荷兰与德国。自亚历山大三世即位之后，他开始采取法俄亲善政策，因此法国的金融家们在这个领域内就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俄国第一次在法国比较大规模地发行债券是由一位二流的老银行家奥斯基埃所领导的财团负责发行的，这项协议由戚昂一手经办。后来财政大臣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发觉戚昂曾经接受了该财团的二十万法郎的佣金，就强迫他辞职。结果戚昂与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就结下了怨恨。

第二次的俄国借款是由维什涅格拉德斯基经手，戚昂向皇帝呈上他的奏折就是与此事有关。在接任财政大臣不久之后，我就弄清楚了这五十万法郎的秘密。一个名叫罗特施泰因的银行家将这件事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我，他和国际银行董事拉斯金在一起，曾代表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商洽借款事宜。似乎是维什涅格拉德斯基曾经在口头上答应过奥斯基埃财团，在以后俄国在法国的借款中将邀请他们参加，所以他坚持邀请奥斯基埃财团参与第二次借款。可是，罗特希尔德果断地拒绝了奥斯基埃财团的加入，他的理由是他从来没有和奥斯基埃共事过，并且也不愿意和它共事。

维什涅格拉德斯基不得不同意，但在商洽妥当之后，他要求 50 万法郎的佣金。这项是向罗特施泰因提出的要求，罗特施泰因发觉一个财政大臣竟如此无耻地勒索资金，感到非常失望。尽管如此，他和拉斯金还是传电报给罗特希尔德，后者满足了维什涅格拉德斯基的要求。第二天，他们告诉维什涅格拉德斯基说罗特希尔德已经划了五十万法郎到他的账户上了。他很高兴地搓搓手，讥讽地回答说："现在请诸位费心把这五十万法郎以他们在第一次借款中所出的款额比例分给奥斯基埃财团的诸团员。诸位看，我曾答应与他们共同参与借款。因为罗特希尔德和其他几位不愿这样做，我想只有请他们拿五十万法郎来给奥斯基埃财团作为赔偿才算公正合理。"

我听了这件事情的经过很觉惊异，于是问罗特施泰恩可否提供证据，证明这笔钱确实曾经分给奥斯基埃财团的成员们。他把各家的收据给了我。我把这些收据转呈皇帝，皇帝感到很满意，因为证实了他的大臣是廉洁的。不过皇帝说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处理这事的方法多少有点不适当。

我想简单提一提他专注于各种算术计算以及他对数字有着惊人的记忆能力。有一次在我面前，他念完一页对数表之后，立刻背诵出来，一字不错。

回到关于我任财政大臣这个话题，我要说我得到了许多有才能的助手的协助。其中，著名的科学家缅杰列耶夫以度量衡室主任的资格供职。我了解到他在科学方面成就卓越，就对他个人与他主持的部门给予了种种帮助，我也得到了他在业务上的辅助，此后我把度量衡室改进了很多。马利舍夫斯基也是一位非常得力而可靠的助手，尽管他是一个富有民族主义思想的波兰人，在我的力荐下，他被任命为信贷所所长。柯科弗采夫担任经济局秘书一职，后来我又将他提升为我部中的参事。

在我的管理下，财政部在范围上日渐扩充。除了原有的财政

事务以外，还包括商业、工业与除纯粹技术事宜外的铁路修筑等各方面的业务。这种情形的缺点很明显，所以我在1905年建议，另外成立了工商部，其中下辖一个铁路局。后来工商业大臣由于对铁路运价处理失当，导致朝廷认为必须将铁路事务交还财政部管理。

修建铁路全部落到我部的权限之内。那时俄国铁路体系正在持续不断地迅速进展。自然，经常有很多请求获得铁路特许权的人成为我的常客。这些人中有第一流的贵族。也就是在那时，我才发现高门望族之辈实质上是如何的卑鄙。他们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具有无限的贪婪欲望。这些人在朝廷上摆出王孙贵族的气派，但只要能得到金钱上的好处，他们就情愿在我的办公室里卑躬屈节。其中有些邪恶与虚伪的贵族已经官拜朝中要职多年，并且至少在表面上和皇族中人来往甚密。

必须记住在那些年里，俄国政府一贯采取了铁路由国家建设并归国家经营的政策。这个政策包括要办理一系列将私营铁路收归国有的事务。

我可以说，西伯利亚大铁路浩大的建筑事业是由于我的努力才完成的，这话并不夸张，当然首先得依靠亚历山大三世、后来又靠尼古拉二世的支持。亚历山大三世很早就希望能够把俄国的欧洲部分与符拉迪沃斯托克用铁路连接起来。在我就任交通大臣后，我初次和他商议的时候，他就向我提过这件事。众所周知，当今皇帝尼古拉二世在1891年5月19日到远东旅行的时候，才兴建了乌苏里铁路，把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哈巴罗夫斯克*连接起来。亚历山大三世抱怨说，尽管十几年来他一直作出努力，但是由于大臣与国务会议的反对，一直没能实现他的梦想。我向他承诺，我一定竭尽所能来实现他的愿望。

---

* 清代分别称之为海参崴、伯力。——译者注

在亚历山大三世当政时期，我在交通大臣与财政大臣的位置上，坚持不懈地提倡需要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我牢记我对皇帝的诺言，前几任大臣阻挠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而我就更加努力设法推进这个计划。我在任财政大臣时非常有利于推进这项计划，因为建筑铁路最需要的是资金。如果我仍是交通大臣，我就会不得不面对财政大臣的反对。

我为这项任务耗尽心血，可惜亚历山大三世的梦想实现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直到尼古拉二世当政，这项硕大的工程才告竣工。这位年青的皇帝本人对于修建西伯利亚的铁路很感兴趣，这种情况有利于我推动修建铁路的进程。当他父亲在世时，我曾组织了一个名为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的组织以促进铁路的修建，在我的提议下，他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可以全权负责，排除了一切不必要的耽搁，也有权管理修建方面的行政和立法事宜。对于当时年青的尼古拉二世而言，这项任务颇有一点政治家训练营的性质。委员会副主席邦格指导他的工作，邦格也是他的导师，这样的安排非常的适当。这位未来的皇帝认真地接受了这项任命，充满激情地投入了工作。当他即位时，他还保留着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可见，他并未失去对于这件事的兴趣。这使我能够在几年之内完成这项工程。

我被任命为财政大臣不久，有一次皇帝对我说，他除了在兴建西伯利亚铁路上感兴趣之外，还有一件他考虑良久的事情想委托给我办理，就是需要改进伏特加酒贸易。他也对我说，他很关注民间流行大量喝酒的事情，有必要采取严格的措施来予以制止。

本来在亚历山大三世当政后期，政府就已经在关注伏特加酒贸易的问题了，但是政府采取的措施并不彻底，因为人们认为当时的伏特加酒贸易制度，即所谓的消费税制度是最为完善的，对其进行改变是不适宜的。众所周知，在消费税制度下，酒精和伏特加酒的制造与出售是自由的。政府以一种对产品征收的间接税

的形式征收消费税。亚历山大三世在位的后期曾几度召开会议来制定应对措施的方案，在保留消费税制度的条件下，还要限制出售酒类的自由。不过，因为消费税制度与对伏特加酒贸易进行限制是不能同时进行的，因此这些举措就没有得到什么效果。

亚历山大三世皇帝期望在这件事上造福于他的人民。在长时间的商讨之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即姑息纵容的办法不会有效果；因此，他决意采取一种前所未有的、范围深广的所谓伏特加酒专卖的措施。这项措施的核心思想就是政府享有酒类的专卖权，国家作为独一无二的购买者，而这些饮料的生产量必须限制到足以供应国家的需要。我不了解这项计划最初是谁构思的。有人说是莫斯科一家日报的编辑卡特科夫的想法，我却倾向于相信这个想法最初是皇帝自己的主意。

亚历山大三世告诉我，他曾经与财政大臣邦格谈过这项计划，邦格作为财政专家非常的博学，但他认为这计划既不可取，也难实现。因此在邦格任期内，现行制度丝毫没有更改。关于这个问题，皇帝咨询过邦格的继任者维什涅格拉德斯基，但他的答复虽然不是全盘否定，但也是令人沮丧的。亚历山大三世对我说，他信赖我年青有为，信赖我的品性与我个人对于他的忠心耿耿，因此希望我能实现他的想法，并付诸施行。因此引进伏特加酒专卖制度是先帝委托我的另一项重大的任务。这项任务我在他在世的时候便完成了。我把全部伏特加酒的贸易转交给政府掌管，酒类的酿制也成为国家的专利。个人只许经营未精制的酒精生产，但他们的产量不能超过政府规定的数量。

1903 年我离开财政部的时候，除了几个边远省份之外，伏特加酒专卖制已普遍施行于全俄国。不过这项改革还没有全部完成。专卖制的引进遭到由于改革而蒙受利益损失的人们的强烈反对。我还记得当这项制度将要引进圣彼得堡的那一天，近卫军总司令弗拉季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确信城中将要发生流血骚乱。

亲王将此事奏知皇帝，虽然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但是皇帝对于这项改革是否应该在首都实行也犹豫起来。可是，我毫不费力地消除了皇帝的疑惧情绪之后，专卖制在首都推行了，当然首都仍然是风平浪静的。

按亚历山大三世的设想，伏特加酒专卖制主要用来减少酒类消费。1899年，为了视察地方上推行伏特加酒专卖制的工作，我到中部几省巡视。在我与官员们的谈话中，我强调这项改革并不是在于增加政府的收入，而是为了减少酒类的消费，所以行政人员成绩的评定，不是以国家从专卖所获得的收入的数量为标准，而是以人民身心从这项措施所获的有益的效果为衡量标准。但日俄战争爆发后，柯科弗采夫任财政大臣，他完全曲解了这项改革的意义。在庞大的战争费用负担之下，他开始把专卖当成国家收入的来源，因此出售伏特加酒所得的利润越多越好，便是他的唯一目标。税务员工作成绩的评定就是以专卖得来的收入的数量为标准。政府这样做的效果就变成了不限制而是增加伏特加酒的消费量。因此，警察对于酗酒行为也不采取制裁措施。酒价也改变了，酒价的涨幅足以使常饮者破产，但没有涨到使民众完全无力饮伏特加酒的地步。出售伏特加酒的酒店数目倍增。在战争期间，这种政策还情有可原，但到战争结束以后，财政大臣应当记得先帝改革伏特加酒贸易制的初衷是限量用酒而非创造收益，并以此为目标来贯彻执行这种改革。

提起伏特加酒专卖制，我还记得一个法国财政部视察员的意见，他随同我去视察中部诸省。他认为这项制度值得称赞，从国家的立场看来，似乎是非常有益的。他认为这种改革也可以适用于法国而同样能获得成功。不过他说，他觉得要在法国实行，必须有一位具有非常坚强果断的专制君主不可。这个法国人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法国国会决不会通过这一类的方案，因为与它利益攸关的有钱人太多了。我最近在法国逗留的时候，我注意到在

法国众议院当选的议员中，大多数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酿酒工业有利益联系。

维什涅格拉德斯基留给我一项法案，规定工厂主应对工人的死伤负责。当这个问题在国务会议中被提出讨论时，波别多诺斯采夫以一篇很长的演说来反对它，指出这项法案是倾向社会主义的。他断言俄国的雇主与佣工间纯粹是一种类似于家长制的关系，工厂的工人实质上都是一些与耕地隔断联系的农民，而上述措施将会使得这样一个无产阶级飘泊无家。另一个反对这项法案的议员是波洛弗采夫。他在工业企业中有投资，所以唯恐这项立法会减少他的利润。因为我个人并未参与这项法案的起草，所以我就声称，虽然我并不同意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意见，这项方案我可以撤回并加以修正。后来在第二次尼古拉皇帝召见我的时候，他对我表示他坚决支持工厂法。同时，他还警告我不要有所动摇。他说，波别多诺斯采夫是一个出色的批评家，但不擅长于做任何实事。也就由于这个原因，皇帝早就不重视他的意见了。

我不得不说，皇帝一向不支持我建立一种视察工厂的制度。政府对工厂存有疑虑，他认为工厂是一个有意支持工人的权利而反对雇主的权利的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机构。这种怀疑的始作俑者都是那些贵族出身的工厂主。总而言之，要通过立法来改善工人的命运的所有努力都遭到反动派的顽强反对。这个政策自然增加了工人与雇主之间的磨擦，并导致一种社会主义的和革命性质的极端主义观点在城市无产者间广为传播。

我在财政部门所做的事情，首先是国家外债的转换，就是将利率较高的债款转变为利率较低的债款。除了这些很宽泛的财务工作之外，我还商订了几项直接借款，全部充作铁路修建与增加金矿开发的经费，后者与金属本位货币相关联。皇帝在所有这些事项上对我予以完全支持。

在我所实行的纯粹财政改革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引进金属本

位货币制。这项政策措施建立了俄国的信用并使它在金融问题上与欧洲列强平起平坐。多亏有了这项改革，我们才度过了不幸的对日战争与后来的国内危机。假设没有这项改革，在战争一开始，俄罗斯就会发生经济与财政上的崩盘，而近几十年来的所有经济成就也都会功亏一篑。

对于引进金属本位货币，我的前任财政大臣邦格和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做的准备工作很少，货币改革的最后详细规划是由我制定出来的。我在这件事上经历了重重困难，我还能够实现这项计划的原因就是尼古拉皇帝对于我完全的信任与无限的支持。

全俄国的知识界几乎都反对这项改革。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上，国内没有几个财政经济专家具有关于这个问题的系统知识。国内高等教育机关既没有开设这门课程，也没有用俄文撰写的关于货币问题的好书。因为从克里木战争以来，我们的传统是在纸币制度下生活，无论是在言论上或是在普通知识分子的头脑中，我们对于金属货币这个概念已经变得模糊了。我们已经习惯使用纸币，正如一个人习惯了身体里的慢性疾病，虽然慢性病正逐渐毁坏着身体。

只要是与商品输出利益攸关的人，尤其是农民都强烈地反对我。他们保守地认定纸币对他们有利，因为随着我们的货币贬值，他们向国外输出的产品代价更大，即认为以我们贬了值的货币计算他们的产品。自然，这种见解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出口者必须对他所购买的任何货物，付出的代价更高。既然他们不是经济学家，就不能理解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从我的属员们所获得的帮助很少。我之所以让安东诺维奇教授任我的参事，主要因为他曾写过一篇博士论文是关于货币的，他坚决赞成金属本位制。但我显然高估了此人的品质。结果是，他更关切的是自身的发展前程而不顾货币改革的前途。当他看到改革受到日渐强烈的反对时，他开始退缩，并也表示反对。

当然还有一些人意识到金属本位制的种种优点。尽管如此，由于担忧我会采取强硬的做法，他们还是持反对态度。此外，在拥护金属本位制的人中，关于用金或银或二者并用作为货币基础的问题也没有达成一致。国外方面，巴黎罗特希尔德公司的首脑阿尔方斯·罗特希尔德和他的朋友蒂埃尔斯内阁的财政部长莱昂·塞都是赞成金银双本位制的。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政府对于我以黄金作为俄国货币本位的计划曾经积极地规划进行阴谋破坏。法国内阁总理梅兰通过法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呈交给俄皇两份备忘录，共中一份是梅兰亲自写的，另一份则是著名经济学家泰里的手笔。这两人警告俄皇说引进金属本位将导致俄国最终破产。他们都主张与法国当时的币制相同的金银双本位制。这是一种明显干涉俄国内政的行为，我认为法国的这一做法非常不合时宜。无论是俄皇或是俄、日政府都不需要他的告诫。皇帝把这两份备忘录交给我，连看也没有看一眼。

法国人干预我的改革，其动机完全出于自身的私利。法国拥有大量囤积的银币，所以处心积虑地要提高银的价格。如果俄国采取金银复本位制，当时低落的银价将会提高，而法国的资产可以立即增加几亿法郎。非常幸运的是，俄国没有走上梅兰所指引的道路，这项足以光耀本朝的重大改革，终于排除一切阻碍而成功地完成了。

1896 年 4 月，我在国务会议上提出了采用金属本位币制的议案。这项议案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我看出这次会议不会通过这项措施。于是我将它撤回并且调整了我的策略。当我观察到发动改革的时机成熟时，我请求皇帝召集正在审查币制改革案细节的财政委员们开一次特别会议，这次会议由皇帝亲自主持，也有国务会议的几位议员参加，其中包括财政委员会的主席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亲王。这次非常会议于 1897 年 1 月 2 日（公历 14 日）召开，主要出于皇帝对于我的信任，委员会通过了这个议案。第

二天就颁布了实施改革的政令。所以实际上可以说，俄国金属本位币制的实现完全依靠的是尼古拉二世的力量。

提到这次币制改革时，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用贬值的卢布作为货币单位，而不选取一个比卢布小的单位。那时每1卢布的价格名义上是等于4法郎的价格，但到1897年1月3日（公历15日）币制改革时，兑换率是每1卢布值2.66—3法郎。为了避免国内经济生活因此发生混乱，我采用了后一个汇率，最后的结果是实际上民众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转换到新的货币本位。至于采用小于卢布的货币单位是否可行，有一个时期我确实曾想实行一种较卢布价值稍低的货币单位。这个货币单位我将他命名为“鲁斯”，而且我甚至已经铸造了一个“鲁斯”的样品。然而后来我终于放弃了以“鲁斯”取代卢布的想法，因为我担心这个改革可能会对无知的农民大众带来重大的影响。采用一种较小的货币单位无疑会使生活费降低，尤其对于城市居民会带来如此好处，但对于整个乡村来讲，这项改变是不会带来什么收益的。

我在任财政大臣的第一年与德国订立商业条约无疑可以算是我最显著的成就。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德国的工业产品对俄出口都是自由的，大批的货物免税按期输入。直到亚历山大二世在位的后期，才为俄帝国奠定了保护关税制度的基础，当时决定对于钢铁及其制品收取关税。自然这项措施引起了德国人的不满，他们从许多方面都向我们提出了抗议，那时还担任首相的俾斯麦也是其中之一。在我们的新关税制施行后不久，俾斯麦在一个海滨休养地遇见吉尔斯，他就谈起这个问题，并且警告吉尔斯说这种征税将导致德国的报复措施而对我们的农产品和原料课税。事实上，虽然我们的行动确实促使德国筑起了它的关税壁垒，但德国早在我国采取任何行动以前就对农产品的征税了。德帝国保护关税运动的倡导者，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李斯特。顺便提一下，我在任西南铁路公司经理时，还写过一本关于他的

小册子。

由于德俄两帝国王室间的密切关系，所以两国间长期没有正式订立商约。众所周知，俄国人为普鲁士王国扩张到最后统一德意志帝国的历次战事中都付出了大量的流血牺牲。可是这一局面到亚历山大三世登基之后发生了转变，他转而接近法国，于是我们对德国的关系发生了剧变。两国之间政治上的转变促使商业交易的状况也随之迅速改变了。大约在这个时期，确切来说，就在1891年，我们制定了关税税率，一部分是为对抗德国所附加于我们的农产品尤其是小麦的关税，但最重要的目标是促进我们国内的工业发展，并最后使我们摆脱对德国工业品的极端依赖。

这些初步措施的施行导致了两国都感到极端的愤怒与不满。特别令我们愤怒的是，与德国对各国的待遇相比，存在着对俄国的明显歧视。德国那时已经制定了一种双重进口税制，包括一项最高税率与一项最低税率，并且宣称凡是已经和德国订有商业条约或是正在进行订约协商的国家，都按最低税率课税，而其余的国家则得按最高税率纳税。虽然这个规定的表达词句一般化，然而毫无疑问的是，这个规定是完全直接针对我国的，因为实际上，当时只有俄国既没有和德国订立商约，也没有商讨这项问题，显而易见，如此不公正的规定致使我们面临严重的困难。如果一个国家，比如说德国，不管粮食产于哪一个国家，对于每一普特的进口粮一律征收30戈比的关税，因为当这类商品的任何一个出口国都担负某种程度的关税时，这种代价将按比例落到所有的出口国身上，因此任何国家不会单独受到严重损害。可是假设某一国，例如说俄国，被单独列出来而被迫比对其他国家收取更重的税，例如每普特要缴45戈比的税，那么对于这个被单列歧视的国家，就成为一种繁重且不公平的负担了。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俄国粮食出口商来说，与其对其他各国也索取同样的税款，还不如每普特纳税60或80戈此或甚至1个卢布要好得多。

显而易见，我们这种不利的处境迫使我们急需与德帝国缔结一个商业协定，尤其是因为过去我们两国间关于贸易的非正式协定在某种程度上对俄国也严重不利。这些非正式的规定是由两国君主和大臣之间的口头许诺与谅解构成的。现在德国人一方面对于我们的承诺与妥协尽可能作最广义、最有利于他们的解释，而另一方面则常常设法对于他们自己的用词加以最狭义的解释来欺哄我国。除了这种情形以外，我国政府还时常忘记或忽略了理应享有的特权并予以利用。

在维什涅格拉德斯基的任期内，尽管两国为订立商约已经开始进行预备谈判，但是大约是由于负责磋商的使节们缺乏兴趣和动力，致使磋商毫无成果。直到我就任财政大臣时，这种死气沉沉的磋商还在继续举行。那时德国的驻俄大使是韦尔德将军。虽然俄皇对这位大使很有好感，但由于他政治才干不足，所以没有什么重要的成就，他根本没有参加两国贸易协定的拟定。我们驻柏林的公使帕维尔·舒瓦洛夫伯爵，却是一个才干卓越的人。在70年代我国和土耳其的战事中，他作为一个高级副官已经崭露头角。他曾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机敏而善于交际，除了具有俄国人固有的天性之外，他还有波兰人特有的机敏，这无疑是源自他波兰籍母亲的遗传。舒瓦洛夫伯爵后来成为了一位非常成功的大使，受到德皇的尊重礼遇。可是接触到磋商订立商约的时候，尽管他做事依然充满激情与勤奋，竟不能有所进展。这一失败有两种原因。第一，要进行这一类敏感问题的交涉，必然要发生不愉快的国际磨擦与个人意见的斗争，而他太过于热诚以致无法避免这些不愉快事件的发生。第二，因为他的个性完全不适合处理经济问题，因此他难以在这方面卓有成效。为了给舒瓦洛夫配备一个得力的助手，我们派遣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季米里亚泽夫，此人后来升任为商务大臣，而当时是国务会议的成员。他当时作为工商业局的副局长，显然是熟悉商业事务的。可惜他虽然具有

谈判的能力，但却缺乏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而且，他急于订约的焦急情绪过于暴露，以致德国人就利用他这种心情，采取了一种很大胆的立场，对我们不做丝毫让步，却要求他们所能设想到的所有特权。

在与我们举行的历次预备性会谈中，德国人毫无顾忌地使用他们双重标准的关税制度。他们对我们讲："我们所要求的一切权益如果得到你们的允许，你们就可以享受最低税率；否则你们还得按最高税率纳税。"这就是他们开出的交换条件，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他们所谓的最低税率实际上一点也不低。在我决定交涉方针时，作为财政大臣，面对着德国的这种态度，我马上决定，如果我们想从德国人方面获得一项公平的协约，只有运用德国的策略来对付它。于是我请求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准许我们通过国务会议也制定一种双重标准的关税率，把现行的税率作为基准，再增加大约20%作为新定的最高率。这样就能构成对德国的一种重要打击，增加的部分几乎完全是针对德国输出到俄国的工业品征收的。

当这项措施在国务会议上提出时，竟掀起了轩然大波。国务会议的成员们一般都担心采取这种激烈的行动将引发外交纠纷，甚至可能导致军事冲突。此外，我们的外交大臣吉尔斯也提出强烈的抗议，他的理由是，这样一个措施将严重影响外交关系，采取之前应该事先与他商量并获得他的赞成才行。同时我强势的行动也在柏林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舒瓦洛夫伯爵上呈圣彼得堡一份措词极为尖刻的报告里，严厉地批评了我，并且警告说德俄在外交上即将面临重重困境。在国外的强硬威胁与国内局势不稳的情势下，我毅然坚持要求通过这项措施。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立场得到了皇帝的完全支持。皇帝对外交大臣吉尔斯的种种要求置之不顾，命令通知舒瓦洛夫，说皇帝完全信任我，并且完全赞同在这件事情上我的行动。在国务会议开会时，我解释说这只是一种

应急之策，这一措施对于德国更意味着告诫而非报复。我指出德国一旦意识到会遭到报复，就会立即认识到它对俄国这一不公正的策略是无效的，从而采取一种较为合理的态度。凭仗着我的义正词严的主张与皇帝的有力支持，这项措施立即被国务会议批准通过了。

这时我们可以用德国对付我们的方式回击德国了："如果你们不对我们使用最低税率，我们就会对所有输入俄国的德国货物按新定的最高税率征税。如果你们同意与对待其他国一样的标准对待我们，那么我们将乐意按照公平的对等原则与你们订立一项商约"。这些话事实上就是我们向德国人提出的建议。但德国人好像以为我不敢实行我的计划，仍然无所顾忌地按照他们原来的方法行事。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停止了预备性的商业会谈，并且下令立即对德国的货物按照最高税率征税。德国的反应是迅速提高已经实行的对俄国货物征收的最高税率作为报复。我们也立即用同样的手段来还击。这样我们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关税战。在这场不流血的斗争中，我毫不怀疑我们终会得胜，因为在这样一种斗争中，俄国是在工业上很落后的国家，与一个像德国这样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相比（其存在就依赖于商业快速的周转）能够维持的时间久得多。

实际上，这时德俄两国间的商业关系在实际上已停止了，这种紧张情势也引起了普通民众的恐慌。那时人们对于我的情绪，可以以 1894 年 7 月 22 日在彼得戈夫宫玛丽亚・费多罗夫娜皇后的命名日庆祝会上众人对我的态度来作例证。那是政府规定的全国性节日，所有的贵族、官吏与内廷侍从都聚集到这个宏伟的皇宫里，在这里将举行盛大的圣餐礼、作感恩的祈祷并游行庆祝。当我走进大厅的时候，就好像我身上有什么可怕的传染病菌一样，几乎每一人都在回避我。同时到处在散布着一种阴险的谣言，说是由于我鲁莽轻率的举动已经使俄国面临即将与德国发生战事的

尴尬局面，而鉴于德国人刚愎自负的性格，必定最后会导致冲突，结果将致使整个欧洲都卷入到一场血染的战事之中。

在这次危机当中，我难以忘记作战部长皮奥特·谢苗诺维奇·万诺夫斯基，他是除了皇帝以外唯一支持我的政府高官。他非常认可如果我们不想再忍受德国人的傲慢行为，就必须表明我们的决心与坚毅。对我而言，我缺乏同僚间的支持，我必须说，那些人不完全是为了怕与德国发生纠纷而反对我。我的许多政敌无疑地是想恐吓皇帝，使他不再对我的举措予以支持，让我被证明是失败的而且长期不被皇帝信任。然而他们的这些心机却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因为亚历山大三世不是一个能被这种计谋欺骗的人，他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我。

不久之后，我们的坚定立场就获得了胜利，因为，尽管德国最初的抗议非常强烈但最终仍然要求重开谈判。于是德俄在柏林的预备性会谈又恢复了，不过前提是在我们撤销新订的最高关税率，而德国也以与其他受惠国相同的原则对待我们。

德国方面的代表是德国首相俾斯麦的继任者卡普里维和德国外交部长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比贝尔施泰因后来在卡普里维退休之后改任驻君士坦丁堡的公使。我们俄方则由季米里亚泽夫和财政部其他几位随员进行谈判。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柏林我们的代表只起代办的作用，一切事项都必须得到我的指令或者经过我的许可才能作出决定。我们的驻德大使舒瓦洛夫伯爵这一次毫无建树。当德国同意我们的要求时，舒瓦洛夫坦白地承认他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局势。从那以后，在他续任驻德大使与波兰总督期间我俩一直是好朋友。他后来在总督任上因患中风症而退职，改任为国务会议成员。

这次磋商达成的商业条约无疑对于双方都是公平有利的。不过因为德国人最初希望他们必须享受一切特权，所以这时感到十分的懊丧。我们的勇敢、决心与争取平等的权利与义务的努力获

得了最后的成功，这是对于那些具有强烈贪婪欲望的人的猛烈一击。听说德国议会中有不少人发表一些言论以表示强烈反对，但最终没有获得什么结果，商约终于获得了批准，并未作出什么值得密切关注的修正。这是我们同德国签订的第一个商约，我们有充分的根据对此感到满意。协议中除了商业协定，还包括几项与实施商业协定关系密切的政治性条款。

在这一次交涉中德皇威廉二世始终表现得处事圆通且举止和善。他得知我是很严肃认真地看待这件事情并且还得到了俄皇的全力信任与支持时，就采取了一种调解的姿态并且向大臣们和议会示意，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纠纷。但事后德皇把卡普里维免职，看来他显然是对于这项条约感到不满意，不明真相的人会对德皇的这一行为颇感困惑。事实上，威廉二世不过将这次条约作为一个施展权力的借口。他把它当成了一个一石二鸟的好机会，他把卡普里维免职，一方面平息了那些对谈判结果极为愤怒的容克地主们的愤怒，一方面体面地废黜了一个他心中认为是一个主张屈辱求和的，而且又是一个危险的、自由主义者的首相，后来卡普里维被封为伯爵而由霍恩洛厄继任首相。

亚历山大三世对于我的这次交涉过程达成的结果感到由衷地满意。当时我本来很可能荣获一个爵位作为封赏，皇帝自己也曾向我提起过这件事。在这不久以前，德国大使曾访问我，在我们的对话之间他明白地示意，说德皇威廉二世非常希望俄国赠送给他一套俄国海军大将的制服。很显然，他是期望我把德皇这一心愿传达给亚历山大三世。因此，当皇帝提及对我的赏赐时，我就说："如果陛下允许我发表意见，我想，赠送给威廉二世皇帝一套我国海军大将的制服，以表示感谢他在这次交涉表现出来的宽宏大度，这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皇帝和蔼地笑了，他答应说："等到将来时机成熟，一定依照你的意见办。确实，威廉这一次表现得很好打交道。我还是第一次发觉他真诚地力求避免两国

关系的破裂。”不过，亚历山大三世显然没有把这个请求放在心上，因为前文提过他性格朴实，并不过分讲究华丽的穿着。而威廉二世正好相反，在这方面特别注重，他最喜爱制服、勋章、徽章与称号。因为亚历山大三世作了这个允诺之后不久就过世了，使德皇对这套制服的期盼又等了好几年。尼古拉二世登位时，我把这次的谈话和先帝的诺言告诉了他。尼古拉听了微微一笑，却没有什么表态。几年之后，他才把一套海军大将制服送给威廉二世。在这几年之中，究竟是俄皇淡忘了这件他认为的所谓的小事，还是因为德皇又重新向俄皇提出要求？抑或是尼古拉二世出于他自己的某种特殊的理由而终于送出了这项礼物呢？其中的原因我就不得而知了。顺便提一句，这一切都发生在日俄战争爆发之前，那时俄国海军制服还享有极高的声誉。

这次商约的签订意味着我开始登上世界政治的舞台。全欧洲的人对这次谈判的结果都倍感意外。此后不久，德国的作家兼政论家哈尔登到圣彼得堡来和我结识。他与俾斯麦来往甚密，时常探访俾斯麦，有时将俾斯麦的政治见解发表在报章杂志上。在谈话中哈尔登对我说他之所以来俄国结识我是出自俾斯麦的建议。俾斯麦对他说：“那个人很值得你去结识。他对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非常明确，也有达到这个目标的品格与意志力。近十年来，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一个人。你将看到他在政治上作出一番卓越的事业。”显然这是俾斯麦承认我的策略对德国的外交已获得了明显的胜利。我在分别的时候对哈尔登说：“当你再见到俾斯麦时，请转告他：我感到他过高地评价了我，特别是对于我将来事业的预测。”我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俾斯麦，但是舒瓦洛夫伯爵和先任驻德大使馆参赞、后又任俄国外交大臣的米·尼·穆拉维约夫伯爵都告诉我说达位老宰相总是对我很感兴趣，并且只要一遇到俄国人士，就会谈及我。

俄国与德国之间于1894年缔结的这第一个商约，成了以后两

国与其他国家订约的标准。商约的有效期原定为十年。在期满的那一年，我们正同日本进行着那场灾难性的战争，而当时战局显然不利于俄国。德国于是乘我之危毫无理由地拒绝照原约续订而且强迫我们做出种种在平时我们决不会答应的让步。

一个国家的经济财富与随之而产生的政治力量主要依靠三大要素：自然资源、资本以及包括体力与智力劳动。就自然资源方面而言，虽然俄国有不少地区因为气候严寒而且地理位置颇为偏僻，但总体来说资源仍是极端丰富的。在资本积累方面，它是贫乏的，主要因为这个国家历史上总不断发生战事，更不必说其他的理由了。至于人口方面，它拥有着丰富的劳动力与知识分子，因为俄国人是很有天赋、极具理智而且虔敬上帝的民族。所有这几种生产要素都是彼此密切相关的，因为只有这些要素协调配合，才能产生财富。由于交通的发展，自然资源变得容易开发，而由于国际信用的增长，资本则更容易转移。因此，劳动在创造财富方面已经获得异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我就不得不特别注意资本和劳动两方面的发展。首先，必需巩固国家的信用。我希望俄国的财政史将承认在我任财政大臣时期，俄国债券在国内和国外金融市场上的信用提升了。我们军事上的冒险行为已经彻底破坏了我们的信用，这并不是我造成的。有一天我在俄国报纸上见到一种评论，大意是说外国银行家与我国债券的持有者关注的是我国是否能够消除无政府状态，但是并不关注我们国家的政体。这个想法未免过于天真。无论对于国外或是国内的投资者，我国有一个怎样的政府体制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他们需要考虑，在这个体制下像对日战争这种冒险行动不会发生，而整个国家也不会成为因私利而斗争的宫廷朋党手中的试验品。如果我们的债权人在一个政府的治理下失去了他们投资的 20%，他们就不会再信任这个政府了。

就资本方面而言，在我执掌国家财政的时期内，几乎增加了

大约 19 亿卢布的国债，而我用于修建铁路与分期偿还帝国银行债务的款项远超过此数。因此这笔借款全部用于生产事业上。由于外国资本家对于我所树立起来的俄国信用感到信赖，所以我国才得到几十亿卢布的外国资金。但是竟然有不少人因为这件事而反对我。这简直是愚昧无知到了极点！如果没有外国资金的帮助，一个国家是难以发展的。在我任财政大臣时期，我始终主张从外国借用资本对俄国是有利的。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和伊·尼·杜尔诺沃、善列维这样一些政治家以及大臣会议的其他成员争辩，尼古拉皇帝的态度照例是犹豫动摇的。他甚至为讨论吸引外国资本是否可行而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在这次会上，我宣称我不惧怕外国资金的介入，反而认为外国资金是对俄国有益的。我所担忧的是我们的政府过于特殊化，恐怕很少外国人肯和我们交往。如果不是在我任期中有人制造了那么多的障碍以反对引进外国资金，进入到我国的外国资金一定会更多。

包括皇帝在内的许多人反对引进外资，这纯粹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他们说应该由“真正的”俄国人利用俄国自己的资金来开发俄国的自然资源才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忽视了这一事实，即俄国国内可资利用的资本严重不足。结果因为这种所谓的民族主义，许多工业上的特许权通常授予给“真正的”俄国人，而他们立即转卖给外国人，从而不劳而获大发一笔横财。例如，我记得有一个名叫冯利亚尔里亚尔斯基的退役上校，他得到了可以在堪察加半岛上开采金矿的特许权，但几个月之后，他就将特许权转卖给一家外国公司。

另一个重大的问题是我国的劳工制度。由于气候的关系，俄国劳工的生产率极低，并且几千万的劳工一年中有好几个月都无事可做。生产率过低的另一个原因是交通不便。70 年代对土耳其战争之后，俄国的铁路修筑处于完全停顿的状态，重新动工这件事就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在这方面做得有声有色，在我的任期里，

铁路的里程增加了一倍。值得注意的是，陆军部经常阻挠我修铁路的计划，只有当我倡仪修筑的铁路具有战略价值时，陆军部才支持我。战略性铁路的修筑常常与我的建议背道而驰。而且，非战略性的铁路常因为要适应陆军部的愿望而不得不改变方向。在这方面，库罗帕特金将军、尤其是前任总参谋长奥勃鲁切夫多次阻挠我。奥勃鲁切夫是一个天资卓越并且教育良好的人，而战略铁路是他唯一能提得起兴趣的事。他时常认为应该修建一条有战略价值的路线，而两三年后又宣告这条铁路不再具备这种战略重要性。我的目标是竭尽全力地发展一个铁路网，军事战略性的考虑（自然常得到皇帝的袒护）使我不能从经济角度修建最有利的路线，结果使整个铁路系统发生了亏损。

可以说，我在从事铁路方面的工作长达40年之后，用事实证明了陆军部的大部分在铁路战略上的考虑都是纯粹的幻想。只有单纯按经济的观点来制订铁路修建计划，国家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就整体而言，这些铁路也会适应战略上的需要。我认为这应当成为铁路修筑的基本原则。为了准备与西方的战争，在30年中我们修建铁路都着眼于俄国西部并耗尽了我们的精力，而战争却在远东爆发了。

要开辟新渠道利用我们的劳动力，最好的办法便是发展我们的工业。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具有天赋的毅力与聪明才智，他是第一个认识到并且实施这个政策的人。我在这一方面是他忠实的助手。发展工业不仅为了人民，而且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一个现代国家如果没有健全的民族工业，是不会强盛的。作为财政大臣，我也对我国的商业和工业担负重大的责任。所以，我使我们的工业增加了3倍。又有人因此反对我。这些人真是愚不可及，他们说我采取了人为的举措来发展工业。这是多么糊涂的评价！发展工业还能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只要是人在干活就一定带有人为的性质。相对应外国，我所采用的办法的人为程度要低得多。我所做

的唯一的事就是支持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在亚历山大三世时代所引进的保护性关税制度。为了推行这项政策，我曾遭受大地主们的强烈反对。我促进成立股份公司所作的种种努力受到内务部特别是普列维的经常阻挠。又有人因为我从帝国银行发行了工业债券而谴责我。实际上这些债券总数只有5000万卢布左右。而且，其中一大部分是未经我的许可就借给朝中的政要了。我不得不说，在俄国国内，只有极少数人充分了解我建立国家工业的意义。附带提一下，在这些极少数人中，我的生平至交，我国的大科学家缅杰列耶夫就是其中之一。

修筑铁路与扩建工业使四五百万人口离开了农业，因此全国的耕地增加了2000至2500万俄亩。为了更快地提高俄国劳工的生产力，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人民生活与工作的条件必须改变。在目前，一个俄国人工作时好像他刚喝过酒一样，虽然他喝的酒少于任何一个外国人，他却更易喝醉。虽然他工作比别人少，但却比别人更容易疲倦。

财政部在1905年以前负责管辖工商业方面的事务。我在财政大臣的位置上，为提倡工商业教育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由于我的努力，中级商业学校体系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我又筹划并设立了许多工学院，教授较高深的商业与技术的知识。1899年我提出在圣彼得堡设立一所这样的学校。在我的下属的辅助下，我拟定了工学院章程，并在经过一些波折后获得国务会议的赞同。当时照例有人反对我，有人争辩说我们原有的高等教育机关已经够多了，这类新设立的工学院恐怕会成为一个滋生动乱的温床。我后来又分别在基辅与华沙设立了两所这样的学校。

在我任财政大臣时期，国家的财政状况总算好转了。我们不但没有亏损，而且每年总有一定数量的盈余。这种情形使我得以在国库中累积大量可以自由支用的现金，有时达几亿卢布。我的这种政策饱受批评。有人说法英德诸国没有任何一国把不用的现

金存于国库中，也有人议论说如果把这些资金用来作为有利的投资将更有好处。我的批评家们只不过显示了他们对于俄国国家经济的一无所知。俄帝国有巨额的外债，远超过上述的任何一个西欧国家的负债情况，所以为了制止俄国国外债券价格的暴跌，必须存储一笔准备金，以备不测。还有应加以考虑的是俄国的国情，俄国是一个农业国。它每年的收入，也就是它的主要财富，主要依靠气候，而气候是变幻莫测的。如果遇上荒年，这也需要存储一笔准备金以备荒年之用。此外，我还要说明一点，自从尼古拉继位以后，我常预感到说不定哪一天在国内某个地方会发生一场流血的惨剧，这种预感也促使我在国库中储积大量可以自由支用的现金以备战时所需。

当我离任财政大臣时，国库中的闲置现金总额为 3 亿 8000 万卢布。不久之后，日俄战争爆发，这笔资金使俄国得以不再借外债度日。后来到订立借款协定的时候也是因为有这一笔现金，世界各国认为我们的需要并不是那么迫切，所以情势才变得不那么糟糕，否则我们不得不接受更为苛刻的条件。

1903 年元旦是我担任财政大臣的十周年纪念日，皇帝特下一道御诏，嘉奖我的功绩：

谢尔盖·尤利耶维奇：

十年前，现居天国的我的父亲任命你为财政大臣。时至 1891 年歉收之后，财政艰难，你却出于对俄国经济力量的坚定信心，坚忍勤勉，继续你的前任所担负的振兴俄国金融的重任，而你可以感到安慰的是你没有辜负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对你的信任，而且无愧于受到他的感谢。

值此你担任财政大臣十年之际，我很高兴地表达对于你的谢意，在过去八年中你也未辜负我对你的信任并

做了大量的工作。我所关心的大事是增强国力与国防以及使上天所托付于我的繁荣这个国家的使命。你怀着对全体俄国人民的信心，对君主同样忠诚，不仅为我分担了我为实现上述目标所作的一切努力，而且你还鼓励俄罗斯的优秀人才主动为国效力。你加强了俄国货币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增加了国库的财源，尽管国家经费与年俱增，也使得我们能够得到充足的供应。你在处理繁杂的政务之外，还执行了我委托你教授皇太子及我的爱弟米哈依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以国家经济学的任务，我十分满意你所做的这些工作。

你的功绩对于国家和我都是很有益的，尚望今后继续在这个职位上继续为国效力。

永远真诚的：

尼古拉（签名）

这时候，以别佐勃拉佐夫和普列维为首的集团正在远东竭力推行他们的秘密军事谋划，而皇帝渐渐受到这群狂人的影响。到1903年，我已清楚地认识到难以避免与日本的战事了。他们每次提出这个在远东进行军事冒险的议题时，我总是严厉地表示反对。事实上，我承认我在皇帝面前所用的辞句往往过于犀利。皇帝甚至企图说服我，但是他的努力是徒劳的。

我觉得，如果我在这种情况下还继续担任大臣的职务，人民大众将会把对这场即将爆发的战争的责备全部推到我的头上。全俄国都知道我坚强的性格，既然我反对这个政府的军事政策，公众不会相信我还会依然供职于这个政府。另一方面，我也清楚，我既然完全不赞成皇帝所采纳的方针，他自然也不会让我占据政府的最重要职位。

1903年8月16日（公历29日），我接到皇帝的诏令，让我第

二天早晨到彼得戈夫宫去向他报告政务，并带着帝国银行行长普列斯克同去。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当时怀疑皇帝想要任命普列斯克担任某一职务，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会选任这个人，因为皇帝自己都不熟识他。那天早晨普列斯克先来找我，于是我们一同去彼得戈夫宫。我让他留在会客室，便先走进皇帝的书房。皇帝和蔼地接待我。这次觐见持续了约一个小时。我向他报告了几项计划，并请求他准许我到正在引进伏特加酒专卖制的省份作一次巡查。对于我想要亲自视察这项重要改革的实施状况，皇帝表示很赞同。最后，当我起身向皇帝告辞的时候，皇帝才问我有没有把普列斯克带来。我回答带来了。皇帝又问，“你看这个人怎么样?”我回答认为这个人很好。事实上，我很看重普列斯克的人品与财政知识。(在我的任期内，他始终是我最亲信的助手之一)。

皇帝稍微停顿了一下，说道:“谢尔盖·尤利耶维奇，我想你接任大臣会议主席，我想任命普列斯克当财政大臣。”我非常惊讶皇帝的这个决定。皇帝看到我差异的神情，就说:“你对于这新的任命不满意吗? 要知道，帝国最高的官职就是大臣会议主席一职。”我请皇帝相信，如果这项新的任命不是一种不信任的表示，我是非常高兴的，不过，我想比起这个新职位，我担任原职可能有更多机会发挥作用。于是我向皇帝告辞并离开了他的书房。



第四章　我与李鸿章的交涉

在亚历山大三世执政的末期，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已经极为紧张，最后两国之间终于爆发了战争。那时我们在远东的兵力很是微弱。因为害怕战事向北扩展影响到俄国远东地区的领土与权益，所以我们把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派遣军移驻吉林，这是我们采取的唯一措施。战争结果是日本获得全胜。众所周知，根据马关条约，日本得到了辽东半岛，包括营口和旅顺口在内，并获得其他种种利益。

中国和俄国在两个半世纪的时期间，除了发生过两次严重的误会以外，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睦邻关系。在那些年代，俄国的政治家们很少对朝鲜、日本，尤其是中国与两者间的关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关于远东的知识比一个小学生多不了多少。因为我负责修筑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所以很注意远东情势。事实上，在俄国政治家中，我是唯一熟悉该地区经济政治形势的人。

马关条约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感到担心。这个条约使日本在我们的权益范围内获得进攻大陆的立足点。那时登位不久的尼古拉皇帝，正急欲在远东扩张俄国的势力。他并没有详尽的征服计划，他只是被一种夺取远东土地的贪欲迷住了心窍。至于我自己，我清楚地看到，对俄国最有利的是让一个强盛而保守的中国做邻居，只有这样，俄国在东方才可以得到安全的保障。因此，在我

看来，我们决不可让日本渗透到中国的心脏而在辽东半岛攫得立足点，因为这块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战略要冲。我坚决主张有必要阻止中日和约的谈判。为了讨论这个问题，皇帝召集了一个会议，由海军大将阿列克塞·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担任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我主张坚持维护中华帝国领土完整的原则。我指出，为了俄国的根本利益着想，应该维持中国的原状，任何国家不得攫取它的领土。万诺夫斯基大臣赞成我的主张。奥勃鲁切夫的态度则显得很淡漠，因为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西线的战争准备上，会上其他人也没有表示出其他的意见。

到了讨论我所主张的议题时，我提议我们可以向日本提出最后通碟，表明我们不能容许日本破坏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原则，因此我们不能赞同中日签订的条约。我建议我们应当许可日本以战胜国的地位要求中国赔偿一笔相当大的赔款以补偿它的战费。如果日本不肯答应我们的要求，我觉得那只有采取公开的有力行动。我没有解释我所提议采取的措施的内涵，但我认为我们不妨炮击日本的一些港口。尽管我清晰地陈述了我的政策，并且对实行的实际方法也作了具体的建议，这个会议仍然无果而终。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始终保持缄默。

皇帝立即又召集了一个会议，由他亲自主持。他只召见了万诺夫斯基将军，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阿列克塞·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和我。当着皇帝的面，我又重述了我的意见，因为无人反对，所以皇帝便接受了我的提议。这次关于中日的特别会议，我在 1895 年 3 月 30 日得出下面几点结论：

（一）为了维护中国北部的现状，俄国先以友好态度劝告日本放弃占领南满的念头，因为这种占领侵害了我们的利益，同时将对远东和平带来威胁；如果日本拒绝遵从我们的劝告，我们就向日本政府声明保留我们进一步行动的自由，我们将按照我们的利益做出应对措施。

（二）联合欧洲列强并向中国发表一项正式声明，说明我们并不希求夺取任何中国的领土，为了保护我们的利益，我们认为必须坚持要求日本放弃进占南满的念头。

皇帝训令我们的外交大臣将这项计划付诸实施。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处理这件事情的技巧真值得称许。他立即取得德法两国对于俄国要求的同意，于是将我们的最后通牒迅速交给日本：日本被迫接受这项要求，结果它没有得到辽东半岛而只向中国提出2亿两白银的赔款。

同时，我参预了同中国的谈判，提出我们愿意为中国所需的一笔巨额借款帮忙，以偿付对日的赔款。因为中国的存款还不足以订立借约，我同意用俄国的资源来作为中国借款的担保。而且，实际上在法国金融市场上的这次交易完全由我负责办理。这次参与发行债券的金融机关有巴黎银行、佩伊—巴斯银行、利奥内信托公司和奥唐热交易所。我许诺这几家银行的代表们，会帮助他们进入中国的金融市场，以回报他们在这次中国借款事件中对我的帮忙。

后来我创办了华俄道胜银行，其中主要的股东都是一些法国的金融家。最初，中国政府和我们的财政部都大量投资于这家银行，但是后来我们的股份已经逐渐失去了主导地位。不幸的日俄战争之后，我们失去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这家银行也开始衰落了。最近，它与北方银行合并而改称俄国亚洲银行；

李鸿章是作为中国特命全权大使被派赴俄国的。他曾任直隶总督，在受命出使的时候，他供职首相，这是清帝国最显要的官职。这样第一等的中国大员竟出使外国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而这个空前的事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这位高贵的使者于1896年4月18日（公历30日），即在俄皇加冕典礼三星期前来到圣彼得堡，中国派遣这样一位高级官员来参加典礼，为的是对于我们的年青的皇帝所给予中国的种种恩惠表示感谢。

当时正在修筑的中西伯利亚大铁路已经延伸到外贝加尔地区，这时就产生了这条铁路向什么方向继续修筑的问题。我的想法是使铁路径直穿过中国领土，主要是穿过蒙古和满洲北部而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据我计算，这条路线可以缩短工期而且便于修筑。考虑到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工程颇为庞大，想要缩短这条路线是很自然的事。从技术方面来说，在阿穆尔地区修建铁路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而且，如果铁路沿阿穆尔河*修筑，就会与阿穆尔汽船公司发生竞争。经过满洲的路线可以节省514俄里。** 比起阿穆尔流域来，这个地区土壤肥沃而且气候也更为有利。问题在于怎样以和平的方法获得中国对这个计划的许可，这个念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曾在适当的场合提请皇帝注意这个问题。然而很受皇帝宠信的御医布里亚特人巴德马耶夫却反对修建由恰克图到北京这一条路线。他不赞成我的这个计划，第一，他认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是这条西伯利亚大铁路最理想的终点；第二，他相信若把铁路一直修筑到北京，会惹起全欧洲反对我们。我们必须了解这条路线的伟大创建者并没有任何政治的或军事的企图。这是一项纯粹商业性的项目。亚历山大三世想要在遥远的滨海省和俄国中部之间以尽可能短的路程建立交通。在战略上亚历山大三世和他的继承者都只认为这条路仅具有防守上的重要性：无论如何，这条路决不是用来作为扩张领土的工具。

李鸿章赴俄途中到达苏伊士运河时，他受到当时皇帝的一个亲信乌赫托姆斯基公爵的迎接。这是依照我的建议办的，我已经得知英德奥各国都在笼络李鸿章，他们要他经过西欧再前往圣彼得堡。与此相反，我则希望他在到达俄国以前，不要访问任何欧洲国家，因为我很清楚，李鸿章一旦到了欧洲，一定会成为欧洲政治家们争相拉拢的对象。

---

* 阿穆尔河指的是黑龙江。——译者注

** 1俄里=1.06千米。——译者注

乌赫托姆斯基公爵接待了这位中国贵宾，并同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虽然欧洲各国都纷纷邀请李鸿章到它们的港口登岸，但他却搭乘了俄国商业轮船公司为我们特别准备的一只轮船——“俄罗斯”号，直赴敖德萨，同行者有他的随员和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在敖德萨城，我们派了一小支军队作为他的荣誉卫队。依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的意思是先让李鸿章暂住敖德萨，等候加冕礼，但由于我的建议，允许他直接前往圣彼得堡。因为我们的外交大臣完全不了解我们的远东政策，于是皇帝授予我与我们的中国贵宾交涉的权力。

有人告诉我说，和中国官员打交道，最重要的是不要露一点急躁，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一种很坏的习气，办事必须从容有礼。在我做财政大臣的任上，李鸿章是第一个访问我的外宾。当他走进我的客厅时，我穿着制服迎接他。彼此鞠躬问候之后，我把他带入另外一个客厅，便令仆役送上茶点。茶点是以盛大而讲究的排场送上来的。我的客人和我坐下，他的随员和我的属员都在旁侍立。用过茶点，我问李鸿章是否想吸烟。他于是喊了一声，颇有点像马的嘶鸣。两个中国人立刻从隔壁屋子里跑来，一个拿着一个水烟袋，另一个拿着烟草，于是开始抽烟的仪式。李鸿章静坐着吞吐烟雾，他的侍者们很肃敬地替他点烟，端着烟袋，从他的口里拿出来，又放回去。很显然，李鸿章是想拿这种种隆重的排场来使我对他的尊严有一个深刻的印像。不过在我这方面，我也使他相信，我对于所有这些排场丝毫没有放在眼里。

当然，在这回初次的访问中没有谈到具体事务。李鸿章不停地问侯俄皇陛下皇后陛下和每个太子公主的安好，同时我也对中国皇帝、皇太后及其亲近宗室的健康表示深切的关心。我们的第二次会谈的性质就不同了。他看到那些繁琐的仪式对我没有发生作用，便不再施展那一套，和我交谈的态度也随便一点了。后来在莫斯科举行加冕典礼的那几天，我们在会谈时一点也不摆排场，

他十分率直而且认真。我也很看重他。在我的活动时期，我曾接触过不少将会永垂史册的政治家。以李鸿章的智力和常识来判断，他要算是这些人中很卓越的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他是极其重要的一个人。他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那个大帝国的统治者。

我和李鸿章会谈的时候，曾详细谈到最近我们对于中国的帮忙。我向他保证，我们既然宣布了中国领土完整的原则，我们在将来也要遵守这个原则，但是，为了保持这个原则，我们必须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给中国以军事援助。俄国的兵力目前都集中于欧洲部分，在欧洲的俄国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没有用铁路同中国连接起来之前，我们就不能进行这种援助。我提请他注意，尽管当中日战事期间我们确曾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派遣过一些军队，但因没有铁路运输，行动过于迟缓，以致当他们到达吉林时，战争已经结束了。因此我向他解释，为维护中国领土的完整，必须修建一条里程尽可能最短的铁路，这条路线将经过蒙古和满洲的北部而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我又向李鸿章指出，这条计划中的铁路将会提高它所经过的两国领土上的生产力。最后我宣称，日本对于这条铁路可能会采取一种赞同的态度，因为这条铁路将把日本和西欧连接起来，日本近年来正积极吸收着西欧的文明。

李鸿章当即表示反对。不过，我从谈话中察觉出他的真实想法，如果他能确实知道我们的皇帝希望这样做，他会赞同我的提议。因此，我请皇帝接见李鸿章，皇帝这样做了。这实际上是一次秘密的接见，其过程连新闻界也不知道。我和这位中国政治家商谈的结果是，我们同意中俄订立一项秘密条约，其中包含下列项目：

（一）中华帝国允许我们在它的领土以内沿赤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修筑一条铁路，但这条铁路必须由一个私营公司管理。我原来提议由俄国财政部来修筑或管辖，而李鸿章坚决拒绝接受。因此，我们不得不成立一个私营公司，即所谓中东铁路公司。这个

机构自然是完全听从于俄国政府，但因为它名义上是一个私营的公司，所以受财政部的管辖。

（二）中国同意割让给我们一条足以修筑和经营这条铁路的狭长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以内，铁路公司可以自置警察并行使完全的、不受任何妨碍的权力。关于铁路的修筑或运用，中国不负任何责任。

（三）如果中国领土或俄国远东滨海各省被日本进攻，两国有互相保卫的义务。

我将商谈的结果报告给皇帝，皇帝就命我和外交大臣协同办理此事。我于是向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说明，我已和李鸿章在口头上达成协议的条款，目前剩下的事情就是要把这个协议写成正式的文件。这位公爵听了我所陈述的各项条款，二话没说就拿起一支钢笔写了条约正式文本。文本写得十分精练，我毫无保留地进行了赞扬。公爵对我说，他第二天就将把这文件呈给皇帝，如果皇帝批准，就交还给我。

当我拿到皇帝批准后的条约文本时，感到大为惊异，我发现在有关中俄联合对付日本的那一段中，竟有一处实质上的改变。原文中的“被日本”几个字竟被遗漏了。在改变后的条文中，条约规定不只是被日本攻击的情况下，而是在被任何其他国家攻击的情况下，两国应互相保卫对方的安全。我感到惊惧。这一点变动关系太重大了。对付所有其他国家的防守同盟是与仅仅对付日本大不相同的。欧洲的几个国家，包括我们的同盟国法国在内，还有英国，都在中国有利益关系，要使我们承担对付所有这些国家以保卫中国的义务，就会引起他们全体来反对我们，以致后患无穷。

于是我立即去见皇帝，陈述这件事情。他命令我去见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要他在条约文本上作必要的修改。这时我感到处境非常困难。我比这位外交大臣年轻得多，官爵也比他

低得多。由我来修改他所拟定的文件是对他的冒犯，从而会引起他的反对。我把这层顾虑奏明皇帝，请他亲自和公爵商量这件事情，皇帝同意了。不久，我们都去莫斯科参加皇帝的加冕典礼。

在莫斯科，我在李鸿章身上费了很多时间和心思，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的谈判能获得圆满的结果，对于俄国来说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事。中俄同盟含有两重意义：第一，我们的大铁路可以按直线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不必在北面沿阿穆尔河绕行；第二，与庞大的中国建立起稳固的和平关系。

皇帝告诉我，说他已经和外交大臣谈过，外交大臣答应恢复原来的条文。皇帝口气十分肯定，以致我心中觉得这件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此后我又有好几次遇到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但我们谁也没有提起这件事。

这时我仍继续和李鸿章谈判，目的在劝诱中国政府将西伯利亚大铁路在中国东北一段的修筑权给予当时已经开始营业的华俄道胜银行。同时我准备和该银行订立一项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再把这宗权利转让给俄国政府即将组建的中东铁路公司。

最后，我们规定了一个日期来签订这项秘密协定，俄国签字的代表是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和我，在中国方面则是李鸿章，那时他已直接从北京得到了许可。双方约定在外交部办公室会晤，在那里按照公法与惯例规定的仪式签署文件。到规定的那一天，俄国的全权代表和从属人员以及李鸿章和他的随员齐集在外交部办公室。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致开幕词，并宣称条约原文已经双方审阅，现在这项文件已由秘书慎重誊录，可以无须宣读而直接签字。不过，他说，如果中国代表想要重读这个文件，他也十分赞成。于是就将一份协定（这个文件写成两份将由两国代表在上面签字）交与李鸿章的属员。我拿起另外一份开始仔细阅读，心想不会有什么错漏，忽然，使我感到惊恐的是我发现关于我国和中国防守同盟的那一段文字，尽管皇帝保证已

经修改了，但现在竟然仍没有改变，与我原来的条文不同，仍然规定我们在任何国家进攻中国时有保卫它的义务。

我走近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把他叫到一边，小声告诉他说条文中关于防守同盟的部分并没有依照皇帝的意旨改正。他用手敲着他的前领，喊了一声："哎呀！我竟完全忘记告诉我的秘书将那一段原文插进去。"但这时他却一点也不惊惶。他看了看表。那时是十二点一刻。他轻敲了几下，招呼侍役，然后转向会场说："时候已经过正午了。我们去吃午餐吧。然后我们再在协定上签字。"

我们于是都去进午餐，只有两个秘书在我们进午餐的时候又将文件誊录一遍，并作了必要的改正。午餐前已经传阅过的两份文件被悄悄地用这两份新的手抄本换掉了。在这两份新的手抄本上正式由李鸿章与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和我签了字。

这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决议。如果我们忠实地遵守了它，我们也许不致招来日俄战争的耻辱，而且可以在远东获得一个稳固的立足点。我可以在这里说正是我们自己违反了协定，才造成今日远东的局面，这是一件将背信和愤懑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事。

这协定后来被中俄两国皇帝批准。此后关于我们和中国的关系，以及我们在远东的地位都以这个协定为依据。

协定签字后，李鸿章在莫斯科逗留了一段时间。我记得有一次我正在拜访他时，外边传报说布哈拉的总督来访。这位中国人立刻端起架子，庄严地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当这位总督走进客厅时，李鸿章从座位上站起来，向前走了几步去招呼他。我因为和他们两个人都很熟悉，所以并未回避。这位总督显然被李鸿章的傲慢态度所震惊，他于是首先让李鸿章明白他这位总督是王室宗亲。他来拜访李鸿章，仅只是出于对中国皇帝的敬意。他不住地问候中国皇帝和太后的健康，而对李鸿章则不是很热情，这照中国的习惯来讲是极具侮辱性的。

而李鸿章则不住地询问这位总督的信仰。他解释说，中国人遵从孔子的教义，他反复地询问总督和他的人民所信仰的宗教。总督声明他是一个回教徒，甚至将穆罕默德创始的宗教原理陈述了一番。会见完毕后，李鸿章陪同他的客人走到他所乘的马车之前。当马车已经走动的时候，李鸿章大声向伴随总督的翻译员说："请你跟总督说，我忘记告诉他，方才他提到的穆罕默德曾经到过中国。中国人发觉他是一名罪犯，把他驱逐出境。他一定从那时才跑到俄国创立了他的宗教。"这个攻击来得太突然，致使这位总督半天没缓过神来，没有作任何反驳。李鸿章因为报复了这位总督对他的冒犯所以感到很高兴，于是兴高采烈地回到了他的客厅。

关于我们与中国订立秘密协定的消息，报纸一点也没有泄漏消息。欧洲所知道的只不过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已经同意把中东—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延续的铺设权让给华俄道胜银行。特许铺设权的协定是由财政部副大臣皮奥特·米哈依洛维奇·罗曼诺夫根据我的命令和中国驻俄公使协商之后拟出的。中国驻俄公使兼任驻德大使，冬春两季他通常住在圣彼得堡，其余的季节则住在柏林。因为当时正值夏季，罗曼诺夫来到柏林，就在那里拟定了特许铺设权的条款。这个草案后来被缔约的两国政府批准了。我还记得当时欧洲风传，说李鸿章受了俄国政府的贿赂，我必须说明这个谣言根本是无中生有。

中国让与铁路铺设权的条款对于俄国是非常有利的。条约规定36年之后，中国有权赎回铁路，但是赎回的条件是极为苛刻的，以致于中国政府将来很可能不会实行赎回。到第37年开始，如果中国政府真想赎回的话，那么依照条文规定，估计要偿付铁路公司不少于70亿卢布的赎金。

李鸿章在和我作非正式谈话时，曾一再表示，他以俄国友人的地位劝我们不要再向西伯利亚大铁路以南进展。他使我确信，只要我们这方面向南有任何行动，很可能引起意外的大骚乱，这

对于中俄两国都将会是一场灾难。他说，在中国内地，无知的民众把每一个白种人都看成是敌人。李鸿章尽力劝告我，俄国必不可有任何侵略的企图。尼古拉二世（虽然是无意地）曾用一个适当的尊号“和平缔造者”称呼他的父亲。作为这位皇帝的忠实臣仆，我一向就是一个最忠诚的和平思想的倡导者。我相信基督教的教义在人类知道实行基督的主要训诫——人没有杀害别人的道义上的权利时才会发生效力。我提这件事，是为了要表明李鸿章是一个多么杰出、头脑清醒的政治家，而他在一般欧洲人的心目中，只是一个半开化民族的代表。

在那一个时期，年轻的皇帝还怀着人类心灵中最善良的理性，所以我觉得无须把李鸿章的忠告转奏给他。我确实知道，在与中国缔结秘密协定时皇帝完全是为和平打算的。

我想顺便说一说尼古拉二世向列强呼吁局部裁军的经过。1896年6、7月间，库罗帕特报告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说，根据他所得到的情报，奥匈帝国将要增加并重新装备炮兵。因此我们的炮兵也需要重新装备，而这项事耗资巨大，因为那时我们的全体步兵也正在进行设备更新。为了这个缘故，陆军大臣就建议和奥国进行淡判，劝它放弃原来的计划，并附有这样的谅解：即我们也将不再增加或改进我们的炮兵的装备。穆拉维约夫征求我关于此事的意见，我表示，这个办法对于我们恐怕只有害处，也不会得到什么实际的效果，而只会将我们财政上的弱点暴露给全世界。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向外交大臣详细阐述正在发展中的军国主义所予世人的无穷祸患以及限制军备给予人类的福利。这些很普通的想法对于这位纯朴的大臣来说却是新颖的，显然使他产生了深刻的印像。

几天之后，外交大臣召集了一个会议，商讨向列强呼吁局部裁军和限制军费的问题。穆拉维约夫告诉我们说皇帝赞成这项计划，并读了呼吁书的草稿。很自然地，库罗帕特金反对这个计划。

我则与他相反，赞成这个计划，因为我赞成任何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纷争的策略。我指出，无论如何，这比起陆军大臣此前所提议的和奥国协商的计划来，是更为符合实际而且更具可行性。

呼吁书是在1898年8月12日（公历24日）发出的，第二年在海牙举行了一次和平会议。有一次我和皇帝谈论这件事。我祝贺他发起了建立世界和平这个伟大高尚的事业。但我同时也指出这个会议大概不会带来什么实际的结果。基督教信仰的神圣真理在约两千年前就由上帝之子宣告于世了，可是大多数的人对这些教训仍是漠然置之。要和平解决国际纠纷的理想，同样应是许多世纪以后的事情了。五年以后，我们证明了关于裁军与和平的议论只不过是一些空谈罢了。

在莫斯科举行加冕典礼的时期，我们又签订了一项与我们的远东政策有关的协定。我所指的是与日本签订的关于朝鲜的条约。这项条约认可了俄国在朝鲜的优势地位，并划定了日本在朝鲜的势力范围。根据这个条约，我们可以有权派遣军事教官和几百名士兵进驻朝鲜。此外，关于这个协定，我们又得到可以左右朝鲜国家财政的权力。我们有权任命朝鲜皇帝的财政顾问，这个顾问实际上就是朝鲜的财政大臣。对于日本，这个条约保障它在朝鲜享有某些工商业权利和特权。因此这个条约划分了日俄两国在独立的朝鲜（中日条约规定朝鲜为独立国）的势力范围。

中日战争之后，我们的太平洋舰队不断增加，海军部开始想找一个军港供我们的军舰使用，鉴于我国与日本的紧张关系，依靠日本的港口已不再是安全的了。1895年中国政府同意开放胶州湾供我们使用，但因为我们发现这个港口不方便，我们事实上并没有使用这项特权。

我们停泊军舰的港口问题一直未获解决，直到1897年下半年德国的一支武装部队竟在位于山东半岛东南海岸的胶州湾登陆，这个消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不过外交大臣对德国的这个行

动并不感到十分惊讶。几天以后，德国的外交官们发表了一项声明，大意说，不久前中国人杀了一名德籍传教士，德国船只进入这个港口是为了对中国人予以惩罚。但令人奇怪的是这种惩罚竟然动用了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运输了一支大规模的武装部队去占据整个港口。

中国政府得到了德军登陆的消息之后，就请求俄国派遣一支舰队到胶州湾去监视德国人的行动。我们驻北京的代办公使先得到了圣彼得堡的通知，说俄国军舰已派赴该中国港口，但第二天这个命令又被撤销了。所以我们的代办公使在向李鸿章陈述这些经过时，说圣彼得堡与柏林之间一定正在谈判，谈判的结果是胶州湾危机将会得到迅速的解决。

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伯爵想利用这个时机来为俄国海军搞到一个根据地。他以为，如果事态的发展趋向不利于中国，那么我们需要占据中国领土的某一地点作为稳固的海军根据地就有正当的理由了。

11 月初，我和其他几位大臣都接到穆拉维约夫伯爵发来的的一份备忘录。它指出德国人占据胶州湾给我们占领中国一个港口——特别是旅顺口或邻近的大连湾——提供了一个好机会。不久我们又接到一个专为接受穆拉维约夫建议而召开的会议通知。这个会议由皇帝亲自主持，参加者除备忘录的作者和我以外，还有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和海军大臣季尔托夫。

穆拉维约夫伯爵致词说，俄国在远东需要一个太平洋的港口，而目前正是占领，或者更确实一点说，夺取旅顺口或大连湾的时机。他指出这两个港口在战略上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我愤激地反对这个措施。我提醒在场诸人，我们曾宣布过维持中国领土完整的原则，并且凭借这项原则的力量迫使日本退出了包括旅顺和大连湾在内的辽东半岛。我进一步指出我们已经和中国缔结了一项秘密的防守同盟，因此负有防止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的义务。我说，

在这种情形下，夺取中国的港口就是极端的背信弃义和不守信用。即使抛开这些道德上的原则，而完全从我们自身的利益着想，这种办法也是极端危险的。我提请出席这次会议的人们注意到我们正在中国领土上修筑一条铁路的这个事实，我们的行动会激起中国反对我们，这样就会危害修筑铁路的大局。而且，在占领这些港口之后，是不能不用铁路和铁路干线连接起来的，这种新路线的修建又会引起其他纠纷而很可能招致灾难性的后果。

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坚定地支持穆拉维约夫伯爵。海军大臣则认为朝鲜海岸的港口距大洋较近，比旅顺或大连湾更为有利作为太平洋舰队的根据地。我的争论对于万诺夫斯基或穆拉维约夫丝毫没有影响，但皇帝显然被我对这个策划的激烈责难所感动，所以他没有批准占领计划。

几天之后，我拜见皇帝。皇帝显然有点为难的样子对我说："谢尔盖·尤利耶维奇，你知道，我已经决定占领旅顺和大连湾。我们的运载军队的船舰已经向该地进发。我之所以采取这一步骤，是因为那次会议以后，外交大臣报告我说据他得来的消息，英国军舰已经在这两个港口外巡弋，如果我不占领，英国人就会去占领。"穆拉维约夫的消息当然是不可靠的，因为我后来从英国大使那里得到了消息证明穆拉维约夫的话纯属捏造。

这个消息让我感到非常不安。在离开御书房的时侯，我遇见亚历山大·米哈依洛维奇亲王。他熟悉远东的发展情况，我对他说，"殿下，请记住这一天，这个致命的决定将会招来灾难性的后果。"

我向皇帝告辞之后径直去拜访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的参赞契尔斯基，请他向德国皇帝发一电报，说为了两国共同的利益起见，在惩罚了杀害传教士的凶犯之后，请他赶快从胶州湾撤兵。德皇的回复大致如下："我从维特的话中看出来，他还不知道这件事的重要细节，所以我们不能听从他的劝告。"到后来我才发觉德

皇所谓“重要细节”指的是什么。那就是，1897 年夏季当他到彼得戈夫宫访问时，就已经强求尼古拉二世默许他占据胶州湾了。

1897 年 12 月上旬我们的一支舰队占据了旅顺口和大连湾。如我上文所说，这一行动乃是外交大臣报告的结果，这个报告的大意是：如果我们不去占领这两个港口，英国人就会去占领。

因为我预料到皇帝所采取的这个行动会招致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没有退让而仍然主张从旅顺口撤兵。关于这件事我和外交大臣有几次剧烈的争辩。结果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紧张，直到他死都是如此。我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这位年轻的皇帝听信外交大臣和陆军大臣的意见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些人的意见符合他本人谋求建功立业的渴望。

穆拉维约夫伯爵训令我们驻北京的代理公使通知中国政府，说我们无意侵占中国的领土，我们占领旅顺口是为了保护中国，防范德国人的侵略，德国人撤退后我们就一定离开。所以最初中国人很放心，并供给我们战舰所需要的煤。

这时，一批批工程人员开始到达满洲。到 1898 年 3 月，初步的勘测已经完成，以致可以拟定筑路的计划了。中东铁路的设计完全是为了文化与和平的目的，但侵略主义的冒险家们则把它变成了政治侵略的工具，包括违背条约，破坏我们自愿许下的诺言而且不顾别国的基本权益。

1898 年元旦，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将军代替万诺夫斯基出任陆军大臣，我曾希望这位新任陆军大臣会采取我的政策而从旅顺口撤兵，结果我的希望成为泡影。在阿列克塞·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主持的一次讨论对中国的要求的会议上，库罗帕特金将军完全反对我的意见。他说对中国的要求不但要包括割让旅顺和大连湾，而且连通常称为关东州的辽东半岛的那一部分也囊括在内。他认为这在战略上是完全必要的。会议就本着这种侵略的精神，拟定了几项要求。其中规定中国把辽东半岛无

偿租借给俄国36年，而且允许俄国修筑一条连接旅顺、大连湾与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铁路支线。

此后不久，鉴于我和政府在远东问题上意见不合，我便奏请罢免我的大臣职务。皇帝却不答应我的请求。他告诉我说他非常倚重我做财政大臣的才能，他个人对我的功绩评价很高。至于占领中国港口的事，则已为既成事实，难以挽回，其是非得失，来日自会证明。同时皇帝还要求我辅助他去实现他新制定的远东政策。

中国政府很不情愿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摄政的太后和年轻的中国皇帝已到北京近郊的颐和园去了。她受了英日两国外交官的影响，坚决不肯割让任何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如果与中国不能达成一协议，很可能引起流血的战争，我于是给我部驻北京的办事员发了一个电报，让他去见李鸿章和另外一个大臣张荫桓，就说我劝他们与我们达成协议。我让办事员馈赠两位大臣以五十万卢布和二十五万卢布的贵重礼品。这是我在与中国人的交涉中，第一次借助于行贿的手段。

这时我们的一批战舰停泊在旅顺口外，准备采取行动，这两位大臣也多半是受了这个事实的影响，去朝见太后并想劝她让步。太后终于答应签署协定。这对我们的皇帝来说是一件惊喜。1898年3月15日，以李鸿章和张荫桓为一方，我们的代理公使为另一方在协定上签了字。这件事违反了我们和中华帝国间的传统关系。我记得有一次和德国大使拉多林公爵谈起我们占据旅顺口的事，我形容我们的政策是“惹祸的儿戏”。这是一个致命的步骤，终于引起了不幸的日俄战争和随之而起的革命。另一方面，中华帝国也渐趋衰落，我预感到从目前正在进行的内战中，将来一定会产生一个共和国。中华帝国的衰亡将引起远东的一次大动乱，而且在未来的许多年内，人们都将感受到这个动乱的影响。

第五章　日俄战争的起因和经过

德皇威廉二世占据胶州湾的事实，确实给我国的外交政策带来了极大的障碍。究竟我们的行动将会引起怎样的结果，他自己大概也不是清楚。不过在那些日子里，很明显，德皇和德国外交家们都竭力要把我们拖进远东的冒险行动中去。他们想让我们的兵力转移到远东去，这样就保障了他们在东部疆界的安全。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战争期间，德皇还替我们防护了西部疆界。为感谢他的帮忙，作为交换，我们与德国签订了一项对我们非常不利的通商条约。

提到我们的远东政策，我还记得在 1898 年我们建造了一艘庞大的破冰船，想冬季在波罗的海航行，但真正的目的则是想在北冰洋探索出一条通往远东的海路。这艘破冰船是在马卡罗夫海军上将的密切参与下建造的。马卡罗夫后来在日俄战争中英勇地战死于旅顺口。他乘了这艘破冰船去北冰洋探险，但只到了新地岛。

我们卓越的科学家缅杰列耶夫对探索经由北冰洋到远东去的海路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和马卡罗夫海军上将、缅杰列耶夫在我的书房中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这位大化学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认为沿北冰洋到达萨哈林岛的想法非常幼稚，他主张最稳当最便捷的一条路线是穿越北极。马卡罗夫海军上将的意见则与他相反，他认为穿越北极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计划，不如沿北海沿岸航行较为慎重。缅杰列耶夫坚信他

的计划是可行的，以致表示如果我们采取他的路线，他愿意和探险队一同乘破冰船前往。但是如果我们依照海军上将的路线，他就拒绝参加这次探险。这两人之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两人的个性，他们此后就再也不见面了，结果这两个计划都没有实现。马卡罗夫海军上将不久就被任命为喀琅施塔得港的司令官，日俄战争爆发时，他被任命为远东舰队的总司令。

我们占据关东半岛这件事让在中国已有权益的列强们感到惊慌。英国立即占据威海卫，日本则重新侵略朝鲜。法国在华南攫得一些领土，而意大利大使马提诺也在 1899 年 2 月 17 日向中国提出割让三门港给意大利并承认浙江省为意大利的势力范围的要求。这一次中国政府表示非常强硬，意大利不得已放弃了它的要求。总之，德国的行动成了列强掠夺中国领土的一个信号。俄国为了安抚各国，自行在旅顺口附近开辟一处自由商埠。然而日本人对此仍不满足。因为害怕与日本发生冲突，我们不得已把朝鲜让给它。我们撤退了驻扎在朝鲜的军队和军事教官，并召回了曾获得对该国财务起决定性影响力的朝鲜皇帝的俄国顾问。1898 年 4 月 13 日我们和日本签订了协定，承认了日本在朝鲜的优势地位。如果我们很忠实地遵守此次协定的精神，日俄两国间无疑可以建立起较为持久的和平关系，我们也会保持住关东半岛，而日本也会完全统治着朝鲜，这种局势可能永久地维持下去，而不致于酿成冲突。

割让关东半岛给俄国，以及列强相继夺取中国领土，引起中国舆论的哗然。签订 1898 年 3 月 15 日协定的李鸿章不得不放弃他的高官而出任华南总督。至于张荫桓，则在义和团事变期间被放逐到中国内地去，在那里被赐死了。此外又听说中国驻圣彼得堡和柏林的大使（一位善良可敬的官员）在召回北京之后，也被斩于市。

中国民众对于俄国不满的表现，其最暴烈的形式就是所谓的

义和团事变。骚乱开始于1898年。第二年，义和团的运动变得更为强烈，到1900年则引起欧洲各国政府的协力镇压。这个运动发源于南方而蔓延到北方。中国群众袭击欧洲人，掠夺他们的财产，在某种情形下也出现过危害他们生命的事件，而中国政府则暗中援助这些暴动者。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政府当局既没有打算也没有办法去平定这场暴乱。

当义和团事变的消息传到莫斯科的那天，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兴高采烈地到财政部办公室来见我。我提醒他注意这次骚乱是我们夺取关东半岛的结果。他回答说："对我来说，我很高兴看到这样的事件。这将给我们一个占据满洲的借口……"我表示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一旦占领了满洲，我的这位来客将要拿它作何用途？他告诉我说，"我们将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

我们是和欧洲列强共同行动对义和团采取镇压措施的。在西摩海军上将想解救实际上已被包围的北京的各国使馆的努力失败以后，我国率先进军北京。在这件事上我又不同意库罗帕特金的意见。我请求皇帝不要积极干涉中国，让别国去镇压北京的骚乱。与此相反，库罗帕特金坚持认为在讨伐北京这件事上我们应起主导作用。我争辩说，我们在满洲有极为重大的利益，所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要去激怒中国人，这样才能维护我们在满洲的地位。

我的劝告未被采纳。在慈禧太后和年轻的皇帝从京城逃亡以后，我们在日军的协助下占领了北京。许多私人住宅，尤其是皇宫，遭到劫掠。当时传说俄国的军官也参与了劫掠，我们驻北京的办事员也私下里向我证实了这些传闻。我必须说，这使俄国蒙羞。有一个中将因为攻克北京而获得了圣乔治十字勋章，在返回阿穆尔地区的驻地时，带来了从北京皇宫抢来的十箱珍宝。不幸

* 布哈拉原为中亚的一个汗国，自1865年起为俄国所控制。——译者注

的是这位将军的例子曾被其他一些军人所仿效。

在劫掠皇宫的同时，我们获得了许多最重要的中国政府档案。在这些文件中，竟然发现1896年我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与李鸿章签订的协定原文本。看来慈禧太后认为这个文件极端重要，所以把它保存在她的卧室内的一个特制的保险箱里。北京被围时，她仓皇出逃，没来得及把这个珍贵的文件带走。后来由于我的建议，俄国把这件我们已经背信弃义的协定交还给中国政府。

攻克北京以后，由于外交大臣和我的建议，我们决定撤出驻北京的军队。

不幸的是，义和团运动逐渐蔓延到满洲。最初，这个地方的官员和人民对我们的态度基本上令人满意。但当我们占据旅顺口之后，这种情况就变了。尤其是南满的人们对我们采取了许多敌对行动。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政府官员都想方设法地阻碍铁路的修筑，有时我们不得不用武力去对付他们。引起这种敌对行动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些纯粹是经济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是自从我们占据了关东之后，地方政府就不再设法镇压或制止民众的这种敌对行为了。

中国政府显然很不情愿惩罚危害俄国人生命财产的罪犯。地方当局只是在一再接到北京的训令以后，才勉强采取不得已的惩戒措施。有一次，地方当局的纵容竟达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于有一次中国的正规军士兵带着步枪和军徽混在袭击我们的一批义和团成员中。还有几次官员们亲自上阵，唆使民众发动对俄国人的袭击。1899年初，奉天将军就布告该省人民，谴责俄国人以种种手段欺压民众，并以不法手段侵占土地来修建大连湾的城市和港口，这个布告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骚动。中国人为了阻止我们，采取了他们一贯擅用的策略，嗾使我们去反对俄国在远东的对手——英国人，显然，中国的中央政府是亲英而排俄的。

当满洲的动荡开始露出征兆时，库罗帕特金就准备派遣我们

驻在阿穆尔地区的军队到肇事地点去。我曾竭力阻止他的这个行动，但不久满洲的暴动就带有威胁的性质，于是我不得不敦促这位将军火速调遣我们的军队到满洲去。这一次库罗帕特金的态度又和往常一样的浮躁且缺乏远见，要恢复当地的秩序显然只需一小部兵力就足够了，而他却调去大批的军队。他甚至把驻欧洲的军队也调去了，当其中这部分军队到达旅顺口时，动乱已经平息了，因此他们就又被立刻调回去。这时北满和南满都被我们的军队占领了。

我们的满洲铁路管理局无疑是怀着一种和平的意向去看待这个事件。它向来主张公平地对待中国，也很想弥补历史上对中国带来的伤害，库罗帕特金却完全不赞成这种政策。我们的军队在满洲的行为就像在一个被征服的国家一样，这样就种下了酿成一场大祸的根苗。满洲的义和团的兵力实际上很薄弱。苏博提奇将军毫不费力就将最强的一支义和团部队击溃了，由于这件功劳他获得了圣乔治十字勋章的奖赏，这次讨伐事实上已肃清了动乱。然而陆军部却以种种借口，坚持让我们的军队留在满洲。这就是在一年半的时期中财政部、中东铁路管理局和外交部代理人为一方与陆军部产生意见分歧的原因。皇帝则踌躇疑惑，举棋不定。一方面他并不断然否决财政部和外交部的意见，另一方面他似乎又嘉许库罗帕特金及其一伙的所作所为。

在镇压了义和团以后，军人在我们对中国的关系上获得了支配性的势力。他们力图趁这个多事之秋来增强他们的军事权力，他们在不断地策划种种征服的计划。有一个名叫希尔什曼的工程师，他曾参与修筑哈尔滨至旅顺口一线南段的铁路工程。他在1902年所写的回忆录中，详细地说明了我们的军国主义者在满洲的活动。

关于1900年的战事，希尔什曼记录着俄国官方关于战事的公报，其中存在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夸大其词，而朝廷又以各种奖赏

颁给满洲的“英雄们”。他写道：“从战事一开始，军部的欲望就不仅局限于惩罚义和团而是想吞并满洲，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他在描写我们在满洲的作战时很确切地评论道，我们是在抢劫一个其经济繁荣与俄国有重大关系的地区。历次讨伐的目的，也不外乎是为进行新的掠夺寻找借口。他援引征讨由晋昌率领的一支叛军作为一个例证。据采尔皮茨基将军所得的报告，这支叛军已在蒙古的库洛城附近建立了它的本部，他决心去消灭它。因为蒙古当局、蒙古人民和俄国人的关系非常融洽，所以给这支讨伐部队配备了可靠的中国官吏和向导。这次讨伐的目的地就是为了保护全蒙古人民所景仰的古老寺院，和以富庶著称的库洛城。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当地人民对于军队的态度也很是友善。如果不是这位指挥官好大喜功，这次讨伐则可以成为缔造和平的过程。

希尔什曼写道，“这件事的经过是采尔皮茨基将军当着几个人的面亲自对我讲的。当讨伐军迫近库洛城的时候，这位将军假装有病，宣称他当天不能进城。到了夜间，随来的中国官吏已经入睡，这位将军在一切准备停当之后突称病愈，然后深夜进入城中。他借口有人向他的军队开枪（这多半是城中守夜的人素来以鸣枪作为值班信号所发）强占了寺院，屠杀了许多僧侣和民众，并且劫掠了神殿。这位勇敢的将军所分得的战利品中，有将近二百尊镀金的青铜神像。”

这位回忆录的作者得出如下的结论：“驱散匪徒，恢复秩序，这件事本可以毫无顾虑地让中国政府去做，因为他们对于处理这种事情更有经验。而撤退我们的军队，也一定不会有什么危险发生。”

1900 年内务大臣西皮亚金到国外疗养，我给他写过一些信，是关于我国政府在镇压义和团运动时期的远东政策的，信中有一些有趣的侧记。下面就是从当年 8 月 10 日我从圣彼得堡发出的一封信中摘录的：

这次向北京进军完全出乎拉姆斯多夫伯爵的意料之外。库罗帕特金总是对我们说北京一时还不能占领，在9月以前还不能开始行动，只是到了9月才有足够数量的军队可供使用。可是库罗帕特金虽然一边向拉姆斯多夫伯爵一再保证，同时他却把一向接受外交部指示的阿列克塞耶夫海军大将调走了，而以李涅维奇代替他，并且没有通知拉姆斯多夫伯爵就命令他向北京进军……但这还不算结束，格罗杰科夫不顾我们官方公开保证我们的目的只是要恢复秩序，突然宣布阿穆尔河右岸为俄国所有。皇帝对此事竟表示嘉许，于是这件事就被公诸于世了。然后他们夺取非常重要的牛庄港，并在那里设立行政机关，升起了俄国的国旗，他们在哈尔滨也做了同样的事。结果在中国人面前我们失去了信用，同时在欧洲引起了嫉妒与恶感并引起了日本人的惊慌。不但如此，库罗帕特金又每天召见各国军事代表，告诉他们说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我们想占据整个北方，我们不能容忍日本在朝鲜扩张势力等等。在这种情形下，我又冒昧地上了一道奏折，大意说库罗帕特金正在把他引向一场灾祸，皇帝所采取的行为不能违背他通过外交大臣所发布的公开声明；我们在中国的当务之急便是恢复中东铁路地区的秩序；秩序恢复之后我们必须撤兵；对中国作战，我们就会使中国人永远成为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深入满洲，一定会在西方或在亚洲的边境上引起其他意外的祸端；远东的战事不会激起人民的爱国热情；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很危险的，因为国内的精神传染病可能会在全国传播开来……最后，我恳求皇帝命令陆军部忠实地依照皇帝原来的计划去做，不要心存什么野心，

不要把我们的国家再拖进国际纠纷中去。

因为我的这道奏疏中的措辞很是激烈，我先给波别多诺斯采夫看了一遍。他说以这样的方式奏明皇帝正是我的责任。于是我便把它呈递了上去。也许是受了我这道奏疏的影响，皇帝传见拉姆斯多夫伯爵，后者也赞成我奏陈的意见而控诉库罗帕特金所采取的办法。他尤其对于占领北京和占领的方法加以很严厉的谴责……皇帝对于这位大臣一向很是和蔼，不过他一再打断他的陈述，说毕竟这次亚洲人所受到的教训是罪有应得……你明白，这种情形是令人失望的。没有确定的政策，没有坚定性，不遵守自己的诺言，而库罗帕特金经常处于一种愤怒的状态中……我已经用尽了我的力量来避免一场灾祸……但事态的进展并不取决于我的努力……

下面是同年 8 月 31 日写的一封信中的一段：

不是开玩笑，我和拉姆斯多夫伯爵怕库罗帕特金甚于怕中国人……除了他正在调用大量没有必要的军队，消耗巨额的军费，在铁路和电报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无用的措施之外，他的那些报告在一些虚构的战斗中杀伤了几百名中国人，而我们这方面却只有极为轻微的死伤或者毫无死伤的战报，这使我深感愤怒。请想一想，对付这个对手，库罗帕特金竟在全国范围内动员了二十万以上的人！我希望这只是他由于轻率而干了傻事，但恐怕这位将军有他的某种应急的计划。最近我已和他讨论过几次，但没有什么效果；他说的是一回事，而做的又是另一回事，也许这就是他的行为的逻辑。有一天他和我们一起进餐，在谈到其他事情时，他说目前他所需军队

数目的多寡应由总司令负责决定，我当时就表示不明白他所谓总司令究竟指的是谁。他回答说虽然有很多人主张需要任命一个司令官，但从这场战事开始，皇帝就已决定自兼总司令了，而他，库罗帕特金作为皇帝的参谋长……请你自己判断这些话的涵义吧。

库罗帕特金将军是一个自私自利而且能说会道的人，他无疑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匹夫之勇。他的大臣官职是年轻的皇帝亲自任命的，他很机敏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他很快发觉，他作为陆军首长，一定会成为实质上是军事帝国的皇帝的得力助手，事实上库罗帕特金就一跃而为皇帝的亲信了。在亚历山大三世时代被任命的大臣们很少被邀请与皇帝皇后共进午餐，而库罗帕特金将军和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却时常得到这种殊荣。穆拉维约夫说一些粗俗的笑话来讨皇后开心，而库罗帕特金则是使皇帝感到高兴。但是他很快也发觉必须同时获得皇后的欢心。我还记得在他被任命为大臣后不久，我去拜访他，知道他次日要觐见皇帝。我有一点事想托他代为禀奏。我在他的书房里会见了他，当时他正坐在一张杂乱地放着许多书的书桌旁，谈完了正事之后，我起身告辞，他挽留我多谈一会。我说我倒并不忙，不过我不愿意耽误他的工作，于是他说他的报告已经准备好了，他告诉我说："在陈奏政务之后皇帝皇后要邀我同进午餐。所以，你明白，我必须预备一些有趣的资料和皇后谈谈。你看这些书都是我国最优秀的作家所写的小说和轶事，特别是屠格涅夫的作品。明天我要谈的题目就是泛谈女人，并专门谈论俄国女人中的最佳典型。"

第二年春天，皇帝有一段时期住在克里木的雅尔塔城，有几位大臣，其中包括库罗帕特金和我也都住在那里。我记得那些日子一连几天都是坏天气。一天早晨库罗帕特金将军从行宫出来，顺便到了我的别墅。他说："今早我可把皇帝逗乐了。我向他陈奏

政务的时候，天色阴霾，皇帝的神色闷闷不乐。忽然间，皇后穿着一件华丽的睡衣站在阳台上，我看到皇帝没有注意到她，就说，‘请看，有太阳了！’皇帝大声问道，‘你在哪儿看到太阳的？’我说，‘请回头看’，他转过身来，看见皇后在那里，于是笑了。他忧郁的神色也随之消失了。”

无论是作为一个司令官或是作为一个军事方面的组织者来讲，库罗帕特金都缺乏创新的才能和独到的见解。他总是依照别人的理想和建议行事，但必须承认他是很勤勉努力的。

二十世纪初，有一种非官方的势力在逐渐形成，并成为我们的远东政策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名叫别佐勃拉佐夫的退役的骑兵上尉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他主张我们必须在朝鲜攫得各种特权，表面上由私人进行，实际上是由政府支持和指导，借以恢复我们在朝鲜的势力。别佐勃拉佐夫赢得了沃隆佐夫—达什科夫伯爵和亚历山大·米哈依洛维奇亲王的支持，这两人引他去拜见皇帝。他们都依从他们那位门徒的意见而赞成用蜘蛛织网的方法并吞朝鲜。这位伯爵的智力不足以预见这样一个政策的后果，而这位亲王又向来具有一个弱点：凡是可以使他显露头角并能满足他好大喜功的欲望的计划都可以让他蠢蠢欲动。

1900 年初别佐勃拉佐夫又想到成立一个官商合办的东亚实业公司，由财政部获得一部分股份来开发朝鲜的森林。我觉得这项计划在政治和实业两方面都具有冒险性，所以表示强烈的反对，这一次我胜利了。尽管这公司的规模已被确定了（1901 年 6 月），但最终没有成立。

朝鲜问题是我们远东政策的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我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在 1901 年 11 月 28 日我给外交大臣的信中说得很明白：

……我深信如果我们不以和平方式消除日本对我们

> 的误会并且和日本互不相让，我们将会不仅经常处于与日本发生武装冲突的威胁之下，并且与中国的关系也将无法稳定，因为中国一定会求助于日本来对抗我们，正如中日战争时中国要求我们的支持和合作。在近期或将来要和日本发生战争，这将是俄国的灾难。我确信俄国将在这场战争中得到胜利，但是这个胜利的代价太大了，而且在经济上将使我国遭受严重创伤。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为占领遥远的朝鲜而和日本开战，俄国人民心中会认为是不划算的，平时在我们国内的生活中已经有令人不安的现象，而由战争所引起的不满会使这种危险变得更加严重，我觉得我有责任说明我的态度：依我的意见，如果情况坏到极点，还不如完全放弃朝鲜……在与日本发生冲突和完全放弃朝鲜这两种祸害之间，我将毫不踌躇地选择第二种。

另一个引起我焦虑的事是满洲问题。我们占领满洲表面上是为了维持北京政府的威信和镇压义和团的起义。现在这场骚乱已经结束，中国政府也已迁回京城，但是我们在满洲的军队却仍然驻扎在那里。中国政府自然要向日本和其他在远东有权益的国家求助了。这些国家于是联合起来要求我们撤兵。结果，在 1902 年 3 月 26 日，我们和中国签订了一项协定，规定我们在一年以内逐渐从满洲撤兵，在 1903 年 11 月 26 日之前撤完。

1902 年的 6、7 月间，我到满洲去视察中东铁路的建造情况，以便就地解决一些有关铁路的修建和操作层面上的问题。我回来以后，我向皇帝呈递了一件奏疏，其中我强调应该从满洲撤兵，并且应以和平的方式来保障我们在远东的势力。可是这道奏疏并未感动皇帝。如果他听从了我的忠告，我们就会避免这场不幸的战争以及全部灾难性的后果。

根据俄国和中国的协定，我们撤退了一部分在满洲的军队，但到了 1903 年，国内掀起了一场运动，主张在撤净其余兵力之前，必须获得中国对于我们在满洲权益的一系列保证。为讨论这件事，召集了一次大臣会议，库罗帕特金表示，他“不禁把满洲的一部分看作是俄国领土”。依他的见解，“我们不必阻止中国和其他列强对我们作出敌对的表示，也不必对他们违约的行为提出抗议，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不履行我们对满洲的义务的借口”。

于是我们拟定了一系列再保证的文稿，作为从满洲撤兵的条件，但满清政府不肯接受我们的要求。这时候，别佐勃拉佐夫的权势迅速地增长起来，虽然他已经被他原来的两位高级赞助人所遗弃，但他获得了皇帝本人的赞许。1902 年 11 月，他被派赴远东去研究开发那个地区的自然资源的可行性。皇帝命我拨二百万卢布存于华俄道胜银行供别佐勃拉佐夫使用，并命令我对于这事严守秘密。别佐勃拉佐夫在远东逗留了两个月。他自称是皇帝的钦差代表。他到过旅顺口，给那个地区的行政当局带来了混乱。他到处鼓吹以武力支援的经济侵略。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远东政策显然分为两派：其中一派是官方公开的有节制的政策，以大臣们为代表；另一派则是暗中进行的，为别佐勃拉佐夫所鼓动并由皇帝亲自领导。别佐勃拉佐夫一伙的计划，成为几次大臣会议的主题。在历次讨论中，我都毫不妥协地反对在朝鲜采取冒险的行动。我不顾伤害其他人的感情，用最刺耳、最严厉的辞句去驳斥别佐勃拉佐夫。在 1903 年 3 月 26 日的那次会议上，我指出我们的势力既然已达到黄海沿岸，在外国列强嫉妒的目光注视下，我们必须暂停前进而固守我们目前的既得利益。总的说来，这次会议反对别佐勃拉佐夫的计划，因而没有同意他的这些计划。

鉴于别佐勃拉住夫对皇帝的影响与日俱增，我知道一个名叫“麦谢尔斯基公爵”的知名新闻记者颇被皇帝重视，我抑制住对这

个所谓记者的厌恶，特地去拜访他，请他写一封信给皇帝，提请陛下注意其远东政策的危险性。“麦谢尔斯基公爵”答应了我的请求。但皇帝的答复显然表明他并没有在意麦谢尔斯基的警告。复信以谜语般的词句结束，大意是说“到 5 月 6 日那天就可以看出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怎样的了”。果然到了那天，别佐勃拉佐夫被提升为国务大臣，而他的同党沃加克则被任命为御前侍从武官长。这都是破格提拔。

就在第二天，国务会议重新召集了一次会议来讨论别佐勃拉佐夫的计划。皇帝对我的态度非常和蔼。他给我一支御用的雪茄并为我划火柴。他显然想借此使我的反对态度缓和下来，但我却仍然以我一贯的耿直重述了我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拉姆斯多夫伯爵则坚决主张远东的交涉应由我们的外交家去施行，必须尊重有关各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它们的合法权利。普列维则答复说，俄国不是由外交家而是由武力建立起来的，所以远东问题必须用刺刀而不是用外交家的笔来解决。从整体上说来，大部分人的意见是相当赞同别佐勃拉佐夫的计划的。

别佐勃拉佐夫成立了一个实业公司来开发鸭绿江流域的森林。公司雇用了许多中国的匪帮作为护卫，但中国政府认为这些人都是罪犯，所以中国的正规军队和这些护卫之间便时常发生冲突。公司代表与中国当局之间的关系因而变得很紧张。我们在鸭绿江流域的活动逐渐吸引其他国家外交界的注意。日本向英国，特别是向美国求助。1903 年夏季，有关的各国都在严密监视着我们在那里的活动。

大约在这时，别佐勃拉佐夫又一次到远东去。他的这次旅行不是以私人的身份进行的，而是带着很多随员并乘了一列豪华的专车。同时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将军碰巧也在远东，于是在旅顺口开了许多次有关我国的远东政策所存在的主要问题的会议。这些会议的决议和圣彼得堡会议的决议在实质上并无二致。俄国吞

并满洲的念头被否决了，但决定向北京政府要求作出保障俄国在满洲的权益的保证。除别佐勃拉佐夫以外，参加会议的人们都是反对侵略政策的。库罗帕特金将军回到圣彼得堡后，给皇帝呈递了一份奏折。他在陈述我国在朝鲜的行动时说：

> 我不敢在陛下面前隐瞒我的见解，既然我们在鸭绿江地区的企业已被世人所知，而俄国君主对于这项事业有着很高的兴趣，这在国内和国外已经成为一桩众所周知的事情了，所以这个企业已不能再被当作一种单纯的商业冒险了，将来它必然具有巨大的的政治重要性。因此，如果我们不想保留一个同日本决裂的危险的根源，那么，无论这项企业具有多么大的商业利益，我们还不如把它卖给外国人。

最后，库罗帕特金在结束他的备忘录时写道："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采取必要的步骤来保持对日本的友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放弃在南满获得一个据点的企图，只要能巩固我们在北满的势力，就应当感到满足了。"

到1903年7月我也呈递了一道应付远东局势的奏疏。关于远东问题的实质以及我们在远东的问题的一般性质，我有这样的观点：

> 快速的交通工具把黄种人也卷入了国际交往的漩涡。自从上个世纪中叶以来，工业上的生产过剩和殖民的冲动，使欧洲和美国的注意力移向远东的各个国家。大国在这里很容易就发生了冲突，这些冲突不仅是在欧美诸国之间，并且也在欧美诸国和那些几千年来从未与世界其他各国往来并发展了它们自己的文化的那些国家之间。

既然西方人在技术和军事上占优势，这种冲突对当地国家来说，其结果是不难预料的。只有像日本这样的国家，迅速采取自卫所必需的欧洲文化的成就，将来才能免遭失败，其余比较保守的国家势必成为强大侵略者的猎物而面临被瓜分的厄运。

这就是远东问题的实质。因此，各国的当前问题就是如何从这些衰朽的东方国家特别是宠大的中华帝国的遗产中，尽可能分得大的一份。俄国从历史和地理上来讲，有着不可争辩的权利分得这个预期的猎物的最大部分。俄国人民最初向东方迁徙始于伊凡雷帝时期。从那时以来不断向东发展，直至最近占领了关东半岛。显然，无论是占领这个地区还是满洲，都不是俄国的最终目的。由于我们和中国之间有着绵长的国境线，我们有着特别有利的形势，除非中国能够自卫，否则中华帝国的很大一部分都将被俄国吞并，那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但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使这种吞并不要引起突发的事件，不要冒进，不要侵占领土，以免有关的其他国家趁机下手，瓜分中国，从而使俄国得不到中国最富饶的省份。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坚持必须解决满洲问题。我认为俄罗斯必须从满洲撤兵。

1903 年 7 月，解决满洲紧张的局势已成为当务之急。同时日本又重新和我们谈判关于在朝鲜和满洲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但是却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一直到战争爆发前局势仍不明朗。因此战争一开始，却打得我们措手不及。

我觉得大体上日本的提议是可以考虑接受的。虽然 8 月 1 日在俄罗斯召集了一次会议，并没考虑日本提出的条件，结果也得到同样的结论。

这时，我们的远东政策忽然发生了变化。7 月 30 日皇帝下了一道诏书，事前并没有通知此前负责远东事务的陆军、财政、外交各大臣而创设了一个钦命远东总督的职位。这个总督握有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军政大权，并负责全权处理对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外交事务。新任的总督是前任关东半岛的长官阿列克塞耶夫海军大将。我相信，阿列克塞耶夫最初是反对别佐勃拉佐夫的，但看到后者当权，就转而归附了他。从那时起，我知道我的主张永远不会被采纳了，而一场不幸的战争则在所难免。

这时我很明白我不能再作为政府的一员留下来了。上文已叙述过我离职时所处的环境。罢黜我并不影响我们政策的推行。俄国正径直朝着一场战争奔去，同时却没有进行应付意外事件的准备。我们好像的确知道日本人不敢攻击我们而甘心忍受一切似的。在那些年里，陆军部一向专心于准备与欧洲的条顿民族进行帝国战争。直到日俄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我们还预料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战争不可避免而忙着准备。我们甚至任命了陆军司令官。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为对德作战的总司令，而库罗帕特金将军则被任命指挥俄奥边境的陆军。

我认为我有责任说，只要内阁各大臣一致反对侵略朝鲜的政策，尽管别佐勃拉佐夫一伙得到皇帝的宠信，他们仍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施行他们的野心。但当内务大臣普列维公然倒向别佐勃拉佐夫一边之后，形势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只是在这个时候，皇帝才完全听信别佐勃拉佐夫。后者和我有一个时期是处于一种你死我活的局面，而皇帝对于我们两人的取舍感到十分为难。

由于远东总督一职的设置，阿列克塞耶夫和别佐勃拉佐夫便公然把远东政策的指导权抓到他们的手中。他们拟定了一些开发远东领地的宏大的、异想天开的计划，他们把满洲和朝鲜北部也算在领地以内。他们指定中东铁路公司和华俄道胜银行为这个目标服务，还打算吸引外国投资者。在我辞去大臣职务之前，别佐

勃拉佐夫曾几次访问过我，为我解说他那些狂妄的计划。我则示以漠然的态度并且表示不愿让他使用国库的钱。1903 年初拨给他的二百万卢布很快就花完了，他在满洲所创办的各项企业都陷入经费困难的绝境，因为他们所说的开发森林所获得的利润只不过是纸上的数字罢了，其余各项开发计划也都失败了。他们引起中国人对我们的敌视，并加深了日本人对我们的猜忌。

皇帝9 月到德国去了，并暂住在达姆施塔特。从那时起，外交大臣对远东事务的影响几乎完全消失了。皇帝直接和阿列克塞耶夫总督商量，而不依靠拉姆斯多夫伯爵的办事机构。在达姆施塔特，皇帝批准了设立远东委员会的法令并任命别佐勃拉佐夫和阿巴札为该会委员。

当皇帝在达姆施塔特逗留时，我也出国了。在巴黎，我发现人们对远东局势持乐观的态度。法国人肯定说日俄间不会发生战事，因为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宣称据他得到的情报，战争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实上，他是从俄国驻法大使那里得来的情报。他没有从北京或东京的外交机关得来准确的消息。这种情形表明法国在远东的外交事务办得是多么糟糕。与此相反，德国的外交当局十分清楚日俄间的情况。柏林方面知道日本正竭尽全力备战，因而认为日俄战争不可避免。看来，我被免去财政大臣的职务使日本人确信战争是无法避免的事，因为他们知道我是那些鲁莽的军国主义者的主要反对者。

当皇帝在达姆施塔特游览时，德皇写信给他，大意是说在远东正在准备进行一场武装冲突。皇帝的回复很特别。他告诉德皇说不会发生战争，因为他不希望打仗。显然他的意思是说俄国不宣战，日本也就不敢宣战。

皇帝于 11 月 21 日（公历 12 月 4 日）回到皇庄*，三天之后，

* 叶卡捷林娜宫，圣彼得堡最奢华的行宫。——译者注

财政大臣普列斯克因病请辞，由其下属罗曼诺夫继任。罗曼诺夫是一个有很好操守的人，绝对诚实并且具有渊博的财政学识。因为他具有这些优点，自然就不能久安于他的职位。不久后他便离职而由柯科弗采夫继任。

1904年有过几次重要的会议。1月初在冬宫开了一个晚会。在这个晚会进行当中日本驻俄大使栗野特地找到我，要求我敦促外交大臣务必尽快答复日方最近的通碟。他告诉我说，俄国同日本谈判的态度是冷漠的，显然是在故意拖延解决满洲和朝鲜问题。他说，日本方面已容忍到了极限，如果最近几天得不到答复，战争就会爆发。诚然，从我们方面对谈判的态度来看，好像我们有意迫使日本求助于武力。虽然对方一再表示愿在几点上让步，而我们的态度仍然很是强硬。尽管我们承认日方的要求大体上还算公平，而实际上我们依然是一步一步地在拖延谈判。

我结识栗野已有一段时间了。在我辞去财政大臣的前一个月里，他交给我方一个可以避免战争的日俄协定纲要。尽管我支持这个纲要，但皇帝旋即将其交给远东总督，命他酌情办理，于是开始了一场无休无止的会谈。我把栗野的话转告给拉姆斯多夫伯爵，他回答说，“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参与这个谈判”。

我们没有如期回复日本，于是在1月26日（俄历），日本军舰袭击了我们在旅顺口外的舰队，击沉了几只船。第二天就宣战了。朝廷举行了一个欢迎皇帝回京的仪式和庄严的礼拜，祈祷战争的胜利。参加的人没有流露出多少热情，宫中充满了阴森沉郁，仿佛有一个沉重的负担压在人们身上……皇帝到达宫中时只听到一阵微弱的欢呼，而且很快就沉寂下去了。次日，政府组织了一系列的街头游行示威，但居民方面没有什么同情的反应。显然这次战争是十分不得人心的。没有一个人要战争，却有许多人诅咒战争。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

阿列克塞耶夫总督被任命为前线部队总司令。这项任命是极

端荒谬的。他并不是陆军出身，他甚至不会骑马。他在海军服役期间也没有什么昭著的功勋。他发迹的经历是很特殊的。当他是一个年轻的海军军官的时候曾随同阿列克塞·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作周游世界的航行。据说到达马赛的时候，这些欢乐的旅行家办了一次酒席，这位年轻的亲王行为非常失礼和粗暴，以至被当地警察传问。据说阿列克塞耶夫当时居然使警察当局相信是他自己而不是亲王犯了无礼的罪。他付了一笔罚款，从此便赢得了亲王的宠信。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在位时，阿列克塞耶夫已升为海军大将，又因为亲王的提携，被任命为关东地方长官。我相信亲王决不会想到他的这位门徒后来能成为一支几十万人的作战军队的总司令，这支大军很快又增加到一百万人。

因为舆论方面对于阿列克塞耶夫表示出极度的不信任，于是在2月8日（公历21日）皇上又任命库罗帕特金将军为远东军司令官。这项任命结果造成统帅权的二重性，必将引起无穷的混乱。库罗帕特金临行时声势非常显赫。他作了几次公开的讲演，行动上颇像是已经得胜还朝的模样。我觉得他还不如静悄悄地出发，凯旋时再大肆宣扬，但是命运注定并非如此。

库罗帕特金将军出发前的晚上和我在一起，因此我们有一个讨论当前形势的机会。他知道我熟悉远东事务，所以关于作战的整体规划，特向我征求建议。我在未说明我的意见之前，表示愿意分享他的计划。他说，我们对于战事完全没有准备，我们要集合起足够多的作战军队，还需要化费许多个月的时间。在军队调动完成以前，他想先向哈尔滨方向移动然后有秩序地后退，而旅顺口则任其听天由命。撤到哈尔滨后，借着来自欧洲的援军再对日本人展开攻势并消灭其军队。我认为这个行动计划是符合当时局势的，因而表示赞成。

我们将要分别的时候，这位将军转过身来对我说道：

“谢尔盖·尤利耶维奇，你是一个非常聪明而且具有多种才能

的人。在我出发之前，你将给我什么建议呢？”

我回答说：“我的确想给你一些很好的意见，只怕你未必会采纳。”

他坚持非要我说说不可。

我问他：“谁和你一同到远东去呢？”他说他带了几名副官，这些人将来就会成为他的幕僚。

我又问：“这些人都可靠吗？”

他答：“当然。”

于是我说：“既然如此，我给你的意见是这样的。阿列克塞耶夫大将现驻在沈阳。自然你也是一直要到那里去的。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这样办。一到沈阳就派亲信去逮捕阿列克塞耶夫大将。以你在陆军中的威信，他们一定会遵从你的命令。接着我便派人在第一时间里乘往西开的火车把他押送到圣彼得堡。同时向皇帝呈一道奏折，大意说：“皇帝陛下，因为要完成陛下所予臣之重大任务，在到达前方后，臣认为必须首先将总司令逮捕而押至圣彼得堡，否则要成功地指挥战争是极端困难的。臣恳求陛下或是因为我做了这样不法的事而下旨枪决我，或是为了国家的前途而宽恕我。”

这位将军哈哈大笑，连连摆手，说道：“谢尔盖·尤利耶维奇，你总是在开玩笑。”我向他保证，我的确是很认真的，我预料到因他到达前方而产生的指挥权的二重性必将引起的麻烦。

这位远东军司令官库罗帕特金认为阿列克塞耶夫只是个一无是处并且自私自利的钻营官职的人物，他的这种见解并非毫无根据。对于总司令阿列克塞耶夫来说，他恨库罗帕特金，衷心希望他失败。两人向中央政府的报告是互相矛盾的，但实际上库罗帕特金为了避免决裂而妥协了。皇帝内心深处是同情阿列克塞耶夫所主张的战略的，但他仍然犹豫不决，继续在行事上表现出好像他的主要目的是欺骗这两位将军似的。库罗帕特金后来告诉我说，

他还保存着一叠电报文稿，从那里面可以看出，直到阿列克塞耶夫被免职为止的战争的第一阶段失败的真正原因。库罗帕特金试图进一步为他自己辩白，也对我说朝廷曾经把一些愚蠢的将官硬塞给他，并且中央当局曾不断地干涉他的指挥。对于他的这些抱怨我回答说，这都是他的过失，因为他不曾接受临别前我给他的忠告。我说，如果他发觉自己没有行事的自由，他就应该辞职。

战争初起时我们的军事领袖们表现出何等的乐观，而我们如何低估了日军的战斗力，可由下面的情况说明。在讨论我们应派赴前方的军队数量时，库罗帕特金将军和前任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的意见就不一致。库罗帕特金将军认为俄国兵和日本兵的此例应为二对三，而前陆军大臣则认为一个俄国兵足能对付两个日本兵。

在整个1904年中，皇帝检阅了所有要派赴前方的军队。为派兵去前方，他视察了别尔哥罗德、波尔塔瓦、土拉、莫斯科、科洛马、奔萨、司兹兰各城。9月，他视察了一些西部的城市并检阅累发尔的海军。10月他又到苏伐尔基、维捷布斯克和邻近的一些地点去。12月，他又视察了南方各地。皇帝时常作简短的演说，祝愿即将出发的部队一路顺利。然后皇帝皇后陛下发给军士们各种各样的圣像，其中包括最近才敕封的萨罗夫的圣泽拉菲姆的像。在这一年全年中，我们连连战败，这就使得德拉戈米罗夫将军造出了一句很讥刺的妙语，流传全国，他说，“我们拿圣像去攻击日本人，而日本人却拿枪弹来对付我们”。

1904年战争的经过如下（日期按照俄历）：3月31日我们的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被击沉，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和一部分人员殉难。这一次惨败使我们的远东舰队丧失了战斗力。4月中旬我们战败于土仑镇。5月末，我们与日本在旅顺口外的交战失败。8月中旬我们在沈阳附近的一次重要战斗中失利，于是开始向沈阳撤退。到达沈阳城的那天，库罗帕特金命令从此不再后退半步。

12月20日，旅顺口陷落了。然后我们又在沈阳近郊受挫，被迫向哈尔滨方向撤退。

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库罗帕特金和阿列克塞耶夫之间常常发生争执。前者要依照一定的计划节节撤退。后者则相反，主张采取进攻战略。阿列克塞耶夫坐在他那非常舒适的书斋里，滔滔不绝地谈论向旅顺口进军和打败日本人的策略，但是没有一个计划被彻底执行。两人都向圣彼得堡请求指示，许多军事措施都是来自首都的命令。这种荒谬的作战方法的结果就是带来了一连串最为可耻的失败。最后，这位总司令被免了职，召回圣彼得堡去了，其职位由库罗帕特金将军继任。

沈阳战役的失败证明了库罗帕特金将军完全不能胜任总司令一职。他的职位由李涅维奇将军继承，李涅维奇曾以占领北京与劫掠皇宫而展露头角。李涅维奇将军虽然本人是一个勇敢的军人，但也无法挽救当时被动的形势。全军士气涣散，军心动摇。头脑清楚的人都能看出在大陆上我们已失掉一切取得胜利的机会。我认为俄国节节失败的原因是我们毫无准备和军事领导权的二重性。在库罗帕特金被解职前上任的陆军大臣雷迪格将军，当时就公开表示意见说，我们已经输了这场战争。

当我住在柏林进行重订商约谈判的时候，我还相信即使我们的海军战败了，我们的陆军还是会取得胜利的。我对于库罗帕特金这人的能力虽然不抱他会成为一个军事领袖的幻想，但我还是信任他的。我觉得日本要接二连三地打败我们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我回到圣彼得堡时，我才清楚地看到我们已经输了这场战争。从那时起，我就致力于快速缔结和平条约。然而我的努力白费了，只是在我们各方面都已失败之后，我们才决定进行和平谈判。

沈阳之役战败后，那些不凭理智而凭各种不可思议的冲动的人抱着一种把我们波罗的海舰队派到远东去就可以改变战争的命运的幻想。他们都以为在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海军上将指挥之下，

我们的波罗的海舰队是可以打败日本人的。当然，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也是一个未加思虑的、凭希望而不凭理智制定的计划。对于每一个明智的观察家都清楚地看到，这支舰队注定会遭到覆灭。旅顺口失陷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舰队的处境更加危险，因为它不能从任何地方得到补给，在危急关头也没有港湾可资躲避。1905 年 5 月 14 日，发生了灾难性的对马海峡之战，我们的整个舰队都葬身于日本海域中。这对于我们在远东的野心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从这次溃败之后，皇帝才有想要讲和的念头。

对马海峡之役的失败是废除远东委员会和罢免远东总督阿列克塞耶夫大将的信号。别佐勃拉佐夫在远东的冒险事业也从此告终。阿列克塞耶夫大将虽然连弹药的气味都没有嗅过，却获得了圣乔治十字勋章。战争期间他安居于沈阳的官宅中，大半时光都消磨于享乐而很少过问军队的情况。俄国高级官职的任命和军功章的颁授的方针真是难以令人置信。



第六章　朴次茅斯和约

1905年7月29日（俄历）我被任命为与日本进行和谈的首席全权代表。在此之前，俄国驻意大使穆拉维约夫被召回圣彼得堡并被任命为全权代表。他回抵京城时，有一天晚上我们曾在一起开怀畅谈。他对我讲，他知道进行这次和谈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不论结果如何，他将会受到各方面的攻击。然而他说，他决定牺牲个人的发展前途，接受皇帝的任命。他又说他住在国外时，在议会制度下的生活使他确信只有实行宪政才能拯救俄国。当时这位大使丝毫不带病容，并且说他自己的精神状态很好。

过了几天，拉姆斯多夫伯爵来见我，告诉我皇帝命他私下来探询我愿不愿意接受对日谈判的首席全权代表的任命。大概就在前一天穆拉维约夫去见皇帝，自称有病，请皇帝解除他所承担的任务。伯爵对于穆拉维约夫之所以拒受任命有一番详尽的解释。拉姆斯多夫伯爵说，第一，因为他个人对于这项工作毫无准备，他的机智足以看出承担这个任务将冒很大的危险。第二，皇帝把首席全权代表的酬金定为一万五千卢布，这使他颇为失望，他曾希望得到十万卢布。

拉姆斯多夫伯爵以爱国心来激励我。他说他自己不能去，因为他现任职务不能分身。至于他的同事奥保连斯基公爵，他认为不适于担任此职。最后我向伯爵表明，只要皇帝亲自命令我接受这项任命，我将不会拒绝这个使命。第二天，皇帝便召见了我。

他对我态度很谦和，要求我去负责进行和平谈判。我回答说我在任何时候都愿意为皇帝和国家效劳。皇帝向我道谢，并说他很诚挚地希望这次交涉能够达成和平。可是他又说，他不能赔一文战费，不割让一寸俄国的领土。

几天以后，我启程赴美国。在我出国的时候我国的财政情况如下：我们已耗尽了我们所有的财资，又失掉了在国际上的信用。无论是在国内或国外都没有一点发行公债的希望。我们所恃以继续作战的办法就是依靠发行新纸币，如此下去，不久财政与经济就要陷于完全崩溃的地步。事实上，在战争期间纸币发行总额已从六亿卢布增加到十二亿卢布。这个可悲又可怕的局面，一方面是由于柯科弗采夫缺乏经验，另一方面则由于我们对战争报以太乐观的态度。

在我个人方面，我确信库罗帕特金和李涅维奇会为我的成功使命而向上帝祈祷。的确，只有讲和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因为那时他们可以说："我们虽然接连被打败，但如果不是讲和的话，我们终会获得最后胜利的……"

我们的代表团中包括下列成员：圣彼得堡大学的国际法名誉教授马滕斯，他是一个学问渊博但心胸却不很豁达的人，也是其他好几所大学的名誉教授；外交部的人员普兰松，他是一个典型的官僚，最喜欢趋承上司的意旨；我们的驻中国大使波科季洛夫，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政治家，曾一贯反对我们在远东的侵略政策；后来升任财政大臣的财政部代表希波夫；陆军部的代表叶尔莫洛夫将军，他是我们有勇无谋的陆军的代言人。陆军部的副代表萨莫伊洛夫上校，他认为我们已失最佳战机，无论付出任何代价也必须议和；海军部代表鲁辛上校，他的见解和萨莫伊洛夫完全一致。副全权代表是罗森男爵，他是我到了美国之后才认识的。他具有波罗的海日耳曼人的才智和十足的绅士风度。他对于俄国的内情毫不清楚，直到听见萨莫伊洛夫上校和鲁辛上校谈起前线上

的状况，他的态度才转而倾向和平。虽然他未积极参与谈判，却尽力协助我。

我作了这样的安排：我的一部分随员在瑟堡和我会合，其余的则在纽约会合。我离开圣彼得堡时，同行者有我的妻子和才几个月大的小外孙列奥·纳雷什金和几个仆人。我们中途在巴黎住了几天，在这个法国的首都，我作为一个俄国爱国者的感情到处受到伤害。公众把我这个大俄帝国君主的首席全权代表，只当作一个微微小国的使臣来对待。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对我表示同情，另一部分人则公然对于我们的不幸表示高兴，大多数人则以一种十分冷漠的态度来对待我。在巴黎车站上，我听到了“讲和吧!”的呼声。这些过激的报纸对于我们皇帝和国家的态度简直是无礼到极点。

我离开巴黎赴瑟堡时，同行者有我的妻子，我们的女儿和她的丈夫纳雷什金，还有一大群新闻记者。我原拟晚间上船，但因暴风耽搁了，所以到次日早晨才动身。我们在一家旅馆过夜，旅馆很挤，我们只得到两间设备简陋的房间。在瑟堡，法国人对我们的轻藐态度更加明显。然而，这大概是由于我国偶遭不幸时我正好身为国家的代表，所以我快崩溃了，而常常出现遭受种种凌辱和痛苦折磨的幻觉。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这次所乘的轮船是德国汉堡轮船公司的“威廉大帝”号，它是一艘最大最快的远洋轮船。上船时我们受到船长和船员们的热烈欢迎，当我走上甲板时，乐队奏起俄国国歌。我的一些同事即萨莫伊洛夫上校、普兰松、纳博科夫、柯罗斯托维茨和马滕斯等都已经在船上了。还有好多我个人认识的新闻记者同行，勃良查尼诺夫是一个颇有才干的青年，只是学识肤浅，浮躁而多话；苏沃林是一个讨人喜欢的青年，这两人都是俄国人。在外国的记者中我认识狄龙博士，他是一个卓越干练的英国政论家，为人忠诚高尚，在英美两国久负盛名。他是俄国

一所大学的毕业生，曾在一段时期内，在哈尔科夫大学教比较语言学。他能说流利的俄语并能以合乎规范的俄文写文章，对于俄国的情况，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的政局变化了如指掌。他与我们的所有政党和社会团体都有往来。在这些新闻记者当中，还有英国国王爱德华的特别通讯员麦肯齐·华莱士。这个人一直到条约将要签字的时候还认定这次和约不会缔结，从这个事实可以判断他一定经常令英国国王对国际形势产生误解。他在一个时期内是泰晤士报的政治栏编辑，他或许是一个好的政论家，但他总是把不正确的俄国消息报告给他的国人。他能说流利的俄语，对于任何关于贵族政治的事情他都情有独钟。他在俄国时，和一些贵族家庭住在一起，专门与一些门庭显赫的人来往。所有他听闻的事情，他都认为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且很忠实地报告给他的国人，但在英国并没有人重视他。前不久他写了一本关于俄国农民的书，其中他对于我们的农村公社（公社共有土地制度）大加赞扬。

在我们的革命（1905 年至 1906 年）爆发前的六个月，他的这本书发行新版，他在书中断言由于有这种明智的农村公社组织，使俄国不致于发生革命。1906 年到 1907 年的冬天，他住在圣彼得堡，据说在他所写的通讯中对我颇有微词，他一定是受了他所密切交往的人士的影响。我在美国怠慢他的举动，可能也让他心怀不满。有一次我对他说，他那本关于俄国农民的著作表明无论多么明智的人，要是以耳代目，也会酿成天大的灾祸。

同我们一起乘船的，还有法国《晨报》记者阿代芒。他是一位出色的职业新闻记者，对我们的态度很好。此外还有一些别的记者，但在欧洲方面凡是关于谈判进行的消息实际上都被狄龙博士和阿代芒所操纵。这次会议中德国新闻界没有派来卓越的代表。

我们的旅程进行了六天，海上风平浪静，所以我一点也没有感受到航海的不舒适。我们单独吃饭，不和船上大众在一起，有几次我邀请了一些记者来一起进餐。我曾两次到普通餐厅去吃饭。

我发现旅客中竟有好几个是因好奇心驱使而踏上此次旅程的，他们去朴次茅斯，只是要想目睹我和小村的政治角斗。狄龙博士从海上航程中以无线电报发表了他与我关于即将举行谈判的谈话记录。从大洋上以无线电报传出一篇谈话在世界报刊史上还是第一次。这篇访问记登载在欧洲的各大报纸上，它在使世人了解我对于此行使命的性质的观点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自从我出乎意料地受命为全权特使以来，差不多已过去两个星期了，在这期间我公务繁忙，不能静下心去思考。但是上船后我就有充裕的机会独自沉思了。在船上我才为这次外交上的决斗做好了准备，拟定了这场战斗的计划。我决定以下面几条原则作为我战略谋划的依据：（一）丝毫不露我方急于求和的意图，使人感觉到我们皇帝之所以同意和谈，只是为了顺从各国对结束战争的普遍期望；（二）做一个配称世界上最大帝国的特使，不因这个强大帝国一时受挫而沮丧；（三）鉴于美国新闻界具有重大的影响，要殷勤对待新闻界，并创造机会让媒体与我们接近；（四）要用民主朴素且不唯利是图的作风博得美国人的同情；（五）鉴于犹太人在美国新闻界和美国生活的其他方面，尤其是在纽约的势力很大，不要对他们显露任何敌意——这与我对于犹太人问题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我在美国访问的整个时期，都严格遵守了这个行动纲领，在那里我好像住在一间玻璃房子里一样，好像是舞台上的演员，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我认为这次外交上的成功，部分应归功于我的这个纲领。在船上时，我已经开始实行这个计划，结果我和很多旅客之间建立了诚挚的关系，后来这种关系又从轮船扩展到普通民众和新闻界，营造出了一种有利于我个人和俄国的气氛。我不但不躲避记者们，恰恰相反，我总是顺从他们的意愿，实际上我迎合了他们要使世人明了会议进程的愿望。自然，我还得随时保持谨慎，细心地推敲所说的每一个字，以便让我所争取的事情获得最圆满的结果。日本的全部战时公债几乎

都是在美国金融市场上发行的，所以美国实际上资助日本来对我们作战，这是一种公开的秘密。而且美国舆论总的来说是偏袒日本的。这就是我到达美国时面临的局势。展望国际时势的演进，我可以说在把美国舆论界拉到俄国周边的目的，我已取得成功。在行动过程中我逐渐赢得了美国新闻界的支持，并使它为俄皇所嘱咐我办理的事情说话，因此当我离开美国时，事实上已经获得了整个美国新闻界的拥护。这样，美国新闻界反过来成为支持我个人和我所坚持的事业的有利力量。

日本的全权代表小村寿太郎在这种关系上犯了一个大错，尤其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美国长大，知道这个国家的文化和民主传统。他总是躲避记者们，竭力不让他们得知这件事情的许多信息。于是我就利用他不善应酬的弱点，激起新闻界对他和他的事业的反感。谈判刚一开始，我便提议将各种讨论全部对新闻界公开，这就好像是说，我愿意信任全世界的人们，我作为俄国皇帝的全权特使，绝无任何秘密和利己的目的。当然，我知道日本方面一定会表示反对，果然，由于对方的提议，新闻记者不许进入会场。这事件立刻就被记者们知道了，于是他们对于日方的动机抱有很大的偏见。后来会议决定，在每一次会谈后，由秘书写成简短的记录，经双方全权代表审阅后发表，供新闻界应用。不久记者们就发觉由于日本代表检查得太严，致使公报既简短又稀少。于是美国人民对于俄国的友谊日渐增加，而对于日本的同情心日渐减少。

可以说，我个人的亲善外交，也是使得美国舆论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凡是我所接触的美国人我都注意以最平易近人的态度相待。无论在旅途中，还是在专用列车上，或是在政府的汽车或轮船上，我对每一个人都真诚地道谢，我和机械师们谈话并和他们握手，总之，无论是哪一个社会阶层的人，我一律都是平等相待。虽然做这种事我觉得比较费劲，但能达到这样的结果却是我

一直梦寐以求的。我这样做，不但丝毫未减少我作为俄皇的首席全权代表的尊严，反而大大提升了我的声望。美国人大都先入为主地认为作为一个俄国皇帝的使臣，应该是一个可怕的、不可接近的人物，就像前来访问这个国家的其他国家的官吏一样，我的亲民举动，让他们发现我这个俄帝国的最高官员——大臣会议的主席和俄皇的特命全权大使——竟是一个平易近人且谦和有礼的人，他对于最普通的市民也能以平等相待，这让美国民众感到非常高兴。

在我们旅程的第六天，当我们的船驶人纽约水域时，有一大队小船和汽艇来迎接我们。这些船上满载着新闻记者和一些因好奇而急于要看看俄国特使的人。记者们上了我们的船，以美国新闻界的名义向我致敬。我则表示来到一向与俄国邦交敦睦的美国，心中十分欣喜。同时对于在美国社会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新闻界，说了几句颂扬的话。从那时起直到我离开美国为止，我真的好像是在这些记者们的监视之下一样，他们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在这期间我成了无数摄影记者追拍的目标。各种各样的人，尤其是女士们，走到我的面前要求静立一会儿以便为我拍照。每天我接到无数从美国各地寄来的信件，要求我签名。这些要求签名的人，特别是女士们，往往还亲自跑来见我。我总是很高兴地满足她们的要求，一般说来，我对每一个光临的客人都竭力表示友善，对于新闻界的代表更是如此。

登岸时，我们的副全权代表罗森大使带着他的下属来接我们。他用他的汽车把我们送到纽约中央大街的一家最好的旅馆。在这个旅馆里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一个套间，其中包括两间书房，一间大客厅，一间餐厅，一间卧室，一间更衣室和一间仆从们的住房。每日租金是三百八十卢布。就在靠近我房间的阳台上飘扬着一面很大的俄国国旗，它吸引着每一个人的注意。当时气候酷热，许多纽约的居民都到乡下避暑去了。罗斯福总统派了几名秘密工作

人员来保护我。这些美国侦探在外表和言谈举止上颇为绅士。他们都穿着便衣，和街上一般人毫无区别——至少在一个外国人的眼中是如此。在欧洲，一个特工人员很容易可以被辨认出来。在圣彼得堡，他也和常人穿一样的服装，但是远远一望就能被认出来，因为他戴着一顶礼帽，拿着一把大黑伞。这个卫队的出现带给我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我问罗森男爵为什么要派这些人来，他解释说，有谣传说，有一群极端派的日本军阀为了阻挠议和可能会派人来谋害我。他说，还谣传聚居在纽约的犹太人可能也会来谋害我。这些犹太人是在普列维所策动的基希涅夫屠杀以及随后引起的几次屠杀之后从俄国迁移来此的。条约签字后，我的秘密卫队得到了增援，因为人们相信住在美国的日本侨民正在准备来刺杀我。

我到达纽约的第二天，在大使馆的一个官员陪同下，乘一辆汽车到犹太区去，那里住的人大部分是从俄国迁移来的。那时纽约的犹太人口已达五十万。这些犹太人很快就认出了我。一开始他们还带着仇恨的目光看我，但是当我向几个人问好又和另外几个人以俄语交谈了几句话，他们就冰释敌意了，大多数人都和善地对待我。我回到旅馆才遇到派来保护我的密探。当他得知我已经到过犹太区而且安然无恙，他感到有些惊异，因为据警局掌握的情报，犹太人对我是很仇恨的。

同一天，我由罗森男爵陪伴，去牡蛎湾拜访罗斯福总统，这地方距纽约有一小时的行程。罗斯福住在他自己的一所小房子里，他退休后，仍然住在那里。这房子看起来就像是某个小康市民的一所普通别墅。他家中所有的仆役都是黑人。罗斯福生平主张黑人和白人完全平等，他总是为美国的黑人争取权益。黑人自然对他非常敬爱。但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白人攻击他，不过这只是少数。我为议和的事同总统谈了很久。我的态度让他很不高兴，他说依我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对日议和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在开始

进行谈判时，两方面各抱相反的见解，互不退让，那么这个会议就要解散了。然后我们共进午餐，除去主人和我们两个客人之外，还有总统夫人，总统前妻所生的女儿和她的丈夫。这顿午餐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是过于简单而且几乎是难于消化的。桌上没有桌布，也没有酒，只有冰水。总统只给罗森男爵敬了一点酒，算是一个特别照顾。我注意到，总的说来，美国人都吃得很简单。在席间最令我惊异的是主人，而不是主妇，第一个入席，餐毕最先离席的也是主人而非主妇。上菜的时候不是先给他的妻子而是先给主人。我也注意到主妇走在总统的后面。这一切都是和欧洲的礼节和习惯完全相反的。“女士优先”的原则，适用于法国总统的夫人，正如适用于任何其他妇女一样。只有在举行某种严格的正式仪式时，法国总统才占有优先地位，但在那种场合，总统夫人通常是不出席的。

午餐后我们又继续会谈，但因有总统夫人在座，所谈的就不是事务性的议题。我们约定第二天当着总统的面我和日本的代表团在总统的游艇上见面。在游艇上见面并互致敬意之后，我和罗森男爵搭乘一只军舰，小村寿太郎和他的随员搭乘另一只军舰，驶往举行会议的地点朴次茅斯。

到了约定的时间，我离开旅馆到码头上去，有很多人在那里对我默默致敬。我们乘了一只小汽船，向总统的游艇开去。一路上不断有船上鸣笛和工厂汽笛的轰鸣和尖叫声，这是美国特有的致敬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代表所乘的那只船却没有受到这样的待遇。我们到达目的地时，总统的游艇按照惯例向我们致敬，对于日方代表也是如此。

我们一登上甲板，总统就按照礼节介绍我们与日方代表相见，接着就邀我们同进午餐。为了避免座位先后次序的麻烦，我们都站着吃饭。我对罗森男爵诉说我料想日方会比我们多占一些便宜的顾虑。举例来说，如果首先向日本天皇然后才向俄皇举杯祝酒

我就不能忍受。罗斯福总统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向来不注意礼仪，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担心他会把整个事情弄糟。罗森男爵于是去和美国助理国务卿商量这个问题，这人曾在美国驻俄大使馆中服务多年。后来他被指定负责组织这个会议并安排会场中的位次以避免发生任何争执。至于对两国元首的举杯祝酒则是和罗斯福总统的演说相连同时并行的。最初我和日本代表相遇，精神上颇感痛苦，因为我所代表的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但毕竟是一个战败国。这次会见是拘谨不堪且颇为局促的。当我们走出船上的大房间时，我们这一群人，包括罗斯福总统、我本人、罗森男爵、小村寿太郎以及日方的副全权代表，驻纽约领事高平小五郎，都依从罗斯福总统的意思合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后来送给参与会议的每一个人，各种美国报纸上也都刊登出来。我们告别了罗斯福总统和日方代表以后，就搭乘一只军舰，直接驶向朴次茅斯。

因为我不喜欢海上旅行，并且急于想游览波士顿，所以我在纽波特上了岸，由一个秘书陪同，打算经陆路赶赴朴次茅斯。代表团其余的人则继续乘军舰前往。

我在纽波特和该港的司令官共进午餐后，就骑马出去观览该港的风景。这个城本身相当小，且并无特色，只是在城的四周有很多非常富丽豪华的别墅。这里是纽约的百万富翁们的避暑地，是美国有钱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富有的欧洲人集会的地点。

尽管时间还早，我却看到了好多骑马的人。他们的服装很是特别，男人们穿着轻薄的彩色衬衫，轻便的裤子和皮靴，并且不顾烈日曝晒。女人们也不戴帽子，穿着轻便的骑马服装。

这位纽波特司令官——他在我参观后的两年曾在德国法兰克福附近的霍姆堡回访过我——对我讲，美国政府原来计划在纽波特举行和会，因为这地方在舒适、享受和娱乐方面比朴次茅斯优越得多。但最后决定在朴次茅斯举行是基于如下的理由。美国政

府有一定依据，怕纽波特那些“时髦人士”，会出来和俄国代表结交并设盛宴款待他们，而日方代表却无人理睬。这种情况难以避免，因为一般美国人无论在政治上同情哪一方，由于同属白种人，不禁对俄国人有一种亲睦之感，而对日本人则抱一种排斥的态度。

我从纽波特乘专用列车奔赴波士顿。到达时天色已晚，但很快就被众人认出来了。第二天我乘车经过城中的几条街去参观哈佛大学，这是美国一所最好的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罗斯福总统就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有一次他对我讲他不希望再去竞选下一届的总统了。他的愿望是被选为哈佛大学的校长。我受到该校校长和几位教授的接待并同他们一起进午餐。在归途中我参观了该城的几个区，回到旅馆以后就驱车去火车站，想乘火车去朴次茅斯。那些陪伴我的、坐在另一个汽车中的密探要我走车站的侧路进去。他们认为应在特别警卫下护送我上火车。车站上挤满了长得像犹太人的人，显然美国当局是怕犹太人对我示威或袭击。我的保护人员也劝我不要下汽车，但眼看有很多人急于和我交谈，我就走上月台。近处的一群人向我脱帽致敬。我也学着他们的举动，走近一群人和他们谈起来。他们是从俄国迁移来的犹太人。我们用俄语交谈，谈话的内容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他们告诉我，他们中间有些是在美国生长的，有些是幼年时来的，但大多数来到美国只有几年。他们在俄国无法再忍受压迫了。我很想知道他们的经济状况如何。他们对我说，他们在美国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平等权利，所以维持小康的生活是不难的。于是我又问他们对于他们的命运是否满意。离我最近的一些人便絮絮倾诉起来。不，他们非常怀念故乡，希望回到俄国去。他们说，俄国的土地埋葬着他们祖先的遗骨，所以俄国永远是他们的祖国。虽然他们现在已加入了美国籍，但他们永远不忘俄国，而且每当他们独自在一起想到生与死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便想到他们的祖先，这样就想到俄国。他们对我说，“我们不爱俄国政府，但我们爱俄国，胜于

爱任何其他国家。因此，请你不要相信那些告诉你说我们偏袒日本的人。我们希望你，作为俄国人民的代表，在会议中获得成功，我们将为你向上帝祈祷”。俄国国土对于他们来说是世上最亲切的东西了。当我向他们告别时，他们高呼“乌拉!”声久久回荡在空中。我也发现在朴次茅斯的犹太人当中，存在着同样的对俄国的态度。

当天晚间我到达朴次茅斯，这里是一个海军基地，也是一个小城镇，这个城镇是中产阶级避暑的居住地。在旅馆中我遇到那些宁愿乘火车而不乘船到这里来的一部分随员。两国代表团所乘的两只军舰次日早晨才能到达朴次茅斯。我们团员所乘的那只军舰先到。清晨，我身穿便服来到海军港口，当我们的军舰一进入海港，我便乘了一只小艇迎上前去，登上军舰，然后在罗森男爵以及其他团员的陪伴下登岸。海港当局派了一支水兵和一个军乐队在岸上欢迎我们。

我们从港口直赴海军大楼。楼的两翼一边成为我们的办公处，另一边则是日本代表团的办公处。两翼之间由一间大厅相连，每次会议就在这个大厅举行。大厅对面有一些宽敞的房间，参加会议的人在那里饮茶和进餐。我们来到朴次茅斯之后，就算是美国人的客人，因此一切膳宿费用都由美国政府供给。同时还有几辆政府的汽车供我们使用。所有赴会的成员都住在当地最大的旅馆中，但一般说来旅馆和全城住的人过多，以致于我这个俄皇的首席全权代表也只得到两个小房间，另外有一小间给我的两个仆人住。我的书房几乎是一间玻璃房，所以不但从旅馆的许多房间和临近的阳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我的动作，就连过路的人也可以看到。自然，那条路上经常聚集着一群好奇的人，他们都很想看一眼正在办公的俄国特使。不用说，新闻记者们更是整天围着这地方徘徊。他们不满意仅仅和我的秘书保持经常接触，他们不停地请求我亲自接见，而每一家报纸的记者又都希望单独会见以便得

到一点独家新闻。

在第一轮会谈结束后，我们和这个海港的一些官员以及他们的夫人聚餐，我们在前些时候曾被介绍给这些人。从此以后两方的首席代表和副代表便同桌进餐，这成了一个惯例。我们还有两名翻译在旁，以备日本代表说他们本国话时为我们通译。每餐菜肴足有几十道之多，但大多数是凉菜。美国政府似乎已经预备好了几百种珍馐佳肴，把它们储藏在冰箱中陆续供给我们品尝。我很快就注意到要留神这些食品。又过了两三天，我决定完全不吃这些食品，而只吃面包和一点蔬菜。小村则和我相反，每一样菜他都吃得津津有味。有一次我劝他留心食品中潜伏的危险，但他却要表现日本人的无畏精神，说他不怕，可以吃任何东西。于是他继续吃下去。结果当我离开朴次茅斯时我是健康的，而小村寿太郎却在会议终结时生病了，他的病发展成一种肠道伤寒症，因此在我离开美国前去向他告别时，他已经病倒在床上了。

第一次会谈之后，我们去参观市政厅，我们都乘坐敞篷的马车，形成一个庄严的列阵。路上挤满了欢迎我们的军队和观众。我还记得当时的队伍中发生的一件事，此事与我们关于一支有纪律的军队的观念颇不相符。当我乘车从一队士兵面前经过时，突然听到传统的俄国军队的问候语：“阁下，祝您健康！”我回头看去，一个士兵正向我举枪致敬。这一定是一个俄罗斯—犹太血统的美国士兵。出乎我意外的是军官们对于这种不守纪律的行为竟毫无反应。到市政厅时，市长和其他市府官员们都出来欢迎，并和我们互致问候。最初我们俄国人吃饭都是在旅馆的大餐厅中单摆一桌。后来我才发觉在我住房旁边的单间屋子进餐更舒适些。所吃的食品都是按照我们的吩咐制作的，因为吃美国的饮食是很危险的。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美国人根本不讲求烹调的口味，只要是他们喜欢吃的东西，即使不新鲜，倘若适当地加以调味后摆出来，他们差不多都可以吃下去。

第二天正式会谈开始了。在这里我最想谈谈我的主要对手小村寿太郎。他在任日本驻俄大使时，我曾在圣彼得堡遇见过他。我也认识他的几个下属。小村无疑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但他的相貌和风度却不怎么吸引人。就风度来说，他还不如我所见到的另外几个日本政治家，如伊藤、山烟、栗野和茨田等。

我担负着那样巨大的责任，因为那样的日子真的是紧张而痛苦。我十分清楚，如果我空手而返，战火又将重起，一次新的崩溃会随之而来，全俄国都会诅咒我未能带来和平。另一方面，我的爱国心又使我不甘接受一个胜利的敌人所强加给我们的和平条件。

在这种情形下，我似乎做到了一切我可能用外交手段来做到的事（整个文明世界都会支持我的这种见解）；事实上，我所获得的比我所期望的还要多。然而不能忘记的是，我毕竟代表的是一个战败国，我毫无办法化解我所面临的无情压力。

日本人在和会上的态度是适度且冷酷的。他们屡次打断私人商议的进行。除去两方各有三位秘书外，与会的就只有两方的全权代表，那就是我、罗森男爵，小村和日本驻美大使。主要发言的是我和小村，副全权代表们很少参与辩论。我的口气和态度非常坚强，以致有一次小村揶揄道："你的语气好像你是代表胜利国一样。"我反驳他说："这里没有胜利者，所以也没有战败者。"

我原来希望代表助理们都参与会议，但不知什么缘故，小村坚决反对。所以有一些代表助理只参加过一次会。日方的代表助理们全都待在会场附近的几间屋子里，小村经常不断地和其中一个美国人商量，那人曾在日本当过律师，当时在外交部任职。私人交际方面我们只是在短短的午餐进程中和日本代表们会见。

我严格地全部执行了皇帝给我的训令。唯有南部萨哈林岛的割让算是违背了不割领土的原则，但这一切只好由皇帝自己负责。这是一个好办法，否则我们就不能获得和平，但是我也许不会自

动采取这个办法。至于罗斯福总统，最初他曾试图胁迫我作出一些相当大的让步，他向我指出，如果我不让步，和约就不能缔结。但我却坚决表示不能作任何这样的让步。在那个时候，日本政府中有两派对立。一派以伊藤为首，主张接受我提出的条件；另一派坚决要求赔偿战费，如果我方不允，就继续战争。当时罗斯福看到美国的舆论渐渐倾向于俄国，恐怕万一议和不成，他本人和日本都会失去美国国民的同情，于是他打电话给日本天皇，向他说明美国舆论的倾向并劝他接受我的条件。小村接到命他让步的训令，但因他本人反对让步，他要求天皇亲自给他一道训令。所以和会在结束时，一再拖延，并呈现出混乱的状况。

谈判进行的经过，可以引用当时的电报和信札来说明。8 月 13 日我给圣彼得堡的外交大臣发去这样的电报：

> 我们已经开始逐条讨论日方的条件。我想日方是在拖延时间，或者希望有什么变故发生，或者是为了和东京、伦敦方面进行商讨。我们坚持这样的看法：就是他们将不放弃他们主要的几项要求。我深信我们必须这样来进行谈判，我不但要赢得俄国人民的拥护，而且还要赢得欧美舆论的同情。如果我们命中注定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那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上帝的援助下战胜敌人。如果欧美两方面不再给予日本以物质上的协助而在精神上同情我国，我相信我们必将获得最后的胜利。所以，在进行谈判时，有三点是绝对必要的：（一）我们必须这样行事以便在不能缔结和平条约的情况下，能够本着纯净的良心把全部文件公布于世，将整个事情提请世人判断，（二）在不损俄国这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和不伤俄国人感情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让日本得到他们由于侥幸获胜所已经取得的全部利益；（三）我们必须公平地估

计当前的形势，因为在这种场合下公平是可行的。我坚信，无论谈判的结果如何，只要我能得到必需的支持，在进行淡判的过程中，我将竭尽全力为皇帝和国家效劳。

四天后，我又发给外交大臣这样的电报：

目前的局势是这样：关于赔偿战费，割让萨哈林岛，缩减海军，以及在中立海域航行的船只等问题还没有达成协定。我们在星期一或星期二将开一次决定性的会，在这次会后如果双方都不让步，我们将不得不停止谈判。我相信，日本人是怎样想的，谁也不知道。他们甚至对于他们的白种人朋友说来也是一面看不透的墙壁……鉴于目前形势的紧迫，我觉得我们有必要重新估计形势并立即作出一个决定。我坚信继续进行这场战争对于俄国来说将是最大的灾祸；尽管我们稍微能够防守，但我们很可能打不败日本。

皇帝亲笔在这电报稿的边上批道："我已经说过，不割让一寸领，不偿付一个卢布战费。这原则我要坚持到底。"

8月21日，我又给外交大臣发了一个电报：

……我相信会议以后，全世界都会得知会议的经过，那时爱好和平的人们都将承认俄国拒绝赔偿战费是对的，但关于萨哈林问题，他们恐怕不会同情我方，因为事实总是胜于雄辩的。事实上萨哈林现在日本人手里，而我们又无法夺回。所以，如果我们想把和会失败的责任推给日方，我们就不能在拒绝赔偿战费以后再拒绝割让萨哈林岛。如果我们希望将来欧美各国支持我们，那么在

作最后答复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罗斯福的意见。

第二天我接到他的复电如下：

很不幸，从你上两次电报看来，尽管你在会议中已表示愿意就和约的各点达成协议，但日方代表依然坚持他们的条件，而这些条件是有损俄国尊严的，因而我国完全不能接受。鉴于这种情形，皇帝已命令你，如果日本政府不授权他们的代表放弃他们那些过分的要求，就停止同他们进行会谈。

……这样，由于日本代表对于战费问题不肯让步，谈判正在破裂；我们也只有到此为止。在这样情况下，再讨论完全不能允许的割让萨哈林问题已经没有必要。

诚然，萨哈林现在被日本人占据了，我们一时也不能把他们赶出这个半岛；然而，这个岛有着光辉的前途，强力占领和有正式文件的割让，这其间有着很大的差别。

罗斯福总统曾敦劝日本代表不要坚持赔偿战费的要求，我保存了他的两封信，从其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金子坚太郎男爵阁下：1905 年 8 月 22 日于牡蛎湾

我觉得应当告诉你，据我所知，各方面同情日本的人士都怀疑日本是否可能为了一大笔战费而继续作战。我国参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中有一位杰出的人物，他是绝对同情日本的，写给我这样的信：

“我觉得日本简直不能只为了一大笔战费而继续作战。如果它为了占领萨哈林岛而使谈判决裂，那倒是情有可原。但是如果它只为得一笔金钱而重新采取军事行

动，它将得不到金钱而且会很快失去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同情。我觉得我应该表明我的意见：我认为日本要求赔偿战费是不正当的。日本已经占据了萨哈林岛这块俄国的领土并且还要保留它。”

我认为阁下一定知道，在美国，凡是同情日本的人士，大都与此信作者抱同样的观点。日本果然承诺把萨哈林岛北半部归还给俄方，就有希望在俄国所应赔偿战俘用费之外还得一笔钱。但日方却一定要求赔偿六亿元的战费，我认为日本不能要求或得到这样数额的赔款。你知道我是如何迫切地敦劝俄方缔结和约。我也以同样的毅力忠告日本不要为了赔款问题而继续战事。如果日本那样做，我相信它定会受到很大一部分世界舆论的反对。固然舆论不见得有什么切实的影响。然而切不可完全漠视它。况且，如果日本只是为了赔款问题而继续作战，它也未见得就能达到目的。我想俄国对于你们所要求的这样巨额的战费一定会拒绝赔偿而世界文明国家的舆论是会支持它的。自然，如果俄国赔了这笔款，那我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如果它不肯赔偿，那么你们再打一年的仗，即使你们占领了西伯利亚东部，你们也总要再花数百亿元的军费，流大量的血，而且即使你们得到了西伯利亚东部，也只会得到一些你们所不需要的东西，而俄国将完全不能偿付你们任何东西。无论如何，俄国将不能赔偿足以弥补你们所多花费了的金额。当然，我在这一点上的判断也许是错误的，但我完全是从我所认为的日本的利益着想，而诚实地表明我个人的信念。而且，我觉得为了文明与人道，不应该只为谋求一大笔赔款而继续战争。

这封信的密级很高，但是如果你能把它电告贵国政

府，我将感到高兴，并且希望你能这样做。如果你要将此信转达贵国政府的话，应立即办理。

您真诚的：西奥多·罗斯福（签名）

1905年8月23日于牡蛎湾

金子坚太郎男爵阁下：

除昨天寄给你的信上所述之外，我想再请大使阁下注意一件事：

我觉得目前缔结和约，对大日本帝国是有利的，有如下两点理由：第一，符合日本自己的利益，第二，也符合日本对之负有一定责任的全世界的利益。你记得，我不是说过吗，你们为了保持萨哈林而继续作战，那是对的，但为了获得俄国一大笔钱而继续战争我觉得是不对的。虽然，你们也许能够达到目的，但我深信你们将为那个胜利付出过于高昂的代价。如果你们不能得到那笔钱，那么即使俄国蒙受更大的屈辱和损失，也将不能抵偿你们生命财产的消耗了。

（一）目前结束战争是对日本有利的。它已经得到朝鲜和满洲的支配权；日本消灭了俄国的舰队从而使它自己的舰队增加了一倍；它已得到了旅顺口、大连湾、满洲铁路；它已占领了萨哈林。若为了谋取金钱而继续战争，对日本来说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为它最终从俄国方面所得的代价将不足以补偿继续战争所消耗的费用。如果日本现在趁胜结束战争，并在国际会议中占据领导国家的地位，那会是明智之举。

（二）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日本对于今日世界的危机负有一定的义务。所有文明国家都期望它缔结和约；各国人民对它都抱有这样的信念：让日本表现它在

道德上的优越不亚于它在军事上的优越！我凭借至高无上的名义向它呼吁，我希望它对于这个呼吁不要置之不理。

谨致深切的敬意！

您诚恳的：西奥多·罗斯福（签名）。

8月27日，我发电报给外交大臣：

有鉴于十四小时的地区时间差，他要求我把明天的会展期推迟到后天（星期二）召开。我回答说我认为我无权拒绝他的要求，但我以非常明确的口吻向他声明，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或环境下，不能放弃根据我国皇帝最后一次训令所作的决定，就我国皇帝所作的最后的让步，日方无论再有什么新的提议，我将立刻拒绝，不再向本国政府请示。所以，我说了，如果他们希望我们服从，那他们就是在浪费自己的精力与时间，而让世人失望。

皇帝在这封电报文稿边上批道：

把我的命令送给维特，叫他无论如何明天结束会谈。我宁可继续战争，也不愿再等待日本方面仁慈的让步。

1905年8月28日于彼得戈夫宫。

第二天，我在给外交大臣的电报中说：

今天九点半钟，在开会之前，小村男爵想要和我作一次私人谈话。在谈话间，我说，遵照我所接到的训令，

> 今天的会谈一定是最后一次了，此后有待他们解决的唯一问题，就是他们对于俄皇最后提出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或是接受或是拒绝。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会对我们皇帝的意志让步。

当天较晚时，我发出如下可喜的消息：

> 我荣幸地报告陛下，日本已经接受了我们关于和平条件的要求。这样，由于陛下的睿智而坚定的决定，和平将完全按照陛下的计划而得到恢复。俄国和过去一样，依然是远东的一大强国，这种地位将永远保持下去。我们胸怀爱国之心，竭尽所能地奉旨行事。请宽恕我们未能获得更多的成果。

和平条约于1905年9月5日下午3时签字。

最后会谈的那一天前夕，我还不知道日本人是否肯签订和约。我睡觉老做恶梦，在祈祷和哭泣的间隙中惊醒。我的内心充满了矛盾。我知道必须缔结和约。否则，我觉得国家有完全崩溃的危险，包括我所全心全意效忠的皇室也将被推翻。我知道我个人对于这次可怕的战争并不负丝毫责任。相反，我曾尽全力去阻止它的发生。可是，缔结这个对我国的自尊毕竟是一个重大打击的和约的职责竟落在我的肩上。我知道签订这个和约的全部责任将由我承担，因为朝中当权的那些人，且不去说皇帝尼古拉，没有一个肯承认他们对于国家、对于上帝所犯的罪过。所以我不禁变得非常忧郁。我在朴次茅斯和会的最后几天中的痛苦之情，即使我最痛恨的人，我都不希望他有这种经历。使我的苦难更加深重的是，我在这时病了，然而我还得竭力扮演一个征服者的角色以吸引世人的眼球。我的同事们中只有少数几个人了解我的心境。

条约的签订是用鸣炮宣布的。全城立刻用旗帜装饰起来。我从会场一直乘车到当地的一所教堂去，因为这里没有一个正教大礼拜堂，我通常到那里去。一路上许多群众向我们热烈祝贺。教堂附近的街上挤满了很多的人，致使我们很难通过。很多人想和我们握手，这是美国人通常表示亲善的方式。

我好不容易挤进教堂以后，才发现里面已挤满了人，所以我们只好待在举行仪式的高台的护栅后面。这时我们看到一个奇妙的场面：各个宗派的教士们，包括来自纽约的我们的正教牧师和几个犹太教的先生，排成一个庄严的队列，正穿过教堂向祭坛行进，前面唱着赞美和平的圣诗歌咏队。这一队人到了高台后就由俄国牧师和新教牧师作了简短的感恩祈祷。在仪式进行当中，纽约的主教也专程从火车站来加入其他教派的行列。他和俄国牧师作了简短的弥撒。接着教士们和在场的几个歌咏队唱了一首圣诗，这时好多人都流下泪来。我从没像现在这样热诚地祈祷。这次庆祝竟使各个宗派的基督教会和所有的基督徒都团结起来，这是所有灵正开明的基督徒的梦想。我们都是由于热烈崇奉“不可杀人”这个伟大的训条而站在一起的。看见美国男男女女为了上帝赐给俄国和平而含着眼泪感谢上帝的情景，我不禁暗暗自问，这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回答是：“我们不都是基督徒吗?”礼拜结束时，歌咏队开始唱：“上帝，请保佑沙皇。”就在这歌声中我们离开了教堂。当我缓步从人群中经过时，很多人力图把礼物塞在我的衣袋中，显然这是当地的一种风俗。到达旅馆后，我发现衣袋中除了许多不值钱的装饰品外还有一些很贵重的礼物。

我这次成功地完成了我的使命，因而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所以尼古拉皇帝在道义上不得不赐我以破格的殊荣，晋封我为伯爵。他此举并非出自他的本心，因为他个人，尤其是皇后并不喜欢我，同时朝中有一群官僚对我进行种种谗言诬陷，这些人的卑鄙与他们的愚蠢程度相等。

全世界都认为这次和约是俄国在一年多战场上的节节失败之后的首次胜利。我之所以能够签订它是由几种情况促成的。第一，当我到了美国之后，我的行为促使美国人意识到我们俄国人在种族、文化和宗教上都是与他们相近的，我们来到美国与一个在各个重要方面都与他们不同的种族以法律的形势解决争端。而且，美国人民发现我虽然是俄国专制君主的特使、一个高级官员，但我却与他们自己的公众领袖或政治家十分相似。同时我们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模仿我那种普遍民主的态度，这也增进了美国人对我们的良好印像。我在上文中已提到过我怎样对待美国的新闻界以及他们怎样给我帮忙。此外我还得到美国犹太人的拥护，因为他们从我过去的事业以及我暂住美国时他们和我的谈话（这些谈话见下文）中得知我主张以人道的态度对待俄国的犹太人，这在近年来俄国的政治家中不能不算是凤毛麟角。我已经听说过罗斯福总统原是同情日本人的。为了增进他的声望，为了满足他作为会议倡议者的利己心，他才要求和平，但是对日方有利的和平！罗斯福总统或美国普通民众都没有想到日本的力量过于发展并不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我想要观察这个问题，在与罗斯福以及其他几个美国政治家熟识以后，我发觉他们对于一般国际政治，特别是欧洲的国际事务很不了解，这让我感到非常惊讶。我听到一些美国最杰出的政治家和公众领袖对于欧洲政治作出了最天真的判断。这里可以举出其中的一两句妙语：“欧洲没有土耳其发展的余地，因为它是一个穆斯林国家，无论哪个国家获得它在欧洲的那部分土地，都不要紧。”“为什么不重建一个强盛而独立的波兰呢？这会是一件公正而自然的事情。”

总体而言，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利于朴次茅斯和会取得成功。法国鉴于它本国的切身利益，期望同盟的俄国与日本讲和；英国确实希望订立一个多少有利于日本的和约。英国人希望这个有利于日本的和约可以让俄国受到一种教训，将来到解决英俄关系中

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时对它有好处。不过，另一方面，英国觉察到日本的过于发展将带来潜在的危险，因此是不可取的。正在那时恰巧英日条约期满。重订条约的谈判已在伦敦开始，英国决定，条约的最后拟定将视朴次茅斯和会的结果而定。我提醒我们的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伯爵关注这个情况，但我们不能了解为什么伦敦的谈判会同我们的和会连在一起。金融界也希望战事终结，因为日俄战事使欧洲的金融受到很大的冲击。基督教教会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因为它们认为日本人是异教徒。虽然应当公道地说，这些异教徒是由他们对于神能产生无穷力量的信仰和对于生命不朽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所支持的。最后，朴次茅斯和会的圆满结束对于德国的威廉皇帝也是最有利的。

我在朴次茅斯接见过一些代表团，其中有一个是代表美国犹太人的。这个代表团中有雅各布·席夫和泽利希曼两个大银行家，还有奥斯卡·施特劳斯，他近年来担任过美国驻土耳其的大使。两年前，这位外交家就怀有访问俄国的愿望。他不顾自己很高的地位和他在美国受到的普遍尊敬，而不得不去和俄国警察作旷日持久的交涉，结果只是在特别监视之下并规定了严格限定的停留时间的前提下，他才被允许访问俄国。这一次我和犹太人代表们的谈话我都详细地记了下来，把它们写成好几封信寄给外交大臣，这里我只说一说谈话的内容。我当时很真诚地接见了他们，认真地听他们倾诉。代表中的发言人请我注意俄国犹太人极端痛苦的处境，应给予他们充分的权利去消除目前这种极可悲的状态的必要性。我指出世上关于俄国犹太人的悲惨情形的谣言是夸张失实的，但我并不否认俄国的犹太人确实处在很困难的境地。尽管如此，我辩解说，立刻完全消除他们在法律上的无权状况对于犹太人来说是弊多利少。对于我的这句话，雅各布·席夫加以很犀利的反驳，然而，他的反驳由其他几个思考更为缜密的代表的发言冲淡了，代表中特别是施特劳斯博士给我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

我在朴次茅斯所接见的许多客人中，有一位是亲俄的美国人杰里迈亚·柯廷，我从童年时就认识他。他是我舅父法捷耶夫将军的朋友，他每次来到第比利斯（外高加索）常去我们家。后来我在圣彼得堡遇到他，他在那里担任美国大使馆的秘书，在他辞去了外交官的职务以后，他还经常长期住在圣彼得堡。他是我们俄罗斯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的著名局长波别多诺斯采夫的密友，他对于正教教义有很浓厚的兴趣。他精通俄语，并且写了不少关于他所挚爱的俄国的文章。在朴次茅斯，他给我们帮了大忙。我在美国时，前后会见他两次，这位老人看来还很健康，但我离开美国后，听说他在几个月后就逝世了。

条约签字后，我们代表团就离开了朴次茅斯。一部分团员乘火车到这个国家的内地去，急切地想看一看美国，尤其是去参观尼亚加拉瀑布。罗森男爵和我则回到纽约。罗森在以前就主张等会议结束后，我应该去美国各大城市旅行，以便增进我已为之奠定了基础的美俄友谊。美国政府也赞成这个计划。于是我将此事报告给拉姆斯多夫伯爵，向他指出了这次旅行的政治意义，结果我得到一个含糊的回答。一方面，皇帝允许我作这次旅行，并似乎很希望实现这个计划；另一方面，他又加上了一些条件，使我一听就明了这个计划在圣彼得堡必将又会引起了某些人的嫉妒。因为我向来不乐于接受这类答复，同时我的脾气又不能忍受这样的待遇，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电复拉姆斯多夫伯爵，表明我不愿去旅行了。我知道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所以我立刻便明了事实的真相，我在美国备受欢迎的情形当然在圣彼得堡已传扬出去，使许多官僚感到不安，因此自然而然地阴谋发动了对我的诋毁。一定有人向皇帝进了谗言，说我想成为将来俄罗斯共和国的总统。有一些善意的朋友也许对皇帝讲："请看，他那么轻易地获得了群众的同情，我们不能让他的声望再增加了……"皇帝自己有一次就说过："维特是一个催眠术师，在国务会议和其他会中，他只要

一张口，反对他的人也都变成他的拥护者了……”那些阴谋家们还想破坏我和拉姆斯多夫伯爵的关系，造谣说我企图超越他，最后取代他，但是，他们对我们真诚的友谊和伯爵的高贵气质所施行的阴谋未能得逞。

我到达纽约以后，又同罗森男爵去牡蛎湾向罗斯福总统辞行。正如我们第一次拜访他一样，我们又和总统一家人同进午餐。在进餐前后，我与我们的主人交谈了很久。我当时有一件愉快的消息准备报告他，在日俄战争爆发以前，美国曾对我们出口的糖征收歧视性的关税，我们觉得这种待遇与俄国作为最惠国的地位不符合，提了抗议，但却没收到任何效果。那时我正担任财政大臣，我们便采取报复性措施，对美国几种进口货物也征收差别税，这个举动当然引起美国的不快。

在我出发赴美以前，皇帝命我转告美方，说这些差别税已被取消了。在会议没有召开之前和正在进行期间，我觉得不应该提出此事，因为我不愿让人感到我们在讨好美国。现在条约既已签订，我可以自由行事，于是我便乘这次最后拜访的机会把这事告诉罗斯福总统，他显然很高兴，第二天，各报都登载了取消差别税的消息，形成了对俄国的良好印象。

我曾提过在和会期间我和罗斯福总统的关系不是很协调或恳挚的。他觉得我很倔强，后来竟不和我商议而开始直接与尼古拉皇帝联络，因此有一部分争执之处是由皇帝亲自决定的。我应当在这里声明，皇帝所决定的这几点在本质上和我的主张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只是我也许不能像他那样爽快地作出让步。然而，这也是自然的，因为我不过是皇帝的一个臣仆，而他却是俄罗斯帝国的专制君主，他的行为只对上帝负责。

在我们这次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尤其是在进餐之前的谈话中，罗斯福总统显然是在竭力消释我们两国关系史上的不愉快，他对我说他曾为了我们的利益而敦劝日本。为了证明他的话，他把我

在上面提到的他致日皇的电报拿给我们看。总的说来，我们这次的谈话是在和睦的环境下进行的。临别的时候我要求总统送我一张他亲笔签名的照片，他很高兴地答应了。于是我们向主人和他的家属告别，当晚便回到纽约。第二天，照片和一封信被送到我所下榻的纽约的旅馆，那封信的内容如下：

维特先生阁下：1905 年 9 月 10 日于牡蛎湾

我希望你接受这张随信附上的照片以及我衷心的敬意。

在你交给我的贵国皇帝的信中，慷慨允许今后以最惠国待遇对待美国，使它与其他各强国处于平等地位，我在此诚恳地对您表示感谢。请将我对此举的真诚谢意转达给贵国皇帝。在我们昨晚的谈话中，我曾敦促你注意发给一些有名望的美籍犹太人护照的问题。我觉得如果这件事能够办到，则危害两国人民感情的因素将被彻底清除，今后我将尽最大努力以促进两国间的传统友谊。当然在你们不知道发护照确实对俄国无害的时候，你们总是拒绝发给美国籍的犹太人或非犹太人的护照。但是如果你们的政府可以找到一种适当的方式允许有名望的美籍犹太人进入俄国，正如你们的政府可以允许有名望的美籍基督徒进入俄国一样。我觉得这就各方面来讲都是一件好事。

再次向你表示深深的敬意，并为和约的缔结再次向你和贵国表示祝贺，请你相信我。

你忠实的：西奥多·罗斯福（签名）

谢尔盖·维特先生

纽约圣雷吉斯旅馆

我在美国剩余的几天倒是过得很愉快。和会一结束，我立刻就取消了特命全权大使的名义而成为一个平民。因此我改租了一套比较便宜的旅馆房间，每天只需要付八十二卢布，以代替以前每天付三百八十卢布的房间。美国的生活费是很高的。例如你不能给开电梯的服务员少于一美金（合两个卢布）的小费，所以在大旅馆中面额小的钱币事实上是毫无用处的。当然我不得不在国家给我的两万卢布旅费之外，又从私款中付出了好几千卢布。

我在纽约到处受到热烈的欢迎。例如我到证券交易所参观时，他们为了表示欢迎我而停止营业一分钟。除了其他一些院校外，我还参观了为美国陆军培养军官的西点陆军军官学校。该校校舍建在哈得逊河边，距纽约市有三小时的路程，设施非常华丽。我在那里也受到盛大的欢迎，学员们都是穿着漂亮制服的成年人，为了欢迎我的参观而举行检阅。那天参观这所学校的不止我一个人。碰巧陪同小村特使的几个日本陆军军官也到那里去参观。我看见他们因为无人理睬而大感扫兴。我看到他们那种窘促的情形，便走过去向他们打招呼，请他们同行。他们向我道谢，就一直跟随着我，好像他们是我的随从一样。阅兵式很壮观，学员们随着“上帝保佑沙皇”的曲调齐步前进。在演奏这首极好的乐曲时，我脱帽致敬，其余在场的全体人员也脱帽致敬。

我是乘约·皮·摩根的游艇来西点的。我在美国停留期间，有好几次会见了这位鼎鼎大名的银行家与实业界的大王。他十分富有，是美国最有势力的金融家。摩根在纽约市有一所豪华宏大的住宅，但他实际上是在他的游艇上生活。他就乘着这只船渡过大洋到地中海等地方去旅游。他认为海上的生活是最健康的生活方式，这的确很有道理，所以他力图把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度过。我在美国期间，只吃过一顿像样的午餐和晚餐，那就是我到西点去的那天，在摩根的游艇上吃的。在旅馆，我们为饮食花了大量的钱（每碟菜得花三十至四十卢布），而吃的东西还非常

差。

我这次拜访摩根的目的是想邀他参加我们正在准备为偿付战债而想借的外债。他表示有接受的可能，事实上，他自己为我帮了不少忙，他坚持要我不去同以雅各布·席夫为首的犹太银行家们会谈。我相信了他会协助我的诺言，就没有去找犹太银行家们要他们参加贷款。上文我已提到过缔结借款协定时的情况，德国银行界由于被威廉皇帝禁止而未能参加，而摩根所领导的那些银行很可能是在德国政府的压力下也取消了对俄国的贷款。

摩根患有一种鼻病，使他的面容受到损害。他鼻子上长了一个像甜菜那样大的瘤。我离开他的游艇之前，趁着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的时机，我对他说："让我感谢你的好客而自愿为你做一点事情。柏林最著名的拉萨尔教授是我的好朋友。我曾一度患皮肤病请他治疗，我在他的诊所看到不少病人患有类似你这样的鼻病。他以外科手术割去了那些肉瘤，使病人的鼻子恢复健康。"

我的主人对我表示谢意，说他听人讲过这类手术，并且也听说过这位教授，但他却不能去动这个手术。我原以为这位银行家害怕，但是我却想错了。

他说："不，我一点也不害怕。我知道那位外科大夫的手术非常高明，我并不怀疑治疗的结果有什么问题。但是，阁下，做了手术之后我在美国怎样见人呢？你知道吗？那样我将永远不能回到这个国家来了。"

我当时迷惑不解。

他接着说道："你不明自吗？如果我把鼻子治好了回到纽约来，街上的每个小孩都将指着我捧腹大笑，人人都知道我的鼻子，没有它，我是不能在纽约街上露面的。"

他很认真地说了这些话。这位银行家显然由于他无力把他那个像甜菜的瘤子除去而真的感到遗憾。

我从朴次茅斯刚刚回到纽约的时候，纽约城的哥伦比亚大学

赠给我法学博士的名誉学位。我在这个著名学府停留了整个上午，参观学校的建筑并和教授们谈话。他们很热忱地招待我，我也因他们的殷勤而感到颇为得意。从外表上看，哥伦比亚大学比哈佛大学还阔气些。因为这时已经开学了，我可以看一看他们的学生团体。美国人对于体育特别重视，这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哥伦比亚大学有一座大楼完全被用作体操赛球之用。

在参观哥伦此亚大学图书馆的经济类时，我记得我问一位教政治经济学的教授，他对学生们讲不讲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制论。他回答说，他的各班学生很仔细地学习了亨利·乔治的学说。他说，“第一，亨利·乔治是我们最有天赋的一位作家。而且我认为让学生们了解他对于土地问题的见解，暴露了他的谬误，这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是有用的。”我们俄国许多普通的经济学者以及我们那位伟大的作家、然而是天真的思想家利奥·托尔斯泰去美国跟从这位教授多读几年书将会对他有好处的。

我问他们像俄国常有的学生骚动在美国大学中会不会发生。这些教授们却显然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他们说，只要任何学生想在大学中从事学习以外的活动，他就会立刻被他的同学们逐出校外。

我又参观了美国的行政首都华盛顿。我在那里参观了总统的白宫、参议院、国会和国会图书馆。在华盛顿的附近有美国的缔造者伟大的华盛顿的故居，它坐落在一条河岸上。凡是船只经过都向它致敬，过路的人也都脱帽致敬。可以说美国人尊敬这座楼房如同尊敬神圣的纪念物一样。他们的确知道如何表彰他们的伟人。接待人员通常都指给到此地参观的人看华盛顿和他的夫人的墓地。人们还可以看到这位伟人逝世时所住的那个房间以及帮助建立新生的共和国的拉法耶特将军所住的那套房间。在故居旁边，有一块专用来种树的场地，每棵树都是到此地参观的名人亲手种的。我也被要求在那里种了一棵，我不知道那棵树现在长得怎样

了。

我来到华盛顿城的那天恰好是星期日，华盛顿故居在这天是不开放的。因为我急于在当天赶回纽约去，我便要求罗斯福总统特许我去参观。有人告诉我说，美国所有的历史性纪念物和建筑都由一个专门的妇女会保管。这个组织有稳定的经费保障，负责保存这些纪念物的一切杂项开支。据说，这个组织完全是独立的，即使是罗斯福总统亲自向它的主席提出要求，她也可能拒绝。因此，他们劝我不如向这位主席直接提出要求。我就打电话给这位夫人，结果她很客气地允许我去参观。我乘了政府的一只汽船前往，这个妇女会的几位代表当我的向导。

我在纽约观光时，我对那些高耸入云的摩天楼很是感兴趣。我乘电梯到一座三十七层高的这种钢铁怪物的顶上。一阵清风吹来，我可以感觉到楼顶的房间在摇晃。

美国人的生活中有一些特点很令我吃惊。譬如说，我所到过的一些饭馆和旅馆中，大多数服务员都是大学的学生，这种观念我很久都不习惯。这些大学生为了优厚的工资——通常是每月一百元美金——很高兴到旅馆和饭馆去服务，在夏天几个月中赚得的钱就足以支付冬季的费用。这些学生好像并不以那种卑贱的职业为耻。他们穿着服务生的制服，伺候客人，收拾餐桌上的碟盘，一点也不会感到为难；但一等到开饭时间过去，他们就换了衣服，有时戴上他们的大学生联谊会的徽章，向住在旅馆的那些少女献殷勤，同她们上公园散步，打网球等等。下次开饭时间一到，他们又穿上他们的制服而变为侍者了。这在俄国是决不可能的。我国的学生一月花十个或二十个卢布的生活费，要不然，宁可挨饿也决不肯降低自己的身份去做一个仆役的工作，在欧洲其他国家可能也是这样。

看见住在我们的旅馆里的一些良家少女在夜间和青年男子们出去散步，也让我很是惊讶。一个少女和一个青年单独走到森林

中或公园中去闲逛好几个钟头，或是到湖上划船，没有人会对此加以指责。我们住在朴次茅斯的时候，我们代表团中有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经常与两个漂亮的少女在一起，她们和她们的母亲就住在旅馆邻近的地方。我们一同吃茶点，直到夜深她们才离去。我注意到没有人认为她们的行为是反常的，或是不适当的。在朴次茅斯，我为了消遣常到开阔的海滨上静静地看着海浪，一坐就是一、二个小时。虽然欧洲的比阿里次海滨的景色是很宜人的，但它不如美国海滨的宏大瑰丽。

美国公众对于秘密警察的态度也很令我惊异。有一天我在纽约乘汽车出行，由保护我的一个秘密警察人员陪伴。我们到达一条很拥挤的大街上，一般人在这里总要等上一段时间才能继续前进。陪我的秘密警察把他的证件拿给交通警察一看，那警察一挥手，潮水般的车辆就像中了魔术一样停住了，我们就继续开车前进。我设想，要是警察的这种举动在专制的俄国，不知要激起多么大的愤怒风暴。

我将离开美国的时候，罗斯福总统交给我一封信，要我转呈给尼古拉皇帝。信中首先提到俄皇曾为总统协助签订和约而对他表示感谢的事。然后就向俄皇提出一项要求。总统说，1832 年的美俄商约依美国人的解释，规定所有美国公民可以自由进入俄国国境，后来完全由于俄国方面要保护它本国不受物质上和其他方面的损害才产生了对这种权利的种种限制。不过，事实上俄国人好像以一种不同的精神来解释这个条约。总统指出，近几年来，俄国政府竟依据宗教来对美国公民加以歧视，拒绝美国籍的犹太人入境。罗斯福总统着重声明，美国人永远反对这种歧视。因此这封信的末段谈到，为了继续保持由于我此次赴美期间两国开始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俄国政府必须取消禁止犹太教的美国公民入境的这种应受到谴责的做法。我将这封信呈给皇帝，随后又传给内务大臣。在我主持内阁期间，指派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研究

这件事情。经过长时间的仔细考虑之后，该委员会建议取消触犯美国人的条款的解释。但是这个建议并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结果美国废除了条约，于是我们就失去了美国人民的友谊。

我乘一艘德国的轮船回到欧洲，这艘船比我们去美国时所乘的那一艘行驶得更快，设备更加豪华。纽约的人民热烈地欢送我，船上的旅客们对我非常地友善和尊敬。当船进入第一个军港的时侯，该港按照军礼为我们鸣炮致敬。

下面是尼古拉皇帝给我的信，其中通知我为了表彰我成功地签订了一个光荣的和平条约的功绩，他决定封我为伯爵：

谢尔盖·尤利耶维奇伯爵：

由于我热切愿望俄国的和平繁荣，我同意接受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友好提议，由日俄双方各派全权代表举行会议，以决定结束这场绵延已久，双方都已遭受惨重牺牲的战争的可能性。我已委派你作为我的首席全权代表前往美国，只要日方的条件尚可接受，即与之进行谈判并以依照我所明确制定的原则和他们订立和平条约。

无论是在详细讨论初步的条件的时侯或是在最后拟定和约条文的时候，你都卓越地尽到了你所担负的职责。你处事态度坚决且具有俄国使节所应有的尊严；对于有悖于俄国尊严、有损国家重大权益的条件都予以断然拒绝，因而获得对方的让步。尽管你曾承认敌方所取得的胜利的结果，但是你遵照我的训令，不允许以任何形式赔偿那些不是因俄国发动的战事所造成的伤害，你只同意将 1875 年以前原属日本的萨哈林岛南部归还给日本。因此圆满地完成了为俄国在远东恢复和平的使命。

为了表彰你所表现的外交才能与政治家的经验，我封你为俄罗斯帝国的伯爵以作为你对国家所做的卓越贡

献的报答。

永远对你有好感并且真诚感谢你的：尼古拉（签名）

1905 年 10 月 8 日

在与日本人的和谈过程中，我曾觉察到，如果和约补充一项与日联盟的条约，我们就可以得到较好的谈判筹码。我很慎重地对小村提到此事，他的答复含糊其辞。可是，日方显然并不反对和我们签订某种近似同盟的条约。我以电报告诉拉姆斯多夫伯爵说，据我看来，谈判应该以结成俄日同盟为目的来进行。因为这位外交大臣的答复含混其词，并且最终反对我的意见，我不得不将此事搁置不提。所以，到会议结束时，我们与日本人不是作为决心互相援助的朋友，而是作为同意无限期继续斗争下去的仇敌而分别的。

我回到俄国，我才明白为什么我的意见不受政府的欢迎。事实上，在那些日子里，许多权贵大部分是由于这场战争发了财的投机者，他们中间盛行一种复仇的思想。一些如像《新时代》这样有影响的报刊鼓吹了这种思想，宫廷显贵连皇帝在内也都赞成这种思想。复仇运动的主要推行者之一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所主持的国防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确考虑了许多实现复仇梦想的措施。

斯托雷平首相自然与军国主义者意见一致。他想出兴建阿穆尔铁路的计划，因而我们可以有一条在自己领土内的铁路，以免被日本人夺取。这个计划在议会上被提出来，受到古奇科夫领导的臭名昭著的防务委员会的欢迎。为了使议会深感这条铁路的重要性，他们竟声称对日战争即将来临，最迟到 1911 年或 1912 年就会爆发。所以议会通过了修筑这条铁路的法案，这件事将使俄国人民承受沉重的经济负担，结果却是有害无利。国务会议也受到同样的影响而予以赞成。我竭力反对这个计划，指出万一对日作

战时，这条新铁路并不比中东铁路安全，也难以避免被日本人夺取的厄运。我还说，这条铁路会使中国人在阿穆尔地区的势力增长到危险的程度。我坚持说，最重要的是，修筑新的铁路线得花费巨额金钱，而这笔钱可以用来防守我们在远东的领地与现有的中东铁路，那样收效更好。但是我的辩论是徒劳的。

日俄战争对于国际形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次战争的前几十年中，法国和英国由于在地中海沿岸亚非两洲殖民地地区的对抗，关系非常紧张。普法战争之后，英国几乎完全取代了法国在埃及的地位，并且可以说从它手中攫取了苏伊士运河。于是，在北非英国都成了法国的敌手。日俄战争数年之前，有一位法国的马尔尚上校曾在他探查过的北非某地升起了法国国旗，英国竟以很蛮横的方式强迫法国放弃那块领土。这个事件引起了法国人民的愤慨，于是法国政府求助于俄国。我们劝法国不要为此事和英国决裂，法国便让步了。随后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来到圣彼得堡，想和我们商议一种可以阻抑英国的办法。他敦促我们赶快修建奥伦堡到塔什干的铁路，以便在意外发生时，我们可以威胁印度。我们同意了这个计划，法国则允许我们向它借一笔款。由于日俄战争的结果，德尔卡塞觉察到法国不能依靠俄国，在这种情形下与英德两国保持紧张关系将对法国不利，结果德尔卡塞开始同英国和解。他和英国订立了一个条约，以调整两国在那些有利益冲突的地区的关系，并将此事通知了俄国。从此以后，法国一直在促进与英国的友谊。

第七章　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娜皇后

1894年当我听说亚历山大三世皇帝逝世时，我就到伊·尼·杜尔诺沃那里去，向他诉说我的悲伤。在那些日子里，他是内务大臣，而我是财政大臣。我们两人都非常怀念已故的君主，到这时自然都是非常伤感的。谈话中间杜尔诺沃问我对于新皇帝尼古拉二世的意见如何。

我的回答的大意是说我很少与新皇帝谈论政务，我知道他十分天真，但却相当聪明，他给我的印象总是一个和善的而且很有教养的青年。事实上，我还很少见过比尼古拉二世风度更好的年轻人。他所受的良好的教养掩盖了他所有的缺点。我接着说，我希望我们年轻的君主学会执政，那样，国家之船将平安地继续漂浮。

杜尔诺沃狡滑地看着我说道："谢尔盖，恐怕你错认了这位年轻的皇帝的为人了。我对他比较了解，我告诉你吧，他的继位恐怕将来会给我们带来许多不幸的事。你记住我的话：尼古拉二世将来会成为保罗一世的化身。"

我想，杜尔诺沃之所以很清楚新皇帝的个性，恐怕并不是由于他观察敏锐，而是由于他以内务大臣的地位负责检查信件的缘故。看来杜尔诺沃检查信件是一丝不苟的。他自己也很直爽地告诉我，他已呈请辞去内务大臣一职了，因为皇太后对她的儿子抱怨杜尔诺沃拆阅她私人的信件。他说，皇太后的态度既然如此，

他当然不能继续担任这个职务了。

大约在同一时刻，我也曾和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著名的局长波别多诺斯采夫谈话。他因为亚历山大三世之死深感悲伤。关于尼古拉二世，尽管他也是皇上的一位老师，他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他所最担心的就是皇帝年轻，不谙世故，恐怕会受到恶势力的包围和嗾使。

我第一次拜见时，尼古拉皇帝对我很热诚。自从我参加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的时候起，我就得到他的信任。那时，年轻的太子尼古拉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我们这一次所讨论的主题是为北方舰队兴建一个海军基地。这是他已故的父亲遗留给他的一项工作。大概由于我的影响，亚历山大三世曾选择了摩尔曼海岸的叶卡捷琳娜港而不是利堡作为建筑地点。尼古拉皇帝对我说，他要实现先父的意志，将立即下令兴建摩尔曼基地。

两三个星期之后，我忽然在《政府信使报》上看到一道御旨，下令在利堡兴建军港，因为考虑到这是先帝的意愿，所以命名为亚历山大三世皇帝港。这事完全出乎我的意外，因为先帝在逝世的几个月之前还明白表示他赞成在摩尔曼建筑基地。

不久之后，我才听人说，就在那道御旨刚刚发表后，皇帝含着眼泪向康士坦丁亲王诉说，海军大将阿列克塞亲王强迫他在违背他自己和他父亲的意愿的一道御旨上签字。

但是主张在利堡筑港的人并不是阿列克塞亲王，而是海军大臣尼·米·契哈切夫。皇帝知道，阿列克塞亲王坚持在利堡筑港，这件事主要的责任在契哈切夫。他虽然屈服于外来的压力，而对于这个策划者却怀恨在心。还不到一年之后，契哈切夫就被撤职了。这显然是一种报复行为。

不幸的是，皇帝在这件事中的行为，正好表现了他的特性，正如米尔斯基公爵所说的，他的性格是我们的一切灾难的根源。他今天赞成某一件事，明天又可能反对它。一个不能令人信任的

君主是不能够将国家之船驶入平静的港口的。他的显著缺点就是他可悲地缺乏意志力。虽然他很仁慈，也不昏庸，但是他的这一缺点使他完全不适合做俄罗斯民族的专制独裁者。唉，不幸的皇帝，命运赋予他以历史上空前的大任，可惜他天生的资质却不能胜任。

尼古拉二世皇帝的加冕典礼于1896年5月14日（俄历）举行，就在这天发生了一件悲惨的事故：在莫斯科地区的霍顿卡矿场已经为民众准备好点心和各种游艺，在那里，将近两千人死亡了。这件灾祸发生后几个小时，皇帝皇后就去出席由著名音乐家萨尔诺夫指挥的音乐会。我记得很清楚，那时中国全权特使李鸿章正因公抵达圣彼得堡，我们在那个音乐会上作了简短的谈话。他向我打听这件祸事的详情，我告诉他一定已经死了将近两千人。

李鸿章说："可是皇帝还不知道这件事，是吗?"

我回答说："当然他知道，这件事的一切经过肯定已经呈报他了。"

这位中国人评论道："我看这有点不聪明吧。记得我做总督的时候，我所统辖的省份约一千万人死于黑死病，但我们皇帝一点也不知道。为什么给他添无用的烦恼呢?"

我自已想，我们毕竟还是比中国人先进。

同一天，法国大使蒙特贝洛侯爵预定举行一个盛大的晚会。我们曾预料这个晚会因为发生了霍顿卡事件而被取消。然而，晚会还是举行了，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而且舞会由皇帝和皇后跳四对舞开头。

尼古拉皇帝的性格可以说本质上是柔弱的。有人说，造物主错给了他男子的属性。起初，任何同他接近的官员都得到他的重视。甚至对他的臣仆也过度地嘉奖，如果这人是他自己任命的而不是由他父亲任命的，则奖誉尤甚。但过了没多久，他对他的宠臣就逐渐冷淡下来，最后竟至怀有敌意。这种恶感显然来自他认

为这人已不再值得他尼古拉宠爱了。关于这一点我可以说，这位皇帝不能容纳任何一个他认为比自己更聪明的人，也不能容纳任何一个与朝廷那班朝臣意见不同的人。

尼古拉二世的性格中有一种乐观的倾向，但是他的眼光却非常短浅，无论从时间和空间来说都是如此，只有当暴风雨真的淋到他身上的时候，他才感到恐惧，但是只要眼前的危险一过，他又坦然了。因此，即使在宪法颁布之后，尼古拉还认为他自己是一个专制君主，他的想法可以表述如下："我想怎样做就怎样做，我想做的事总是好的，如果人民看不到那是好事，那是因为他们是一些平凡的人，而我则是上帝授权的君主。"

他不能对人开诚布公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乐意用不光明不正直的手法。他确实非常喜欢秘密的文稿和方法。即使是在最严重的时刻，就像即将公布宪法的时候，他还没有放弃他那些"拜占庭式的习惯。但因他不具有梅特涅或塔列朗的才于，所以往往自陷于泥淖之中或惹出一场血腥的祸乱"。

下面这件事可以说明尼古拉二世的蛮横无理。在曾任内务大臣的西皮亚金在 1902 年被革命党人暗杀后，他的同僚皮·尼·杜尔诺沃和副官黑塞受命清理他的文件。他们将所有文件加以分类，属于私人性质的一部分文件就交给这位已故大臣的夫人。西皮亚金夫人知道她丈夫保存有两本日记，其中一本是他在任大臣时期所写，另一本则是他主持诉讼委员会时所写。因为她没有收到这两本日记，她就向杜尔诺沃探询，才得知日记在黑塞将军手中。（这件事的经过我是从西皮亚金夫人和她的妹夫舍列麦捷夫伯爵那里听到的。）隔了几天，西皮亚金夫人去宫中感谢皇帝皇后的关照。在谈话中皇帝告诉这位客人说他得到了她丈夫生前的两本日记，认为写得很有趣，如果她许可的话，皇帝想留下阅读。西皮亚金夫人当然表示同意。

过了几个月，日记仍然在皇帝手中。西皮亚金夫人于是托她

的妹夫舍列麦捷夫伯爵向皇帝提起日记的事。舍列麦捷夫伯爵是皇帝的侍从武官和老朋友。此后不久，西皮亚金夫人有一次去拜见皇后，在告辞的时侯，皇后请她稍候片刻，因为皇帝想要见她。过了几分钟，皇帝走进来，交给她一个包裹，说是奉还她丈夫的回忆录，并且对她的允许阅读表示谢意。可是西皮亚金夫人到家后，发现还给她的日记只有一本，就是她的丈夫主持诉讼委员会时期所写的那一本。于是西皮亚金夫人又恳求舍列麦捷夫伯爵帮忙探究事情的真相。这位伯爵就向黑塞将军询问，但结果却碰了个钉子，黑塞将军表示为了这两本日记，已经打扰皇帝太多了。

皇帝几天后到了莫斯科，预备在那里举行圣餐礼，并度过复活节后的那个星期。在一次公宴时，舍列麦捷夫伯爵碰巧坐在黑塞将军的旁边。黑塞将军告诉伯爵说他确实已把西皮亚金的两本日记呈交给皇帝了。皇帝回到圣彼得堡之后，召见了舍列麦捷夫伯爵谈话，这是伯爵后来亲自对我讲的。皇帝曾对伯爵说，他听说西皮亚金的一本日记遗失了，不知伯爵是否知道这事的原委。舍列麦捷夫伯爵回答说杜尔诺沃和黑塞都不否认他们确实收到两本日记。但是他们无法解释遗失一本的原因。这时皇帝说黑塞与西皮亚金过去曾经不和，一定是这位将军发现了日记中有关于他个人的记事，所以把日记焚毁了，以免被皇帝看见。这位伯爵说完事情的经过，最后说："我知道事实上西皮亚金的那本日记是皇帝自己销毁的。"此外我顺便再说一点，1905 年 10 月 17 日法令发表后，舍列麦捷夫伯爵下令把宫中所有皇帝的肖像都转向墙壁，这事引起了我们二人感情的破裂。

还有一件和我个人有关的同样性质的小事：

鉴于不断谣传我强迫皇帝颁布 10 月 17 日宣言，我写了一篇辨明事情真相的回忆录，由宫廷大臣呈交给皇帝。皇帝留下了约两个星期才还给我，他对汉·弗雷德里希斯男爵说："维持的备忘录中所叙述的事实是正确的。不过你只在口头上转告他，不要用文

字通知他。”弗雷德里希斯男爵把这些令人惊奇的话转告奥保连斯基公爵，公爵又转告我。请想一想，亚历山大三世这位最伟大最真诚的君主的儿子竟说出这样的话，……当然，我始终没有收到他对我的备忘录的书面答复。

尼古拉皇帝在制定我们的外交政策时所起的作用，尤其是在日俄战争时期所起的作用，我在上文中已经谈到了。这里总结起来说一句话就够了：如果真可以对一个其行为只对上帝负责的人进行责备的话，那么这次最不幸的战争应当归咎于他。

尼古拉皇帝本心是拥护侵略政策的，但他的思想一向是自相矛盾的。他每天在不断改变着他的政策。他试图哄骗远东总督和陆军总司令两人，但是，自然，在大多数时间中他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他之所以卷入到远东的冒险之中，是因为他年轻，因为日本曾一度企图暗杀他而引起他对日本的仇恨（他从来没有对人提起过这件事），最后，则因他暗中渴望打胜仗。我还相信，即使我们不和日本冲突，战争也会在印度边境上爆发，或者因为争夺博斯普鲁斯海峡，战争最有可能在土耳其爆发。战祸也许就从那里扩展到其他地区。就在皇帝举行了加冕礼而到法国旅行以后，我们的驻土耳其大使聂利多夫几乎把我们拖进一场俄土战争。

1905 年的下半年，君士坦丁堡发生了屠杀亚美尼亚人的事件，在这之前小亚细亚发生了同样的屠杀事件。10 月皇帝从国外归来，我们的驻土大使聂利多夫也回到圣彼得堡。由于他的回国，引起了一些关于我国正在采取各种对付土耳其的谣言。这些谣言使我不得不上一道奏折，陈述我对于土耳其问题的意见，并且建议不要使用武力。11 月 21 日（公历 12 月 3 日）我接到聂利多夫草拟的一份秘密报告。这位大使以含糊的词句谈论土耳其的紧张局势，他建议我们应该造成一些事端，以便我们有合法的权利和实际的可能来攫取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上段。

两天之后，便由皇帝主持召集了一个特别会议，讨论聂利多夫的建议。这位大使坚决认为奥托曼帝国在不久的将来必有大规模的动乱发生，为保障我们的利益，我们必须占据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上段。陆军大臣兼参谋总长奥勃鲁切夫自然支持他，因为对他来说，占领博斯普鲁斯海峡，如果可能还要占领君士坦丁堡，这的确是一项既定的计划。其他各大臣都不发表意见，于是只有我以坚决强毅的态度反对这足以导致灾难的计划。我指出这个讨论中的计划最后必将引起全欧洲的战争，而亚历山大三世皇帝所留给我们的政治经济遗产必将因此遭到摧毁。

皇帝起初只是咨询与会诸人的意见。到讨论结束时，他才表明他赞成大使的意见。这样，事情就算决定了，至少在原则上是如此。那就是：我们决定要在君士坦丁堡制造事端以作为海军登陆并占领博斯普鲁斯海峡上段的合理借口。政府立即训令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军事当局开始为在土耳其海岸登陆的部队作必要的准备。同时又由聂利多夫大使确定成熟的登陆时机，由他打电报给伦敦的俄国金融事务办事处官员，要他购买某一数量的谷物作为一种信号，然后将这消息立刻转达给帝国银行总裁，再由总裁转达给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

这次会议的记录是由外交大臣希什金执笔的。他所记各项议决案都是全体通过的。我通知希什金说我不能在这会议记录上签字，因为我认为这次会议的议决案将会给我们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托他请求皇帝许可，或是把我的意见的大概意思附加于会议记录中，或是简略说明我完全不同意这次会议的议决案。我说，我不愿在历史面前对这种冒险行为负责。希什金呈报了皇帝，皇帝命他在会议记录的开头加上这样的声明："国务大臣维特认为不在事先取得列强的同意的前提下占据博斯普鲁斯海峡，在目前的局势下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很可能招致灾难性的后果。"皇帝于11月27日（公历12月9日）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字，并在边上

写了几句话，大意说他完全赞同大多数人的意见。

聂利多夫前往君士坦丁堡，热切地去实现他蓄谋已久的计划。当时大家都认为他的电报随时都有到来的可能，所以特命由帝国银行总裁的一位秘书负责终宵守候，准备收到这个电报后立刻呈报给总裁。我因为担忧这个行动的后果，我忍不住将自己的担心告诉了几位最接近皇帝的人，主要是弗拉季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和波别多诺斯采夫。

波别多诺斯采夫读完了会议记录就还给我，写了这样几句话："我赶快把这会议记录还给你。谢谢你把它送给我看。事情已定，但愿上帝帮助我们!"

不知道是由于受了这些人的影响还是由于上帝的大发慈悲，皇帝居然改变了主意，在聂利多夫赴君士坦丁堡后不久，就命令他放弃原来的计划。但重要的是自从这事件发生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皇帝对我心怀怨恨。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俄战争时期，宫廷集团和皇帝本人都非常敌视英国。这是因为英国与日本订立过协议并且也收容俄国的革命党人的缘故。皇帝习惯称呼日本人为猴子，即使在正式公文中，也用这个词。他称呼英国人为犹太人。他喜欢反复地说："一个英国人就是一个犹太佬。"

为了进一步说明皇帝的见解，我还将叙述一个惊人的事件。我当总理大臣时（1906 年）有一次接到索洛古勃总督的一份电报，其中谈到累发尔区镇压叛乱所采取的措施，请求我对讨伐军的队长里希特加以善言规劝，因为他连一点合法的样子也没有，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戮人民。我把原信呈给皇帝看，他看后交还我，在描述那位队长屠杀人民事迹的几行对面草草批了几个字："干得好！是条好汉。"后来皇帝又要我把这份电报还给他。此后他就再也没有交还给我。我辞去总理大臣职务以后的一个时期里，皇帝对我非常亲切，要我把所有我所保存的带有他亲自批示的电报和

信件都交还他。我当时遵命办了，现在却后悔。因为这些文件可以把这位确实不幸的君主的个性以及他在智力上和道德上的一切弱点清楚地显现出来。

在与皇帝商讨政务的过程中，当我提到舆论的时候，皇帝往往愤怒地骂道："舆论对我有什么关系?"他认为舆论就只是"知识分子们的意见"，这倒是对的。至于皇帝对于知识分子们的意见，我记得米尔斯基公爵为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尼古拉皇帝巡查西部各省时，米尔斯基公爵以总督的身份陪侍皇帝共进午餐。在座的某人提起知识界（知识分子们）。皇帝一听到这个词，就感叹道："我多么厌恶这个词啊！我能下令国家学院把它从俄国字典中删除就好了。"

朝廷里的一班大臣使得皇帝相信除了知识分子以外全体人民都是坚决拥护他的。皇后也有这样的自信。米尔斯基公爵有一次在和皇后谈论政治形势时说，在俄国每一个人都是反对现政府的。皇后对此作了一个犀利的回答，说只有知识分子反对皇帝和他的政府，而民众不仅现在拥护皇帝，将来也决不会改变。公爵反驳说："是的，确是如此，但是到处都是知识分子阶层创造历史，而群众不过是基本的力量罢了；他们今天可以屠杀革命的知识分子，明天他们也许就劫掠皇宫。"

皇帝被一些公开仇视犹太人的人们所包围，如特列波夫，普列维，伊格纳捷夫以及"黑色百人团"的首脑人物等就是这样的人。至于皇帝个人对于犹太人的态度，我回忆起每次我提醒他说反犹太人的暴乱不能加以纵容时，他不是默然无语，就是说："这只能责怪他们犹太佬自己……"（皇帝总是爱用带有污蔑意味的"犹太佬"而不用"犹太人"。）反犹太人的潮流不是自下而上的，而是相反的方向。

1905 年 12 月中，哥美尔发生了残忍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我要求内务大臣杜尔诺沃加以调查。调查结果，知道这次流血暴乱

组织得十分敏捷周密，是由当地宪兵长官波德戈里恰尼伯爵指挥下的特务人员组织的，这位伯爵并不否认他参预此事。我又请杜尔诺沃把调查结果向大臣会议报告。大臣会议严厉地谴责了特务人员的活动，并且建议将波德戈里恰尼伯爵革职查办。这样的意见却以缓和的语气记载在会议记录中。会议记录旋即呈奏于皇帝。皇帝显然很不高兴，在边上写了这样的字句："这整件事情怎么会与我有关？波德戈里恰尼伯爵案的处理是在内务大臣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几个月以后，我得知波德戈里恰尼伯爵又在黑海沿岸的一个城市当警察局长。

皇帝对于犹太人的态度，正如同对于其他事情的态度一样，他的理想实际上就是"黑色百人团"的那些理想。"黑色百人团"的力量全在于皇帝和皇后都认为这些右翼的无政府主义者能够挽救他们的王朝。

所谓"真正俄国人民"的党，如"黑色百人团"自称的那样，基本上是一种爱国的组织，如果他们能够具有我们的世界大同的理想，原本是可以获得我们的同情的。但是，"黑色百人团"的爱国主义肤浅得很；它不凭理智，只凭狂热。他们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是狂妄的政治冒险家，丝毫没有正当的政治观念，他们的一切努力都花费在煽动和利用群众的低级的本能冲动上。由于得到了皇室的扭护，这个党也许能够酿成惊人的变乱，但它的工作将必然是纯粹破坏性的和消极的。这是野蛮的和无政府主义的爱国思想的表现，这个党靠撒谎、诽谤和欺骗存在，是一群残暴而怯懦的绝望之徒，毫无果敢、明辨、创造性的精神。大部分党徒都是浑噩无知的愚民，首领尽是些逃离法网的痞棍，其中也有一些有爵位的贵族和暗地同情革命的朝臣。他们的得势完全是因为法治的废弛，他们的名言是："不是我们为人民，而是让人民为供养我们而效劳。"可是我应该说明，"黑色百人团"的领导人，不管他们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只占俄国贵族中的极少数。他们是被贵

族阶级唾弃的，依靠皇帝的一些残羹冷炙而存活的流氓。可怜的、受蒙蔽的皇帝竟梦想借助于这个党恢复俄国的威严，可怜的皇帝！

由此我想到皇帝在 1907 年 6 月 3 日所发给那个有名的骗子——俄国人民协会（“黑色百人团”的一个组织）的主席杜勃罗文那份可耻的电报。在这份最谦和的电报里，皇帝对于杜勃罗文以俄国人民协会主席的名义所作的各种活动表示赞许并明言他将来是要倚重这一帮凶手的。这份电报以及解散第二届国家议会的宣言，都显露出这位专制皇帝缺乏政治头脑和智力的缺失。

亚历山大三世是一位非常俭朴的皇帝。在他当政期间，宫廷部的预算始终没有增加过。尼古拉二世继位后，宫廷部的预算开始很快增加起来。按法律规定，这预算是应当由国务会议定期核定的，实际上则是先由宫廷大臣和财政大臣协同估计，所商妥的数字照例是由国务会议批准的。尼古拉皇帝登位后，宫廷大臣沃隆佐夫—达什科夫伯爵开始大量增加这个部的经费。由于他不顾我的规劝，我上了一道奏折。皇帝也表示愿意仿效先帝的简朴作风。此后他一定对沃隆佐夫—达什科夫伯爵说了什么责难的话，因为伯爵亲自来找我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过了几个月，这位伯爵辞去了宫廷大臣的职位，由弗雷德里希斯男爵继任。此后不久，我接到一份御诏，其中命令取消宫廷部制定预算的现行规定而另创建一个新的规定：宫廷大臣独自可制定预算，呈交皇帝批准；最后预计数字交付财政大臣编入总预算，不必经由国务会议讨论。诏书结尾规定这个新法令暂时不必公布，以免无谓的议论，但在下次出版的法规中，有关的条文应加以相应的修改。在俄国，像这样非法的手续，自从保罗一世以来还是头一次，即使是保罗一世本人，对于像这样实际上是伪造国法的举动恐怕也是颇费功夫的。

谈到皇帝和皇后对我个人的态度，我应该说我觉得亚历山德娜皇后是特别恨我的。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我认为这种芥蒂起

于1900年发生的那件事。在那一年，皇帝有一段时期住在克里木的雅尔塔城，皇帝生病了，发展成伤寒症。尼古拉二世不喜欢医疗，这一点我想是罗曼诺夫家族的特性。我深信他父亲早亡，就是因为讳病忌医，治疗得太晚了。尼古拉皇帝的御医是一位姓希尔施的、很受尊敬的绅士，他的职位是由于世袭而并非由他本人凭本领得来的。他实际并不擅长内科或外科。

皇帝生病时，我和内务大臣西皮亚金碰巧都在雅尔塔城。我们立即将皇帝得病的消息传出去，并从圣彼得堡召来一位有名的医生。当皇帝病势十分严重的时候，西皮亚金邀我到他所住的旅馆去见他。我在他的书房发现了除主人以外，还有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亲王、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伯爵和宫廷大臣弗雷德里希斯男爵。他们正在讨论万一驾崩，因无后嗣所产生的局势。那时皇太子阿列克塞还未诞生。有人提议既然皇后可能已有身孕，在分娩以前，可由她摄政。我反对这个计划，坚持遵守法律上的明文规定，那就是，皇帝既然无嗣，就应该由他的最近亲属，即他的弟弟米哈依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继承帝位。议论结果是所有参加这个会议的人都赞成我的意见。决定一旦驾崩，我们就立即拥立米哈依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为皇帝。后来皇帝病愈，所以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皇后却把这事认为是我对她的一种阴谋，因而总是对我怀着仇恨。有人告诉我，当我辞去总理大臣的职务时，皇后松了一口气，表示满意。

不管我对皇帝和他的帝国做过多少贡献，除去他在位的最初几年外，皇帝基本上与皇后一样对我怀着很深的厌恶。当我辞去大臣会议主席以后，我只被召见过两次。第一次是在1906年我从国外（事实上，我在国外是流放）归来以后，谈了约二十分钟。我们只谈到正在建造中的亚历山大三世皇帝的纪念碑。第二次是1912年。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被皇帝接见过了。

在尼古拉二世在位的最初几年，正是各位亲王揽权和玛丽亚

·费奥多罗夫娜太后也分享部分权力的时期。小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得势的时间也许最久。这种情形恐怕是因为这位亲王也有着那种和他母亲一样的神秘心理。

在我与尼古拉亲王的交往中有一件事可以说明他优柔寡断的个性。我和他的最初结识是在他基辅的家中。我很熟悉他的母亲亚历山德娜·彼特罗夫娜亲王夫人。那时我是西南铁路公司的经理，而他是总参谋部的上校。我们有时候打纸牌。他的母亲是一位很优秀的女人，但也受了笃信神秘思想的影响。以后我经常看见他，但总没有机会和他详谈。我当大臣时，每逢节日，他总是寄给我一张问候的名片，或亲自把它送来留下。我被任为大臣会议主席之后拜访了他。有一次我们在谈话间提到了皇帝。

他突然说："谢尔盖·尤利耶维奇，请你坦白地告诉我，依你看，我们的皇帝是一个普通人呢，还是超乎一般的人呢?"

我回答他说："哦，皇帝是我的君主，而我是他的忠实的臣仆，虽然他是上帝或大自然所赐给我们的君主，但是他还是具有普通人特质的人。"

这位亲王说："依我的意见，皇帝并不是一个凡人，而是介乎人与神之间的人。"说完我们就分别了。

我认为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皇太后对于她儿子的影响是好的。但自从他结婚以后，皇太后的影响很快就消失了，于是他就永远着了皇后的迷。这位皇后是一个歇斯底里且精神不正常的女人，但却有很强的人格魅力，足以完全控制住皇帝，并把她自己的病态传染给他。

亚历山大三世逝世前的几年中，曾试图为这未来的尼古拉二世皇帝物色一位妻子，但未成功。为了这事，达姆施塔特的阿利克斯公主曾一度被带到圣彼得堡来候选。因为太子不喜欢她，当时给太子完婚的计划就落空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很自然，年轻的尼古拉寻求了不正当的欢乐，结交了一个吟克泽辛斯卡的

芭蕾舞演员。虽然他的威严的父亲一直不知道他与那个女人私通的事，但却无法避开皇帝亲信们的注意。这些近臣便敦促皇帝赶快为太子完婚。这时皇帝已经生病了，结果就急于让他的儿子从速完婚。因此又想起了上次未曾中选的阿利克斯公主，便命太子到达姆施塔特去求婚。

由于这个决定关乎国家的命运，我曾从奥斯滕—萨肯伯爵那里得到一个消息，奥斯滕伯爵现在是我们派赴德国的公使，我们在柏林私下谈话中，他告诉了我下面的故事。这位可敬的伯爵说："在亚历山大二世时代，我以代理大使的身份派赴达姆施塔特，因而我很熟悉达姆施塔特亲王的全家。到亚历山大三世时代，代理大使一职取消了，我被调往慕尼黑任职。太子到达姆施塔特时，又派我到那里与他会合。到达该城以后的第一天，我和老朋友老奥贝尔—霍夫马沙尔闲谈，我们的谈话转到了这位公主身上。我说：'当我离开达姆施塔特的时候，阿利克斯公主还是一个小女孩。现在她已长成了，请你老实告诉我，你看她人怎样?'这位老大臣站起身来，到门外巡视了一遍，弄清楚确实没有人窃听，然后说：'你们现在把她要走了，真是黑森—达姆施塔特的运气!'"

这位公主答应了尼古拉皇帝的请求，并且对于她将不得不改变宗教信仰一事明确表示遗憾。她对于俄国正教的了解，差不多如同一个初生的婴儿对于天体摄动论一样毫无所知，以她那种天生的偏狭与固执，我想她一定很难放弃她生来就信仰的宗教。必须记住，她改信宗教并不是出于什么高尚的动机，而是纯粹考虑到世俗的利害关系。可是，接受了正教之后，她似乎已经明白正教是人类唯一真正的宗教。虽然她现在还不了解正教教义的精髓所在，将来恐怕永远也不会了解，但是她被我们宗教的仪式迷住了，例如在各式各样宫廷礼拜堂中举行的庄严礼拜，使得她眼花缭乱。她崇拜我们的宗教的形式而并不崇拜我们的宗教精神。这样一个被一大群不断奉承的侍从围绕着的、生活在不健全的、东

方式的奢侈环境中的女人，她的宗教信仰势必蜕化为浅薄的神秘主义，成为缺乏仁爱的宗教狂热者。因此才会发生如下的一些事情：驰名遐迩的菲利普“医生”，对萨罗夫的圣泽拉非姆的崇拜，外来的通灵之人以及本国的被当作圣人的“白痴”，这一切我将在后面逐一论述。

尼古拉皇帝登位不久之后，在1894年11月13日和阿利克斯公主结了婚。亚历山德娜长得堪称标致。她有很坚韧的性格，是一位贤良的母亲。如果她所嫁的是一个小小的德意志王侯，那的确是一个很适当的配偶，即使她当了俄帝国的皇后，如果不是由于皇帝太优柔寡断这个可悲的事实，也可能是没有什么害处的。亚历山德娜影响她丈夫的程度是怎么说也不能算夸张的。有好些场合她简直好像是国家的元首一样指挥他的行动。我还记得有一次尼古拉皇帝称皇后为“我绝对信任的人……千万人的命运实际上掌握在那个女人的手中。”的确，如果阿利克斯公主当初嫁给一位德意志王侯，我们可怜的皇帝以及我们这一班他的忠诚的臣仆，尤其是俄国，就会幸福多了。

现在再回来谈一谈迷住亚历山德娜皇后的那种奇异而肤浅的神秘思想，以及她如何把这种思想又传给她的尊严的丈夫。1903年我住在巴黎期间，我常和罗特希尔德银行年近古稀的经理阿尔方斯男爵作长时间的闲谈。我们的话题大都是关于已经在俄国宫廷中生根的玄学和神秘主义，依男爵的意见，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他再三谈论这个题目。他指出历史上发生重大的事件，特别是国内的重大事件之前，往往在统治者的宫廷流传一种奇怪的神秘主义。他甚至送我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书，其中作者列举了好多历史上的证据来证明这种观点。阿尔方斯男爵又告诉我，关于某个里昂人菲利普医生对俄国皇帝和皇后以及某些亲王和王公夫人的影响，法国人正在议论纷纷。他复述国外的一些谣传，又说也许很多是夸大了，不过这个江湖医生菲利普的确常常进宫，皇

帝和皇后都把他当作圣人崇敬，在精神生活方面颇受他的影响。

在法国散播的这些传言，给俄国人的形象带来了很坏的影响。当然，我也听到不少关于菲利普在彼得格勒的事情。我要把我所得到的全部材料详细记下来。菲利普原来住在法国的里昂，他并没有什么专长。他的女儿嫁给一个医生的时候他才开始当江湖医生，有时也能为人治好病。除做江湖医生之外，他还兼做占卜算命。那些和他熟识的人说，他这人很机敏，对于那些意志薄弱或精神不健全的男女们，具有一种特殊的魔力。他的江湖医生生涯几次遭人控告。政府禁止他再操医业并几次强制执行。然而他终于得到一群仰慕者，其中大多数是国家主义者，包括我们驻巴黎的武官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在内。毫无疑问，这位伯爵实际上发狂了。他想借此引起俄法两国的不和，因为他痛恨法国的共和政府。

就是这位伯爵和其他菲利普的仰慕者把这个骗子尊为圣人。他们总是断言菲利普的诞生与常人不同，他直接由天上降临，将来也同样以非凡的方式去世。菲利普在法国是经人介绍给一位俄国王公夫人的。这位王公夫人不是彼得亲王的夫人黑山长公主米莉扎，就是洛伊希滕贝格王公的夫人黑山二公主阿娜斯塔霞，我现在记不清了。

（前几天，黑山二公主受了这种邪说的鼓动，得到皇帝和皇后的许可，与洛伊希滕贝格王公离婚而嫁给王公的表兄弟尼古拉亲王。）

菲利普医生和这两位黑山公主的结识对于俄国来说是一桩大事件，因为这两位公主都是皇后最宠信的人。她们进入俄国宫廷并对它施加了这样一种有害的影响，其经过也值得加以追述。当她们很年轻的时候，就被她们的父亲黑山王公尼古拉送到斯莫尔尼中学去读书，那时并没有人注意她们。她们中学毕业时正值亚历山大三世皇帝放弃了传统的亲德政策，而俄法间的联合还在萌

芽状态的时期。就在那时，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在一次招待黑山王公的宴会上说了那句出名的祝词："为我唯一的朋友黑山王公尼古拉而干杯!"这句祝词与其说是向尼古拉王公表示友好，还不如说是有意向世人宣告这位皇帝没有什么朋友，也并不需要任何朋友。

对于黑山王公尼古拉来说，他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去讨好俄国皇帝。黑山人是斯拉夫民族中最亲近我们俄罗斯人的民族，对于这个民族的代表，皇帝自然是要赐予种种恩惠的。在这种情形下，亚历山大皇帝对于他的两位公主表示关切是十分自然的。于是就有几位皇族中人来向她们求婚了。当时我们已经拥有一大群亲王。尼古拉（大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多病的小儿子彼得亲王，他在最近一次俄土战争中当过司令官，要了黑山长公主，二公主则嫁给洛伊希滕贝格王公尤里。

这样，由于亚历山大三世皇帝的关怀，这两位公主都嫁给了第一流的王公。如果不是尼古拉皇帝登极并娶了阿利克斯公主，这个故事本来已经到此结束。虽然皇太后和其他几位亲王夫人对待皇后都是很热诚的，但还没有真正把她当作皇后看待。只有这两位黑山公主总是像朝见皇后那样向她鞠躬致敬，并向她表示真心的敬爱。有一次皇后忽然患胃病，她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来表现她们的忠诚。她们日夜守护着她，把宫女们都打发走而亲自代替她们做种种相当苦的差事。她们就以这种方式讨好皇后，最后成为她最亲密的朋友。她们对皇帝和皇后的影响逐渐增长，而皇太后的影响日渐削弱。

就是这两位黑山公主成了菲利普医生的狂热崇拜者。当她们在巴黎的时候，就有一位公主把我们在巴黎的秘密警官拉奇科夫斯基召了去，表示希望预发给菲利普一个医业执照，许可他行医。拉奇科夫斯基自然便向这位黝黑的王公夫人解释说她的这种要求未免太天真了。因为他讲到这个江湖医生时用词不够礼貌，结果竟为他自己招来了一个宫廷中的危险敌人。

由于这两位黑山公主的斡旋，菲利普得以接近各位亲王，后来进一步出入于内廷。亚历山德娜皇后和皇族中的女眷没有亲密的往来，惟有这两个黑山女人是例外，她们和皇后的关系，可以说是在密友与侍女之间。菲利普便成年累月地秘密住在圣彼得堡和他的高级主顾的一些避暑别墅里。在那里不断举行有皇帝皇后和一些亲王以及他们那两位黑山夫人参加的神秘降神会。

菲利普在俄国的时候，受到禁卫军司令黑塞副官保护，黑塞像我们现在的防卫司令一样，有他自己的一批秘密勤务人员。他觉得有必要向拉奇科夫斯基询问菲利普的人品如何。拉奇科夫斯基写了一份说明菲利普是江湖术士的报告。在他因公来到圣彼得堡时，带来了这份报告。在未呈交黑塞之前，他念给西皮亚金听。西皮亚金说在公务上一点也不知道这份报告，因为报告并不是写给他的。他私下劝拉奇科夫斯基把这份报告扔进壁炉中烧了。但是拉奇科夫斯基还是把报告呈上去了。当普列维被任命为大臣后，拉奇科夫斯基被免职并被禁止住在巴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也禁止在法国的任何地方居住。据普列维对我解释，他是被迫这样做的。黑塞曾竭力为拉奇科夫斯基斡旋，但还是无效而终。不过因为后来特列波夫当政时是一种独裁的政体，拉奇科夫斯基才又被召回在警察署担任要职。

因为菲利普在法国没有得到营业执照，所以后来圣彼得堡的军医学院不得不违反法律赠给他以医学博士的学位。这事发生在库罗帕特金当陆军大臣的时期。而且这位菲利普“博士”还居然被授予参议员的身份。这一切都是秘密搞的。这位“圣人”随后到一家成衣店里定做了一套军医制服。

菲利普所主持的夜间降神会，尽管保守秘密，但仍然使皇太后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感到非常烦恼。黑山二公主的前后两位丈夫，即洛伊希滕贝格王公和尼古拉亲王与一些好奇的友人向他们打听菲利普时，他们都回答说无论如何他是一位圣人。逐渐地

在菲利普“博士”四周形成了一小群自称先觉之徒。

亚历山德娜皇后完全被这个骗子迷住了。她确信菲利普“博士”是一个有魔法护身的人，可以不受器物的伤害。就他对皇后的影响力量的广度和性质来说，下面的这一件令人难以相信但却是确凿的事可以作为例证。当皇后受这个江湖术士支配的时候，她热切渴望生一个男孩，因为皇帝皇后前此所生的四个孩子都是女儿。菲利普博士使皇后相信她将要生一个儿子，她也自信是怀孕了。到了幻想怀孕的最后几个月，人人都觉得她已经比从前胖多了。她开始穿宽大的衣服，不再参加宫廷的仪式。大家都确信皇后有孕了，皇帝特别高兴，圣彼得堡的市民每天都在盼望听到彼特罗巴甫洛夫斯基炮台的号炮声响，因为按古老的习惯，这炮声宣告皇室后裔的诞生。最后，皇后都不走动了，宫廷产科医生奥特教授带了他的助手们来住在彼得戈夫的王宫中。但过了好些时候仍然不见分娩。最后，奥特教授要求皇后检查一次。她同意了，于是这位医生给她彻底检查了以后，宣告皇后并未怀孕。

不难看出，这样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在掌握了专制政府所赋予君主的无上权力的时候，可能造成多么大的灾害。

在彼得亲王的家中，菲利普会见了好几位神甫，其中有声名狼藉的喀浪施塔得的约翰神甫。显然在那里订出了要封萨罗夫的长老泽拉菲姆为圣的计划。

这件事是波别多诺斯采夫亲自对我讲的。他说，一个晴朗的上午，他被皇帝和皇后邀去同进午餐。波别多诺斯采夫虽是皇帝和他的严父亚历山大三世皇帝的教师，但最近他和皇帝与皇后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这次邀请有点出乎他的意料。进餐的时候，除了皇帝与皇后之外并没有其他客人，吃完以后，皇帝就当着皇后的面要求波别多诺斯采夫代草一道封泽拉菲姆神甫为圣的诏谕，封圣之日即在几个星期之后，并为纪念这位道德崇高的人而举行一整天的庆祝。波别多诺斯采夫回答说，封某人为圣是东正教事

务总管理局权限之内的事，首先必须将受封者的一生作一番详细调查，同时还得听取人民的意见。对于这一点皇后回答说："任何事情都是在皇帝的权限之内。"我也有好多次听见她说过这样的话。但皇帝倒是尊重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意见，在当天晚上，皇帝写了一个便条给他，对于他所说不能立即封泽拉菲姆为圣一事表示同意，命令他下一年将此事付诸实现。

波别多诺斯采夫遵旨做了。皇帝和皇后都出席了祭圣物的典礼。在这庆祝的过程中，发生了几件奇妙的治好病的事情。在那天的夜间，皇后在一种治病的泉水中沐浴。一般人传说这样一个信念：这位萨罗夫的圣人将要在四位公主之后赐给俄国一个皇太子。这件大事果然实现了，皇帝和皇后遂对于这位泽拉菲姆圣人的灵验坚信不疑。皇帝的书房里也挂上了这位圣人的画像。10 月 17 日决议公布后革命风潮澎湃，阿·季·奥保连斯基公爵正担任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局长，他多次对我抱怨那两位黑山公主干涉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的事。他说，他曾经向皇帝谈到宗教事宜而涉及泽拉菲姆圣人，皇帝说："我完全相信泽拉菲姆圣人的神灵和他的奇迹的真实性，任何人也不能动摇我的信念。"

有许多人因圣泽拉菲姆事件而荣任要职。主持祭圣物典礼的席林斯基—沙赫马托夫公爵就是其中的一个。典礼举行之后，他接着就被任命为特韦尔长官。他以长官的身份要求神甫们替人民担保"政治上的可靠"而出名。结果当时的内务大臣米尔斯基公爵革了他的职，这却引起了皇帝对米尔斯基的不满。席林斯基—沙赫马托夫公爵一到达圣彼得堡，皇帝就立即接见了他，他听信了关于米尔斯基公爵的种种谗言，并且违反一切规定任命他为枢密官。第一届国家议会召开之后，我被追辞去大臣会议主席，席林斯基公爵又在戈列梅金内阁中被任命为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局长。后来戈列梅金内阁倒台，斯托雷平大臣任会议主席，又把席林斯基免职，皇帝旋即任命他为国务会议议员。直到现在他还以

“黑色百人团”首领的身份盘踞在国务会议中。席林斯基公爵具有波别多诺斯采夫所有的缺点和弊病，却一点也没有他的种种优点，例如所受的教育、教养、经验、学识以及政治上的中庸态度，他都没有。

菲利普在日俄战争结束以前死去，他的信徒们断言，他已经完成了他在人间的使命，活着升到天堂去了。



第八章　沙皇的改良尝试

尼古拉二世当政期间，政界为改革立法与行政而掀起的运动在经历了许多惨败之后，终于在1905年10月17日发表了宪法宣言。我现在就简略评述一下这个改革运动的艰难曲折的过程。

尼古拉二世在他的严父仍然当政的时期，就曾表现对农民命运的真诚同情。所以在1893年，在他担任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主席的时候，他赞成我鼓励无地的农民移居西伯利亚。这个措施因为会减少廉价农业劳力的供应，遭到了地主们的反对。到他自己当了皇帝后，我想他一定能够施行一种公正、理性的农民政策，继承他祖父那令人钦佩的传统。但是我的种种希望都被统统打破了，不久，这位年轻的皇帝被一些违反农民利益的权势人物所支配。可以说，皇帝心意的改变，与那些在他登基时的一些贵族和地方自治会的代表所致祝词有关。这些祝词所表达的情绪和愿望颇像1905年到1906年革命时期遍及全俄的情绪和愿望。我认为这些代表发言人在表白他们的愿望时，如果更节制一些就好了。内务大臣伊·尼·杜尔诺沃和著名的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局长波别多诺斯采夫利用皇帝的迟钝，鼓动皇帝谴责那些自由主义者，指斥他们用最恭敬最忠诚的措辞来表白的愿望为“幻梦”。十年以后，这些幻梦都成为事实了。

尼古拉皇帝登基的初期，我多次提醒他注意农民问题，指出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但我的努力经常遭

到普列维的阻挠，而且，我完全没想到，在没有设立一个农民问题委员会的情形下，1895 年倒召开了一个会议来研究地主豪绅的需要。大臣委员会主席杜尔诺沃被任命为该会议的主席，但实际上普列维却成了该会议的核心人物。参加这个会的成员的身份表明，召开这个会的意图很明显是为了单独提高私有土地的地主们、尤其是我们的那些负债累累、得到人为支持的贵族的经济地位。我当时担任财政大臣，因而也是该会议的一个成员。在第一次开会时我就向大家宣称，因为农民才是我们主要的土地所有者和农业劳动者，所以应当特别注意农民的需要。我争论说，农民的经济繁荣了，就意味着地主经济的繁荣。主席打断了我的话不让我说完。他向皇帝表示，到第二次会议时，一开会他就说皇帝指示这个会议的目的只在于调查贵族的需要。后来，杜尔诺沃宣布，皇帝命令这个会议仅限于那个专门的任务。

这个决定等于宣判了这个会议的死刑。它持续了大约三年，所讨论的问题大多是贵族的各种特权和用公款给予他们的钱财补贴。我对于这些计划都予以反对，并尽力揭露贵族的贪婪。我由此激怒了那些把俄罗斯帝国当成供他们挤奶的乳牛的贵族。普列维始终是具有极端封建倾向的拥护者，他历次发言总是援引历史上的事实来表明贵族创建俄罗斯帝国的主要功绩。他发现我是一个毫不留情的反对者。我承认我对他没有顾全情面，所以他曾几次请求主席保护。不用说，这个会议事实上毫无成效。杜尔诺沃获得了一份厚赏。贵族们也得到了几种小的财政特权作为给贵族的好处，但是贵族中的某些人永远不会忘记我曾反对这个会议的各项计划。不过有一点是不辩自明的，我从来没有对贵族阶级怀有敌意。我自己就是一个世袭贵族而且受过贵族传统的教养。我发觉在我们有土地的贵族中间的确有不少高尚的、大公无私的人，他们拥有着真正贵族的精神——保护弱者，为普通人民服务的影响。19 世纪 60 年代里的几项重大的改革都是由少数贵族实行的，

就在此时，有一些贵族把民众的福利当作是他们自己的福利，他们有时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为国家的事业操劳。不过这样的贵族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贵族在政治上都是一群败类，他们只知道满足自己的私利与贪欲，设法牺牲一般纳税者的权益，主要是农民的利益以获得种种的特权和恩赏。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会议的记录从未对外公布。如果这些文件被公众所知，那么即使是毫无用处的第三届国家议会，恐怕也要为之羞愧。尽管这些文件并不是各项讨论的详实记录，但是如果把它们连同那些写给会议的便函一齐发表，那么就可以充分表明许多我们在日俄战争后所遭受的灾难。到了二十世纪初，还采取中世纪的政策方针而想泰然无事，那是不可能的。当国家意识到或至少是部分意识到它的尊严和需要的时候，就不可能继续采取那种显然不公正的鼓励享有特权的少数人靠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谋利的政策。君主与政治家如果不明白这个简单的真理，他们就会亲手造成一场革命。政府的力量和权威一旦开始衰弱，暴乱就会爆发以至于不可收拾。我国革命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政府不了解社会在前进这一基本事实。防止这个运动是君主的责任。如果他不能这样做，只知抑制，结果必定会造成革命洪流的泛滥。在俄国，这种革命洪流尤其危险，因为百分之三十五的人口是被征服的非俄罗斯民族。任何一个了解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前几个世纪民族主义的发展已经给民族融合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在贵族会议解散的时候，我在上呈1898年度的国家预算报告中，再次敦请皇帝注意农民问题。几个月之后恰好国家审计官在他呈报给皇帝的本年度报告中也提及了这个问题，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向大臣会议建议召开一个特别会议来研究农民问题，该会议由国家高级官员组成，由皇帝任命一个政治家来主持，或者由皇帝亲自主持更好。戈列梅金没有提出异议，但普列维极力反对，杜尔诺沃也跟着表示反对。然而这次大臣会议却通过了我的建议，

决定召开一个专门会议来“研究有关农民阶级的立法范围及相关问题”。皇帝对于这次会议的议事记录既没有批准也没有明确地拒绝签字，于是事情就耽搁下来了。这时，夏天来了，皇帝到克里木避暑去了。我只好写给他下面的这封信，强调这个会议的重要性，请求他不要放弃这个计划：

克里木战事使那些能够明白的人受到启发。他们发觉俄国在农奴制度下是不可能强盛起来的。皇祖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把民众的灵魂和肉体都从他们的领主手中赎出来。这一空前的壮举创建了陛下现在统治的庞大帝国。俄国从此才改变了旧状，它的权力与知识都增长了十倍。尽管如此，但农奴解放以后，自由主义运动兴起了，并且带来可能粉碎俄罗斯帝国赖以存在的基础——专制政权的危险……八十年代的危机，并不是由解放农奴引起的。这种危机的发生是由于报刊那蛊惑人心的影响，学校的解体，各种自由主义的自治机构以及由于各种各样的人不断攻击官潦政治，使得专制政权的各机关的威信受到了损害……亚历山大二世皇帝解放了农奴，但是他没有把农奴的生活安排在坚实的法律基础上。亚历山大三世皇帝致力于恢复俄国在国际上的威信，加强我们的军事力量，改进我们的财政状况，镇压叛乱，所以没有余暇来完成他的严父所未竟的事业。这项任务已遗留给陛下了，并理应由陛下完成。否则俄国未来的发展将会受到妨碍。

陛下有一亿三千万臣民。农奴解放以前我们的预算是三亿五千万卢布。农奴解放使我们能够把预算增加到十四亿卢布。如果我们能像法国那样富庶，按人口比例，我们的预算可以增加到四十二亿卢布，或者，如果我们

的经济繁荣与奥匈帝国一样，也可以增加到三十三亿卢布。为什么我们人民的纳税能力如此低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农民太贫困了……

农民虽然是从他们领主的手中被解放出来了……但他们仍然是农村公社大会所代表的农村公社的奴隶，也是整个管理农村的小官吏特权阶级的奴隶。农民的权力与义务在法律上并没有被明确规定。他们的幸福与人身完全被专横的地方官吏所掌握。像农村地区法庭这样的一些机关仍然会让农民遭受鞭打……农民现在得到了土地，但法律上却没有明文规定他们对于土地的权利。在任何盛行土地公社所有制的地方，农民甚至不知道哪一处是归他所有的。遗产继承权是依据模糊不清的习惯制定的。所以农民到现在还不是根据法律占有土地，而是根据习惯，往往是根据任意的判断来占有土地。至于农民的家庭权利，几乎完全属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

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的法律改革，对农民的影响极为有限。他们的诉讼案件不是由国家普通法庭判定，而是由特殊的农村法庭根据习惯法判定，坦白地说，也就是任意地判断。赋税的增加也没有较明确的规定，只是由地方政府任意征敛。……所谓共同负责纳悦的原则是使农民个人负有纳全公社的税的责任，而结果往往使他们完全无力担负。地方自治会也任意向农民征税。这种苛敛即使超过农民的承担能力，政府也无法制止。还有村社费的增加也是一种横征暴敛，而最近的增加幅度更趋严重。政府对此却完全不能加以管制。

我们的民众教育如何呢？毋庸讳言，它还在萌芽时期。在这一方面，我们不仅落后于许多欧洲国家，而且也落后于亚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然而这并不是不可救

药的弊病。我们只要办教育，人民就可以受到教育。自从六十年代以来，直到亚历山大二世皇帝驾崩（1881年），这是一个自由主义过度炽热的时期，我们的民众受到了什么样的教育呢？那种教育可以说是腐败的。尽管如此，却要不顾一切地推进教育事业，而且必须竭尽全力来办教育。我们不能因为小孩有摔倒跌伤的危险就不让他学走路。只是教育必须完全掌握在政府的手中。

因此，农民虽然得到人身自由，但由于他们知识的缺乏以及官吏的专横跋扈，贪赃枉法，他们依旧是处在奴隶的地位上。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已失去了用合法的手段去设法改善他们的生活的动力。他们已丧失了动力，变成了一些消极的、没有精神的人了，这样就为各种罪恶的滋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任何一种单纯的措施，不论何等重要，也不能挽救这种局势。最重要的是必须激发起农民自立自强的精神。陛下必须给予他们各种公民权利。如果农民生活状况照目前这样下去，国家就不能前进并获得事物的性质和命运本身赋予它的世界重要性。

农民的这种状况是我们国内经常发生危机的基本原因……现在我们都很重视所谓的“土地危机”。鉴于地价都在增涨，这的确是一种奇怪的危机。现在各地舆论的焦点都集中在谈论各个阶级为国立功多少，竭力研究哪一个阶级才是支持君主的，仿佛俄国的专制君主政权只可能依靠某一个阶级而不是依靠全体俄国人民……我们的君主政权要永远建立在全体俄国人民这个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上……国内动乱的根源并不是什么土地危机，不是无组织的移民，也不是预算的增涨，而是农民大众不能安居乐业……总之，陛下，我深信农民问题是我们当前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们必须立即加以解决。

我不知道皇帝看了我的信以后会有什么感受。他没有复信，在他回到圣彼得堡以后也从来没有提起这件事。皇帝在答复杜尔诺沃报告的谕示中，对大臣会议所通过的措施表示同意，但必须等他下令后才可付诸实行。然而他的命令一直没有下来。普列维—杜尔诺沃集团于是假借立法改革的方式再度阻挠我改善农民生活的努力。

然而，到了 1894 年，我实行了两种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阶级的法律地位，这就是取消共同纳税制和放宽护照规定。

农民被解放的时候，我国为了财政上的便利采取了共同纳税制度，其基本原则就是公社比个人容易管理。共同纳税制实质上就是节俭的人为挥霍无度的人负责，勤劳的人为懒惰的人负责，不喝酒的人为醉汉负责。这一种非常不公平的制度，败坏了人民的道德秩序，损害了人民对公道和公民责任的信念。因为内务部在为这种制度辩护时每每假托财政部的需要，我便以财政大臣的身份在国务会议中声明财政部是反对这种政策的。然后我提出一项向农民征税的办法，就是废除共同纳税并把收税的工作由警官移交给财政部的税务稽察员。内务大臣戈列梅金坚决主张这项工作不应交给税务稽察而应交给乡村警官去办。但税务会议的多数人都拥护我的主张。戈列梅金又向皇帝埋怨我企图降低乡村警官在农民眼中的威望。因此我呈奏皇帝，如果国务会议上大多数人所通过的议案遭到否决，我将被迫辞职。结果，共同纳税制被取消了，征税工作也改由税务稽察员办理。但是这项新法律并不能完全摆脱立法者认为农民不能与其他阶级同等看待的一些规定。

束缚农民手足的护照规定，也是以护照收税可增加财政收益为由而加以维护的。我在国务会议中声明财政部情愿放弃这项收入，我又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份新的护照规定，将取消大部分限制农民行动自由的规定。大臣会议通过了这份新的规定，不过又依

内务大臣的建议加以修改，使其多带了点保守性。后来我任大臣会议主席时，内务大臣又制定了一份较为开明的护照规定，但因某种缘故未能成为法律。

1900年西皮亚金继戈列梅金之后成为内务大臣时，我特别提醒他注意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我说明，只要农民问题还没有在个人繁荣和人身自由的原则的基础上公正地予以解决，其他一切改革都如同在沙上建造房屋，是不牢固的。西皮亚金与皇帝商谈这事，结果就命我组织一个会议，正式名称叫作“农业需要专门会议”，目的在于调查农业特别是农民的需要——会议由一些著名的保守派人物组成，其中有：高加索总督沃隆佐夫—达什科夫伯爵，契哈切夫副官，后来做过芬兰总督的杰勒德，多尔戈鲁科夫元帅，以及皇帝的狩猎官舍列麦捷夫伯爵。这个会议从1902年1月22日开到1905年3月30日，长达三年多。当会议刚刚召集时，我有一次觐见皇帝，他对我表示他希望我能以亚历山大二世所实行的原则的精神研究并解决农民问题。第一年，我们将各省区委员会的报告加以收集分类。我们希望收集到大量的事实材料作为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据。这两种地方委员会的主持者都是当地的长官或军官，全是贵族，这种情况自然使委员会的讨论自由受到了限制。但是他们毕竟给当地民众一个多年来梦寐以求的、能较自由地发表他们意见的宝贵机会。皇帝和内务大臣都曾预料这些委员会将攻击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从而这些组织本身就被证明是陷害它们创始人的圈套。可是，出乎他们的意外，这些委员会都一致抱怨政府的国内攻策，特别是在立法上使农民处于无权地位。

在这个会议的存在期内，前后更换了3个内务大臣。这个会议刚得到必要的事实材料并开始准备采取实际的办法而进行审议的时候，内务大臣西皮亚金就被遇刺了，维亚切斯拉夫·康士坦丁偌维奇·冯·普列维被任命继任内务大臣。他立即迁怒于那些发表意见时过于直言不讳的地方委员会的领导人。因此，库尔斯克

地区的地方委员会主席多尔戈鲁科夫公爵被免职，而沃罗涅什地区的一位著名的统计学家谢尔比纳也遭到流放。小人物则遭到更加残酷的对待。土拉省一个农民因为到该省的一个地方委员会中陈述意见而被逮捕流放，利奥·于尔斯泰伯爵为他鸣冤，谴责我挑拨离间，却没有确凿的证据。（他的信夹在我的记录册中）。后来普列维得到皇帝的许可，在内务部设立一个专门会议来制定一套关于农民的法规，并立即进一步在各省成立另一套由各省长官主持的分会。这些新委员会中的人选都经过严格的审查，只包罗那些对当局歌功颂德的人。因为并没有命令禁止“农业需要专门会议”的活动，又因为我断定普列维所组织的会议不会做出什么成绩，所以我就采取了一种观望的态度。这时我所主持的会议正在研究谷物贸易、铁路运输与小额贷款等问题。

由于一种奇怪的巧合，普列维竟遭遇了和他前任同样的命运。他遇刺后，便由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公爵继任内务大臣，米尔斯基公爵是一个高尚的人，但对于他的这个责任重大的职位说来是过于软弱了。这时，“农业需要专门会议”开始处理农民各方面的问题。当时一度酝酿废除赎金制，但是我的继任者财政大臣柯科弗采夫表示反对，所以皇帝决定搁置这个问题，到战争结束后再行解决。顺便说一句，1906 年我任总理大臣期间，赎金制终于在革命暴动的直接压力下废除了。“农业需要专门会议”于是着手其他一些有关农民的问题，讨论的一般倾向是把农民阶级在法律上的无权地位状况予以废除。还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会议宁愿采取土地个人所有制，而不愿采取土地公社所有制。一些显然不是自由主义者的人都拥护我，而反对者则是那些宫廷奸党，他们后来都公开地或秘密地成为“黑色百人团”的首脑人物。

戈列梅金是会议的一个成员。他表面上和我合作，而背地里则阴谋反对我，和他同谋的有那个善于钻营的官僚克里沃申，他当时任国务会议成员，另一个则是特列波夫将军。这几个阴谋家

竟然使得皇帝相信农业会议是“不可信的”。结果就在 1905 年 3 月 30 日那个晴朗的早晨，财政部的一个司长打电话报告我说遵照一道特别上谕，已将农业会议解散，另由戈列梅金主持成立一个新的会议。尽管我是农业会议的主席而且也是一个很称职的主席，但这个行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们好像被当作是一个革命俱乐部那样来对待。在这个解散会议的谕旨到达的前两天，皇帝还批准了会议的议决案。当然，他从来没有对这个会议表示过不满，也没有警告我说要将它解散。事后他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个会议。皇帝的性格就是这样的犹豫不决。如果当时政府能允许这个会议完成它的任务，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也许都可以避免。农民所受革命思潮的鼓动也不至于像实际发生的那样深刻，农村的暴乱在规模上和激烈程度上都会大大削减，而许多无辜的生命就可以保全了。

戈列梅金所主持的会议当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兴趣，结果当然是毫无成就。至于我们的会议则由许多地方委员会的精英所写的备忘录和一些经过详细分类的、系统的关于俄国经济生活各方面的材料组成，给俄国经济文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看了这些材料的人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大体印象，就是在 1903 年至 1904 年期间，在人民的头脑中，已经时常有一个想法：要避免革命的苦难，就必须实行许多跟上时代精神的改革。就因为我们的会议的活动具有这个特点，所以它被解散了。

到革命爆发时，政府在土地政策方面被迫作了远超过农业会议目标的让步。但已为时太晚了。农民问题已不能再以开明的改革的方式来解决。它采取了一种激烈的革命的形式。任何革命的发生都是因为政府不能满足人民的急需，而且充耳不闻他们的呼声。没有一个忽视民情的政府可以太平无事。好多年来我们政府一向广为宣扬关心人民的需要，竭力为农民谋幸福等等。这一切都不过是空话。自从亚历山大二世皇帝逝世以来，政府对农民的

政策都由朝中一班拥有土地的贵族决定。所以今天农民也不辨是非，对全体贵族加以攻击。这也是人类的天性。

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公爵被任命为内务大臣，开辟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时代。其实公爵个人，无论是从信仰、事业、门第等任何一方面讲，都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不过是一个有见识、有头脑并且忠于君主的人。他向皇帝呈上一份报告，其后附了一件关于施行许多改革的诏书的草稿，这样开展了他的开明的改革运动。1904 年 12 月，皇帝在皇庄召集了一个会议讨论米尔斯基公爵的报告。除了内务大臣之外，只有少数高级官员参加。有人告诉我说皇帝原来不想邀我，后来因为米尔斯基公爵的劝说才请我去参加。

开会的时候，皇帝致开会词，大意说革命风潮日渐澎湃，我们有必要现在决定，究竟是采取迎合社会上的温和派的策略还是仍然实行那个已经招致西皮亚金与普列维两位大臣被害的政策。我碰巧是第一个发言人。我竭力表示我的意见说，要是仍然坚持执行反动政策，那就会把我们带向灭亡。与会的大多数人都拥护我的意见。当然，波别多诺斯采夫对我的见解持一种批评的态度，但是，像往常一样，他在结束时的发言宣称，最好是无为而治。会议还讨论了恢复帝国的法律权力、废除对于信仰旧教人民的苛刻的法规、以及其他违背宗教宽容原则和信仰自由等的法律问题。会上也指出有必要增加地方自治会与各市政自治机关的权力和范围。但是辩论的中心却是是否准许人民选举的代表参与立法工作的问题。大多数都表示赞成准许。我发表意见，大意说我们政府的情况实在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也不适应所有知识阶层的觉悟程度。因此我说，我是赞成这项改革的。但最后我说，我不愿对皇帝隐瞒这个看法：人民代表经常定期参预立法，据我看来，势必导致所谓的立宪政体。像往常由皇帝主持的各次会议的情况一样，这次会议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决定。皇帝只是命令国务大臣

诺尔德男爵在我的指导下按照会上大多数人的意见来起草一道诏书。同时又决定将各项拟议的改革交付大臣会议加以讨论和考虑。

第二天，这道诏书拟成，随后的几天里，在12月6日或7日，召集了第二次会议来讨论文中的措辞。定稿包含着一段措词相当含糊的阐明关于人民选出的代表可以参与政府的立法工作的规定。这件草稿呈给皇帝，他考虑了一番之后，将有关代表一条改为代表不是由人民选举而是由政府遴选。接着就召我入宫，问我对于修改了的条文的意见。我说这一条文经过这样的改动实际上就毫无意义了，因为根据我们现行的法规本来就可以召集专家参加国务会议的审议。我劝皇帝干脆把这一条取消。我讲，如果皇帝顾虑召集选举代表会引起类似于立宪政体的形成，那么就把这事完全勾销好了。皇帝听取了我的劝告，而这件经过修改的诏书在1904年12月12日签署公布了。

这道诏书授权大臣委员会筹划制定法规，增加人民的言论自由，扩大宗教上的包容性，扩大地方自治的范围、减轻非俄罗斯民族在立法方面的无权状况，并取消各种各样的非常法案。诏书还特别提到农业会议的未竟工作必须圆满完成。大臣会议将负责拟定总的原则，而关于每一个问题的细节则由皇帝任命的各专门委员会来审议制定，这些委员会直接对皇帝负责。我以大臣委员会主席的资格尽我的全力来把诏书中所列举的各项改革尽可能便利地、彻底地付诸实施。我积极设法解决每一个问题，我的下属则提供大量关于某一专题的资料。我希望用尽快实行这道诏书的各项改革的办法来抑制国内人民的不满和不安的蔓延。我必须克服的障碍首先是普通人的漠不关心，其次是朝廷大臣的阴谋，以及皇帝一直对于这些改革怀有很深的疑虑。总之，这道诏书的功效实际上是微乎其微的。所制定的法律只不过是关于宗教宽容、西部各省的学校制度和宗教派别的法律地位寥寥几项。

大臣委员会所拟定的立法原则从来没有实施过。我后来成立

了一个修订各种检查规章的会议，参加这个会的人员都很称职而且见解也都相当开明。但在这会议成立后几天，皇帝没有通知我，也没有通知该会议的主席就任命了两个参加这个会的成员：一个是戈利津—穆拉夫林公爵［现在是俄国人民协会（黑色百人团）的会员］，另一个是恶名昭著的尤泽福维奇。这会议毫无成果。关于宗教宽容问题，会议在取消了几百年来压迫着旧教徒在法律上的无权状况之外再也没有什么成绩。按皇帝的本意来讲，他始终是袒护这些宗派信奉者的，但是，宗派信奉者有一个有权势的、顽固的反对者波别多诺斯采夫，二十五年来，他是开明地解决宗教派别问题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当宗教宽容会议正在讨论教派信奉者的法律地位的时候，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提出召开一次教会代表大会并恢复彼得大帝所废除的大主教职权的问题。皇帝因为受波别多诺斯采夫的影响，将教会会议的召开无限期地延期。就在这个时候反动的报纸开始大肆宣传说我和大臣会议的一位成员安东尼厄斯大主教合谋，要削弱皇帝的权威，说我们鼓吹恢复大主教职权，意在制造两个帝王，一个是世俗的，一个是宗教的。我担任国务会议主席以后，召集教会代表大会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于是在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下设立了一个筹备会议以拟定召集大会的计划。但是因为我的辞职和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局长奥保连斯基公爵的免积，这件事情又被搁置下来。据我看来，俄国当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立东正教教会的腐败和当今人民宗教精神的迷失。如果斯拉夫民族主义对于国家曾经作出了一点贡献的话，那是因为早在五十年以前就强调了这个真理。目前的革命已经特别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没有一个较高、非凡的理想，任何政治组织都不能存在。这些理想只要是简单、崇高且使人易于领会的，只要是具有神圣的特征，就能够支配群众。如果没有一个世俗的教会，宗教就成了哲学，就失去了进入人民生活并调节人民生活的力量。如果没有宗教，

民众就变成一群有理性的畜牲了。不幸的是，我们的教会早已变成了一种死气沉沉的官僚机构，我们的僧侣也不是为尊严的正教、为上帝服务，而是为世俗的偶像崇拜的神祖服务。我们对基督教的信仰逐渐变得比任何其他基督教会信徒们的信仰更为淡薄了。我们比任何国家都缺少信仰。日本之所以战胜我们，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它的神比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更为坚定。正如有人说1870年德国战胜法国就是因为它的学校比法国办得好。

大臣委员会在实行12月12日诏书的过程中，还讨论了劳工问题，但除了建议试行义务的工人保险制度以外，就没有再做更多的事。为了要实行诏书中的规定，大臣委员会决定召集一个省区两级的自治会与市议会的代表大会，授权给他们拟定一份地方自治会与城市自治机关的章程。这个详细记载着大臣委员会的决议的会议记录由皇帝签了字，但是这个决议却永远没有得到施行。大臣委员会又声明地方政府不得任意订立规章，尤其是颁布所谓“非常紧急法令”。这种非常法令原是八十年代所施行的一套临时法规，一直施行到现在，其施行的地区和范围日渐扩展。可是大臣委员会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成就。最后是关于犹太人问题，大臣委员会宣称至少必须制定出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但是除了逐渐废除犹太人的无权状况外是没有什么其他解决方法的。大臣委员会又主张，鉴于目前犹太人问题日趋尖锐，必须有常与犹太人交往的人民代表参与，或者随着反犹太人的种种限制取消而将与他们密切往来的人民代表参与解决犹太人的问题。

我因为鉴于颁布了12月12日诏书的结果并不会导致各级政府采取认真的措施，所以便赶快结束了将遵照这道诏书行事的大臣会议，这一行动使皇帝感到很满意。因此可以造福国家的措施竟成为对国家无用的东西了。这件事很清楚地向各知识阶层表明：皇帝和朝廷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施行新政。

这时，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公爵失去了皇帝的信任，

而由布里根继任内务大臣，布里根为人正直冷静，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这次任命，是因为他以前曾给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做过助理。在这不久之前，特列波夫将军由于宫廷大臣弗雷德里希斯男爵的推荐而被任命为圣彼得堡总督。他之所以荣任这个新设的职位，是因为他有一副堂堂的刚毅的外表，他与弗雷德里希斯男爵一样，曾供职于骑卫队，但最重要的原因则是他曾在皇帝面前严厉批评过米尔斯基的政策。皇帝的性情本来就像个钟摆一样，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晃着。因此，竟不顾布里根的反对，也没有令特列波夫辞去原来的总督职务，就任命他为享有种种特权的内务部副大臣。于是我们同时有了两个内务大臣，或者更准确一点说，一个傀儡大臣和一个真正的独裁者。再没有别的名词可以用来形容这位特列波夫将军的地位和角色了。他完全挟持了皇帝并由于皇后的姊姊伊丽莎白·费奥多罗夫娜公爵夫人的帮忙，获得皇后的宠信。正是在他独裁的时期，1905 年至 1906 年的革命集聚了足够大的能量。

特列波夫每天呈报皇帝关于内政事务和外交政策的情况，布里根则坐在他的办公室从文件上得知一些他名义上指导的国内政策情况。不过他对于这种不幸的处境倒是处之泰然。每当有人问他在何种情况下采取某种措施时，他就平静地回答："我不知道，他们还没有告诉我"，或者说："我刚从报纸上得知这件事"。

只有一项重大的改革和布里根的名字联在一起，那就是尝试创立一个具有咨询权的议会机关，尽管它一产生便夭折了。与这项改革有关的一切工作都由当时人们称为索尔斯基会议的大臣会议担任。1905 年 10 月 17 日以前有两个行政机关都行使立法的职权，即拟定法律条文呈请皇帝批准，这就是大臣会议和内阁会议。内阁会议很少召集，即使召集时照例也是由皇帝亲自主持。1905 年 1 月，皇帝召集了一次大臣会议，在会议结束时，皇帝顺口对索尔斯基伯爵说："伯爵，以后请你负责召集这个会议来讨论大臣们

提出或是我指出的所有的问题。”从此之后，所有计划要实行的各项改革的问题便都归入这个会议的职权范围，这个会议便被人们称为索尔斯基会议。这个机构在 1905 年 10 月 17 日宪政宣言后的各项改革销声匿迹以后还继续存在着，与国务会议同时行使职能。就是这个会议又提出了允许选举出来的代表参与立法工作的问题。这项提议得到柯科弗采夫和其他一些人的支持。柯科弗采夫宣称没有这项措施就很难发行战争所需的公债。布里根也表示从国内形势看来，这种改革也是形势所迫。讨论结果是皇帝授权布里根起草一道诏书，命他以内务大臣的资格负责拟定召集民众选举的代表参与立法工作的审核。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下一次审核布里根拟定的诏书草稿的会，订于第二天召开。第二天清晨，我和别的一些大臣会议的成员在车站会合，一同去皇庄开会。但这时竟完全意外地在当天的晨报上看到了一个宣言的本文，我们都感到非常恼火和愤怒。司法大臣马努欣向大家解释说昨夜这宣言送到他那里让他发表，他原想将文章格式审阅之后交由枢密院公布，但内务府长官以皇帝的名义要求他在第二天的《政府信使报》发表。如同所有的宣言一样，这个宣言充满了虚假，还是那句老话：“一切都将照旧，打消你那无用的梦想吧！”没有人知道这宣言的作者是谁，到了皇庄，我们才听说前一天曾把宣言本文送给波别多诺斯采夫看，而得到他热烈的赞赏。后来又听说这个宣言是由皇后交给皇帝的，而皇后又是得自普提雅廷公爵之手。这个文件究竟是谁写成的，我还不能确定。很可能是一位“黑色百人团”的领袖写的。

皇帝到会场时，泰然自若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我想他看到每一个人烦恼的表情时候，内心里一定会觉得很有趣。他常常喜欢做出一些使大臣们感觉惊异的事来。因为他不提起宣言的事，所以布里根便宣读他起草的诏书，其中规定相当多的人民代表参与立法工作，这在原则上和几小时以前正式公布的宣言完

全相反。经过一番大部分是关于文字的简短讨论之后，开始休会进午餐。皇帝照例离开会场而去与皇后一起进午餐。我在进餐的时候说，那些出席会议的人们会在诏书的文字上辩论不休，结果这诏书恐怕根本无用。大家因为对这场拟定宣言的恶作剧都非常恼怒，所以便约好一致赞成布里根的原文，不再讨论。开会后我们依约而行，这大大出乎皇帝的意外。他没有办法，只好在诏书上签字。希尔科夫公爵感动得掉下泪来，索尔斯基伯爵作了一个简短的洋溢着热情和谢意的讲演。于是在同一天内就制定了两项互相矛盾的法案，在这种情况下，难怪国家要遭受革命的苦难了。时至今日俄国还是被人当作玩偶一样拨弄着。但在统治者的眼中，还不是把对日作战当成一场儿戏吗？

从这次事件之后，我就不再积极参与布里根计划的推行了。索尔斯基会议通过了布里根计划的纲要。到我赴美国以后，皇帝在彼得戈夫宫主持召集了一次会议，对这个计划作最后的审议。这次到会者除索尔斯基伯爵之外，还有几位亲王和坚定的保守派人物：如波别多诺斯采夫，伊格纳捷夫，国务会议中的贵族代表纳雷什金和圣彼得堡贵族出身的前元帅鲍勃林斯基等。1905 年 8 月 6 日发表了一个宣言，同时颁布了一道规定创设国家议会的命令。其规定这个机构大致如下：

（一）国家议会为永久性的机关，类似西方国家的议会。（二）一切临时和永久的法律规章以及国家预算必须提交国家议会讨论。（三）国家议会为专门咨询机关，对于所讨论的事宜享有发表其意见的充分自由。（四）选举法的制定主要以农民为基础，因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而从君主政体的观点看来，又为最忠实最保守的人民；选举法非经国家议会同意不能修改。（五）选举权不因民族与宗教之不同而受任何限制。

这真是繁文缛节的官僚们的经典之作。这个国家议会享有一个议会的各种特权，但却缺少最主要的一项。即：它是一个议会，

然而作为一个纯粹的咨询机关又不是一个议会。这个8月6日的法律不能令任何人满意，对于不断上涨的革命浪潮也一点没有起到阻挡的作用。

当我在美国期间，政府给予各大学自治权。这是说明我们政府的政策产生了一些轻举妄动的行动。结果所有圣彼得堡的高等学校都成为各阶级革命党人的开会场所。无政府主义与好斗的社会主义的极端思想就在这些集会上大肆宣传。讲演常常被“打倒专制政体!”这样的口号和许多类似的反对帝国元首和王朝的反叛词句所打断。当局唯一的办法便是派军队把大学校舍包围起来，以防止革命的火焰蔓延到街上去。各学校当局则宣称唯一可以阻止这种集会的办法便是政府准许人民在别的地方自由开会。据这些学校当局说，学生们认为他们应当和其他公民分享他们的特权(集会的自由)。于是大学自治便成为政府堡垒的第一个缺口，革命由此进入了开阔的天地。此后不久政府曾颁布了一套关于集会权利的规定，但是这项措施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在我逗留美国期间，还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设置一个类似内阁的机关以协调各部的事务。索尔斯基伯爵也曾在会议中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从美国回来时，这个问题刚开始讨论，当时几乎是全体参会人员都认为各大臣的行动有必要取得一致。只有财政大臣柯科弗采夫极力反对，因为他认为这个计划如果实行，必定要任命一个主席以统率各大臣，而他大概没有获得这个位置的希望，所以他便千方百计去阻挠实行这个计划，这种态度是这个心胸狭隘的人的特点。其余反对这个计划的人倒并不是不赞成这个计划，也不是像柯科弗采夫那样考虑个人的利害，只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一个机关的存在以及其领导人物的权势太大，恐怕会损害皇帝在人民心目中的权威。会议终于决定设置一个内阁会议以代替现在的索尔斯基会议，它是依照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在位时期发布的法令成立的，法令规定会议的主席由皇帝亲自担任。但

如前面说过的，尼古拉二世皇帝违背这条法律而将主席职务交给了索尔斯基伯爵。

这个新拟定的法令在10月17日前不久由皇帝颁布实行，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各大臣的工作，尽管索尔斯基伯爵的会议所遗下的一切事情都是含糊的、片面的，主要因为索尔斯基伯爵不愿让皇帝为难，在各种问题多选择退让。为了避免与自由主义的西方宪政相混，索尔斯基不称这新机构为内阁而称为大臣会议。我被任命为第一任大臣会议主席。因为以前就已存在着一个称为会议的组织，所以人们把它所制定的各项规章，如像布里根的国家议会法等都认为是我做的。一直到今天，大多数民众还认不清现今的和从前的会议的区别，以前的那个会议往往一连几年都不开一次大会。

这次设立新的大臣会议的原因虽然表面上是各部需要协调，但我有理由认为这个改变主要由于索尔斯基伯爵看到民众的暴乱日益增多，暴风雨即将降临，因而想要退隐，这样就卸去代替皇帝主持以前的大臣会议的重任。他的这种希望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这位伯爵多年来已经是一个病人，甚至不能走路。他当时担任着国务会议主席、财政委员会主席和大臣会议主席，在那样的情况下他竟能担负这些极为重要的职务，实在是令人惊奇。由于他的意志薄弱与身体衰弱多病，他近来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的一大群参事和秘书的影响。

到9月末，革命风潮愈演愈烈，以致“怎么办?”成了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10月上半月，政治情势急转直下，终于颁布了10月17日的宪政宣言。以下便是那个历史性文件的原文：

目前在帝国的京城和许多地区发生的动乱与骚乱，使我们心中充满了忧伤。俄国君主的幸福与人民的幸福密不可分，人民的忧患也就是君主的优患。当今发生的

动乱可以在民众中引起严重的混乱而成为对俄罗斯国家完整与统一的一种威胁。我们既已立誓效忠于皇帝陛下，就必须鞠躬尽瘁，以在最短时期内平息这一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动乱。除已经命令各有关的主管机关对于危害治安及各种骚扰暴乱的行为采取镇压措施并保护安分尽职的良民之外，为更有效地实行我们为安定国家而制定的措施起见，我们认为有统一各高级政府机关活动之必要。

我们赋予政府以执行我们的坚定意志的义务：

（一）按照真正的人身不可侵犯性及信仰、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的原则，承认民众有公民的自由权利的不可动摇的根据。

（二）进行国家议会的选举，容许以前未获得选举权的各阶级人民参加议会，只要在议会召开前的短期内来得及这样做的话。普遍参政权的原则的进一步发展则留待新的立法机关（即依 1905 年 8 月 6 日颁行的法律而设置的议会与国务会议）解决。

（三）建立一条法规，规定法律条文非经国家议会批准，概属无效，并应当保证人民选举的代表对于我们属下之各机关的合法性有实际参与监督的权利。

我们要求所有俄罗斯的忠实子民们铭记他们对于国家的责任，协力消弭这些空前的动乱并与我们一起来尽力恢复俄国的安宁与和平。

不久之前，皇帝曾命我以大臣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使各大臣的活动取得一致，我上了一道奏疏，这时这道奏疏也和宣言同时发表，原文如下：

不能把席卷俄国各个阶级的动乱看作是政治与社会制度的部分不完善所引起的结果，或者看作是有组织的极端派分子的活动所致。这种动乱的根源是很深远的。其根源就在于思想家们的愿望与他们生活的外在形式之间的失衡。俄国的成长已经超过了现存制度所能适应的程度，并且正努力谋求一种基于公民自由的制度。所以，俄国政治生活的各种形式必须提高到能激励大多数人民的那种水平。

目前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立即奠定这个新制度的基础，也就是不必等待国家议会的立法批准，便准许人民享有特别是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以及出版、信仰、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进一步加强国家政治生活的这些基础，必须经由正常的立法程序来进行，正如使所有俄国公民不问宗教与民族的差别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工作必须经由正常的法律程序来进行一样。当然，这些公民自由必须在法律上加以限制，以保障第三者的权利以及国家的和平与安全。

政府的第二个任务就是设置各机关和拟定各种立法的原则，以期与大多数俄国人民的政治理想相协调并保障既得的各种公民自由权利不被剥夺。政府的经济政策应以谋求广大群众的福利为目标，同时对于一切文明国家所承认的那些财产与公民权利也予以保护。

以上所列举的政府基本任务需要进行许多立法与行政工作。一种政治原则，从它现今的言论到成为法律条文或者是把这些法律规范引入人民的生活之中到政府机关的实施，其间必定要经过一段时间。在一个一亿三千五百万人口的多民族国家中，政府决难于顷刻之间，强力推行一种新的政治制度，也不能立即按照另外的一些

原则和传统组成一套复杂的行政机构。政府只采纳公民自由的标语口号来开始建立这个新的制度是不够的。只有为同一个目的所激励的、协调一致的政府作出不懈的努力，才能建立起这个新的制度。

目前的形势要求政府只有用各种方法来表明其坦诚的意图。所以政府不要干涉国家议会的选举并诚意地努力推行1904年12月12日诏书中所列举的各项改革。政府必须维护将成立的议会的威信并信赖其工作。只要议会的决定不损害俄国历史上建立起来的权势，政府就不应予以反对。为了严格遵照皇帝陛下的指示精神，关于国家议会的规定应随着该机构的工作要求和人们新的需求而进一步加以发展。政府在民间思想的指引下，应努力满足群众的愿望。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按照选举的原则改组国务会议，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在国务会议与国家议会之间建立正常的关系。

政府应采取的其他措施，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想提出下列几条我认为各级行政当局必须遵照的原则：

一、在进行最近给予人民的各种权利和特权的立法时必须做到有章可查。

二、坚决废除各种额外的规定。

三、必须协调政府所有机关的活动。

四、避免对各种并不危害国家或社会的行为采用镇压手段。

五、对于一切危害国家或社会的行为，则严格依照法律予以坚决镇压。

不言而喻，只有获得民众的广泛而积极的支持并在和平条件下政府才能运用它的全部力量，有效完成以上列举的各项任务。我们对于俄国人民的政治才能是充满

> 信心的。人民决不会希望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因为无政府状态不仅足以引起内战，而且也有造成国家本身分裂的危险。

虽然这两项同时公布的文件的精神是一致的，但是二者却非常不调协而且范围也大不相同。问题是：为什么皇帝会认为发表两个声明是适当的，而不把他的意思表明在一个布告里呢？1907年1月初我写了一份附于1905年10月17日宣言的备忘录（见第九章），这个文件答复了以上这个问题和其他一些关于宣言的来历的问题。因为当时朝廷中盛传我曾强迫本来不愿意这样做的皇帝发表这个宣言，我作这份备忘录就是为了辟谣。这份备忘录是关于宣言发表前的十一天的情况。本书上文中我已经叙述了我把这个文件呈给皇帝的经过，以及皇帝处理这件事的手法是多么的不高明。



第九章　1905 年10 月17 日宣言

1905 年9 月至10 月上旬，全国连续发生了政治骚乱与政治暗杀事件，全国各地，尤其是在圣彼得堡以及其他一些大城市都发生大规模的动乱，我作为大臣委员会主席鉴于这一事态，在1905年10 月6 日请求觐见皇帝，奏陈当前极端危急的国内形势。10 月8 日皇帝通知我，指定在第二天即10 月9 日下午6 时左右与他讨论如何应对目前的国内形势。

10 月9 日我觐见了皇帝，并呈上一篇仓促写成的备忘录，在这个文件中说明了我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并认为目前有两种办法可以稳定国内局势：1. 采取文件中所拟定的办法，2. 授全权于一个具有坚定的意志并忠于沙皇的人去用武力镇压一切暴乱。我说，必须挑选一个具有坚毅的性格并受过军事训练的人来担任这项工作。虽然我个人认为第一种方法较为适合当前的局势，但我的判断也许并不正确，所以我建议皇帝最好把这个问题拿来与其他政府官员以及可能与此事有密切联系的皇室成员们商议。皇帝听了我的陈述之后并未发表他的意见。

我从彼得戈夫宫回来之后，又同当时的大臣委员会代理主席武伊奇加以审核那份仓促写成的备忘录，并作了几处修改，在末尾附加另外一条办法：要抵挡当前的潮流，必须坚决而系统地进行。他说尚不能断定这种办法是否能够成功，或许这也是个错误，他接着说，无论采取何种办法，当事者必须对这种办法具有充足

的信心。

第二天，即 10 月 10 日下午 3 时，我又荣幸地受到皇帝召见，这次在座的还有亚历山德娜·费奥多罗夫娜皇后。皇帝考虑我所得出的结论，我解释在报告后面的附注，同时又提到我已呈奏的变通计划。皇帝皇后都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只是皇帝说最好将这个报告的内容以宣言的形式发表。

10 月 12、13 日，我没有从彼得戈夫宫得到任何消息。大约就在这时各地的动乱呈现出如火燎原之势，大有发展成为一次叛乱的趋势，所以我在索尔斯基伯爵办公处的一次会议上，在讨论了其他一些事项之后，主题转移到对这个非常危急的形势的讨论上。副官长李哈乔夫和帕连伯爵坚决主张无论如何必须以武力粉碎任何叛乱。我立即以一份特别奏折的方式将此事报告给皇帝，同时建议所有抱有这种信念的官员，都应该听一听他们的意见。不久之后，副官长李哈乔夫问我是否由于我的建议皇帝召见他，我回答说，对此我并不确定，不过我个人的确认为有责任来告诉皇帝，有一些官员对于解决当前形势所引起的问题的方针已形成了清晰的概念，我认为，若予以召见咨询，对皇帝一定是有益处的。10 月 11、12 日，我听说他的纲领已被提交到大臣中讨论；到 13 日，他得到皇帝发给他的电报：

> 在批准内阁法之前，我命令你使那些我曾训令在各地恢复秩序的大臣们的活动取得一致。只有在全俄帝国的生活处于安谧之中，政府才有可能与人民自由选出的代表们进行合作。

由于这份电报的缘故，我在十四日的早晨又去了彼得戈夫宫，极力向皇帝说明，仅仅把意见不同的各大臣联合起来决不足以平息当前的动乱，国内局势要求必须采取先前给出的两种方略之一。

因为皇帝以前说过可以将我的报告的内容以宣言的形式发表，所以这时我便把报告的纲要呈给皇帝，附以前言说明这几项要点原是奉了皇帝的命令与指示而拟定的，如果皇帝审阅后同意，则呈请皇帝予以正式批准。至于发表宣言，因为要在所有的教堂中宣读，所以我指出在这样一个文件中文字无须太详细，最稳妥的办法便是以经皇帝批准了的报告的形式公布，这样就表示出皇帝嘉许报告中所提出的计划，既然我承担着实施这些措施的所有重担，所以皇帝可以不负什么责任。

这时，在圣彼得堡以及许多其他大城市里，工厂、铁路以及各公共事业机关，罢工浪潮风起云涌，城市里经常停电，夜晚一片黑暗，商店关闭，电车停驶，电话不通，铁路交通陷入瘫痪。由于事态紧急和皇帝的严厉训令，我在皇宫召集了一次由部分大臣参加的会议，其中有雷迪格将军、内务部副大臣兼圣彼得堡长官特列波夫将军、铁道大臣希尔科夫公爵，讨论恢复圣彼得堡铁路交通应采取的步骤，最低限度也要保持与相邻地点间的联系。这时陆军大臣兼圣彼得堡卫戍司令特列波夫将军肯定地说，要想镇压城中或是皇宫附近的武装暴动，城内现有的兵力勉强可以应付得过来，但若想恢复城外的铁路交通，即使是圣彼得堡与彼得戈夫宫之间的交通，兵力就不够用了。作战部长概括地说，目前除了常备军之外，已命令滞留在欧洲俄国地区的一大批士兵和军官编入现役军队。这些部队中有很多人都是从预备役征调来的，在缔结和约以后还把他们留在军队里，自然会引起他们的不满。这种情况再加上漫长的兵役年限，在很大程度上败坏了帝国军队的士气。

14 日的晚上，奥尔洛夫公爵从彼得戈夫宫用电话通知我，请我参加 15 日上午 11 时皇帝召集的会议，并请我把宣言的草稿带去，因为重要的是“一切都应出自皇帝个人的意思，而其中所列改革事项应由诺言转变为皇帝允许的事实，没有必要以宣言的形

式，而只以皇帝批准过的报告的形式发表较为稳妥”，但事到如今也只好遵照圣旨办理，国务会议成员阿·季·奥保连斯基公爵拟了宣言的草稿。因为那天晚上我身体不适，公爵恰巧到我家来拜访我。

16 日早晨我邀了奥保连斯基公爵和大臣委员会主席一同前往彼得戈夫宫。在同一只汽艇上还有宫廷大臣弗雷德里希斯男爵。奥保连斯基公爵在这些人面前宣读了他的宣言草稿。我略作了评论，但是快到彼得戈夫宫时，我请奥保连斯基公爵和武伊奇把宣言草稿再根据他们的商谈作出一份大致的定稿，而奥保连斯基公爵和弗雷德里希斯男爵则一起到宫廷去。在宫中遇到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和雷迪格将军。11 点钟，皇帝召见了他们四人并命我宣读前面提到的那份报告。然后我说，依我个人所见，要摆脱当前的困难只有两条路：或者是建立一个独裁政权，或者是颁布宪法，而皇帝自从发表了 8 月 6 日宣言之后，接着又下过几次内涵相似的诏命，实际上已经走上第二条路了。奥保连斯基公爵的报告建议采取第二条路，如果皇帝批准的话，那么就将导致进行种种措施的立法，这将扩充 8 月 6 日宣布的法律的范围，从而开始实行宪政。在我宣读报告的时候，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经皇帝许可问了许多问题，我则为之详细解答，最后我表示，在这样残酷的战事与狂暴的叛乱之后，不可能很快地恢复社会的稳定，但这第二种办法可以使我们比较快地实现这样的期望。

读完报告之后，皇帝问我是否已经拟就宣言的草稿。我回答说，奥保连斯基公爵在来彼得戈夫宫的途中，已将宣言草稿审阅过一遍，现在这草稿正在加以修改。但皇帝认为，对政府来说比较稳妥的办法就是批准这份报告。皇帝午后一点钟解散了与会诸人，令他们三点钟再来，并指示我把所建议的宣言文稿带来。

会议在下午三点钟后又继续举行，与会者在对报告继续交换意见之后，我宣读了宣言草稿，与会诸人都未表示反对。10 月 16

日晚，弗雷德里希斯男爵通知我说他要来拜访我，商讨宣言的事情。到了午夜时分，这位男爵才和他部中的办公厅厅长莫索洛夫将军一同来到，说皇帝在前天会谈之后，曾和另外几个人商议。国务会议成员戈列梅金和布德贝格曾分别拟就了两份宣言草案，皇帝特命他们把这两个文件告知我。我首先问这一切是否已经通知了特列波夫将军，因为他统率全帝国的警察，负责维持全国的治安，任何影响广泛的措施如果不事先通知他，就可能引起非常不幸和难以控制的事件。弗雷德里希斯男爵回答说他之所以来得这么晚，正是因为曾去特列波夫将军家中，向他汇报了一切情况。接着男爵便把两份宣言底稿拿给我看，我注意到，他之所以把这两份底稿拿给我看，定是认为我拟的草案不好。但我不赞成这两份稿件，理由如下：第一，底稿直接宣布自此宣言公布之日起，皇帝赐给人民一切权利，而在我所拟定的计划中，皇帝只委任政府去实现他授予这些权利的愿望，这样可以使政府有进行准备工作的时间；第二，因为底稿未曾提及我的报告中所列举的许多重要条款，如果和奥保连斯基公爵的报告同时发表，则报告中所列的原则是否完善和有力就会立即引起人民的怀疑，所以不宜同时公布。由于这些理由，所以我请弗雷德里希斯男爵回奏皇帝，说我仍认为不需要发表宣言，只把皇帝批准过的报告公布就够了，而且这样做比较稳妥。男爵反驳说，关于报告中所提议的改革事项是否以宣言形式向人民宣布的问题，皇上已经断然决定了。我听了这话，就再请弗雷德里希斯男爵代奏皇帝，因为内阁会议主席的重要职务必须是一个执行令皇帝满意的纲领的人，我感觉到皇帝仍然怀疑我判断这个问题的正确性，在这种情形下，最好不要任命我为总理大臣；而且，在皇帝始终不赞成选任一个独裁者以武力镇压叛乱的计划的情况下，最好选任一个比较中庸的人来负责协调各大臣的行动。我又说，如果我刚才所看过的两份底稿都被认为是适当的，就应当任命其作者之一为内阁会议主席。最

后，我恳请弗雷德里希斯男爵上奏皇帝，如果需要的话，正如我先前曾向皇帝陈述过的一样，我愿意退居次要的职位来为共同事业效力，即使是当一个省区长官也没有关系。

第二天，即 10 月 17 日，我又被召赴彼得戈夫宫，到达之后，我立刻去见弗雷德里希斯男爵。男爵告诉我，皇帝已经决定接受并批准奥保连斯基公爵的宣言草案，并说这个决定得到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全力支持，亲王曾断言由于缺少军队，要建立军事独裁的体制是不可能的。

在大约六点钟的时候，我便陪同弗雷德里希斯男爵到皇宫去，男爵携带着已经重新誊写的宣言。当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也在皇宫里。皇帝当着我们的面在宣言上签字，同时又批准我的报告。于是这两项文件在通知特列波夫将军之后，当日就对人民宣布了。

关于我这个奏折中所记载的这一个时期的事件，我还有另外两篇记录：其一是前任大臣会议秘书、现任枢密官武伊奇写的，另一篇是皇帝的秘书即宫廷副大臣奥保连斯基公爵写的。这两个人在那些危急的日子里都拥有观察宫廷情势的宝贵机会，他们也了解皇帝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关于 10 月 17 日以前所发生的重要事件，他们所记载的与我的记录相符，所以我感到高兴。

在我上述的备忘录中，因为行文简略和它的纯粹记事性质，所以有一些插入的事件与思想未能收入，现在我来加以补充。

在那些危急的日子里，诸位亲王对于国家和朝廷的命运漠不关心的表现使我感到惊讶。在 10 月 15 日以前，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一直在他的庄园中打猎，没有回圣彼得堡，而彼得·尼古拉耶维奇亲王当时还闲居在克里木。不过我确实知道，如果皇族任何人对于政局表现哪怕是一丁点的关心，或是试图去左右事件的进程，人们就会有礼貌地告诫他休管闲事。

当皇帝最初向我提起宣言的事时，我首先对它持怀疑的态度，

后来则变为坚决的反对。我怕它会不能达到原先设定的目标，不仅不能使国家平定下来反而使国家陷于更加混乱的状态。我对于建立军事独裁体制也没有什么信心。如果我内心曾怀有对独裁制的希望的话，我承认那也只是一种自私的想法。独裁制一但建立，就意味着我不必再执掌政权。我当时十分清楚自己的任务是劳而无功的。我知道如果我成功，因为朝廷害怕我的成功我也会被打倒；而如果我失败的话，无论是朋友或敌人都会乐于攻击我并驱逐我。后来我才发觉皇帝为什么坚持发表一个宣言，因为他事实上听信了他的亲信们的话，说我想当俄罗斯共和国的首任大总统。我对这种说法感到震惊，但这种谣言的确存在。有人向皇帝说我想把稳定帝国秩序作为我个人的功绩，而把皇帝的名字抛开，之所以要发表宣言就是为了要阻挠我这种邪恶的图谋。"让我们利用维特的主意，过后我们能够把他赶走……"我想这就是皇帝的亲信们所持的理由。

皇帝在和我磋商的同时又秘密地和其他大臣商议。事实上他同时咨询着各自独立且政见相反的两派人物，一派的首领是我，另一派的首领便是皇帝内定将接替我担任首相的戈列梅金。这种两面手段的做法使我感到愤怒。我很清楚，虽然处在这样危急的境地，皇帝还是不能公正行事。如果在那些决定性的日子里尼古拉皇帝能够像一位沙皇本应具有的正直和诚意来办事的话，那么许多误会和痛苦就可避免了。如果我和戈列梅金之间能有一个机会公开、坦白地交换意见，那么共同的责任心一定会迫使我们作出一个比较均衡的决定，尽管我们的政见大相径庭。但因我们在做着捉迷藏的游戏，各项大事自然都是时行时辍的，因而具有历史重要性的文件竟是如此仓促地拟就，而没有经过这种重要文件所要求的那种深思熟虑的过程。

10 月 16 日，我和弗雷德里希斯男爵用电话交谈：我告诉他据我所知，彼得戈夫宫现在正举行着会议，参加者有戈列梅金和布

德贝格男爵，他们正在考虑把我的宣言草稿进行种种修改。我告诉他说我丝毫不反对这些修改意见，不过如果真的作了这些改动的话，皇帝就必须放弃任命我为政府首脑的打算。我又说依照我的判断，目前根本不需要发表一种公开宣言性质的东西。男爵则对我保证，说他们所考虑的那些改动全是关于字句的问题，并无其他的目的。他答应晚上带来修改过的草稿给我看，但等他来到的时候已过午夜了，我才发现他们对我的文稿做了大幅度的修改，以致于实际上是两篇完全不同的宣言草稿。我决意不再和他们玩这种无谓的游戏了。我以自己一贯直率的态度，请求男爵代奏皇帝，说我断然拒绝接受与我原来的提纲不合的任何宣言草案；如果皇帝对我没有充分的信任，他最好在他秘密咨询的诸人中选一人来做政府的首脑。男爵离去的时候我的情绪十分激动，我独自向上帝祈祷，求他把我从这一群怯儒、盲目、狡猾而愚蠢的人中解脱出来。

第二天早晨我到彼得戈夫宫见着弗雷德里希斯男爵时，他告诉我说："今早我把昨晚和你的谈话向皇帝复述了一遍，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显然是等着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我辞退后，刚回到我的住处，亲王就来了。我把过去的事情又对他重述了一遍，最后我这样讲：'现在有必要建立一个独裁政体，而你一定会被任命为独裁者。'他从他的衣袋中拿出一支手枪来，回答我说：'你看见这支枪没有？我现在就去见皇帝，请他在宣言草稿和维特的纲领上签字。他若不依我的话，我就拿这把枪把我的头颅打碎！'说完这话他就走了。过了一会他又回来向我传皇帝的谕旨，命我将宣言和你的报告誊清，等到你来时，再把这两份文件呈给皇帝，皇帝将在这两份文件上签字。"

我这时知道我是没有任何退路了。就在这一天上午，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会见弗雷德里希斯男爵之后，宫廷部办公厅厅长莫索洛夫将军也和男爵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莫索洛夫将军

后来告诉我男爵谈话的内容。男爵说："我一直在希望为了应对现时的局面，俄国应建立一个独裁的政体，以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为独裁者，因为我觉得他是勇敢而绝对忠实于皇帝的。现在我发现我想错了，他原来是一个卑鄙的，动摇的人。任何人现在都逃避担负独裁的责任，我们都已失去了理智，所以今后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不得不屈服于维特伯爵。"

我很久不明白为什么这位亲王会这样坚决地赞成10月17日宣言。我当然知道他不曾被自由主义所感化，也不是由于对国家内部状况有什么了解。他这人一直是拥护无限制的、专横的君主专制政体。至于他个人的理智，又早已被过度的神道崇拜所蛊惑了。无论如何，我可以断言，不论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怯懦与精神错乱在决定这位亲王的行动的方针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皮·尼·杜尔诺沃因为经管内务部中检查信件的事宜，所以特别了解各种机密事情，1907年他曾告诉我，说这位亲王之所以对于宪政宣言那样拥护是因为当时受了一个名叫乌沙可夫的工人领袖的影响。我知道这人是少数几个在革命时期中没有失去理智的工人之一，这些工人拒绝参加1905年的苏维埃。我曾和他交谈过，要求他为我写下一篇备忘录，记述他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交往。根据我保存的这篇文字，乌沙可夫得以接近亲王的原因，是经过安德罗尼科夫公爵和一个名叫纳雷什金的人的引见。1905年10月17日的前夕，乌沙可夫曾去会见亲王，在谈话中乌沙可夫就极力主张颁布宪法，认为这是摆脱目前危急局势的唯一途径。在本书别处我已提到过，这位亲王对于新生的俄国宪法的热心很快就消失了。宣言发表后几个星期，我听说他就和黑色百人团的头子，即声名狼藉的杜勃罗文勾结起来。

第十章　流血的星期日与第一个苏维埃

我记得日俄战争初期，库罗帕特金将军有一次责备普列维是唯一一个想打这场战争并附和朝中政治冒险集团的大臣，这些政治冒险家已经把国家拖进这场战争中去了。普列维反驳说："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即库罗帕特金），你不熟悉俄国的内部局势。我们需要打一场胜利的战争去抵挡革命的浪潮。"

历史却嘲弄了普列维们的打算。战争不但没有提高国家的威望和增加物质的资源，反而以其无穷尽的痛苦和耻辱完全损伤了整个帝国的元气，使它那极端的腐败赤裸裸地暴露于国民和世人的眼前，全国人民的实际需要多年来被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所忽视，所以人民终于失去了耐心，并陷入了一种不可形容的混乱状态。

我将凭我的记忆的来叙述 1905 到 1906 年间动乱的经过，关于 1905 年 1 月 9 日的事件，在这通常被称为"流血的星期日"。

有一个名叫谢尔盖·祖巴托夫的人，他是专事挑拨煽动的密探，他主张运用一种以敌攻敌的策略来打压革命。他创建了一种可以称为警察社会主义的制度，目的在于以革命党自己的武器和策略去对抗革命。他说，革命党人正在宣传社会主义太平盛世来争取工人站在他们的一边，因此让我们模仿这些社会主义鼓动家的方法和语言，把我们的民众拉拢过来。祖巴托夫又进一步组织了一种所谓的"劳工运动"，有各种工会，工人集会，讲演会等，

都是由特务机关主办的。拥有大量工人的莫斯科城就成为祖巴托夫的大本营，他的一切活动得到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与莫斯科市长特列波夫将军的合作与鼎力资助。工厂检察局和我个人都极力反对祖巴托夫的计划，但是我们却无法反对那个权力很大的亲王。内务大臣西皮亚金也只能把祖巴托夫的活动限制在莫斯科的范围之内。

1902年西皮亚金遇刺后，他的继任者普列维就把这种警察社会主义的实验扩展到圣彼得堡。他在这里也摹仿莫斯科的组织拼凑了一些反革命性质的工人团体，以便把工人群众笼罩在警察局的影响之下。组织工作则委托加邦神甫去做。这位神甫很快就赢得圣彼得堡长官的完全信任。后来自然就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事情。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宣传逐渐败坏了工人的风纪，他们本能地力图实现社会主义的最高纲领。加邦不但不能阻止这个运动，连他自己也逐渐被革命精神所感染了。一场革命的暴风雨即将来临，而米尔斯基公爵和身居大臣委员会主席的我以及整个政府还对此毫无察觉。

1月8日晚间，司法大臣报告我说，工人们要在明天结队到冬宫广场游行向皇帝呈递请愿书，所以政府将在米尔斯基公爵府召集紧急会议以制定对策。司法大臣又说因为我熟谙劳工问题，他们原拟邀我参加，但因为财政大臣反对，所以才未曾邀我。当天晚上，有一批热心公益的市民代表来见我。我接见了他们，其中有我认识的沙赫马托夫院士，作家阿尔先邓夫，还有马克西姆·高尔基。代表团的发言人请求我促使皇帝接见工人们并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说，如果不然，一场大祸就不可避免。我拒绝做任何事，因为我对于这事情一点也不清楚，而这类事又不在我的权限之内。于是这些人便走开了，他们对于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还要拘泥于规章制度很是愤慨。他们走了之后，我立即打电话给米尔斯基公爵，告诉他市民代表见我的事情。次日早晨，我从阳台

上看到一大群人沿着石岛街前进。其中有许多知识分子、妇女和小孩。过了不到十分钟，从特洛伊茨克桥方面传来了枪声。有一个枪弹从我身旁飞过，另一个便把亚历山大文学会的守门人打死了。接着我又看到从肇事地点用马车运走许多受伤的人，有一群人往各个方向奔跑，到处是一片女人的哭喊声。事后我才听说，在上面提到的那次会议上，决定阻止游行的群众到达冬宫广场，但显然训令没有及时传达给军事当局，所以竟没有一人出来对工人们讲话，或试图让他们按照理智行事。我不知道是否全城各处都发生类似的事件，但在特洛伊茨克桥一处，军队莫名其妙地开了枪。结果死伤了几百人，其中有许多无辜的民众。加邦逃走了，革命党徒胜利了，因为工人们从此与皇帝和政府完全决裂了。

后来特列波夫将军被任命为总督，他有一个把工人们对于"流血的星期日"的恐怖印象除掉的巧妙计划。他从雇主们那里得到一批可靠地愿意做间谍工作的工人名单，他带领了其中的十二名工人到皇庄，把他们作为圣彼得堡工人的代表介绍给皇帝。这些"代表"对皇帝表明他们的忠实，皇帝对他们宣读了一篇事先写好的演说，要他们确信他心中始终记挂着工人们的需要，并将尽力为他们谋幸福。于是在赐宴给这些"代表"后又把他们送回圣彼得堡。这一出闹剧对于都城中的劳工大众并没有发生任何影响，有几个"代表"却受到了他们同伴的恶意对待，以致他们不得不离开他们被雇佣的工厂。

当我初任大臣会议主席时，加邦神甫曾托马努伊洛夫—马努谢维奇要求与我见面。据说他对于1905年1月9日惨案中的所作所为表示悔悟，现在既然已经颁布了宪法，他渴望协助政府安定国家。我拒绝与他会见，并且告诉马努伊诺夫—马努谢维奇，如果加邦神甫不在二十四小时以内离开圣彼得堡，我就要下令逮捕他并交付审判。第二天有人来对我讲加邦愿意到国外去，不过他没有旅费。我便交给马努伊洛夫五百卢布，他答应保证让加邦出

国。过了一个时期，加邦又托人来要求我准许他归国，其理由就是鉴于加邦对工人们有影响，可以利用他来对付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党人。我的回答是我永远不愿和此人打交道。到 1906 年 3 月，杜尔诺沃大臣对我讲，加邦现在芬兰，他向政府建议用贿赂手段把中央革命委员会的整个战斗组织收买过来。目前特务机关的头子拉奇科夫斯基正在和他磋商，加邦要求十万卢布作为活动的费用，而拉奇科夫斯基则只允许二万五千卢布。我表示用钱多少倒不重要，但总的说来，我根本不信任这个人，后来听说他在芬兰被人刺杀了。

自从一月惨案发生之后，不幸事件接连发生。当我在 1905 年 9 月从美国订完和约回来的时候，革命风潮已呈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新闻界干了不少坏事，在俄日战争初期，新闻界已开始摆脱政府控制，由于俄军的节节败退，新闻界就愈发大胆，到 10 月 17 日之前的一个月中，它就完全不听驾驭了，不光是自由主义政党的机关报，而且连保守派的机关报也是这样。尽管各报的最终目标不尽相同，但一律都鼓吹革命，都采用同样的口号："打倒这个卑劣无能的政府！""打倒官僚政治！""打倒现政权！"圣彼得堡的各家报纸本来一向就居于全国新闻界的领导地位，现在仍然如此，不过程度上稍逊于往时，此时竟完全摆脱了政府的检查，甚至组成一个联盟，互相默契，一致不理会检查官的命令。几乎所有报纸都参加了这个联盟，连包括《新时代报》在内的保守派的报纸都加入了这个联盟。有趣的是，到后来革命被镇压时，《新时代报》竟忘记了已往的行为，首先起来责难政府软弱，并指责新闻界风纪败坏。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我在 1905 年 10 月 19 日和新闻界的代表们会谈过。代表团的发言人是《交易所新闻》的编辑，一个名叫普罗佩尔的犹太人。他说话很大胆，带着某种受过教育的俄国犹太人所特有的高傲。他说话的要旨大意是新闻界对于政府没有

信心。他要求政府把所有军队调离都城而委托市民所组成的民团维持治安。他又要求给予新闻界完全的自由，实行普遍的大赦，并解除特列波夫将军的职务。像普罗佩尔这样的人，常常久候在达官贵族的接待室中为他的报纸招揽一点政府广告或谋取一点特殊权益，而这个人竟然以这样的语气来与我这个政府首脑说话，这足以证明俄国患着一种特别的疯癫。当然，我不能依靠报纸来安定国家。

当时各种报纸都向公众报导全国各地已组成了许多联合组织并由一个中央联合会来统辖这些联合组织。关于其中一些组织，例如学术协会的会报，报纸上报导得很详细，关于其他协会则只限于说某某协会在某处开会，并已采取某些重要措施。除了这些团体外，当然也有地方自治与城市代表的联盟，该联盟有起着重要作用的常设办公处。与这个组织相关的是所谓公务员的领袖们，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尝过革命的"痛快"之后，变成了反动派。古奇科夫、利沃夫、加利岑公爵、克拉索夫斯基、希波夫、斯塔霍维奇、海登伯爵以及其他同一阶层的人都属于这个联盟。此外还有不少秘密共和党人和理想主义的政客，其中一些人是很有才能的文学家和演说家，如黑森、米留可夫、格列杰斯库尔、纳博科夫和国家研究院院士沙赫马托夫等等。所有这些联合会尽管在组织和宗旨上大不相同，但他们都参加推翻现政府的准备工作。为要尽力实现这个目的，他们依据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地行动的原则。结果他们就不太慎重考虑策略问题，特别是在报纸上公然露骨地撒谎。事实上，当时的各种报纸不论是保守派的或是激进派的全都登载了一些欺人之谈。但必须承认，当革命运动爆发且无政府主义猖獗的时期，保守派报纸在散布谎言、诋毁和胡乱造谣方面胜过了激进派。

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或者可以说只是采取了一些无效的措施来对付和制止这些联合会和报纸的破坏活动。之所以如此，也

许是政府没有关于这些联合会的目的与活动的真实情报，也很可能是由于听信了一些不称职的顾问的错误意见。例如后来就有人告诉我，希尔科夫公爵曾极力为铁路工人协会辩护，其理由是这个组织是纯粹经济性的、互助性的，丝毫没有反政府的倾向，而后来这个组织领导铁路工人罢工了。关于执行新闻检查制度，却由于有一个秘密印刷所的存在使其困难程度大为增加，这个秘密印刷所印出了几百万份各式各样的革命纲领和宣言小册子，并将它们散布到各地。

政府之所以未能立即有效地对付这些革命的骚乱是由于行政官员们大都很怠惰、无能和胆怯。首先，内务大臣布里根对此便是漠不关心，因为他自己明白他的一切政务实际上被特列波夫将军所把持。而特列波夫将军则又几乎在犯神经病。他做起事来忽冷忽热，到他眼看暴风雨正在袭来，就由于恐惧而心慌意乱。他心力交瘁，因而渴望逃脱这一场不可思议的恶梦。他的职务名义上是内务部副大臣，而实际上则是他自己造成了一个独裁者，他后来对我说他再也不能继续担任这个职务了。的确，当时想从各种负责岗位上退隐的愿望是非常普遍的。例如那位明智而多疑的波别多诺斯采夫就放弃了除了和皇帝通讯以外的一切事务。其余各大臣如柯科弗采夫、施瓦内巴赫、格拉佐夫将军以及雷迪格将军等这一群平庸之辈则保持沉默，什么事也不干。

革命首先出现在边疆地区，波罗的海各省最早显示出明显的动乱征兆。在这些地区革命采取农民暴动的形式，其主要原因是政府在当地推行俄罗斯化政策。众所周知，波罗的海各省的下层居民多是拉脱维亚人，而上层则为日尔曼人。我国政府为了使这个地区俄罗斯化，在过去几十年间曾摧毁了日尔曼人强加于拉脱维亚人的文化联系。这是通过俄国学校以彻底反对日尔曼贵族用来教育拉脱维亚农民的开明思想来教育这些农民。结果，施行俄国化政策的目的就是让拉脱维亚平民反抗日尔曼贵族。当革命风

潮波及当地的时候，那些健壮的、心胸狭隘的拉脱维亚人热烈响应，群起焚烧和掠夺日尔曼地主的财产，这并不足为奇。因此，波罗的海各省贵族出身的领袖如布德贝格和高等法院院长里希特等人敦促政府在那个地区实行军事管制。于是在米陶城及其南方邻近地区事实上已经实行近乎军事管制性质的统治。不过，我并不想满足这些波罗的海地区的爵士们的愿望。

为了挽救这种局势，我为包括库尔兰、埃斯特兰和利弗兰的地区设置了一个临时总督，由索洛古布中将担任。由于这项任命源于我的举荐，所以他担任这项工作赢得我的绝对赞许。他做事勇敢而直率，努力制止一些部下的暴虐行为。因此，他挽救了里加城免遭受皇后宠信的奥尔洛夫将军所统率的讨伐队的滋扰。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索洛古布将军后来不得不离职。他的职务由奉行铁血政策的麦列尔—札科麦尔斯基继任。

早在1905年初，芬兰就存在着一种爆发大动荡的风险。尼古拉二世皇帝刚一继位便公布一篇特别的宣言，郑重地宣告他尊重先帝给予芬兰的种种权益。这确实是他的诚恳愿望。在他临朝的第一年中，他许可芬兰人修建一条接通瑞典的铁路，虽然我曾提醒他说先帝因为战略上的原因是反对修建这条铁路的。他说，他完全信赖芬兰人民对他的忠诚，对此没有任何怀疑。

在库罗帕特金将军就任陆军大臣的时候，他提出将芬兰俄国化的问题。他想显扬自己。只要芬兰总督海登伯爵还在，他就不让库罗帕特金的愿望实现。但是，不久海登伯爵逝世了，朝廷任命鲍勃里科夫将军继任。当我向他祝贺就任新职时，他表示他在芬兰的使命与穆拉维约夫伯爵在波兰的使命相似。这个比拟让我大为吃惊，我不禁想到穆拉维约夫伯爵是被派去镇压叛乱的，而他此去芬兰显然是被派去制造一场叛乱的……这一次是我们最后一次友好的谈话。

此后不久，库罗帕特金拟定了一项芬兰军事改革计划。同时

公布了一道诏书，宣称今后任何有关帝国利益的立法案件必须由国务会议通过。这违反了已故的几位皇帝所颁行并为皇帝自己所确认的宪法。库罗帕特金把他的计划提交给国务会议，希望这个机构不顾芬兰人民议会的反对而将其通过。我极力反对这位陆军大臣的军事改革案，并另拟了一个我认为可以接受的条文。国务会议中大多数人以及芬兰人民的舆论都是拥护我的。然而皇帝批准了得到鲍勃里科夫和普列维支持的库罗帕特金的计划。

这时，芬兰正在施行俄国化。俄国当局采取了许多措施，从芬兰人的立场看来，这些措施显然是无理和不合法的。芬兰的学校被迫设置俄语课，全国布满了俄国的秘密工作人员，芬兰上议院的议员很多被解职了，代替他们的是一些与芬兰人民毫无共同之处的人，凡提出抗议的人都被放逐到芬兰境外。结果鲍勃里科夫被人暗杀了，凶手并不是无政府党人而是一个芬兰的民族主义者，于是芬兰变成一个孕育骚动和暴乱的温床。

因此，俄国中部革命的爆发预示着芬兰革命即将开始。芬兰总督奥保连斯基公爵立刻就放弃了这场斗争，稍后就辞了职。我当时知道，芬兰的叛乱一定会使俄国的革命形势日趋复杂。另一方面，我始终反对尼古拉二世所采取的对芬兰实行迫害的政策。后来芬兰人代表来见我，表示只要俄国政府诚实地尊重亚历山大一世与亚历山大二世所颁予芬兰公国的各种权益，芬兰人就可以忘掉他们的一切痛苦而安静下来，我则向皇帝表示我相信目前必须恢复已往几位皇帝对芬兰的政策。我对他说明，只要我们采取适当的方式对待芬兰人，他们一向都是很忠诚的，况且在圣彼得堡的大门旁，如果产生第二个波兰的局面，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我敦请皇帝尊重亚历山大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两位皇帝所给予芬兰人的各种自由。由于我的推荐皇帝任命格拉尔德为芬兰总督以接替已辞职的奥保连斯基公爵。任命了格拉尔德以后，芬兰就不再是一座排演俄国革命悲剧的舞台了。目前看来俄国好战的沙文

主义又在转向芬兰，期望在那里制造麻烦。值得注意的是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皇太后完全不赞同鲍勃里科夫的政策。她为了被迫害的芬兰人而再三劝阻皇帝。

在这个时机，波兰境内也充满了反叛的气氛，不过，不满的人们是被迫保持隐蔽的，暴动事件并不常常发生，因为当地驻有相当多的军队。这些军队由斯卡隆总督统率，此人虽然不是一个奇才，但至少是一个勇敢正直的人。他的前任是马克西莫维奇将军，一个政绩平平的人，是由于宫廷大臣弗雷德里希斯男爵的推荐才担任总督的。据说在男爵结婚时（他的婚姻门第很不相称），马克西莫维奇送了礼品，男爵只是出于报答才保荐他当总督的。在叛乱发生时，他躲避在华沙近郊的别墅中，事后才回来，因此被免职。斯卡隆就是在马克西莫维奇被免职前不久才被挑选来担任这个职务的。

当我在 1905 年 10 月就任内阁会议主席时，我发现波兰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每天都发生暗杀与其他恐怖事件。这些骚动地区是属于农业性质的，也有一部分是工业性质的。一般人都渴望民族独立；其中一部分人梦想建立一个单独的波兰王国，只是与俄国共同拥戴同一个皇帝，其余的大多数人则希望地方自治，这种民族主义运动使各阶级的人团结起来，从而使局势复杂化了。鉴于这一切事态，我和总督商议，宣布波兰处于战争状态，这个措施在俄国的激进派中引起了比波兰民众更大的愤怒。俄国自由主义者也表示反对，社会党人以此为借口号召进行第二次总罢工，不过没有成功。我很明白，我们俄国人为了实现政治解放，已经对于我们光荣的历史与其伟大的成果——大俄帝国失去了尊敬。激进派把从官僚政客的腐败统治下的解放与从我们历史上存在的一切传统下解放出来混为一谈了。

一个波兰代表团来见我，想说服我解除波兰的战时状态。他们的主要发言人是一个著名的波兰律师，在我的印像中可算是一

个很明智的人物。他说他知道波兰要脱离俄国独立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俄国政府对于波兰爆发的叛乱也只有采取严厉的手段来镇压。但是，他断然地说，波兰各省之所以出现这样不可容忍的状态，完全应归咎于俄国的统治和文化。因此，波兰人渴望脱离俄国人。接着他说，“波兰的劳工问题，很久以来就已经存在过，但在西欧则早已发展成一种有次序的改进方式。我们的革命根源是由你们俄国人那里来的。当普列维策划了基希涅夫的屠杀和好几次反犹太人的暴行以后，许多犹太人工匠和工人都迁移到波兰来了，在波兰，犹太人受到较为人道的对待。正是这些俄国的移民把他们好战的、更加剧烈的无政府主义和政治斗争的恐怖手段灌输给我们的工人。我们的犹太人是被你们的犹太人教坏的，正如野兽把它们的野蛮习性传染给家畜一样。当然，你们的犹太人是被迫变得狂暴的，因为你们不允许他们有人类的情感与愿望。我们的学校到处都蔓延着俄国虚无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的宣传。这些恐怖的思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是从你们的学校和大学传来的。我们的儿童尊敬他们的双亲和长辈，尊重他们的宗教、文化、语言与文学。他们对于自己的民族有坚定的信念，他们确信‘波兰还没有灭亡’。你们企图使波兰俄国化的结果却是把我们的儿童引入歧途，把他们的那些神圣的传统——形成一个强盛民族的唯一要素给剥夺了。你们夺去了我们最宝贵的财产，而你们给我们的却只是你们那形形色色的虚无主义。”他以要求和解与取消战争状态来结束他的的演说。但是我感到无法答应他的请求，因为根据可靠消息，那些富有的波兰人是由衷地不希望解除军事管制的。

敖德萨也正在掀起叛变。这个城市之所以变得极端混乱是由于两个特殊的原因造成的。第一，占当地人口大多数的犹太人以为通过革命就可以造成普遍的混乱和削弱政府的威信，从而得到平等的权利。这时只有占人口少数的犹太人是积极的，可是绝大

多数的犹太人因为遭受种种不公平的待遇，早已失去了耐心，所以同情那个现在正采取革命策略的所谓“解放运动”。第二，动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个被大多数居民所痛恨的市长奈德哈特的残暴行为引起的。奈德哈特这人无论从学识或经验上都不适合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他之所以被任命为市长，只不过因为他是斯托雷平的内弟，也是靠着这种关系他才被任命为枢密官。也许还有部分原因，是由于皇帝有点喜欢他，因为他曾经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兵团的一个类似于滑稽小丑的军官，皇帝年轻时曾在该兵团中服过兵役。奈德哈特虽不愚蠢，但却肤浅无知，并且很自负。由于他对待下属和人民是那样的傲慢和残暴，也激起了我对他的反感，于是在10月17日之后不久，我就不得不把他免职了，这件事使他和他的姐姐即斯托雷平总理大臣的夫人自此以后就成为了我的敌人。

在东南地区，克莱格尔斯总督的态度早就十分消极，到十月间他辞了职。从前他当过圣彼得堡的长官。他是一个头脑不是很清醒的人，但皇帝却非常喜欢他。我想大概是因为他有一副骑士的仪表和泰然自若的风度。如果让他做一个警察局长倒是很合适的，但像基辅总督这样重要的地位他就完全不能胜任了。当初皇帝任命他的时候，所有对时局还抱有一线希望的人都感到非常惊讶。

在高加索，乡村地区和城市的叛乱十分猖獗，恐怖暴力事件也时有所闻。副总督沃隆佐夫—达什科夫伯爵试图采取怀柔政策，但他事实上不断交替地施行了开明的与反动的措施。总的说来，他这人并不十分聪明，但内心却很是真诚，也具有相当的常识，他之所以失败，主要因为他无法选任能干的下属。

整个西伯利亚处在可怕的骚乱中。这是因为这个地区长久以来就是、现在仍然是一个罪犯、流放犯和不安本分的人们的收容所。而且，因为西伯利亚距战场较近，这个地区的人民就能更敏

感地感到战败的耻辱，他们目睹战场与后方之间来回的运输情况，更深刻地感到战祸的可怖。此外，当地的总督库泰索夫也是一个无能的人，所以使得这个地方的局势变得更加严重。库泰索夫把他的官署设在伊尔库次克，他倒不是一个缺少才智的人，但是他也不是一个做事的人，把时间都消耗在不断的空谈之中。据说他被任命为总督完全是亚历山德娜·费奥多罗夫娜皇后的意见。皇后少年时常去拜访她的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皇，而库泰索夫那时正是俄国驻英大使馆的侍从武官，就在那时，皇后认识了他。此外，库泰索夫常与鄂木斯克总督苏霍廷争论，也削弱了西伯利亚地方行政的力量。苏霍廷是一个爽直可靠而聪明的人，但性情有点急躁。

边区各省显然是趁着俄国中央力量薄弱的时机来显示它们的威力。我们长期以来对于这些省份都施以种种不公正的待遇；我们曾采取过一些损害这些已被我们征服但未被我们同化的民族的行为（尽管有些措施是正确的），于是他们乘机开始报复了。他们热烈地期待着摆脱俄国与蒙古的控制。这种形势的造成，只能归咎于我们的政策失误。我们没有觉察到自从彼得大帝时代以来，尤其是从叶卡捷林娜二世女皇主政以来，我们已不是居住在俄罗斯本部，而是居住在俄罗斯帝国之内了。占大多数人口的俄罗斯人，又分为三个不同的分支：大俄罗斯人、小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而百分之三十五的人口则是非俄罗斯人。不考虑构成大俄帝国人口的各非俄罗斯民族集团的民族愿望，就不可能治理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让俄国各民族变成“真正的俄罗斯人”的政策不是融合帝国的各种民族于一个政体。我承认，如果俄国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而不是一个多民族的帝国，对于我们俄罗斯人来说会更好一些。要达到这个目标，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放弃我们的边区各省，因为边区各省是决不会容忍残酷的俄国化政策的。但这种办法我们的君主自然决不会考虑的。相反，我们并不满足

于占有边境以内的波兰人、芬兰人、拉脱维亚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等等的地方，我们还怀着吞并蒙古人、中国人与朝鲜人领土的欲望。

1905年10月我以大臣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主持俄罗斯帝国的大政。当时这个国家陷于一种普遍的混乱状态。政府处于绝境，当革命从社会最底层猛烈地沸腾起来的时候，俄国政府就完全瘫痪了。他们或者一筹莫展，或者往相反的方向退缩，所以现政府及其领导人几乎全都被清洗了。骚乱的猛烈程度与日俱增。革命公然在街头出现，具有越来越大的威胁，革命的冲动把各个阶级的人民都带走了。

一般人都对于现存制度深感不满，这是俄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腐败的最明显的症状。正是这种不满的情绪使各阶级的人民团结起来了。他们都要求彻底的政治改革，而这只不过是他们理想中的改革方式，即让现在的各个阶层的位置发生变化罢了。

上层阶级即贵族对现政府的不满也达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他们只要本阶级得到好处，并不反对限制皇帝的独裁权力。他们的理想是一个以贵族为主体的君主立宪政体。商人、实业家、有钱人希望建立起一个资产阶级式的君主立宪政体，并且梦想资产阶级占据领导地位，梦想成为一个有权势的俄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知识分子，也就是从事各种自由职业的人员，也希望建立君主立宪制度，这种政体最终将演变成为以法国为榜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学生们——不只是大学生，也包括高年级的中学生在内——根本不承认法律，只承认那些宣传极端革命和无政府主义的人所说的话。各政府机关的许多官员也反对他们所服务的现政府，因为他们对于在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已经增长到如此可耻的腐败制度深感厌恶。地方自治会和城市的工作人员很早以前就主张采取立宪政体以挽救当前危局。至于工人们，他们所关心的无非是吃得比往常饱一点，因此他们对于各种式样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组

织计划都欢喜若狂。他们完全被革命党人所操纵，只要有需要人力的地方，他们就倾全力予以协助。

最后，占俄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迫切想多得一点土地，并且解除地主阶级的种种专横行为，以及从最低级的宪兵到省长的整个警察系统的种种无限制的专横行为。农民梦想能得到一个专制的但是爱民的君主，保证实现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在位时所宣布的原则，即打破财产权利不可侵犯的原则而把农民和土地一齐解放出来。农民喜欢君主立宪制的观念，对于强调劳动的劳工党所制定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以及认为只有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才是一切权利的基础的学说都能接受。他们也准备使用暴力来获得更多的土地和改善他们不堪忍受的生活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贵族愿意与中产阶级分享这块蛋糕，但是这两个阶级的目光都不够锐利，没有注意到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这个阶级不但人数上比贵族和中产阶级占优势，而且不会有任何阻碍。当这个一向被人忽视的阶级——无产阶级开始像一只勇往直前去吞食猎物的猛兽一样咆哮的时候，他们就已接近了这块蛋糕。

我可以说当贵族和中产阶级发现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退缩，或者向后转。《新时代报》的社长苏沃林在三年前曾预言“春天”即将到来，并且因为预先享受到春天的香气而喜悦，而这时却变成了一个骗子，每天高喊着：“我要一部宪法，但是为了俄国的利益，一切都应当遵照皇帝的意志和我们这些有十万卢布收入的人的意志行事。”总而言之，几百年来贵族们都在梦想宪政的施行，但完全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着想。当他们发现宪法决不会是贵族的宪法时，他们就接受了如杜勃罗文、普里什凯维奇这一班恶棍以及别的黑色百人团领袖们的政治信念了。

先前我已经提到过，帝国中的非俄罗斯民族占全人口百分之三十五，当这些异族人看到这个大变乱的时候，他们就昂首挺胸，

认为实现他们的梦想与愿望的时机已经成熟。波兰人要求自治，犹太人要求平等的权利，不一而足，他们都渴望消灭苛刻的压迫制度。而更危险的是军队不稳定的士气。对日战争的节节失败使得军纪松弛，士气低落，士兵们责难政府，他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此外，复员方面又发生很多的困难。因为东方的战事需要大量的兵力，俄国欧洲方面的兵力已减少到最低限度，所以当和约签订时，政府认为履行原来的诺言，即把战争期间征集的全体士兵复员是不合适的。士兵们为政府不遵守诺言所激怒，许多地方发生兵变，时常有些小部队受革命党首领的唆使而与政府作对。许多官员从这些叛乱事件得出了军队都是不可靠的结论，对于把驻在东方的军队调回来怀有深深的忧虑。就是这种恐惧心理导致了拟定了一项至少保留一部分东方部队驻在西伯利亚的计划，以酬劳战功为名，分给兵士们土地以换取他们的服从。

无政府主义分子把目标指向杀害政府官员，各高等教育机关，大学里都发生了暴动和各种各样过激的行为；军队中的纠纷；农民和工人的暴乱，包括破坏财产和凶杀；最后是罢工。这些都是当局必须应对的情况。1905 年 10 月 8 日，联结莫斯科的各条铁路运输完全停顿了。两天之后，罢工风潮就蔓延到铁路联结点的哈尔科夫，到 10 月 12 日，联结圣彼得堡的各条路线也被封锁了。接着其余各条铁路线的运输也都停顿。到 11 月 17 日，几乎全国的铁路网和电报都陷于完全瘫痪的状态。与此同时，俄国的各大工业中，几乎所有的工厂和工场也都停顿下来了，在圣彼得堡，工厂的罢工始于 10 月 12 日，到 15 日京城的实业业务完全停顿了。

所有这些灾难在同一时间里纷至沓来，折磨着这个国家，结果造成可怕的混乱以致于人们可以说，俄国必须结束这混乱的秩序。人民的呼声是："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我们必须推翻这个狂暴的现政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无论是思想上的或行动上的，不是少数几个而是成千上万个领袖与斗士正从各个阶级兴

起。虽然这些人毕竟只占全体人口的极少数，但他们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因为几乎人人都同情他们并希望他们成功。

圣彼得堡这个全国的文化都市拥有大量的工业人口，便很自然地成为了革命风暴的中心之一。工人代表会议（苏维埃）就是在那里产生的。组织这样一个机构的思想始于十月初旬，报纸开始在都城的工人中间鼓动建立苏维埃。10 月 13 日，苏维埃的第一次会议在工艺学院召开。这次会议向都城的工人们发出一项鼓励他们罢工和提出极端的政治要求的呼吁。第二天又在同一地方召开第二次会议，选出了一个名叫诺萨尔的犹太人律师作为苏维埃的主席。诺萨尔为了宣传，化名为赫鲁斯塔列夫在切舍尔工厂中当纺织工人。几乎所有的圣彼得堡工人，对于这个苏维埃的决定都完全遵照实行。10 月 15 日，苏维埃又在原来的会场开会，有几个教授和少数其他自由职业者参加了这次大会，他们都积极参加讨论。第二天，因为政府颁布了新的关于公共集会事宜的规则，各级学校校舍都关闭了。因此苏维埃这一天未能开会。10 月 17 日，苏维埃在"自由经济学社"的会堂开会，这时这个苏维埃拥有二百多名成员。

1905 年 10 月 17 日颁布了极具历史意义的全国宪法。就在这一天，一个革命机关报《工人代表苏维埃公报》开始由几家印刷所轮流刊印。当然，这并未得到印刷所主人的许可，因为他们决不是革命党人。

当我最初就职的时候（10 月 18 日），这个工人苏维埃乍一看是一个相当大的人民团体，因为它得到包括印刷工人在内的工人群众的支持。印刷工人听从它的指挥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情报，因为这意味着在相当程度上所有报纸都受苏维埃的控制，因为报纸的刊印终究要依靠印刷工人工作的意愿。印刷工人对苏维埃的热心直接影响到《新时代报》的编辑兼发行人苏沃林。这一家大报首先是一个获利颇丰的企业，它的老板向来就是这样看

待它的。苏沃林是一个干练的出版家，又是一个爱国者，但随着他的利润的增长和拥有巨额财产，他就日益愿意牺牲他的理想与才能而把精力集中于营利方面。他最初从事于新闻记者行业时，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到他死的时候，竟拥有约五百万卢布的财产。在他死前几个月，他还表示对俄国不满。他抱怨说，如果他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他早已积蓄了几千万卢布的财产，可是在俄国，他只有可怜的两三百万卢布的财产。

工人苏维埃在10月18日开会，决定发动一次大罢工，表示工人们对宣言的不满。然而莫斯科以及其他各地的罢工运动这时已渐趋衰微，而铁路运输不久就恢复了正常运营。鉴于这种情势，苏维埃在其19日的会议上决定两天后复工。在宣言公布后的几天里，都城街道上不断发生革命党人为一方，军队、警察和反革命分子为另一方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死伤了数人。圣彼得堡大学的塔尔列教授就在工艺学院附近头部受了伤。苏维埃企图在为死亡工人举行葬礼的时候组织游行示威，但政府不许。10月17日以后，我下令允许进行对宣言表示意见的和平游行，但对于有破坏公共秩序的暴乱嫌疑的示威行动，则予以镇压。想借工人葬礼而举行的示威游行，显然是有意引起骚乱，所以我就下令禁止。

大致说来，10月17日以后的几天，圣彼得堡就平静下来了，在我当总理大臣的六个月中，对于圣彼得堡城及其辖区，未颁发过一次紧急法令，也没有宣判过一次死刑。后来斯托雷平又开始实行推翻10月17日的改革的政策，又采用各种非常的手段。

我遭人责难的理由之一，就是在我当总理大臣期间未曾枪杀足够的人，并严禁部下随意屠杀。他们认为一个不喜杀戮的人是不能担负责任这样重大的职务的。但我却认为这正是我的一项特殊功绩，因为在我当权的六个月中，圣彼得堡城内只有数十人被杀，并且没有一个人被处死刑。整个俄国在这几个月中，法律被普遍推行，判处死刑的人比斯托雷平当政的几天中所杀的人还少。

历史将谴责尼古拉二世在位时期的那种做法，即不问男女长幼，无差别地由军事法庭审判，因政治罪在死刑之前还监禁三年、四年，以至五年之久。

但是在俄国的其他地方，为宣言而举行的游行示威往往引起骚乱。例如10月26日在喀琅施塔得就发生了暴动，这到10月28日才告平息。喀琅施塔得是由海军部管辖的城市，革命势力特别猖獗。水兵的反抗精神比陆军更为根深蒂固。即使在10月17日以前，塞瓦斯托波尔的全部水兵、尼古拉耶夫和喀琅施塔得的一部分水兵所发表的军事宣言就表现出这种精神。革命精神在水兵中间日愈激昂，这不仅因为海军当局管理不当，还因为海军都是从知识比较高的阶层中征来的，比较容易接受革命宣传。在这些日子里，广大人民群众正进行着革命化。

宣言的公布引起了全国各地许多欢欣鼓舞的游行。同时也有所谓黑色百人团主使的反宣言的游行。黑色百人团之所以得到这个名称，不仅是由于他们的人数少，并且都是一些流氓无赖。但由于在某些地方得到地方当局的支持，所以声势日增，后来从事对犹太人的屠杀。而且，因为极端左倾分子对于宣言缺乏必备的改革精神心存不满，力图致力于掀起暴动，而没有遭到自由主义者的强烈的反对，于是右翼的流氓无赖即黑色百人团很快就获得中央政府、甚至更高权威的支持了。

这些人建立起与警察局有关的一个印刷所，专印关于鼓动屠杀犹太人的各种宣传品，目的在于激发大多数无知的民众去反对犹太人。这件事是前警察局长洛普欣报告我的，此人现已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我听洛普欣报告后，随即取缔了这个印刷所。但各省中这种活动仍然在进行。我任总理大臣时期，在哥美尔还发生过一次屠杀犹太人的事件。这次暴乱是由宪兵队牵头发展起来的。我发现这个可耻的事件后就立即报告给大臣会议，皇帝则在关于此事的备忘录上谕示，说这类事件不必向他报告（因为是很小的

一件事）……在这件事上，皇帝一定是受了内务大臣杜尔诺沃的影响。

罢工结束之后，自10月27日起，有几个工厂开始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工人苏维埃利用这个机会宣布强制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制度。苏维埃觉得它正在逐渐失去在工人中的威信。11月1日它号召举行第二次总罢工，强调以此作为抗议在波兰实行军事管制和政府镇压喀琅施塔得骚乱的方式。我得到这消息后，就在当天晚上立即打电报给几个工厂的工人，警告他们不要服从那些明明是在引导他们走上毁灭和饥饿道路的人。我在电报中向工人们说我是以同志的态度忠告他们的。一个政府的首脑使用这样的措辞对工人们说话是非常罕见的。有些报纸，包括《新时代报》在内，就抓住这个辞句来说挖苦话。另一方面，工人领袖们感觉到我的话对于工人的影响，而变得愤怒起来。然而，罢工最终未能成功，工人们不再听从苏维埃及其领袖们的号召，因此，到11月5日，苏维埃又决定复工。大体说来，到11月7日罢工风潮已完全平息。皇帝在同一天写了一个字条给我说："我很高兴这个毫无意义的铁路罢工结束了，这是政府的一次大胜利。"

11月13日，苏维埃又考虑宣布一次总罢工的议案。但未获通过，苏维埃也"暂时"克制一下，停止强迫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从这时起，苏维埃的权威开始迅速衰落，它的组织也逐渐涣散。此时，我发现逮捕诺萨尔的时机到了，并在11月26日将他逮捕。因此，苏维埃选了三个人组成主席团来代替诺萨尔。这个主席团举行秘密会谈，而苏维埃则始终未再召开。本来很早以前我就想逮捕诺萨尔，但李维诺夫—法林斯基劝我不要这样做。此人现在负责管理工商业管理总局的某一部门。他主张未得到工人赞同之前有必要延缓这种行动，也就是说，等到诺萨尔与苏维埃完全失去威信的时候才逮捕他。这样，我们可以避免与工人们发生不必要的流血冲突。这个意见颇有道理。诺萨尔被捕以后，我下令逮

捕全体苏维埃的成员，到12月3日，杜尔诺沃执行了这条命令。在逮捕之先，杜尔诺沃担心分别逮捕会使他们分散逃避，所以便等候他们开会时再一起抓捕，而苏维埃开会的时间也总是没有准信。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这种担心是有充分理由的。12月3日当他们在自由经济学会会堂中开会时，全体会员共一百九十人全被包围逮捕。原来诺萨尔被捕之后，苏维埃曾筹划总罢工以示抗议，但他们的企图终成泡影。

工人苏维埃与其领导者诺萨尔的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这件事被报纸大加渲染，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包括印刷工人在内的这些罢工也使新闻行业的盈利受到损失。自然而然，在新闻记者中间也有同情“工人革命”的，不过那些人都是极度无聊的记者，大多数是一些空想家。革命这种事情随时随地都会产生这样一些狂妄的理想主义者。

1905年以后，俄国就没有发生过严重的罢工。革命时期的罢工运动使工人们对于诺萨尔那样的领导人采取一种非常怀疑的态度，同时也给雇主们以教训。这些雇主们多少已改善了工人们的状况。政府方面也获得了一些经验。今年，政府不顾国务会议与国家议会中实业界代表们的反对，毅然试行工人保险法。这项法律实际上在二十年前我当财政大臣时就已通过了，但遇到了重重障碍，迟迟未能实现。然而这次革命看来没有给予宪兵以及秘密警察们任何教训。就在这一年，如果我记有没错的话，一个名叫捷列辛科的宪兵队长枪毙了二百多名勒拿矿工，尽管这些工人是在忍耐了多年之后，只不过想用和平手段来改善他们那不堪忍受的生活状况。地方当局显然是受了金矿公司的巨额贿赂，而对于它的掠夺贪婪则毫不阻拦。内务大臣马卡罗甫还想为这次宪兵屠杀矿工事件加以辩护，在国家议会中提出一篇强词夺理且颇为虚伪的报告，末尾竟有这样可恶的感叹：“这种事情下不为例”。自然，即使不是预言家也可以断言，要是这类事情（如冯·普列维所

筹划的、加邦所做的事件）是真的，那么，对这类事情的策划不能永远存在下去也同样是真的。一个在其治理下竟会发生这类屠杀事件的政府决不能长久存在，10 月 17 日便是这个政府走向坟墓的开始。

我辞去大臣会议主席之后，有几家报纸造谣说我曾接见苏维埃的主要领袖和他们率领的代表团，有些黑色百人团的领导人责备我与苏维埃及革命党人串通一气。另外有些人甚至说苏维埃是由我自己创立的。《新时代报》对于散布下述这个愚蠢的笑话应负主要责任，这个笑话的大意是说：在我任总理大臣期间有两个政府，一个是维特伯爵的，一个是诺萨尔的，在一段时间里不能确定谁将逮捕谁：是维特逮捕诺萨尔，还是诺萨尔逮捕维特。

对于这些流言蜚语，我想在这里声明一句：我生平从来没有把诺萨尔放在眼里，也从来没有和苏维埃或革命党人有过任何联系。此外我也从未接见过这类苏维埃的成员。如果他们要来见我，我就打发他们去市长那里。总之，我认为这个苏维埃是微不足道的。它只不过对圣彼得堡地区的工人们产生了一点影响，在我看来，以此作为它有任何政治上的重要性的依据，是非常可笑的。当我认为逮捕它的成员的时机到来时，我就毫不犹豫地做了，不用流一滴血。又有谣言说关于我与苏维埃勾结一事，几种有嫌疑的报纸都是在内务大臣的掌握中。不用我多说，这些谣言纯属虚构。

但是，革命运动的主要中心不是圣彼得堡，而是古城莫斯科。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莫斯科就已成为反对派的大本营。莫斯科是激进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的培育室，从这个意义上说，莫斯科超过了官僚政治的圣彼得堡。

莫斯科的市长是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德洛维奇亲王和特列波夫将军。这两人只会把各阶级的人民都赶进那个真正的全国反对派的怀抱中去。这个反对派是由受到挫折的保守思想与不公平的

物质利益所催生的。莫斯科是地方自治会议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产生那些注定要组成革命阵营的参谋本部的领袖之地。

谢尔盖·亚历山德洛维奇亲王被刺之后，政府任命前任警察总监科效洛夫将军继任他的职务。科效洛夫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物，人人都尊敬他，但不幸因与特列波夫将军不和而被迫辞职。因此，由索尔斯基伯爵请求，挑选了杜尔诺沃，杜尔诺沃在此之前由伯爵提携进入国务会议。他是一个富有的将军，曾做过圣彼得堡市议会的主席，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与古代暴君的奇特混合的人物，实际上完全不适宜担任任何重要的事务，也不能得到该城社会团体或党派的同情或支持。他在莫斯科茫然不知所措，也不知道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后来竟变得那样的糊涂以致于有人告诉我说，有一次革命党人作乱，他不知如何应付，他穿着副官长的制服，脱掉军帽去广场向聚集在红旗下的革命群众讲话。

包括贵族与商人阶级的代表在内的莫斯科群众都在公开地或者秘密地反对政府。莫斯科的一些百万富翁不但对立宪运动慷慨捐助，而且也同样资助革命者。实业之王萨瓦·莫罗佐夫通过一个与马克西姆·高尔基同居、而又被莫罗佐夫所迷恋的女演员送给革命党人几百万卢布。我记得，1905 年初，莫罗佐夫打电话给我要求拜见我，我答应了他的请求，他于是对我说了一些极端的意见，大意是我们必须废除专制政体，实行一种议会制度等等。因为我已和他相识多年，而且又是他多年的老上司，我就用手拍着他的肩对他说："因为我希望你好，所以我给你这样的忠告：专心做你自己的事吧，不要管革命的事……"莫罗佐夫显然吓了一跳，但我的话使他清醒了一些，他对于我的劝告表示感谢。后来他在莫斯科因某个罪行被当场逮捕。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警察暗示他最好是到国外去。后来他在国外被完全卷入了革命之网，并以自杀收场。

另一个莫斯科的实业界领导人物克列斯托弗尼科夫，是英斯

科股票交易委员会的主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在宪政宣言公布后不久来见我。他来访的目的是要求我减低帝国银行对期票交换的折扣率。当时国家正处于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我国金属本位制的稳定只是靠我借得的一笔外债来维持。我没有向他解释俄国的财政状况，只是告诉他说我不能答应他的要求。他失望地用手托着头喊道："给我们成立国家议会，尽快召开国家议会吧！"像一个疯子一样冲出了我的书房。在那些日子里，社会上一些著名人士对当时局势的误解程度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国家议会选举法早已被众人所知，但是资产阶级的一位著名代表竟幻想一旦召开国家议会，我就会制定有利于资产阶级利益的措施。当国家议会未能实现各有产阶级的希望时，他们就放弃了自由主义的主张，这些迷途的羔羊重新回到了专制政体的羊栏里来。

莫斯科政府无力控制事态的发展。他们耳目既不灵通，办事又缺乏效率，只是一味逃避责任，谋求个人的安全而不敢抗拒即将到来的革命。莫斯科农民代表大会的事件就足以说明俄罗斯古都的情形。我听说这个代表大会决定采取强迫无偿没收私人地产的政策。总之，这大会召集的目的是公开宣传极端的革命思想。我当时以为当地总督会禁止代表大会的召开，或者提出此事和中央政府商议，然而我从报纸上得知这个代表大会已经召开了。我打电报给当地总督，警告他这个代表大会的性质令人警惕，但我一直都没有收到回电。最后这个大会在已经开了多次会而且成功地广泛宣传了许多革命的思想之后才被警察禁止。当局之所以这样松弛多半是由于害怕革命党人进行恐怖报复的缘故。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一个关于莫斯科局势消息的私人来源。在我任西南铁路公司经理的时候，有一次一个我曾在朋友家会见过的少妇来见我，含着眼泪恳求我给她一份工作以维持生计。我把她安排在铁路管理局的某一单位当职员。过了几年我又在圣彼得堡遇见她。宪政宣言公布后几个星期，有一位夫人来见

我，自称是莫斯科一个著名法官的妻子。我认出她就是多年前我曾帮过一点小忙的那个女郎。她告诉我她有一个女友现在和一个青年发生了恋爱，这青年是革命党中的重要人物，通过这个朋友她得知革命党人的计划。她说莫斯科城里正在准备用各种惯用的手段如设置防栅等来进行一场真正的武装暴动。革命党人了解地方当局与守军的腐败与恐慌，所以他们想乘当局未警觉之前便给予打击。她最后表示她之所以告诉我革命党的阴谋，一则是为报答我的恩惠，二则是为救她的朋友。

我被她的话所感动了，便敦促皇帝从速任命一个可靠的莫斯科长官。当时莫斯科城中的革命风潮日趋高涨。我从那位夫人得到的消息也愈来愈令人担心了。11 月 9 日（公历 9 月 22 日）那天，在皇帝的亲自主持之下召开了大臣会议，会终，皇帝刚要离去，我就请他暂停一刻，对他说，除非任命一个果断有力的人去管理莫斯科，否则恐怕这城就要落入革命党人之手了，如果真成那样，莫斯科将成为全国混乱的信号。我坚决要求立即任命杜巴索夫将军为莫斯科总督。皇帝允许了我的要求。杜巴索夫就在叛乱爆发之前的几天到达莫斯科。不久他要求我调更多的军队去援助他。陆军大臣报告我说，三天后就有一个团从波兰调往莫斯科。后来因为革命党人破坏了该团一部分人所乘的列车，所以该团未能如期到达。在这个团到达以前，杜巴索夫将军又要求从圣彼得格勒调兵。据他向我报告，他当时手下的兵力仅能保护各火车站，而莫斯科则完全没有兵力防守。我便立刻打电话给特列波夫将军，请他亲自去报告给皇帝，说我认为如果我们还想保住莫斯科不使它落入革命党人之手而遗祸无穷的话，就请立即派遣军队到那里去。晚上，特列波夫将军通知我说，皇帝要我去见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劝他派兵去莫斯科。我于是遵照皇帝的旨意去见亲王。亲王承认杜巴索夫将军手下的军队很少而且士气低迷，但是他说他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保证皇帝个人和皇族的安全，如果他

的兵力被分去一部分，恐怕会危及皇帝本身。至于莫斯科城，他愿意听任它遭到毁灭。他说，这地方不就是革命的策源地吗？我争辩说，圣彼得堡实际是很安全的，而莫斯科则已危在旦夕。我们的谈话持续了几个小时，天亮之前，有一个廷差拿来皇帝写的一张给亲王的便条。亲王念了便条说："皇帝要我派兵往莫斯科，我将遵命去办。"我敦促他赶快办理就匆匆告辞了。这次派往莫斯科的军队包括差不多是谢缅诺夫团的全部以及一部分骑兵和炮兵。我知道这次镇压叛乱将非常麻烦，而谢缅诺夫团的士兵也过于残暴。但是这只能归咎于民政当局未能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也没有防止当地军队的风纪败坏。杜巴索夫将军无疑是莫斯科唯一头脑清醒的人，由于他的胆略与诚意，终于使该城转危为安。暴风雨过后，圣彼得堡的部队又调回去了，杜巴索夫将军呈请皇帝宽大为怀，不要用军法审理那些被捕的暴徒。皇帝征求我的意见，我也表示赞同杜巴索夫将军的意见。在我们两人任职期间，莫斯科的革命党徒始终由民事法庭审讯，虽然内务大臣杜尔诺沃主张由军事法庭审讯。

众所周知，有人企图密谋刺杀杜巴索夫将军，但没有成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向他的马车抛来的炸弹把他的副官科诺弗尼岑伯爵和马车夫都炸死了，而将军本人却未受伤。我辞职之后，他也辞了职。皇帝虽然未曾为难他，但对他也很冷淡，因为杜巴索夫有几次发表了与皇帝的意见相左的意见。1907 年，又有一个年青的革命党徒密谋刺杀杜巴索夫将军未遂。这件事发生后几小时我就去探望他，他十分镇定。他唯一非常担心的是对他开枪的那个年青的命运。他怕斯托雷平的军事法庭会立刻把这个刺客处死。他对我讲："我不能平静，我眼前总有那双稚气而善良的眼睛，害怕得发狂了。要把这样无辜的青年处死是件罪过。"接着他把他呈请皇帝赦免这少年囚犯的信读给我听。第二天皇帝答复说他不认为他有权妨碍新设立的军事法庭管理的独立以及不可改

变的司法程序。我不知道应该把他的这种答复归之于狡猾还是稚气，但是皇帝对于迫害犹太人和激进派分子的罪犯却并不认为是不可宽赦的。

不用说，这次因企图叛变而牵连被捕的人都立刻被处以死刑。为了使得前面述说的那个故事完整，我不妨附带说明：那个无意中泄露了革命党徒计划的夫人和她的爱人顺利地逃到外国去了。



第十一章　挽救俄国的借款

我到美国去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归来后不久，有一次和国务会议主席季米特里·索尔斯基伯爵作了一次关于俄国内政的推心置腹的谈话。他一再说："伯爵，只有你才能挽救这个局势。"他听我说想尽力离开国家政坛，到国外休息几个月的时候，他竟流下泪来，责备我太自私并且缺乏爱国心。他呼喊起来："到外国去！我们这里将会被全都毁灭了！"

因为不愿逃避对于君主和国家的责任，我没有到国外去。尽管我明知工作艰难而且徒劳无功，但我仍然负起了当政的重任，维持了政府的稳定长达六个月之久。10月17日宣言发表后，我立即被任命为总理大臣，根据这项宣言，俄国人民获得各种公民自由与代议制的政体。

1905年10月，政府既没有军队也没有经费来与革命斗争。我很快看出来只有两件事可以挽救皇朝，使俄国得以度过革命的风暴，那就是借一笔大的外债和把在贝加尔湖以东及满洲的军队调回我国的欧洲地区。除此之外，再加以政府决心履行宪政宣言中的各项诺言，我确信国家是可以恢复稳定的。

在我担任总理大臣的时候，我国的军队约有一百万人都远在满洲。在国内的一些部队，无论是人员和装备都十分地空虚。事实上庞大的俄国陆军几乎都处于体力完全衰弱、士气十分沮丧的状态。当时全国人民都怀着普遍不满现状的心理，由于军队是通

过普遍征兵制建立的，军队自然也就沾染了这种心理。我国不负责任的当政者使全国陷入这一灾难性的战争，士兵们比一般民众更为敏锐地感受到由这场战争所引起的苦痛与耻辱，所以军队确实成为滋生最极端的颠覆性思想的肥沃土壤。应该提到，军队中实际叛变的事件并不多见，这也许要归功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镇压得力了。

在我被任命为总理大臣的几天之前，我和陆军大臣以及当时的圣彼得堡卫戍司令特列波夫将军商谈，目的在于确认：如果我们决定以武力镇压革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军队。这次商谈给我的印象是：我们的军队是不可靠的，第一是兵力有限，第二是军心不稳。这个情况也许就是皇帝之所以决定走改良道路而不一味完全使用武力的原因。我找不到他做此决定的其他理由，因为他和所有懦弱的人一样，是最相信实力的。

朴次茅斯条约签订以后，规定必须解散为继续战争而征召的预备兵。这些士兵都是一些最惹麻烦的分子，他们在外贝加尔区以及俄国欧洲地区的驻军中传播着革命思想，所以我立即让他们复员了。结果，由我掌握的军队的数量减少了，但随时可以从军队中清除叛乱分子。这样，俄国欧洲地区实际上没有军队，只有圣彼得堡、华沙和高加索军区还保有可以调用的充足兵力，但因这些地区的战略地位险要，要将他们的部队调去支援其他地区，其长官是非常不情愿的，而俄国中部几乎完全没有军队驻守。这次军队大规模遣散致使军事当局本身都不清楚还剩多少可用的兵力及其驻扎地点。后方大多数部队的兵员都远在正常水准之下，而军事当局对于部队减员的程度也往往一无所知。例如，应某一地方政府的请求，在拖延很久以后才派遣一营士兵赶赴该地镇压农民暴动。但不久我们就接到该地方政府的报告，说所派的一营兵实际上只到了大约十几个人。我们再向陆军当局探究，才知道这个营的大部兵员还在前线。我记得，这样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我后来才知道这种混乱的状况是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将军办事的结果。

因为我们既没有军队也没有乡村警备队可供调遣，所以不可能对农民的骚动作任何有效的镇压。在我任总理大臣时期，才将城市和乡村的警察部队予以增加和整顿。但有些地方骚乱猖獗，却完全没有警察部队，就连莫斯科的警察装备也是很差的。常有这种情况存在：当警察出勤的时候，他们的全副武装不过是一些空的手枪套子。

因为许多地方的政府已经腐化，我想出一个把皇帝的高级副官们派赴局势最危急的地区去的计划。因此，派萨哈罗夫副官长到萨拉托夫地方政府去，斯特鲁科夫副官长到坦博夫和沃罗涅什的地方政府去，杜巴索夫副官长到契尔尼哥夫和库尔斯克的地方政府去。杜巴索夫将军办事很得力，但又不招惹任何人的嫌怨。他对于农民骚动的广泛性与严重性，有深刻的了解。我记得，他曾极力劝我不必等待国家议会召开就颁行一项法律，将农民们以暴力夺取的土地判定为他们的合法财产，他认为这样可以平息农民的动乱。他说，这对于地主们也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否则农民们会夺取他们的全部私有财产，寸草不留。

农民暴动是由于俄国的特殊情况产生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社会主义者的宣传所引起的。全部社会主义的教义，从托尔斯泰的基督教共产主义到简直是抢劫的代言词的无政府社会主义，在形成革命运动的过程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有这些教义都否认罗马法所规定的财产权。在过去的五十年里，社会主义的思想传遍整个欧洲，势若燎原。俄国之所以成为这些思想滋长的肥沃土壤，是因为它的政府不断侵犯人民的各种权利尤其是财产权，而人民又缺乏教养。革命党人允诺把工厂给予工人，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他们声称这些财产理应为人民所有。这些都曾不公平地从他们手中夺去，工人们自然以罢工响应，而

农民们便开始焚烧和掠夺地主豪绅的财产，第一届国家议会的代表赫尔岑施泰因模拟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位讲演家的口吻称这种现象为“对地主家业的清零”。

在满洲的士兵们自然很渴望返回家乡。由于俄国的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铁路工人罢工，远东与内地之间常常好几个星期都不通消息。结果种种荒诞无稽的谣言犹如野火一般在军队中传播。瓦西尔奇科夫公爵在朴次茅斯条约订立之后，经由西伯利亚归国，途中听说皇帝全家都已逃到国外去了，我和各大臣都被吊在圣彼得堡马斯广场的电灯杆上，所以在他未抵车里雅宾斯克以前，始终不知道皇帝是否还在俄国，这件事是皇帝亲自告诉我的。

据我了解，1905 年年底，前方军队的纪律已完全废弛而且沾染了革命思想。但这种现像普通人并不知道，那是因为军事当局有意隐藏这种正在腐蚀军心的瘟疫。

最初的革命浪潮起源于西部，向东流传而影响到外贝加尔的驻军。1905 年底开始了一个反方向的运动，有一些复员的士兵把革命的霉菌从前方带进内地。在这以前几个月，关于满洲军心的令人担心的消息就已传到圣彼得堡。由于这个消息的影响，农业大臣施瓦内巴赫就向大臣委员会建议把西伯利亚的国有土地分配给愿意留居当地的现役军人。但经过对这个特别提案作了一番简短的讨论之后，大臣委员会便不愿再进一步去讨论这个问题，所以这事便不了了之了。

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罢工以及士兵们的回家渴望，使中东铁路公司完全解体了，这种情形更增加了军队的不满。由于铁路工人罢工，就使得征募的新兵迟迟不能集合，也耽误了把在满洲的部队运回国。甚至有一段时期西伯利亚铁路掌握在一群匪徒和非法组织手中，他们拒绝服从政府的命令。革命党人认为一旦士兵们回到家乡，他们就会立即失掉革命的热情而变为法律和秩序的维护者，所以便千方百计地维持西伯利亚的铁路罢工。

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铁路的运输常常完全陷入停顿，往西去的军队就骚动起来。这时，电报局的报务员罢工，使局势更加混乱。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军队仍离俄国中部很远，兵力的缺少使国内外的情势愈趋复杂。我一再向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陆军大臣和总参谋长帕利金说明形势的严重。他们的答复也很正确，他们说这是现役军总司令李涅维奇将军的职责。在我担任总理大臣的六个月期间，我从这位将军那里收到的唯一的一份公文就是一封通知我有十四名（我很清楚地记得这个数目）无政府主义的革命党人已来到前方军队里捣乱的电报。我把这份电报呈给皇帝，皇帝看完还给我，在边上批着这样的话："我希望把他们都处以绞刑。"

在这个时候，我想出一个办法，就是专备两列军列，一列自哈尔滨向西开行，一列自俄国欧洲部分向东开行，由两个坚决果断的将军指挥，命他们负责维护西伯利亚铁路的正常运输并排除一切妨害铁路正常运输职能的障碍。皇帝很赞赏这个意见，并采纳了我的计划。麦列尔—札科麦尔斯基将军被任命为由莫斯科东下列车的长官，而自哈尔滨西上的列车则由伦南卡姆夫将军管理，同时命令这两位将军不惜任何代价恢复正常的运输以及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秩序。两人勇敢地执行任务，并获得显著的成功，两列车在赤塔附近相遇。当然，执行这种非常的措施不得不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当时赤塔地区完全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在到达该地之后，伦南卡姆夫将军便要把一大批人处死。就在他正在着手恢复赤塔秩序的时候，我的妻子忽然惊惶地拿着一封从布鲁塞尔以赤塔的俄国革命团体的名义发给她的电报给我看。电报原文如下："如果你的丈夫不立即命令伦南卡姆夫撤销所判处的死刑，我们就把你的丈夫和以下诸人（名字列在下面）处死，而你的女儿和外孙也将一同被杀。"当时我的女儿和她的在俄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任职的丈夫纳雷什金住在布鲁塞尔，他们有一个刚满周岁的

小男孩，我和我的妻子都十分钟爱这个小外孙。我当然不理会这个恫吓，而这些革命党人也并没有实行他们的威胁。不过这件事情很能说明这些革命党人秘密联络的组织是如何的完备，而我们当时的处境是何等的艰难。

这时总司令李涅维奇被免职，格罗杰科夫将军由于我的推荐而继其后任。他终于恢复了军队的纪律，把驻在满洲的部队运回国内。他依照我的建议变更了各部队的驻地，以便对地方上的暴动和骚乱进行最有效的镇压。我的原则是以武力对付武力，采取最严酷的措施来对付公开的暴动，但同时我反对那种在秩序恢复之后数月甚至数年的时期中处决一大批人的做法。

我的另一项重大的任务便是筹集一笔外国贷款。早在 1904 年，我们迫切需要筹借一笔外债。当时我们的财政系统已逐渐不能支撑军费的重担了。1904 年我在和德国缔结第二次商业条约的时候，我成功地得到德国政府在他们国内发行公债的允许。第二年，我又努力准备在法国和为签订朴次茅斯和会而到那里去的美国发行公债。我的目的是想在国家议会召开以前签订这笔借款。因为我确实感到第一届国家议会将是紊乱的，而且带有某种程度的报复性，害怕议会的干涉可能会阻碍发行公债的谈判而使得银行家们更不易驾驭。其结果将是我们的政府由于缺乏资金而失去行动的自由，要知道，在一个动乱的时期，行动的自由是非常重要的。

我个人对于借款的事宜尤其关切。因为俄国之采用金属本位币制（1896 年）是由我筹划创立的，这时因战事所引起的财政危机以及财政大臣短视的政策，使得这种币制受到严重的威胁，这令我倍感痛苦。财政大臣想等待战争结束后才举办一笔大的借款，但他没有预料到革命的爆发会给我们的信用带来灾难性影响。

法国愿意对我们开放它的金融市场，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即法国政府要求我们必须先与日本议和。到朴次茅斯和约签订时，又发生了新的障碍，就是德法两国关于摩洛哥的争执，巴黎政府

表示，如果这次纠纷能够和平解决，借款就可以实现。在我记述德皇的一章中，我将叙述我是如何在阿尔黑西拉斯国际会议中调停德法间的这个纠纷的。这个会议延续到1906年3月末方告结束，至此借款协定的缔结才算成功。

这次借款将是国际性的，因为数额太大，法国银行家集团将担任主要的贷款人。1905年，我开始和巴黎荷兰银行行长诺伊茨林作初步的协商。自从里昂信贷公司的热尔曼死后，巴黎荷兰银行便成为所谓基督徒银行家辛迪加集团中的主要银行。另外一个银行集团便是所谓犹太帮，以罗斯柴尔德银号为首。已去世的老阿尔方斯·罗斯柴尔德男爵曾与我有很好的交情，这个家族的家长是现住在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勋爵。因此，我便训令驻巴黎的财政部代表拉法洛维奇到伦敦去探询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我们借款事宜的态度。拉法洛维奇回复说，他们出于对维特伯爵这位政治家的尊重，愿尽全力来协助我们借款，但是除非俄国政府采取立法的措施来改善俄国犹太人的境况，他们才能这样做。我因为觉得把借款事宜和我国的犹太人问题联系在一起有损于我们政府的尊严，所以便决定放弃想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参加贷款的念头。

立宪民主党人十分明白这次借款会对我们的政府起到稳定的作用，因此他们便设法在国家议会召开之前破坏我借款的努力。他们的代表，主要是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和马克拉科夫，到巴黎去活动，想使法国政府相信俄国政府未经国家议会批准的借款是不合法的。这班公众领袖是一些非常适合做那一些事情的人，如果他们回想一下这种很难称为爱国的行为，也应当感到羞愧。唯一可以为他们辩解的是在那些日子里，俄国大部分有思想的人物都处在一种着了魔的状态中。人们饮了曾经酿造了多少世代的自由陈酒，真的醉了。

至于我们的新闻界，他们一点也没有做增强外国投资者信心之类的事。举例来讲，几乎所有的报纸都登载革命党人对人民的

这种呼吁：要求他们提取在银行和地方政府银行的存款，从而迫使政府不能对外国交换信用证券而使国库所存现金减少直至破产。另一方面，外国新闻界对我们表示了很大的敌意。拉法洛维奇在1906年1月8日写信给我说："我们当前的困难在一般经济和金融性质的报纸上清楚地表现出来。虽然保罗·勒鲁瓦·博利厄先生（一个财政学权威）利用他的学术地位来向公众解说和保证，而凯尔加尔先生（《经济评论》的编辑）也在这方面热心帮忙，但其他出版物在论调上都好像被一种憎恨与快慰的感觉鼓舞着，那样的感觉只有当一个野蛮人看到他仇人的死尸时才会出现……英国《经济学家》杂志长期以来一直对我们进行抨击，该杂志正谈论着俄国金属本位制度崩溃的问题。尽管它并没有确实的情报，却宣称俄国在没有相应的黄金储备的情况下，已不得不依靠实行一种强制的兑换率去滥发纸币。其他报纸则屡次重复这样的无稽之谈：俄国为了稳定外汇率，自行购买在国外的俄国股票，这导致一部分黄金已流出国外……又说俄国沦落到不得不靠发行打折的纸币过活的地步……这些都是损害俄国信用的敌人的喊杀声。"

1905年11月，我们的货币发行已处于一种很危险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这情况报告给财政委员会。经过我的同意之后，财政委员会任命了柯科弗采夫和农业大臣施瓦内巴赫两个委员，会同财政大臣希波夫来监察帝国银行的交易，但他们并不能提出任何改善这种局面的建议。由于形势迅速恶化，而且财政委员中一部分人认为立即借一笔外债是可能的，于是我就建议柯科弗采夫到国外去，全权办理借款事宜。我明知这件事在摩洛哥纠纷解决之前决无成功的希望，但是我认为把关于当前局势政治方面的情况报告给财政委员会是不稳妥的。

柯科弗采夫于1905年12月末去到巴黎，自然，鲁维埃对他说借款事宜必须等待摩洛哥事件和平解决之后才能商订。柯科弗采夫也拜见了卢贝总统，并得到预支未来借款项下的一亿卢布的允

诺。这笔款不过是杯水车薪，因为柯科弗采夫在柏林所发行的短期债券快要到期了。于是我又要他在归国途中在柏林停留一下，设法把我们的债券延期。这次延期的事得到德国的同意，其原因是德国政府当时还不明白我所要采取的外交政策。我虽然帮助废除了可恶的比耶尔克协定，但我曾表明赞成俄德法联盟，这个联盟即使不能统治全世界，也至少将主宰欧洲。这个计划是我的主要政治思想，如果它未能实现的话，那是因为我们方面和德皇威廉的政治眼光都不够远大的缘故。

我已经述及对阿尔黑西拉斯会议的进程起着决定作用的各种势力的相互作用，以及德国如何有意拖延谈判以增加我方的困难，并对我废除比耶尔克条约进行报复。我自美国归来途经巴黎的时候，已一度就借款事项与他们进行了初步的商议。到 1906 年 1 月我决意继续进行借款的商谈。因为我个人不能脱身出国，也没有人可以托付谈判这件事情，所以我便邀请诺伊茨林到俄国来。他的来访应对公众严格保密，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倘若风声泄露，对于阿尔黑西拉斯会议和我们的证券交易都会带来不良的影响。这里我可以附带提及，自从 1903 年我卸任财政大臣以来，俄国的股票价格已跌落百分之二十了。于是诺伊茨林没有声张地来到俄国，下榻在皇庄内弗拉季米尔·亚历山德洛维奇亲王的府邸。他是在 2 月 2 日到达的，逗留了五天。在这期间，我和他作了几次会谈，并邀财政大臣希波夫参加，商妥了借款的条件。起先，诺伊茨林坚持要等国家议会召开之后才借款，经我为他解释这样的一种安排不合适，他才同意等到阿尔黑西拉斯会议结束后就立即实现借款，并且也同意借款的数额应尽可能大，以便使我们足以支撑一个足够长的时期而无须进行新的借款，并可把柯科弗采夫在德法两国的临时借款全部偿清。我原来坚持借款数须达二十七亿五千万法郎，虽然我当时已经预料到事态的发展，甚至可以说由于德国和以摩根为首的美国银行团的背信弃义，我们不得不把总

额减少到二十二亿五千万法郎（合八亿四千三百七十五万卢布）。诺伊茨林主张利率为6.25%，因为我的反对，后来定为6%，十年后借款单据可以兑换。我们同意，经营此项借款的银行团由法国、荷兰、英国、德国、美国和俄国的银行组成，也允许奥地利的各银行参加这笔借款。银行团向各方征集资金时，其利率为1.25%，集齐后再转借给俄国政府，在一年内分期交付。借款额的半数以上须出自银行团本身。此外我们又商妥各项次要细节。诺伊茨林归国后与银行团其他各家商议，他们对于我们在皇庄所协议的主要条款都表示赞同。此后我不断给他提出一些建议，一直到借款协定签订以前，他还常以私人身份要求我予以指导。

这时，德国还在阻挠阿尔黑西拉斯会议的进行。我在私下劝鲁维埃多作出一点让步，但另一方面我却授意我们的代表、驻西班牙大使卡西尼伯爵在一切场合都支持法国。德国的种种要求太不公平，以至于作为它盟国的意大利和奥地利的代表有时都支持法国。在向皇帝报告借款事宜的奏疏中，我这样讲述当时的形势：

> 我对于德国当局的行动不免有些怀疑，虽然这种怀疑也许是没有根据的。当前的国际形势是，德国得到一个良好的机会去压迫法国。俄国目前的处境不能给法国以丝毫军事上的援助。奥地利和意大利两国不会妨碍德国的行动。至于英国，在大陆上也没有力量帮助法国，从军事的观点来看，毫无疑问德国有能力给予法国一次严厉的打击，这对于德国来说是颇具诱惑力的。即使德国不想发动战争，它也可以一方面致力于阻挠它的邻居即俄国迅速从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中恢复过来，另一方面，努力向法国表明，法国唯一的生路就是与德国和解。因此，我怀疑德国之所以对于摩洛哥问题表现出这样浓厚的兴趣，必定是别有用心，因为坦白地说，这个问题和

它无关紧要。我已经注意到德国的谦恭和亲善只是空口的应酬话。

与此同时，我们的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伯爵传达给我们驻德大使奥斯滕—萨肯伯爵以这样的意见：

法国实际上已经（在这个会议上）同意了柏林最近提案中的各要点，这种退让已接近他们的极限。德皇和比洛公爵在谈到摩洛哥事件时，一再提到爱好和平的精神，目前对德国来说，证实这种精神的时候来到了。关于摩洛哥警察制度的条款，法国（在这个会议上）提出的变通办法本来足以保证警察的国际性质，德国却没有看到这一点，不顾他们历次所作的保证，拒绝接受这些变通办法，他们希望让法国另想办法去解决困难。关于警察问题，与会各国本来都没有异议，如果仅仅是这个比较琐碎的问题而导致阿尔黑西拉斯会议陷于停滞，那未免太可惜了。德皇威廉以前当着我们皇帝的面曾以坚决的信心表明为了全人类的幸福要保持和平，又要求俄国从中斡旋使德法和好。现在如果威廉皇帝决定破坏这个会议，就表明他不仅放弃了他的政治纲领，还会引起欧洲各国的恐慌，而这种恐慌所引起的多方面的后果所带来的危害不亚于发动一场战争。所以我们想他是不会这样做的。德国政府很明白，要采取某种对俄国说来最重要的经济措施，有待于阿尔黑西拉斯会议圆满结束。只有实行那些经济措施才使俄罗斯帝国政府能够采取必要的措施去彻底镇压革命运动，这场革命运动已经显示出传播到相邻各君主国的征兆。各君主国已认识到必须协同行动才能对付这些国际无政府主义的组织。目前虽

然国外盛传俄国之所以未能缔结借款协定是由于犹太人的挑拨，但根据真实的情报，我们知道，法国银行家之所以被迫不采取金融方面的行动，只是由于对阿尔黑西拉斯会议的结果还不能完全肯定。如果德皇威廉或他们的首相和你谈到摩洛哥问题时，你就照这信中所提示的对他们坦陈你的意见。

这电报中所谓犹太人的挑拨行为，是根据皇帝亲自告诉我和拉姆斯多夫伯爵的话。皇帝说，德皇威廉曾写给他一封信，其中说我们之所以不能签订借款协定，并不是因为阿尔黑西拉斯会议，而是因为犹太银行家们不肯参加贷款。我听到这话之后，便发给我们驻巴黎的代办拉法洛维奇这样的一份电报：

柏林一再力图使人相信，阿尔黑西拉斯会议绝对与我们缔结借款协定的可能性无关，借款事宜无进展只是因为受了犹太人的一贯阻挠，所以，阿尔黑西拉斯会议的结束并不能改善当前的局面。最好你将此事向鲁维埃提一提，我好把鲁维埃的意见转告给有关方面。

我上呈皇帝的拉法洛维奇的复电如下：

鲁维埃回答说："柏林方面对于现状的观察是不正确的，因为不仅是犹太人，而是所有具有见识的人都认为借款只有在政治上的云雾消散之后，也就是摩洛哥问题以保障欧洲和平的方式得到解决之后才可能实现。"我加上一句：各报纸制造出一种悲观的气氛。我觉得我们借款问题的关键在于德国皇帝。

我们的大使在给拉姆斯多夫伯爵的复电（2月9日）中说，按照比洛公爵的意见，我们之所以未能缔结借款协定并不是因为阿尔黑西拉斯会议，而是因为俄国的革命运动。至于会议方面，公爵认为我们应当劝法国再退让一点。拉姆斯多夫伯爵的回复如下：

> 从比洛公爵的话给我们留下一个奇怪的印像，就是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我们的借款和俄国的内政上面。其实这两件事要看阿尔黑西拉斯会议的结果如何而定，我觉得德国既然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俄国的革命运动对于它的影响是很大的。在你会见这位首相时，应该特别提到德国完全忽略了法国代表为了获得谅解而提出的条件。在德国首相对你辩解的言辞中，再一次清楚地表现出德国偏狭的态度。他完全忽视了巴黎政府所做出的种种让步……法国政府已把它的忍让表现无遗，所以我们无法相信能够对法国施加何种压力。如果这次会议无果而终，各国无疑都将认为会议的失败完全是由于德国的侵略企图所造成的。

鉴于德国继续制造障碍，我就利用德皇曾允许我经由奥伊伦贝格伯爵和他联系的机会，直接请求他加紧考虑阿尔黑西拉斯会议，但我的努力白费了。德皇回复我说他不能损害德国的威望而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最后他像往常一样要我对法国施加压力，使其变得更顺从。我对德国的行为感到愤懑，在一次会见德国大使的时候，我把对于此事的意见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他。德国大使听到我的话之后，便给比洛首相发去一份电报，这份电报和比洛的复电虽然都不是发给我的，但后来都落入到我的手中。大使的电文中有这样的话："皇帝陛下的政策始终是为谋求和平、协调与信赖。但是不能为了这种原因，我们就牺牲那些处于危险中的我

们业已牢固掌获的权益。这次会议的失败及其引发的各种后果并非不能避免，只要法国能够同意那些充分按照国际公法规定的条件就行了。”这位首相在他的复电中说到，德尔卡塞的免职，正如我所坚信的，并不是对德国的让步，而是“法国内政上的一个事件。”

几天以后，鲁维埃内阁垮台，由萨里昂继任组阁。在此期间，巴黎的《时代报》和德国的报纸之间发生了一场轰动朝野的论战，论战的起因是因为《时代报》发表了一篇关于俄国政府给卡西尼大使训令的文章。据拉姆斯多夫伯爵给我的解释是说这事件起源于德国人散布的谣言。德国首相散布这些谣言已经有了一段时期了，其目的是想阻挠阿尔黑西拉斯会议的进行并离间与会诸国之间的关系。

萨里昂内阁刚刚成立，我就命拉法洛维奇去拜访财政部长普安卡雷，向他报告关于借款商谈的现况，同时我也让诺伊茨林去和普安卡雷部长商议我们借款的事情。3 月上旬，拉法洛维奇先会见法国外交部商业领事局局长亨利，不久又见到财政部长本人。拉法洛维奇先对这两位政治家大致说明了现状之后，就依照我的意见声称我和鲁维埃两人间已经有了一个正式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我将尽力调解摩洛哥问题，而法国政府在阿尔黑西拉斯会议圆满结束以后，将尽力帮俄国借款，关于借款协定的基本条件，我和诺伊茨林已经商妥了。

新成立的内阁尤其是普安卡雷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善意的态度，并花费了一些时间来研究这项问题，但是他们不能改变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在阿尔黑西拉斯会议结束以前，是无法谈到借款问题的。后来，尽管德国进行了种种阻挠，这个会议终于和平结束。3 月 16 日，拉姆斯多夫伯爵写给我的一封信说：“我从一个很可靠的来源（比洛首相给舍恩大使的信）得知冯·比洛认为阿尔黑西拉斯会议的结果很圆满。他现在是要想使全德国相信他已获得德

国所期望的全部成果了。”在此之前不久，诺伊茨林就报告我，一旦会议圆满闭幕，我们应在4月10日（新历）派代表到巴黎，把协定写成最后确定的文本并与银行团签定合同。诺伊茨林在信中又说普安卡雷屡次质问，俄帝国政府未经国家议会批准而订立借款协定的权力是否合法。我回复他说，到订立协定的时候，我将提出关于这种权力的合法证明。于是我要求闻名全欧的国际法权威，现任内务部会议成员马滕斯教授审查这件事。马滕斯教授用法文作了一篇备忘录，证明帝国政府完全有权进行借款事宜。我把这份文件转交给在法国负责与银行团签订合同的我国全权代表。我也将诺伊茨林建议我们在缔结协定之前和新闻界协商的意见转告给拉法洛维奇。

后来，会议即将圆满结束的形势已经很明朗，我便请求皇帝派遣一个特别使节到巴黎去，负责决定条约中几点次要的问题和签订合同。我原本推荐现任商业部长的季马舍夫，那时他是帝国银行的总裁，但皇帝却任命了柯科弗采夫。

诺伊茨林随即到伦敦去，和伦敦各银行的代表雷维尔斯托克、德国门德尔松银行的银行家菲舍尔以及美国的老摩根商谈。3月22日，他发电报告诉我商量的结果。他说，德国各银行的代表正等待他们政府的许可，才参与借款，而摩根的态度是不大赞同。我们记得在美国期间曾得到这位美国银行家参加这次借款的允诺。第二天，诺伊茨林从伦敦发电报给我，说菲舍尔告诉他，德国政府已明令禁止德国银行参与借款。这样，德国起先之所以拖延阿尔黑西拉斯会议，就是希望我们因不能借款而停止以证券自由兑换黄金，这样俄国的财政就会恢复到金属本位制以前的状况，俄国完全受柏林的证券投机交易的支配，而德国可以从中获得很大的利益，但这次它失败了。在这借款协定即将订立的最后时刻，德国竟背信弃义地下令禁止本国的银行家们参与借款。摩根也仿效德国拒绝参加。这位美国银行家得到德皇的嘉许，他不顾一个

美国人应有的民主意识，而去重视一位帝王的眷顾。

我给诺伊茨林以如下的答复：

> 我曾警告你留心德国的意向。柏林正在等候找到一个借口来和我们为难，它最近所采取的这个步骤主要是为了对阿尔黑西拉斯会议和俄英和好进行报复。在这种情形下，其他参加借款的各国没有理由减少他们原定的款额；相反，他们按理说来应该增加借款额。同样，我们也没有理由延迟办理借款事宜；而是应当比原定日期提早订立协定。

尽管德国各银行不能加入银行团，但我确有把握知道德国金融市场会私自对我们开放。我特别信赖门德尔松银行，因为这家银行与俄国的金融利益已将近一百年，它的行长埃内斯特·门德尔松同我有十分亲密的友谊。3 月 24 日夜间，我给拉法洛维奇发了如下的电报：

> 德国出于报复在阿尔黑西拉斯会议上的失败，又恐怕借款成功会使我们和法国联合得更紧密，并且由此奠定与英国和好的基础，所以到了这最后关头，竟拒绝允许德国银行家加入国际银行团。为了找一个好像有理的借口，德国政府出人意外地发行了一项公债。但两星期之前，门德尔松奉了他们政府的命令到圣彼得堡来的时候，还没有发生拒绝给俄国贷款的问题。德国政府临时采取这样的手段，以图破坏俄法关系的行为，仿佛是在告诉我们："你们一向都支持法国，现在让你们知道自己已经做错了。"请你把这种阴谋以适当的方式告诉给法国新闻界。

虽然德美两国拒绝参加借款，但这对英国人毫无影响。菲舍尔的声明发表以后，诺伊茨林立即发给我一个电报说明这个情况。阿尔黑西拉斯会议可谓是多年来英俄日益接近的初次表现。在这次会议中，英俄两国全力支援法国，其完全一致的精神，给全世界作了一个好榜样。奥国银行并没有退出，意大利的确没有参加，但纯粹是出于本国财政上的原因，它刚刚稳定了它的财政体制。数年前，意大利国王来到俄国时，赠给我一枚意大利金币，说这是意大利造币厂铸造的第一枚金币，作为送给大俄帝国采用金属本位币制的第一人的最合适的礼物。

3月20日那天，我接见柯科弗采夫，亲自对他解释借款的详细情况。我还交给他一份文件，其中详细列举了我们所同意的各项条款，同时对于他此去的公务又给以最明确的指示。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他于3月26日启程去巴黎，同行的还有债务问题专家、我以前的财政部的同事维什涅格拉德斯基，有他参与此事可以保障我们不至于造成重大错误。4月3日，借款合同就由俄国的全权代表柯科弗采夫和国际银行团的代表们签订了。几天之后，我们的使节便携带合同文本回到俄国，先把合同交给我，随即由财政大臣希波夫提交财政委员会，经过该会审核通过之后，呈请皇帝批准。

德国的主要银行门德尔松银行的总经理埃内斯特·冯·门德尔松·巴托尔德托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带给我一封于4月5日（公历18日）写的信：

借维什涅格拉德斯基先生途经此地之便，托他带给您这一封简略的信，以庆祝您此次伟大的成就，并对终于圆满完成这一重大事务表达衷心的祝贺。我很想对您表明深深的歉意，因为虽然几经努力、费尽苦心，最终

还是未能参与贷款。您是很清楚当前的情势的，难以用语言来向您说明我们的心情。现在我们唯一可以尽力去做的、也是我们正在做的是，在国外各地引起和加强普通人对新债券的兴趣，不仅在理论上做到这一点，而且在实际上也要做到这一点。在这方面我认为有必要告诉您（只有您一人，其理由您容易明白，这事还要绝对严守秘密），我们已经分别在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和圣彼得堡四处投资于这次债券了。我们采取这个办法是为了使每一处的事务都对外界保秘。自然，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尽可能对各有关的银行产生最大的影响，也为了防止因德国的退出而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事实上我相信这种办法已经产生效果，各方面所显示的不安情绪已经被完全消除。我们的确很高兴看见局面有了这样的变化。我很高兴地告诉您，我们发觉金融界对于这个事件的倾向是很有利的。

从德国这位最卓越的银行家的信中，可以看出这次德国政府又失策了。事实上，早在 4 月 17 日（公历 30 日）银行团的首席代表诺伊茨林就写给我如下的信：

这次国际借款已经成功，昨天已达到签字阶段。这次伟大的财政成功现在已成为普通民众谈话的主题，而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俄国信用第一次在一片极大扩展的区域内奠定着基础。在报告你这个胜利的消息以后，我还得向你表示深挚的谢意，因为由于你的信赖，我得以光荣地自始至终参与这件工作。在皇庄会谈期间，在协商的危机阶段，由于您的支持和鼓励，我放弃了原定的计划。

这次借款确实是一项最重要的成就。在各国的近代历上这是一笔最大的外债。普法战争之后，梯也尔曾发行一笔数额更大一点的公债，但他那次大部是国内的，而我们这次几乎全部来自国外。靠着这笔借款，俄国自 1896 年实行的金属本位币制才得以保全。这反过来使我们得以维持财政制度的基本原则，这种财政制度大部分是由我建立、而后来柯科弗采夫以值得称赞的坚决态度予以维持。就是这些原则使俄国得以在经过那场不幸的战争和后来称之为俄国革命的骚乱之后恢复过来。这笔借款给俄国提供了资金，因而使它能够度过自 1906 年到 1910 年期间的一切危机。这笔借款所提供的资金，连同自外贝加尔调回的军队，使政府的法令恢复了统一性并有了可靠的保证。

鉴于以上所说的这些情况，我们的皇帝对于借款的态度是怎样的呢？他十分了解借款的重要性，也完全明白假如借款失败将会引起一场多么严重的灾难。当我任财政大臣时期，在所有财政事务方面，他完全信任我，毫不阻挠我的活动。这次借款时，他仍和往常一样，凡是与政治有关的财政事项，都让我全权处置。他好像是一个旁观者，静观着一个规模宏大的政治和财政的棋局，但这位旁观者却充分了解这个棋局的结果对于俄国异乎寻常的意义，所以十分关心地注视着棋局的进程。

在 2 月和 3 月期间，我越来越难于容忍反动派对 10 月 17 日的改革所作的种种攻击。某些派别的人竟加我以叛逆的罪名。同时，暂时代理总督的杜尔诺沃和其他一些人背着我执行了许多措施，尽管那些措施应由作为政府首脑的我来负责施行。结果我开始暗示说，我不反对让皇帝更加信任的人来担任我的职务。皇帝屡次给我的答复都是说我必须等待借款完成之后才能引退，他十分清楚只有我才能去谈判借款的事情。第一，因为我在国外金融界享有声望；第二，因为我在金融业务上有丰富的经验。下面是从皇

帝于4月15日写给我的一封信中摘录的：

> 这次借款的成功是你担任大臣期间最光辉的一页。这是帝国政府伟大的精神上的胜利，也是俄国将来顺利和平发展的保障。

很明显，皇帝完全清楚这次借款的重大意义。在结束这段借款的故事时，我想回头再谈谈柯科弗采夫的事。他自巴黎带着借款合同归国后就来见我，祝贺我的成功。我对他已经准确地完成托付给他的使命表示感谢。这时他就向我要求，是否可以从借款中提出八万卢布给他作为酬劳。在国家财政极端困窘的时侯提出这样的要求，使我很生气。我一时想不出适当的话来答复他，我就说等我和财政大臣希波夫商议一下。于是我就去拜访希波夫，告诉他我和柯科弗采夫的谈话经过。

我对希波夫说，“柯科弗采夫显然以为财政大臣和他的同事在订立借款协定之后可以得到一笔佣金是一种惯例”。我又说：“他忘记这种做法已被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废除了。”

柯科弗采夫的手段使希波夫感到惊奇和愤怒。因为他们两人感情很好，我请他去和柯科弗采夫商谈，劝他不要再提这个问题。从那时以后，柯科弗采夫才转向国务会议的主席索尔斯基伯爵要求为借款之事给他以其他形式的奖赏。索尔斯基伯爵来和我谈论这件事，因为我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于是颁给柯科弗采夫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同时发表一份正式的公告。

后来，国家议会召开了，我辞去总理大臣的职务，由戈列梅金组成内阁。当时内阁总理想请柯科弗采夫担任财政大臣一职。柯科弗采夫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劝他接受这项任命。后来出乎我的意料，他宣称1906年的借款挽救了俄国的财政困境。他还说为主持借款他费了多少心血，遭受了多少挫折。总而言之，我们最

尊重的弗拉季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即柯科弗采夫）想利用国家议会中没有人知道借款一事的真实经过来使大家相信他——弗拉季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是俄国的救星。这个人的人品就是如此！……因为他曾发表过这样的一些言论，所以我便将手中所有关于这次借款的文献收集起来。上面我所引用的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总体而言，我在财政和军事两方面大体上都是成功的。但是俄国却不能从我克服种种巨大困难的成功中得到好处，因为很不幸，统治集团不开明而且缺乏足够的度量，以致不能严格履行10月17日宪政宣言中所宣布的各项原则。这次宣言是仓促起草的，直到最后一刻我还不知道皇帝会不会签字。如果没有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劝告，皇帝也许就会不签字。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亲王直到宣言公布的时候还信奉黑色百人团的教义。宣言的起草人之一——阿·季·奥保连斯基公爵在他参加起草宣言的时候，正处于一种神经衰弱的状态中。这位宣言的热心提倡者，在宣言公布几天之后竟对我宣称他这次参与起草宣言是他生平最大的罪过。宣言公布前数日，皇帝召集了两个同时进行的会议，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会议，戈列梅金参加了另一个会议。在这样危急的时刻，这样极端的口是心非，使我非常地沮丧。

实际上，我是很反对发表宪政宣言的，我当时更多的是筹划另外一个办法，即建立一个军事独裁体制。宣言最初条文的起草是违背我的意志的，所以并没有让我知道。但是鉴于各个高阶层的人物都想发表一个宣言，我就声明如果要我出任总理大臣，宣言就必须采取我所拟定的文字。

从多方面讲，10月17日宣言具有良好的影响。举例来说，宣言破坏了使得反对派阵营非常难于对付的联合阵线。它使全国人民清醒起来，所以在国内又能听到爱国的声音，有产阶级则进行一番奋斗并起来保卫他们的产业。但另一方面宣言也有其严重不利的地方。它的公布如同晴天霹雳一样，大多数地方当局都不理

解发生了什么事情，许多人对于这种新的政策方针显然完全不表同情。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宣言，许多情况本已很危急的地区由于它的突然出现便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革命与反革命的暴动在全国到处发生，而反动方面的表现就是有组织的屠杀。这种屠杀多半是由地方当局策划，或至少也受到了他们的鼓励。由此看来，宣言实际上激起了骚乱。我之所以反对发表宣言，就是担心发生上述结果。并且，这件事使人们对政府其他所有的法令都留下轻举妄动的印像。

我毫不怀疑我国实行代议制的必要性。在那些日子里，即使是保守派也赞成制定一部宪法。事实上，1905 年 10 月 17 日前夕，俄国没有保守派。这个宣言把俄国的过去与现在一刀两断。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手术确实必要，但是应该完成得更小心谨慎一些。我还得感谢上帝，宪法已经颁布了。把过去一刀切掉，虽然有点粗糙和急促，但总比请一位庸医用钝锯慢慢锯掉要好得多。

任何人都清楚 10 月 17 日的法令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转折点。那些对统治权力在政治上的合法性保持信心的人，终于发觉自从十二月党人开始，多少高贵的生命为之牺牲了几个世代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至于那些受了过分刺激的极端分子，他们则觉得旧制度的主要代表人物，尤其是皇帝本人，应当和旧政体一起被废除。因为事实上，尼古拉二世不是已经毁灭了俄国而且把它赖以立足的基础抛弃了吗？许多人怀疑（他们的怀疑显然是正确的）尼古拉皇帝只是在惊惶失措之下颁布了宪法，一旦他的地位稳定起来，他就会将宪法加以篡改使之失效，而变成一种极恶劣的谎言。

1905 年 10 月，朝廷中到处充斥着令人抑郁的气氛。这种忧郁心情的深度可以由下述的这个事件表现出来。在那些日子里，因为铁路工人在罢工，我们常常乘汽艇去彼得戈夫宫参加朝会。有一次在汽艇上遇到副官长本肯道夫伯爵，他和我们驻英大使是兄

弟，他是一个思想敏锐、学识丰富并且很忠于皇帝的人。尼古拉皇帝在学识方面受到几位学识渊博的人物的陶冶，本肯道夫伯爵就是其中之一。伯爵和我的同伴武伊奇谈了一些别的事情，就说到我们的皇帝夫妇现在有五个孩子（四位公主和一位可怜的皇储阿列克塞，据说他是一个很好的男孩），他很担忧一旦皇族必须乘轮船离开彼得戈夫宫到国外避难，这些孩子将是一个大的累赘。下面我将说一件很有趣但同时又令人困惑的事，来看一看在那些日子里，即使是一些很有学识的人惊慌到什么程度。1906 年我辞去大臣会议主席的职务之后就去法国维希养病。在那里著名的麦奇尼科夫教授常来访问我。我和他的最初相识还是在我肄业于敖德萨大学的时候，那时他教授动物学。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有革命倾向的人，而我则持保守的见解，直到今天我仍然忠实于这种信仰。就是由于他那自由主义的思想，他被迫离开了敖德萨大学而漂泊国外，在国外他接受了帕斯特学院的聘请。

这位著名的科学家有一次从巴黎专程来找我商量一件事情。他告诉我说，他在帕斯特学院的年薪只有三千法郎，这自然是不足以维持生活的。他每年主要的收入约八千卢布是来自他的夫人在俄国的地产。不久之前牛津大学曾聘他主持一个讲座，薪金是三千镑。他本来不想离开帕斯特学院的，因为他在这里曾获得世界知名的声誉，但却怕可能失去从俄国得到的收入，因为他了解这时的俄国正在进行没收地主产业的运动。如果他的地产被没收，那么他就不得不离开巴黎而接受牛津大学的聘请了。我使这位担心的科学家确信，如果强迫没收的办法普遍推行——这件事不大可能——也总要给地主们以相当的赔偿，从而消除了他的疑惧。

在与这位大科学家的交谈过程中，实际上可以认为他是在责备我杀的人太少了。关于在我当政时应当遵循的行动方针，他有一套他自己的理论。依照他的办法，我应该将彼得格勒或是莫斯科，或甚至整个一省交给革命党人，经过几个月之后，我应把这

个革命的堡垒包围占领，将几万名革命党人全部杀掉。依这位博学的教授的见解，这徉就可以把革命一次彻底肃清了。为了支持他的理论，麦奇尼科夫援引了法国梯也尔（Thier）对付公社党人的办法作为例证。这是多么昏聩无知的理论！居然有一些俄国人对这种最残忍的挑拨保持观望的态度，梯也尔从一开始就没有以人为的办法造出巴黎公社来。而且，在袭击公社的时候，他得到由全体人民投票选举的国民大会的支持。他是按照全法国人民的意志行事的。他之所以采取镇压的手段，是因为他处在必须尽可能限制而不是煽动国民大会的职位上。如果俄国在10月17日宣言颁布之后，便由普选产生一个国民大会，那么这个国民大会就会要求废除一切死刑。而且，它无疑会要求皇帝退位，以及审判那些对日俄战争所引起的耻辱负责的人。结果，俄国就会爆发一场自相残杀的内战，而这场内战结束时俄国的一些边远省分将要割让出去，而我们的一部分领土也将被外国军队占领。

每一个有关的人很快就看清了王朝与政府的地位不像当初那样岌岌可危了。知识分子的革命热忱只不过是他们智力的渴望和闲着无事的结果。后来掌权的集团感到懊悔，因而处心积虑地想废除10月17日的法令。结果，宫廷禁军司令特列波夫将军便成为不担负责任的政府首脑；而我这个担负着全部责任的人，被降低到一个傀儡的角色。早在1906年一月，我就向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声明，一旦订立了借款协定和从满洲撤兵完毕，我就辞职，因为我觉得我不可能为我反对的人及其措施作掩护。我不愿为特列波夫将军和尼古拉亲王做爪牙，也不愿当黑色百人团的盾牌。于是我在4月辞了职。

第十二章　我担任总理大臣

我在宪政宣言公布之前和皇帝商谈的时候，非常慎重地表白了我的意见。的确，我把我的信念毫不含糊地陈述出来，这些意见后来写在一份呈给皇帝的报告中。我提请皇帝注意：万一他遇见什么不幸的事（但愿不要发生这样的事），王朝就要由当时完全不具备治理帝国能力的尚在襁褓中的米哈依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来代表，这种局势，特别是在当今革命风潮汹涌的时期，无论对王朝或国家来说，都是充满了危险。所以我认为现在必须设法获得人民对王朝政体的支持，尽管普通民众的社会意识不仅残缺而且非常不可靠。我与皇帝自他的幼年时代就已熟识，从他最初继位时起我就在他的朝中任职，他的父亲是我最崇敬的帝王，当我对他说这些话时，感到万分痛苦。然而我知道，如果不把我所知道的全部真相告诉皇帝，那将让我背上深深的道义上的谴责。

在我坦陈自己意见的同时，一再对皇帝说，也许我的见解是错误的。我劝他再去咨询他所信任的其他大臣。不用说，我并没有劝他偷偷地这样做，也没有暗示他去请教戈列梅金等不可靠的人或者是朝廷的奸诈之徒。我毫不隐瞒地告诉皇帝，在我看来，当今的局势充满了困难与危险。我看出他有意把掌握政权的重任加在我的肩上，于是有一次我就用一个比喻来解释我所见到的国内形势。我把皇帝比作一个必须渡过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的人。我说，有好几条航线可走，有一些水手各自备好不同的船舶。无

论选择哪条航线，搭载哪只船，途中都会遇到很多危险与损失。我坚决认为从俄国的未来着想，我的航线和我的船是危险最少且最符合当前局势的。但是如果皇帝真的决定选择我的航线和船只，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形：船在海上航行不久就会开始颠簸摇荡起来，以及随后袭来的暴风雨有可能使船身受到损伤。到这时，“聪明”的顾问们就会暗示皇帝应另选其他航线而把他本人与国家的命运托付于另一只船。于是怀疑、犹豫不决的心理以及各种阴谋随之而起，国家也必将遭受更多的危险。

皇帝却不同意这个说法，他向我保证他绝对信任我。不过，我对于这位君主的个性却认识得很清楚。我知道他既没有坚决的意志，又缺乏政治家的远见，很容易受到各种恶势力的左右，而且他个人的种种特征将使局势变地更加艰难。我很明白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遇到许多艰险，而且最后我会完不成指定的任务而不得不离开皇帝。果然，我短短的担任总理大臣的历史（1905 年 10 月 20 日至 1906 年 4 月 20 日）充分证实了我预感的正确性，并且证明我的忧虑是有道理的。

让我掌控政府其实是违反我个人意愿的。皇帝只是迫不得已才起用我。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所宠信的那些人如戈列梅金、伊格纳捷夫将军、特列波夫将军等都被革命党的恐怖分子吓坏了，陷入到理应由他们自己负责的那一些互相矛盾的措施所引起的混乱之中。

我被任命为国务会议主席伊始就表明，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局长波别多诺斯采夫必须离职，因为我断定这人是代表旧时代的保守势力。我认为，我们既然要开始实行一种新的制度，就不能允许他参加，因为他不能遵从时代的召唤。我推荐阿列克塞·季米特里耶维奇·奥保连斯基公爵为他的后继人选。皇帝立即赞同我的提议，任命奥保连斯基公爵为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局长，而波别多诺斯采夫则被指定为国务会议的普通成员。我又代劳苦功

高的政治家波别多诺斯采夫请求赐予以下几种优待，如准许他仍占用当局长时所住的寓所，他的免职不是以正式的政令形式宣布而是由皇帝亲自告诉他。皇帝对这件事的态度最足以表现出他对待元老旧臣的无情和随便。波别多诺斯采夫从皇帝幼时就与他熟识，多年担任这位太子的教师。有一次在他与我谈话中他说，因为他从来不曾要他的学生复述书的内容，所以就不知道年轻的尼古拉是否曾经领悟了他讲授的内容。

同时我决定把教育大臣格拉佐夫将军免职，因为他完全没有能力获得这个职务。此外我又决定把内务大臣布里根免职。教育大臣一席，我请塔甘采夫教授继任，他是一位学术界闻名的刑法学者，是国务会议与枢密院的成员，此人相当开明。当我向他提出这个建议之后，他表示他身体不好，希望给他一天的时间来考虑此事。在那些日子里，每个人的身体都不健康。第二天，塔甘采夫便和波斯特尼科夫来见我，后者是圣彼得堡工学院的院长，我原来计划请他做教育部副大臣的。塔甘采夫教授显然很激动。他表明他不能接受我的邀请。当我还想和他争辩时，他却用手抱着头跑出我的书房，一边喊道："我不能，我不能。"等我跟着他走到外边时，他已经把大衣帽子拿在手中仓促离去了。关于这件事我可以说，在那些骚乱的日子里，很多人不敢接受一个大臣的职位，就是怕挨一粒枪弹或是一枚炸弹。

我的第二个教育大臣候选人是美术学院副院长伊凡·伊凡诺维奇·托尔斯泰伯爵。他在圣彼得堡大学毕业后曾主持美术学院多年。我希望皇帝不会反对这项任命。

我之所以选任托尔斯泰伯爵并不是因为他在学术领域的杰出成就。早在动乱时期，教育大臣就是一个充满竞争的职位，任其位者不但需要在学识上能够胜任，而且还必须是一个持保守见解并是学生们既尊敬又畏惧的人。在各高等院校罢课期间，许多当政的人都成了学生们的玩偶，而唯独托尔斯泰伯爵能不受学生们

的嘲弄。美术学院的学生们对他是非常的尊敬。所以我相信他决不会沉迷于过激思想之中。皇帝之所以与教育大臣万诺夫斯基断绝了联系，就是因为他太过于主张自由主义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于是推荐托尔斯泰来担任教育大臣。不过，那时皇帝一直在犹豫任用托尔斯泰伯爵是否明智，因为担心他的保守思想会引起学生们的愤怒。

我特地邀请托尔斯泰伯爵到我的书房来，要求他接受教育大臣的任命。起先他不愿接受，并很坦白地表示恐怕他的能力不够。他劝我另外邀请更能担负此职的人。我向他解释说，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期，愿意接受这个职位的人很少，而且，我的组阁工作不能再耽搁了。

于是伯爵便慨然应允了。他对我说，他想到在这个多难之秋，拒绝担任一个责任重大的职位、并且不愿意协助我实现 10 月 17 日宣言所颁布的原则，这一切都是一种不爱国的行为。皇帝立即批准了我这个任命。

其次，我必须选一个内务大臣。十月革命以前，内务部副大臣皮奥特·尼古拉耶维奇·杜尔诺沃曾几次向我暗示他是唯一有资格担任内务大臣的官员。

他的经验确实很丰富。他是海军军官出身，在俄国司法制度改革的时期，曾任基辅的副检察长。司法大臣帕连伯爵对我说，他还在七十年代就熟知杜尔诺沃的为人，颇为欣赏他的精力与才干。到八十年代初，杜尔诺沃升任警察局长。关于他做局长时期的活动我不太清楚，不过后来他何以被迫辞职，我倒听到过些详细的情况。

当时杜尔诺沃因为追逐一个女人弄得声名狼藉。事实上，他以警察局长的地位常用下属的特工人员为他做私人的事情。那时他与一个十分浪漫的女人热恋着。杜尔诺沃为了揭发这个女人的变节行为而派警察局的特工人员去西班牙驻俄大使的书桌内窃取

了那个女人写给这个大使的书信。

一场争风吃醋的风波过去之后，事情也就和解了。对于那个女人来说，事情也就到此为止。可是，西班牙大使写了一封信给亚历山大三世皇帝，阐述了这件事的始末。皇帝盛怒之下，几次严厉斥责杜尔诺沃，杜尔诺沃于是被迫辞职。

当时的内务大臣伊凡·尼古拉耶维奇·杜尔诺沃（此人与皮奥特·尼古拉耶维奇·杜尔诺沃并无亲族关系）后来劝说皇帝任命他为枢密院成员。他在枢密院任职很久，以思想开明和稳健而著称。每当有人提议剥夺犹太人的合法权利时，他总是为犹太人争辩。

杜尔诺沃在西皮亚金和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两任内务大臣时做过副大臣。他对于份内的工作尽心尽责，并拥有开明的见解。

所以在乌鲁索夫公爵以外我便选定了此人为内务大臣候选人。

当我在国务会议上提出杜尔诺沃的名字时，大多数成员都反对任命他为内务大臣。但是他们又不能提出一个更适当的人选。当我对皇帝陈述我的计划时，他似乎非常反对任用杜尔诺沃，可是关于乌鲁索夫则没有说什么。特列波夫对我提名的这两个人也都说了一些令人讨厌、恶意中伤的话。

我不妨坦白地说明，正因为特列波夫排斥杜尔诺沃，我才决意任用后者。当时我已经很清楚特列波夫想间接操纵内务部，或者是更想操纵警察局。因此，他希望内务部大臣是一个外行的生手，或者是一个绝对不了解警察局复杂内幕的人。

当天晚间就举行了一次会议，希波夫、古奇科夫和特鲁别茨科伊公爵都声称如果任用杜尔诺沃，他们都将退出内阁。他们都坚持主张我自兼该职。我向他们解释说，由于我的时间有限，公务繁重，所以绝对不能兼任。我实在想不出另一个熟谙内务部情形而又不致于被特列波夫和警察局所操纵的人。

我便请求皇帝任命杜尔诺沃为内务大臣兼国务会议成员。

皇帝答应任命他为国务会议成员，但是派他代行内务大臣职务而不肯任命他为有实权的大臣。这一次对杜尔诺沃的任命是我当政期间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

皇帝只给他代行职务的名义，其用意很明显：如果杜尔诺沃将来能够迎合皇帝的旨意，皇帝就可以宽恕他的过去——即使是他在枢密院中发表过自由主义的主张。另一方面，如果他不能博得皇帝的欢心，则随时面临解职。

后来杜尔诺沃渐渐认清了朝中的情形，看出皇帝之所以起用我只是迫于局势的严峻，只要他一旦发现有更适宜的人做他的盾牌，他随时都乐于把我撤换，杜尔诺沃便觉得在皇庄做一个皇帝所喜欢的人要比在圣彼得堡跟我做事划算得多。要想取悦皇帝，就得取悦于特列波夫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于是杜尔诺沃便决意巴结这两位权臣。

到第二年元旦，杜尔诺沃被任命为内务大臣并当了枢密顾问，这次擢升很出乎我的意料：大体说来，杜尔诺沃已认为他每次觐见皇帝已无须向我报告，尽管我知道他觐见的次数很多并且待的时间也很久。复活节前不久他的女儿被选为皇后侍从。

杜尔诺沃很宠爱他的女儿，很久以来就梦想让她去做皇后的侍从。他曾多方努力，但都失败了。本来选定一个皇后侍从是需要经过皇太后与皇后双方同意的，看来皇太后一直不同意此事，最终还是靠皇帝费了很多唇舌才得到她的允许。

我辞去总理大臣一职以后，杜尔诺沃也出人意料地被迫辞职，皇帝赏了他二十万卢布（当然是国库中的公款）作为对他失去职位的安慰。

杜尔诺沃虽然存在着道德方面的缺陷，但无疑是一个富有能力与才干的人。他既然是由于我的推荐而被任用，只要我仍当国务会议主席，他做任何事情就必须先报告给我并征得我的同意，

那么一切事都可圆满进行，事实上杜尔诺沃也就会成为我理想中的内务大臣了。

商业大臣一席我委任了瓦·伊·季米里亚泽夫，尽管我对此人评价不高。这也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我很快就发现他持有极端自由主义的观点。他曾出国多年，想必已经幻想我们俄国开始进入一个民主共和国的时代了。我由于一件很可耻的事而不得不把他免职，就是那个臭名昭彰的加邦神甫和一个新闻记者从季米里亚泽夫手中获得三万卢布，名义上是要用来恢复加邦创办的一个劳工组织，实际上他们是想贪污这笔公款。

他离职之后，我听说他差不多天天接见激进派报纸的记者，抨击政府的种种施政措施，竭力装作极端自由主义者的样子。可是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却证明他的自由主义不过是一副假面具。

等到斯托雷平组阁时，季米里亚泽夫又被任命为工商大臣，但在他的两届大臣任内，政绩乏善可陈。他的前任因为拒绝允许从石油矿田支付一笔非法帐款而离职。季米里亚泽夫则比较通权达变。他力求做到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取悦于当权者。当国家议会对油田的非法行为提出质询时，他发表了一番实在令人作呕的讲话来为自己辩护。一方面他暗示这件事乃是他秉承皇帝意旨而行的；另一方面，他又非常天真地说皇帝有天赋的权利去拯救不幸的人民，这种特权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一个优点。他的讲话引起了普遍的愤慨，有人批评说，以这次事件而论，皇帝所拯救的只是那些侍从武官与宫廷狩猎官。

原任交通大臣希尔科夫公爵也被我免职，他是一个性情和善而饱学铁路专门知识的人，但作为一名管理型领导，他却显然能力不足。他的继任人选是由我推荐的西南铁路公司经理聂麦沙耶夫，此人以在铁路管理方面经验丰富而久负盛名，而且我也知道他会得到皇帝的满意。皇帝赞成我对他的推荐。聂麦沙耶夫成功地恢复了铁路运输的正常运转。

对于陆军大臣雷迪格与海军大臣比里列夫我都毫无反感，而且我对于司法大臣马努欣和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也是非常地器重。对于财政大臣柯科弗采夫和农业大臣施瓦内巴赫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评价，但是如果他们不再搞阴谋诡计，我也愿意与他们合作。

在进行组阁之前，我决定召开一次民众领袖的会议，其中有著名的地方自治工作者希波夫、现任国家议会中十月党的领袖古奇科夫、斯塔霍维奇、乌鲁素夫公爵和先任莫斯科大学教授、后来任国务会议成员的特鲁别茨科伊公爵。我曾得皇帝的批准，如果我认为某些卓越的民众领袖的威望对于平定骚乱有所帮助的话，可以请他们来担任某些职位。这次会议无果而终，通过对这些人进一步的了解之后，我觉得他们尽管有的德才兼备，却并不适合担任大臣职务。因此，在我被任命为总理大臣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我还不能组成一个与宪政宣言中的原则相符或者至少是担负着某种历史使命的内阁。结果在一段时期里，我凭借着这个庞大且复杂的、而实际上不起作用的政府机构，来独力管理这个处于非常混乱状态中的庞大帝国。

大约在我组阁后的两星期，圣彼得堡总督兼卫戍司令和内务部副大臣特列波夫将军正式提出辞职。我在电话中告诉他我接受他的辞职。第二天清晨当我乘坐政府公用船到彼得戈夫宫去向皇帝作每天例行的报告时，在船上遇到了他。他告诉我他已被任命为宫廷禁军司令了。这消息我事前毫无所闻，同时也颇出人意料。他这次离开都城好像是仓促逃走一般。到觐见皇帝时，我讲我很高兴得知特列波夫将军的新任命。我说，以他做秘密工作时积累的丰富经验，一定能胜任保护皇帝生命的宫廷禁军司令的职务。皇帝显然不愿谈这件事，赶紧改变了话题。

特列波夫的后继者是原来的警察局长加林。加林很快当了枢密官，并且终于成为特列波夫的非正式秘书。他为特列波夫将军写了一些很有深度的决定书，其中援引了许多法律著作，后来这

些决定书都以御笔名义发表。实际上皇帝本人生平从来没有翻过俄国的法典，我可以断定，他连枢密院中的动议部与其他各部的区别都不知道。

特列波夫是变革时期的一个中心人物，必须加以详尽的叙述。乌鲁索夫公爵在第一届国家议会中提到他时这样形容他："以教育程度而论，他相当于一个军需官，以政治信念而论，他是一个屠杀犹太人的策动者。"虽然对于一个人的极其复杂的个性原本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述尽的，但是乌鲁索夫的话却能表现出特列波夫的一个主要特征。他的教育程度的确只相当于一个军需官，这一点正是他自己的不幸，也是俄国的不幸。他年轻时进过军事学校（士官团），但他所有的知识全是在骑兵卫队的营舍中和军官俱乐部中得来的。他也许生平就未曾读过一本正经的书。不过我们却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个八面玲珑的、谨慎的并且受过充分训练的军官。

"以政治信念而论，他是一个屠杀犹太人的策动者。"——这句话并不完全正确。特列波夫好用屠杀手段并不是为了屠杀。他毫不犹豫地采用屠杀的手段，只是在他认为这是必须保护国家重要利益的时候。不过他常不把这种反犹太人的屠杀行动当一回事，在这个方面他和普列维、伊格纳捷夫伯爵以及许多别的高级官员的态度十分相像，他们都把这种流血惨剧当成一种政治游戏。皇帝本人不也是号召我们所有的人都团结在公开宣传消灭犹太人的政党——俄罗斯人协会的旗帜之下吗？

我第一次注意特列波夫是在一个很特殊的场合。这个事件却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他的某种特性。当亚历山大三世皇帝的遗体自雅尔塔运到圣彼得堡的之后，随即被运往圣彼得与圣保罗大礼拜堂，殡仪行列所经过的街道两旁都排满了军队。按照仪式，行列的最前面是各部大臣与国务会议成员，分二列行进，然后是牧师们和运灵柩的马车。到涅夫斯基大街经过一列骑兵卫队时，我

突然听到一个卫队官佐发出如下号令："向右（就是向运灵马车的那个方向）看！高兴点！"于是我就向碰巧在我身旁的武官询问那个傻瓜是谁。他回答我说："小队长特列波夫伯爵，一个很机灵的军官。"

特列波夫最初走上政治舞台是在莫斯科总监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手下做该城的警察局长。亲王惨死（被恐怖分子刺杀）以后，亲王夫人——一位高尚而不幸的女人——伊丽莎白·费奥多罗夫娜自然对亲王昔日的同僚都有好感。正是由于亲王夫人的提携，特列波夫才得以擢升。亲王夫人终于使她的妹妹——亚历山德娜皇后信任特列波夫，自然这也就等于获得皇帝的信任。此外特列波夫又是弗雷德里希斯男爵的护卫者。在男爵那简单的头脑里，他真实地认为像特列波夫这样一个有勇气的骑卫兵正可用来训练俄国人民的行为与思想。此外，特列波夫的姐夫莫索洛夫将军又是弗雷德里希斯男爵的办公处主任，他一有机会便在男爵面前夸奖特列波夫的行为和思想是多么的可贵。男爵本人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什么独立的判断能力。他不能抓住事实的本质，更不用说去进行一连串的推理了。他每次向皇帝陈奏事情时，他的助手们总是像教小学生一样来引导他。此外特列波夫在朝廷中还有一位权势显赫的朋友，那就是皇后的心腹宠臣奥尔洛夫公爵。

在革命期间，特列波夫将军的思想上显现出一种完全混乱、自相矛盾的状态。他既缺乏政治学识，又没有政治理想，往往同时表达两种完全相反的意见，由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他本来主张绝对君主专制政体，但在讨论布里根提出的质询性质的国家议会议案时，他又发表出最激进的意见。1905 年 10 月的一天，他发布了一个著名的当日命令，指示部队在对付革命党人的时候"不要吝惜弹药"。几天以后他表示赞成一次最宽大的政治特赦。一方面，在大臣委员会上他坚持对于高等学校的师生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另一方面，他又创拟并实行了一项准予各高等学校实行

一种广泛而规定得很含糊的自治计划，这项措施对于促进革命起了不小的作用。

然而我们得承认，这位拙劣的政治家的所作所为都是诚实的，是以一种对皇帝绝对忠诚的精神去做的。我们要知道特列波夫将军在晚年的时候也失去了皇帝的宠信，当他病死的时候，皇帝甚至要罢免他。我肯定没有人会怀疑我对于特列波夫有什么偏袒。他实际上是我的头号政敌，就是他，比别的任何人都更加使我难以忍受总理大臣这个职位。因此，我觉得，在说明了一切之后，我可以断言特列波夫是一个诚实的、政治上正派的人。

虽然特列波夫担任看似平凡且不涉及政治的宫廷禁军司令的职务，但事实上他所扮演的角色却是在一个不负责任的独裁者与一个日夜侍从君主的内臣之间的平衡手。他是一个果断、勇武的人。他对这位意志薄弱的君主起到一种支配性的影响。皇帝个人的安全完全被掌握在特列波夫的手中，因为他担负着公开的和秘密的护卫皇帝的责任。他可以随时向皇帝进言，并且各种各样呈奏皇帝的机密文件和秘密报告都得经他手转呈。他有权扣压一项文件，使之不能上达，但也可以使它引起皇帝的特别注意。很自然，许多竭力依靠单纯功绩之外的其他手段谋求升迁的人，以及以联络请托的方式来谋求官爵的人便开始千方百计地到皇庄和彼得戈夫宫的特列波夫的会客室去拜见他。朝廷中的权贵集团选择特列波夫作为他们在革命引起的一阵混乱和惊慌之后推行反动政策的工具，也是很自然的事。

特列波夫对于皇帝的影响远在我的影响之上。事实上他是一个不担负责任的政府首脑，而我却担负着全部责任，却没有什么权力。在这种情形下，我的种种活动受到很大的妨碍，我之所以在国家议会召开之前几天辞职，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我的继任者戈列梅金和特列波夫关系非常之好，这当然也是他能被任命的原因之一，因为戈列梅金这人除了他那丛大胡须异

于常人以外，也不过是成千上万个平庸官吏中的一个。但特列波夫既能让一个人当上总理大臣，他也照样能够罢黜一个总理大臣，事实上戈列梅金也是由于特列波夫的建议而被解除职务的。后来到了1908年，戈列梅金有一次对我讲，“斯托雷平就任后几个星期特列波夫就死了，他真够幸运的。”

特列波夫就任宫廷禁军司令之后，似乎并没有和警察局断绝关系。曾是警察局中心人物而这时又是特列波夫属下特工队长的拉奇科夫斯基是宫廷禁军司令部的常客。这人曾被杜尔诺沃调到内务部去负责特殊的任务。大约在1906年初，普列维部下的警察局长洛普欣有一次和我商议公事，谈话间他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说他确实知道现在警察局属下有一个特殊部门，由科米萨罗夫上尉领导，专门从事印刷煽动屠杀犹太人的宣传品，并将其散布于全国各地，就在前几天，大批的这类文件被分发到库尔斯克、维尔纽斯与莫斯科。他又说，这个部门是特列波夫主管该局时创设的，而曾由那时和该部门还保持密切关系的拉奇科夫斯基领导。

我知道洛普欣对特列波夫和拉奇科夫斯基都有宿怨，所以对于他所说的这件事有点怀疑，便要求他提出证实此事的证据。几天之后，洛普欣带来了几张他所说的宣传品的样品。他警告我，如果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处理此事，科米萨罗夫就能很容易地消除一切痕迹。于是第二天我便让我的一个秘书乘我自用的马车去警察局，从那里再到科米萨罗夫所最常去的地方，迅速带他来见我，即使他当时没有穿着正规的制服，也不要允许他更换衣服。

半小时以后，我生平第一次会见了这位科米萨罗夫上尉。他穿着便衣。我请他坐下，便开门见山地问他所掌管的重要事情进展如何，我说，对于这件事我很是关心。我接着提到我所知道的种种详情，他一听大为惊骇，便不想再对我隐瞒他的活动了。他

承认这些宣传品正在散发出去，但所说的数字比洛普欣告诉我的要少。他承认这些文件是在以前抄获的几个革命的秘密印刷所中印的，现在储藏在警察局办公楼的地下室中。我于是就问他谁是这项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就急忙向我保证这完全是他自己主动搞的，只因为他觉得这种工作最有用处，无论是先前或现任的上司一概都不知情。我看出在这一点上追问他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我就对他说："你要答应我，回到警察局以后，你立即把所煽动屠杀的文件焚毁，并把你所有的印刷机或是毁坏，或是投入丰坦卡河中；你也不要再从事这类活动。我不会容忍这种事情继续进行下去。到明天早晨你如果还没有遵照我的命令去做，我就要依法处置你。"科米萨罗夫发誓说他一定遵循我的命令。

第二天我便向内务大臣提起此事。杜尔诺沃显然对于科米萨罗夫所掌管的这部分工作一无所知，于是他便作了一番调查。我现在还保存着他的调查报告的记录。他的报告虽然不否认这些事实，但却把它们缩减到最小限度。不久这件事情就被新闻界得知，乌鲁索夫公爵还以此为题在第一届国家议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在我觐见皇帝的时候，就把整个事件的经过报告给他。皇帝一言不发，好像一切详情他都十分清楚一样。我报告完了之后，请求他赦免科米萨罗夫。皇帝则表示他根本不想惩罚他，因为在日俄战争期间时，科米萨罗夫获得了一些秘密军事文件。

提到特列波夫和他对皇帝的影响，我不禁想起一个足以说明问题的事件。到1905年底，我有一次在皇帝的接待室中遇到了特列波夫将军。他向我说希望帝国银行能借给斯卡隆一笔款，斯卡隆是一个侍卫武官，又是现任国家议会主席霍米亚科夫的女婿。我对他说最好直接到帝国银行去办理这件事。

特列波夫则说帝国银行拒绝了他，理由是银行业务规章上没有这一类的借款。

于是我就这样回答他，"既然如此，斯卡隆就不能得到借款。

从前银行规章上所没有的借款项目，有时可以根据皇帝的谕旨贷付。但是现在这种办法是行不通了，一是因为这将和10月17日宣言的精神相违背；二是国家现在正面临着财政上的难关。这项借款的实情我虽不知道，但从表面上看，依照我以往的经验，我几乎可以肯定帝国银行将会遭受损失。无论如何，这将是一笔长期的借款。”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财政大臣希波夫来问候我的健康状况，我自美国归来之后，身体总是不太好。谈话期间他说他认为应当报告我一件机密的消息。

他说在他上次向皇帝汇报政务后，皇帝命他转谕帝国银行，借给斯卡隆二百万卢布。皇帝又对他说：“这事你不要对大臣会议主席提起一个字。”于是我对希波夫保证，在公事上我一定装作完全不知道的样子，不过我很想知道他是怎样办的。

希波夫说，他回到财政部后，立刻写了一篇奏折，说他很愿意遵从皇帝的命令去做，不过他认为有必要请皇帝注意帝国银行规章的那些相关条款，按照这些条款的规定，显然它是无权借出这笔款的，实质上这类借款是不合理的。皇帝看完把奏折退还他，在边上批着：“照我的命令办理！”于是帝国银行贷出了这笔借款。

但希波夫因为这篇奏折吃了很大的亏。到我辞去总理大臣职务时，尽管我为他说情，他也未得到新的任命。至于那笔借款的偿付仍是遥遥无期。

下面我想谈谈库特勒的农民法案，以此来说明特列波夫的种种策划，并作为紧随全国稳定之后发生的政治反动的例证。

俄国革命将来一定会引起土地问题，尤其是自从斯托雷平根据俄国是为一小撮地主而生存的格言来制定政策以后，我对于这一点没有丝毫的怀疑。在宪政宣言发表后的最初几周里，农民似乎已完全不肯遵守法令。要知道，俄国农民对于法律、正常的司法制度以及现代国家中作为社会基础的财产制度，其观念是极不

明确的。而此时地主们都惊惶失措。特列波夫将军便是首先陷于思想混乱的那群人之一。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到皇宫去向皇帝述职时，曾和他进行了一番很有意思的谈话。当我们的话题转到农民暴动时，特列波夫就说唯一可以消弭这场灾难的办法就是赶快大规模地没收私有土地以分给农民。我则对于他的意见表示疑虑，因为采取这样广泛而重大的措施并不能扭转乾坤，必须经过审慎的考虑，而且还得考虑在国家议会召开的前夕是否有必要实行这种政策。他却反驳我说地主们会欢迎这个办法的。他说："我就是一个地主，如果我能够确有把握安全地保留一半土地，我很乐意把那一半放弃不要。"

在我觐见皇帝时，皇帝交给我一项文件，说："这是米古林教授的研究报告，你拿到大臣会议中去讨论吧。"这篇研究报告主张强制没收土地以分予农民，此项政策应由皇帝下诏立即付诸实行。我立即明白是谁把这份报告呈交给皇帝的。米古林教授编写过许多华而不实的作品，完全缺乏真正的学识，他只是在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地方名流之中，享有一点声望。因此，他是不难设法与特列波夫接近的。在此次觐见之后，我又遇见特列波夫，他试图让我相信报告中倡议的措施应该火速实行，以免农民们把地主乡绅的全部土地都抢走。

米古林的计划经过大臣会议的审核，所有与会诸人，连农业大臣库特勒在内，都反对他建议的办法。大家一致认为：这种影响整个俄国政体根基的措施必须得经过一番彻底的评估与调研，并且，这种政策的决定应该属于国家议会与国务会议的权限之内。

大臣会议虽然否决了米古林那轻率的建议，但采取了两项改善农民生存状况的措施：一是取消赎金，即取消农民在获得政府分配的土地时所偿付的代价；二是扩大农民银行的土地营业范围。这两项措施立即由皇帝降旨付诸实行。大臣会议又决定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由库特勒担任主席，负责起草提交国家议会讨论的

关于农民问题的提案。值得注意的是，平定莫斯科叛乱的杜巴索夫副官长对于平定农民暴乱的见解和特列波夫的意见十分相近。1905 年 12 月他在一次和我谈话中表示，要想稳定农村的唯一办法是对于农民已夺取的土地予以法律上的承认。

这时候，革命浪潮开始减退，随着国内稳定有了普遍的进展，统治阶层开始越来越坚决地摒弃那些因革命引起的恐慌而产生的种种见解。强制没收私有土地的办法渐渐不再是讨论的议题，到后来竟被认为是一个叛逆的、罪恶的甚至实在可怕的措施了。在大臣会议否决了特列波夫所拥护的米古林教授的计划几个星期以后，成立了一个进行农民立法的筹备委员会，这时库特勒对我说，他越研究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越明显地发现有必要为了农民的利益而以某种方式强制没收私有土地，并给地主以相应的补偿。

不久之后，我发现在我的书桌上有一个装着许多油印文件的袋子，那是由库特勒的委员会所拟定的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改良草案。因为皇帝曾要我尽快拟定应对农民阶级的各种措施，我立刻命令下属将草案的抄本分发给各部大臣与某些国务会议成员。我自己也在当天很晚的时候抽空把库特勒的计划看了一遍。我发现这个计划主张有偿地强制没收一部分私有土地，并将之分配给缺乏耕地的农民。我觉得计划书中的办法在当前的形势下显得不合时宜了。我已经注意到上层人士对于强制没收的方式所持的态度逐渐走向反动。于是我又将已经分发出去的抄本追回来。第二天早晨我对库特勒讲，我认为目前已不适宜讨论他的委员会的计划了。这位大臣倒并不固执，只是要求我把这个计划的原则和各大臣私下讨论一下。我问他是否对这项计划采取了保密措施，因为我恐怕这又会被人利用作为种种阴谋诡计的借口。他说，他从来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随后不久就召集各大臣开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议。各大臣一致反对库特勒计划的基本原则。他们将私有财产制度的神圣不可

侵犯性作为其主要的依据。我同意他们的见解，不过我提醒他们注意这个历史性的法令的基本原则就是强制没收财产。我之所以反对这种方式，就是因为我认为俄国的财政资源在战争以及随后的内乱中逐渐枯竭了，没收私人的财产会导致国家的破产。库特勒也承认他提出的办法会带来削弱俄国经济基础的影响，但是他认为要想长久地稳定农民大众，这是唯一的办法。总的说来，他并不坚持为他的计划辩护，大臣会议要求他修改他的原计划，他也表示接受。大臣会议又指定了几个人加入到他的委员会，这些人都是坚决反对强制没收土地政策的。会议之后，库特勒向我道谢，因为我给了他这个和他的同僚交换意见的机会。

几天以后我接到皇帝的一张便条，他向我索取一份库特勒的土地计划书。我回奏皇帝说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计划书，只有一份包括几项简略措施的纲要（这个纲要我已封在报告中）。这个纲要曾经被各大臣非正式地讨论过，后经大家一致否决，正如前几日陛下交付给我的米古林计划被否决一样，库特勒也接受了大臣会议的意见，现在他所主持的委员会（其成员已有所变动）正忙于重新起草计划。此后又过了不久，我觐见皇帝时又谈到库特勒的计划，皇帝说库特勒已为此触犯众怒，最好将他免职。我就请求皇帝，如果将他革职，是否可以任命他为国务会议成员，皇帝慷慨答应了。

然而我刚回到家中，就接到一件亲笔上谕，说他又认为不应该任命库特勒为国务会议成员。几天以后，我又和皇帝谈起这位大臣免职的事，这次皇帝答应任命他为枢密官。但过后这位皇帝又改变了主意而不肯履行前言。以后我们又通了好几次信，最后我才按照皇帝的意思把库特勒请来，告诉他说，由于他的计划书所带来的种种麻烦，他最好提出辞呈。他这样做了（1906 年 2 月）。由于我的请求，皇帝准许给他每年七千卢布的养老金。这样，特列波夫一伙急于撤回他们由怯懦而产生的激进主义，需要

为他们此前的罪行找一个替罪羊，而库特勒就成了他们那种反动狂热的牺牲品。

当提到物色继任农业大臣的人选时，皇帝认为库特勒的幕僚克里沃申是合适的人。我知道此人深受特列波夫的宠信，是一个肆无忌惮、自私自利的钻营之徒。我对皇帝说："陛下，您本人和克里沃申并不熟识，只是由于听从某些不负责任的推荐者的介绍才想任命他。而我不能容许这样一个靠钻营贿赂谋生的人加入到我所领导的内阁。我宁愿欢迎一个保守的政治家，只要他的见解是出自其虔诚的信念而不是为谋取私利。"皇帝让步了，要我让克里沃申在常任的大臣任命以前暂时代理农业大臣的职务。

我认为适合继任农业大臣的人选是费奥多尔·萨马林，他是一位坚定的亲斯拉夫民族主义者，也是一位公正廉洁的公共事业家。但是他不肯接受我的邀请，他坦白地说不愿加入我的内阁，因为一方面他完全不赞成10月17日的法令；另一方面他感到自己的能力与经验都不足以胜任这个职务。后来我又提出许多继任人选，其中有亚历山大三世皇帝时代的农业大臣叶尔莫洛夫、柯楚别伊公爵和乌鲁索夫公爵。这些人中有的是被皇帝驳回，有的是他们本人不肯接受。

这时候，朝廷正在酝酿着反对我的阴谋。公开抨击我的内阁的种种弹劾奏章每天都由特列波夫送达皇帝的手中，这些奏章所带来的影响也与日俱增。1906年1月在一些大地主中流传着一份请愿书，其中指责我的内阁中的一些成员在搞革命阴谋而要求解散内阁。这份请愿书的文字相当冗长，其中有这样的一段：

>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从陛下手中获得大权的那些人既无学识又缺乏经验。现在众人议论纷纷是很自然的，据说维特伯爵的内阁正在拟定种种乌托邦式的立法措施，其真正的意图是要把已在城市劳工阶级中失败了

的革命转移到乡村中去。

请愿书的结尾这样说到：

> 我们作为陛下的忠实臣民，认为作如下的声明乃是我们的神圣职责：维特伯爵所代表的现政府不能获得国人的信任，整个俄国希望您以一位拥有更坚定的政治家原则、更有经验挑选值得人民信任的、可靠的阁僚的人来代替这位总理大臣。

2 月 10 日我接到皇帝的上谕，说他想任命克里沃申为农业大臣、鲁赫洛夫为商业大臣。这事使我感到非常愤慨，决意提出辞职，但在辞职之先，我召集我的同僚们商谈此事，对他们宣告我的决定。他们都极力反对我要辞职的念头，劝我先向皇帝作这样的陈奏：

> 所有对于政府行政的责难以及由各种施政所激起的仇恨，首先应由我负责。这是大臣会议制度的必然结果，尽管这种制度所依据的法律并没有被严格遵守，我时常在报纸上得知很多重要的措施都是由省区当局采取的。这一切使我的处境非常艰难，我之所以不顾身心疲惫而忍耐下来，不仅是出于我对陛下负责的责任感，更是源于一种爱国热忱的鼓舞。
>
> 由于我受到层层阻碍，所以时至今日还未能将政府各部的行动协调一致。但是国家议会与改革后的国务会议不久就要召开，我将不得不在会议中报告我所未曾参预的政务、我不能实行的措施以及我所不赞成的计划。
>
> 以当今的现状而论，政府各部人员彼此间缺乏团结，

> 更谈不到信念与见解的一致了，这样的政府是做不成任何事的。我认为我完全不能与克里沃申或鲁赫洛夫合作。关于克里沃申的事情，我曾与陛下您商议过，承蒙陛下前后两次向我保证只让他在短期内暂摄部务。接到陛下今天关于这两人的谕旨，我认为最好通过和诸阁僚交换意见来证实我对这两个候选人的看法。于是我在今天召集了各大臣作非正式的会谈，我们一致认为无论是克里沃申还是鲁赫洛夫都不适合这些职位。如果任命他们担任这两个职位，一定会妨碍大臣会议的进行从而使我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因此，各大臣就授权我向陛下报告这件事，恳请陛下维持内阁人员团结一致的现状，以容许我们在国家议会召开之前完成治理国家的艰巨任务。

皇帝这次又让步了，由于我的保荐，改授我任财政大臣时期的同事尼科尔斯基为农业大臣。我之所以选中这人，是因为我知道他是克里沃申的好友，因而皇帝不会反对。

我在前面已提到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在宪政宣言发表前的危急时期所起的作用。他以圣彼得堡地区陆军总司令的身份答应我只要我认为圣彼得堡及其郊区有施行军事管制的必要，他的军队就可以随时出动。我俩商议此事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刚上任不久的亲王的助手哈森坎普夫将军来见我，他以亲王的名义要求我在必要时不要宣布军事管制而宣布紧急管制。他解释道："您知道如果宣布紧急管制，判处死刑就属于杜尔若沃（内务部长）的权限，而如果宣布军事管制，那么判处死刑就要由亲王负责，亲王就很可能成为恐怖分子暗算的目标。"

这位亲王一发觉太平时期不会立刻到来，他那相对的贤明的姿态就消失了。不久以前我就听说亲王最亲信的部下劳赫将军正在和著名的黑色百人团首脑杜勃罗文博士会谈，那时杜勃罗文的

活动才刚开始。后来亲王与俄国人民协会（一个黑色百人团组织，更确切一点说，一群势利的无赖）的关系更为紧密。该协会的圣彼得堡分会一度有意拥戴亲王为名誉会长，但后来因为觉得这样做过于冒失而作罢。杜勃罗文不仅得到亲王的保护，我相信，他还有杜尔诺沃的保护，所以竟敢有一次聚集一群无赖汉在圣彼得堡一个骑术学校大楼中开会，并发表如此煽动性的演说以致群众从大楼出来就高喊："打倒可恶的宪法，把维特伯爵处死！"

在我的内阁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里，有一个是修正与 1905 年 8 月 6 日法令同时公布的选举法。根据这项法令，产生了纯粹具有咨询性质的所谓的布里根议会。为了实行 10 月 17 日宣言，有必要将这个选举法加以修改，但是不能影响当时已经开始的帝国议会的选举。一群以希波夫、古奇科夫、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为首的莫斯科的公众领袖拟定出了一部选举法。在召开会议来讨论他们入阁的问题时——我说过，此事未成——他们就曾自告奋勇，或者不如说他们全靠乞求终于制定了一份选举法。同时在政府方面，也在我的指导与直接协助下由克里扎诺夫斯基另拟了一份选举法。克里扎诺夫斯基是内政部的成员，他也曾参预布里根议会选举法的制定工作。

克里扎诺夫斯基的选举法并没有改变布里根议会选举法的基本原则，只是将其范围加以扩大，以包括新增加的选举人的种类，而那些公众领袖所拟的选举法则企图趋向实现普遍选举的原则，这也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的理想。

于是大臣委员会召集了一个由我主持的特别会议，以审查上述两种选举法草案。根据法律规定，出席这个会议的应该有国务会议的各部主席（索尔斯基伯爵，弗里什和戈卢标夫）和一部分国务会议的成员，如萨布罗夫、塔甘采夫等以及那些参加起草选举法的公众领袖。

这些民众领导人，除鲍勃林斯基伯爵以外，都坚持他们的计

划，但在我的大力斡旋下，与会的大多数人最终都赞同政府方面所拟的选举法草案。

然后由皇帝亲自主持，召集了一个特别会议来讨论这两种草案。与会人员除了各大臣和一部分国务会议成员外，还有几位亲王和包括鲍勃林斯基伯爵和科尔夫男爵在内的几位公众领袖。我当时觉得后两人一定会赞成政府方面所拟定的草案，但我却想错了。这位伯爵后来告诉我，在这两次会议之间的时期，他到国内各地作了一次旅行，从其中得到的结论是：唯有一个非常民主的选举法才能使人民满意。几位公众领袖发表意见之后，皇帝请他们退席并宣告暂时休会。后来会议又继续进行，但仍毫无结果。显然皇帝感到难以作决定。第二天，在朝廷的某种仪式的进程中我有机会和皇后闲谈一会。我对她说如果皇帝批准那个民主的选举法草案，恐怕会误入歧途。我为了国家大事而借重皇后的影响，这是仅有的一次。接着又召开第二次会议，会上大多数人仍然赞成政府方面的也就是我所拟定的草案。皇帝终于克服了他优柔寡断的毛病，批准了这个草案。

我当政时期所拟定的最重要的一种法律条文便是帝国的基本法，可是这一部基本法直到我离职、戈列梅金被任命为总理大臣后几天才正式公布。这一项法律条文的最大意义就是它能在10月17日以后的局势严峻期间给予新成立的政府以必需的保护，事实上它在这一时期之后也不失为国家的基本法，尽管被斯托雷平在6月3日实施的无原则措施可悲地加以歪曲。

尽管将近1904年底或1905年初，地方自治代表与城市工人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曾拟就一部大俄帝国基本法法典，这法典是极端民主的，其中规定普遍选举，个人秘密投票和直接代表，使皇帝的权力缩减到相当于瑞士共和国的主席，但是在我就任总理大臣的最初两个月中，无论是我的阁僚或作为总理大臣的我来说，都还没有考虑到制定10月17日宣言所需要的基本法，这项宣言要

求建立国家议会并彻底修改帝国预算制度；当然，我们更没有认真考虑到在议会召开之前是否应该公布这些法令，以便使这个新成立的代表机关可以立即对各种立法措施进行明智的讨论。

1906 年初，索尔斯基伯爵在一次私人谈话时告诉我，说皇帝的秘书伊克斯库尔和他的助手哈里托诺夫秉承御旨正在草拟一部宪法法典，伊克斯库尔是一个富有行政经验的卓越人物，但鲜有建树。他又说一旦拟成法典，将交给他亲自主持的一个非正式会议加以讨论，伯爵当时很热心地邀请我去参加讨论。虽然我与他的私交很好，这次我却断然拒绝了。但伯爵还再三要我接受他的邀请，于是我就说明：根据我过去的经验，一种国家的制度要以这种形式来谋求改进，尤其是在当前这种危难时期，是必定会失败的。只要我参预其会，后人一定会把严重错误的责任加在我的头上，所以，鉴于我所处的显要地位，我决意不参加这样的会。我进一步说明，我坚决相信根本法和普通法令的拟定都是大臣会议的事，大臣会议的成员和作为总理大臣的我必须承担这项责任。我的回答使索尔斯基非常不高兴。不久之后他通知我皇帝又令他将以前提出的法律草案加以修改，然后提交大臣会议讨论。

二月末，我收到索尔斯基伯爵送来的法典草案，在格式上和他交给皇帝的一样。这草案交付我的方式足以呈现出当时俄国普通社会人士的病态心理，尤其可以看出俄国社会的代表人物心理上的不健全。这次企图颁布一部根本法的倡议者是特列波夫，他的动机过了相当长的时候才显现出来。他此时所处的地位近似一个独裁的元首，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相当详细地叙述过了。皇帝赞同这个意见，就授命皇帝的秘书与其他助手去实施这项工作。他们把炮制出来的宪法条文的杂烩又转交给索尔斯基伯爵，这人可以算是圣彼得堡官僚政治的典型人物，一个具有标准的才能与学识，并且是国务会议中的善意维新者，总之，他是一个完美的高等官吏的标本。于是一部经过皇帝认可的宪法法典最终就传到我

这个身处革命危机中的政府首脑的手中，这是在10月17日以后第二次把皇帝的个人自由意志或者不如说是无意识的权力缩小到这样显著的地步，以致于皇帝的权力不但远不如日本天皇，也不如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不如瑞士共和国的主席。由于受到这样的根本法的束缚，帝国及其政府就将听从第一届国家议会中占多数的狂热分子的摆布了。自然，到头来对于这种日趋恶化的混乱将归咎于谁呢？那还不是只有我维特吗？

这次我向皇帝上了如下的奏章：

> 我以为，目前所提出的法典既犯了违法罪又犯了不作为罪。它一方面列举了许多极端危险的条文，而另一方面又缺少对于建立新制度所需的条文。我认为首先需要将法律与法令加以区别。目前几乎连一个措施都可以看作是一条法律，因为严格按照它的作用进行解释，实际上每件事都得经国务会议通过。虽然这样的办法也许对于皇帝是便利的，但国务会议不过是一个咨询机关，在新的情况下，这个办法将使我们陷入最麻烦的困难里。尽管在讨论关于国务会议与国家议会的规定时，我曾经一再谈到此事，但是在索尔斯基伯爵交付我的宪法草案中并未提及此问题。我还促使大家注意这部宪法关于皇位继承与摄政制度的规定存在着缺陷，据波别多诺斯采夫和穆拉维约夫对我讲，陛下早就有意修正这些法律。

（皇帝有这个意愿是当他在雅尔塔患了一场严重的伤寒病之后不久，当时因为皇后已有身孕，王位的继承就成为一个需要审慎解决的问题。）

在这个时期中，皇帝没有给我任何关于宪法问题上的指示。显然这件事的幕后正进行着一场阴谋，到后来我才得知其中缘由。

此前我已提到过，这阴谋的策动者是特列波夫，他的意图是想不让我和大臣会议参与此事，或者不如说是想让我扮演替罪羊的角色。因为我对他的计策防范很严，未曾落入这个圈套，所以这草案才不附有任何指示而由索尔斯基伯爵转交给我。直到我把修正了的草案上呈给皇帝之前，皇帝一定还没有看过这个草案。

虽然宪法草案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但大臣会议只开了很少几次会来讨论。讨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在国家议会召开以前是否公布这个根本法。这个问题的答复实际上就可以决定10月17日建立的内阁的命运，决定它是继续存在下去，还是被淹没于血泊之中，我对此很清楚。显然这个法律如果不在议会召开之前公布的话，议会就会变成制宪会议的性质，由此新政府就会被暴力破坏。这将是最好的结果吗？除非出现第二个彼得大帝，也许对国家有利。但是我对于这样一个奇迹毫无信心，我坚持在议会召开以前便将宪法公布。大臣会议的全体成员都持同样的意见，唯独阿·季·奥保连斯基一人例外，这人当时完全迷失了方向，从极端的自由主义狂乱地转变为极端的保守主义。他的意见是根本法应由国家议会拟定。但是我和其他人已经不再认真听取他的意见了。我的意见并没有向国务会议完全表达出来，而会议的成员们也没有像我期望的那样看得那样远。后来在登载着宪法修正草案的那一期会议的刊物上，有一段记载可以表示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大致意见：

> 为了在国家议会协助下制定宪法而延期公布宪法草案，这是最不明智的，因为这将意味着新选出来的人民代表们不能立即从事组织建设，而会被拖进那些关于他们的权限以及他们与皇权的关系的徒劳的争论中去。

在开始审查索尔斯基伯爵所提交给我们的草案时，我曾问外

交大臣拉姆斯多夫伯爵、海军大臣比里列夫和陆军大臣雷迪格，对于有关他们所管部门的宪法条文是否有什么反对的意见。他们竟都回答说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反对意见，这却使我大为惊讶。于是我就对他们讲，在我个人方面，我坚决反对关于外交事务以及帝国军队统辖权的那几条。依我的见解，外交政策的指导权与陆海军的统率权应属于政府的首脑，也就是皇帝，而国家议会应当只从财政的立场出发，也就是与国家预算有关时，才可以过问这些事项。这三位大臣受了我的影响，于是在大臣会议上提出建议，经过讨论之后，又在根本法上加以修改，这样，皇帝才被确定为外交政策的决策人，同时也是陆军和海军的最高指挥者。直到今日我仍然相信，在当时的形势下（在一段长时期中还不致发生变化），如果让国家议会干预这些事情，结果必然使俄国在列强中的地位受到削弱。当然对于这种意见不乏反对者，他们会特别援引对日战争这个大错误来反驳我。我可以这样答复他们：人总是容易犯错误与干一些蠢事的；但只要我们看一下从伊凡雷帝与彼得大帝再到尼古拉二世俄国地图的变化，就可以认识到，几乎没有任何别的国家在这样短的时期内在对外交通和扩张方面取得如此巨大的进展。诚然在尼古拉二世当政时期，曾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但愿上帝不许他重犯这些错误。

在这以后，又转到我曾提请皇帝注意的法令与法律必须加以区别的问题，我向大臣会议指出这一点。关于这个问题，会议所得的结论是：既然过去的立法经验已经表明，凭内容来区别法令与法律是不可能的，所以有必要在宪法条文中把皇帝所能全权专断的事项加以更详尽的列举。于是会议便对皇帝的权力拟定出一个包罗万像的定义，特别说明他的行政权——为维持国家的法律和秩序以及为增进人民的一般福利而颁布设立政府的某些行政机构的法令的权力。此外会议还认为皇帝对于政府雇员与官员的管理权应加以更洋细的规定，尤其是他调动和罢免官员的特权。可

是，关于最后一点牵涉到司法部，引起了一场争论。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都主张皇帝的罢免权力也适用于司法部，而少数人却主张实行亚历山大二世时代的司法官不能罢黜的法律。

大臣会议又进而规定皇帝享有铸币的特权、皇帝宣布军事管制或戒严、大赦、豁免捐税、指定自由居住区以及没收私有财产充公等权力。此外，会议又认为有必要说明皇帝对于他的产业包括证券在内的个人财产以及宫廷事务部的管理都拥有无限制的管理权。为了避免误会，又确定正规的司法部门未经皇帝同意不能对政府高级官员进行刑事审讯或判罪；同样，未经皇帝事先同意，不能剥夺特权阶级人士的各种权利。

因为根本法不同于一般的法律条文，唯有皇帝下令才可以修正，所以国务会议认为把近来有关帝国预算的法令中最重要的条文编入其中是有好处的。基于同样的理由，又加入一条，规定每年为施行军事训练而征集的兵员数额如到5月1日还未确定，则应按照与上年度相同的数目征集。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防范立法会议对于这类极端重要的事项可能采取的阻挠。

宪法中对关于大臣会议的条文也稍加修改，使其易于与代表机构合作，但各大臣仍只对皇帝负责；自然，当他们有渎职的情形时，司法机关也可以有质询权。

最后关于尊重信仰自由的一条也与建立宗教宽容的1905年4月17日法令一起编入新宪法。

我在3月20日将基本法修正案呈给皇帝，到复活节以后不久，皇帝就召集了一个特别会议来讨论。与会者除各部大臣外，还有许多国务会议成员，其中有亚历山大二世时代的司法大臣帕连伯爵、戈列梅金、伊格纳捷夫伯爵，弗拉季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米哈依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和陪随他的顾问波托茨基将军。

大臣会议中发生了几次激烈的争论，第一个就是关于征兵数

额的问题，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主张每年征集的兵额应在根本法中预先确定，以免受到立法机关的干预。但弗拉季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则极力反对，他认为征兵数额不是根本法的问题，而是一种周期性的政令问题，因为每年的动员与大多数人民的福利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如果完全不顾人民代表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就会极大地影响士气。他说如果我们对于俄国人民的忠诚没有信心，那我们根本就不应容许他们成立议会，但是如果我们还相信他们有爱国心，我们就应该准许他们的代表机构行使他们的权力。他最后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始终信赖俄国，我相信俄国人民，我也相信他们的议会将是爱国的，因为它将由一些有爱国心的俄国人组成，因此我不担心我们的未来。"由于他的回答，皇帝拒绝接受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提议。

特别会议也和大臣会议一样，关于司法官任期问题在与会诸人中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司法大臣阿基莫夫和我都主张皇帝应有罢免法官的权力。我的观点是：第一，在宣布这项法令之前，皇帝的权力是毫无限制的，所以所谓不能罢免，只是指司法大臣与一般高级司法官对其下属官员的权力而言，并不适用于皇帝本人；第二，由于10月17日宣言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皇帝的权力随之有所削减，所以皇帝是否应该放弃这项罢免司法官的特权，才有了讨论的必要；第三，如果皇帝独自保留这项特权既不委托给下属官员，也不给予人民，那结果将是鼓励和保障司法行政官的独立与公正。帕连伯爵竭力反对我的意见，他显然忘记了当他做司法大臣时期处理预审推事的情况，以停止任命正规的法官而指派其任期在法律上无明文规定的代理法官充任遗缺的办法回避法律关于不得罢黜法官的规定，当时他曾感到很方便。所以，我们现在的预审推事全都是一些代理法官。戈列梅金也积极主张应保证司法官的任期。尽管持这种意见的人只是少数，皇帝也赞同这种主张。而如今，在斯托雷平—谢格洛维托夫的政权下，这个高

贵的司法不可侵犯的原则已经变成什么样了呢？当时我们是想使参加会议的人都相信法官的罢免属于一种非常的政令，总要事先得到皇帝的同意才行；但是现在这位可敬的谢格洛维托夫先生漠视法律，随心所欲地任意罢免司法官，所以司法部由于有一些巴结司法大臣的馅媚奉承之徒而腐败了，司法大臣可以赐给人们包括任职权利在内的一切福祉。

在讨论第三十一章关于保障财产问题时，我和戈列梅金之间发生了热烈的争论，虽然当时我没有认识到这次争论具有很重大的意义。戈列梅金在批评这一部分条文时说，我们不应该允许未来的议会参预没收私有财产，如果议会不遵守这项禁令，我们就应当立刻将它解散。虽然这章最后仍然保持着大臣会议的意见，但是戈列梅金的激烈言辞却博得在场多数人的同情，就连皇帝本人，看起来也是颇为赞许他的。但在我这方面，我反对他所说的办法，因为我觉得虽然个人可以断然反对强制没收财产，却不能因此禁止议会讨论关于这个问题的实施办法和途径或拟定相关的法律。我又说，恰恰相反，这个问题才正是人民代表大会所认为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只要他们议事的程序是合法的，即使他们想商讨农民的问题，我觉得也没有解散议会的理由。我最后说，大臣会议正是为了制止人民议会的错误而组织起来的，如果议会有什么不合理的决议，大臣会议可以对其进行修正。这次辩论到此结束了，但是，如读者在以后看到的一样，这次争论是导致我辞积的原因之一。戈列梅金把这次事当作一块台阶，在特列波夫的协助下，得以取代我出任总理大臣。后来当议会提出农民问题时，他不得不将第一届议会解散，因为他在这次会议上已经宣布过类似施政纲领的计划，这时是势必出此，别无他法了。

大臣会议所提出的草案讨论结束时，皇帝声称他接受这项经过大臣会议讨论、主要在编辑上作出一些修正的法典草案。这件最后修正过的草案由皇帝签了字，我觉得这事就此告一段落了。

当根本法确定批准的时候，已是四月初旬，此后不久，俄国已缔结了借款协定，于是我在 14 日奏请皇帝准我辞去大臣会议主席的职务。第二天皇帝准许了我的请求，于是到 22 日正式宣布了我的退职。

在我辞职之前虽然已决定由戈列梅金继任，而且他的新内阁也已组成，但新的根本法法典尚未公布。有人告诉我说法律条文根本公布不了，只是在我要离开冬宫的时候，我把特列波夫将军叫到一旁，对他说："大家都知道我已经不是总理大臣而只是一名国务会议的成员，对于以后事态的发展我是不负什么责任的。不过，我请你立刻去见皇帝，报告他我作为他忠实的臣民，最恳切地劝他尽快将根本法公布，不要再拖延了，因为如果到议会召开时，还没有新的法典，它就会没有具体的方针行事，结果必将引起严重的混乱与危险的骚动。"不久以后特列波夫将军告诉我说他已经照我的话一字不差地转告给皇帝了。但是到了 4 月 27 日议会召开的当天，根本法才又经过一番无关重要的修改而正式发表。

为了进一步说明根本法的延期公布与补充修正的原因，在这里有必要考虑下面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直到 1907 年才由弗拉季米尔·伊凡诺维奇·柯瓦列夫斯基告诉我，他是我做财政大臣时期的助理官员。我最初认为他讲的故事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后来他拿出了一些文献的证据我才逐渐相信，这些文件到现在还保存在我的案卷里。当大臣会议把根本法草案呈给皇帝时，特列波夫就获得这个草案的原文，他把它交给柯瓦列夫斯基，在他看过一遍之后，要求他审查草案中的条文，然后作一篇详细的关于根本法的报告书。柯瓦列夫斯基又约了几个人来协助他进行这项研究，其中有后来被推选为第一届议会主席的穆罗姆采夫、保尔·米留可夫和黑森，这三人都是立宪民主党员。此外还有 M. 柯瓦列夫斯基，他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学者和自由主义者，现任国务会议成员。他们几个人作好一篇报告，由弗·伊·柯瓦列夫斯基交给特列波

夫将军，又由后者于4月18日转呈皇帝。

这篇报告开头这样说道：“为了保留皇室的特权，这部法典的起草者已设法应对各大臣的跋扈和不负责任。”下面接着与此类似的评论说：“为了避免整个草案被摒弃，遂在比较重要之处酌加修改，不过有些地方只是加以细微的修正之后，建议大臣会议接受这个草案。”于是接着便列举了他们提出的修正案，如果采用了这些修正案，不仅皇帝的权力削减到相当于法利埃先生（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程度，并且采用代议制度，而且还把俄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系列最复杂的问题随便地交与政府决定。这份报告书似乎使皇帝的信念发生了动摇，所以他开始犹豫批准公布大臣会议拟就并经特别会议审核过的法律。但是，最后由于我和皇帝通过电话进行交流，他才准许在稍加修改后公布此项法案。大部分的修改是无关紧要的，不过是为了满足几个幕后顾问和特列波夫将军本人的自负罢了。特列波夫这个人具有一个军事司令官所受到过的粗浅教育，也具有一个不谙世事的下士所持的肤浅见解。

他们所修正的重点如下：（一）限制皇帝颁布诏令的权力，这样就增加了立法机关的所谓行政职能，而这种行政职能只会妨碍它的立法工作。斯托雷平当权时公布了6月3日宣言，其中似乎有一些显然与根本法相抵触的条款，对皇帝诏令的约束却丝毫未能生效。（二）皇帝一切诏令必须获得大臣会议或其主席的认可后方能生效，借此可以使各大臣对皇帝负责制增加一种议会制的责任。（三）减少了许多关于宗教宽容的条文，这也许是由于得到皇后支持的某些主教提出的建议。

从这次根本法的起草直至公布的经过着来，可以知道这个时期的情况是怎样的动荡，人民在某种危机的压力下怎样易于从一个极端急速转到另一个极端，而幕后阴谋家们又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

我临辞职时，曾和皇帝有几次通信，现在我想把这些信件引

述于下。1906年4月14日我给皇帝写了这样的一封信：

尊敬的皇帝陛下：

为了国家的利益我最恭敬地请求陛下在国家议会召开以前，一但办妥借款事宜，就解除我的大臣会议主席的职务。我冒昧地谨将我的想法陈述于下。

（一）由于我是受到了诸位大臣的责难，并感到体力不支，我的精神如此紧张以至于不能保持在当前新的局势下所必需的镇定。

（二）我十分敬佩内务大臣的坚定和毅力，不过，陛下也知道，他的执政方式与某一部分地方行政官的行为，特别是在群众性的叛乱实际上已被扑灭之后的最近两月里，我认为他的这种行为是不恰当的。我相信，这种行动方式已经激起大多数人民的愤怒，结果是使一些极端分子得以进入国家议会，以抗议政府的政策。

（三）我和皮·尼·杜尔诺沃一同出席国家议会，这将使我们两人都处于一种难堪的境地。我将被质问到一些政府的措施，我对其中的一些还不是很清楚，甚至有些措施我是持反对态度，我势必将无话可说。当我在场的时候，要内务大臣解释我所不认可的一些措施必将使其感到为难。

（四）关于某些政治上的重要问题，如宗教问题、犹太人问题和农民问题等，无论是在大臣会议还是在有权势的人中，都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总的说来，我不能维护与我的信念不合的见解，我也不赞成最近成为内务大臣的政治信条极端保守的意见。

（五）在讨论根本法的会议上，国务会议成员帕连伯爵和被有些人认为是农民问题专家的农民会议主席戈列

梅金不仅对农民问题的实质、甚至对政府未来的政策都发表了意见。农民问题将决定国家议会的活动的性质。如果这两位政治家的意见是正确的话，陛下应该给他们一个实施他们主张的机会。

（六）我已成为所有那些写文章或叫喊的人、以及那些能够把意见上达于陛下的极端分子故意攻击的目标，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6个月之久。革命党人诅咒我，说我竭尽全力以最严厉的手段来对抗革命；自由主义者责骂我，因为我遵循我的良心去履行我的誓言，我必将至死维护皇帝的特权；最后，保守党人也抨击我，因为他们错把自从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公爵担任内务大臣[①]以来政府发生的那些变革都归罪于我。只要我当政一天，我就要受到各方面猛烈的攻击。而最危险的是保守派的贵族与高级官员们对于大臣会议主席的不信任，这些人容易接近皇帝，而势必把他们的怀疑与见解告诉陛下。

（七）政府必须设法在国家议会召开之时与之合作，否则就必须准备采取最极端的手段。在第一种情形下，内阁人员的变动可以使政府工作易于进行，因为对于现任内阁首领以及各部大臣来说，他们近几个月来已有了许多积怨，在更换了他们以后，就有助于消除对他们彼此之间的猛烈攻击。这样，各种问题便更容易达成协议。但是如果政府采取高压政策，那么它的活动将集中在内务、司法和陆军三部。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就立刻成为一个障碍，无论我如何行动，都会受到恶意的中伤。

我可以郑重地提出更多的依据以请求陛下在议会召

① 我对于米尔斯基公爵向来抱着一种友善尊重的情感，所以我对于他的这个任命是赞成的。但在他被提名的时候我并未参预其事，因为那时我正失宠，担任着大臣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开之前准许我辞去大臣会议主席的职务，但我觉得上面所说已足以使陛下准许我的请求了。我本来应该在一发觉我做大臣会议主席的地位不稳定时，就提出辞呈，但由于当时国家财政状况是如此的困窘，所以我认为我不该那样做。我觉得我有责任尽力使俄国避免财政破产，并使议会不能利用政府的财政困难来强迫它对各个政党进行妥协而损害整个国家的利益，而国家的利益与陛下是一体的。各革命党派与反政府党派都责备我，主要是因为我参与了借款交涉，这并不是没有缘故的。现在，已经顺利地缔结了借款协定，所以陛下不必为筹集清偿战争中所欠债款的款项而担心了。同时国内的骚乱已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下来。在这种情况下，陛下可以把注意力转到帝国内部的组织方面，并将议会的活动引向适当的轨道，这时，我相信我在道义上有权利再次提出我的请求。因此我冒昧向皇帝陛下提出我最衷心的请求，恳请解除大臣会议主席的职务。

当天（4 月 14 日）晚上我召集了大臣会议，宣读我向皇帝提出的请求。大臣们连杜尔诺沃在内都显然不赞成我这个决定，因为这将使他们自己的职位不稳。有几位表示要立刻辞职，但我劝他们不要这样做。只有教育大臣伊·伊·托尔斯泰赞成我的这个行动，他说他知道朝廷中正在对我进行着一种什么样的阴谋，他的确觉得，皇帝一旦能够无需我的帮助就控制住局势，他就会立刻把我免职。

两天之后我接到皇帝的一封亲笔谕令：

谢尔盖·尤利耶维奇伯爵：

昨天早晨我接到你请辞现任职务的信。我同意答应

你的要求。借款协定的圆满订立是你当政以来最美好的一页。这对于政府来说是伟大的精神上的胜利，也是将来俄国顺利发展的保证。在欧洲，我们国家的声望也显著提高了。[①] 议会召开之后事态将如何演变，那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对于国家前途的看法不像你那样悲观。我觉得议会的全体议员之所以那样敏感多疑，不是由于政府的镇压措施，而是由于12月11日的选举法过于宽大，政府当局对于竞选运动采取完全不干涉的态度，这在别的国家是从来没有过的。[②] 谢尔盖·尤利耶维奇，对于你在过去六个月的非常时期里任总理大臣时对我的忠诚和热忱的工作，我向你表示真诚的谢意。

我希望你休息一段时期并恢复健康。

尼古拉

下面这道诏谕是4月11日公布的：

谢尔盖·尤利耶维奇伯爵：

由于过度劳累使你的健康受损，这迫使你向我请求辞去大臣会议主席的职务。在我任命你担任这项要职的时候，就是为了要你去执行我允许人民参与立法机关的计划，我知道以你干练的政治才能必能顺利建立起这些新的选举制度。这种制度是为了实现我赐予人民的各种

① 皇帝一定以为在可耻的日俄战争之后，我们在亚洲的威望是更高了。有几个侍臣告诉我，皇帝一再对人表示，俄国人曾给日本人以惨重的打击。

② 这句话好像是责备我没有操纵选举。事实是这样的：1905年9月22日，内务大臣对各有关部门发了一项通告，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遵照皇帝的神圣意志，所有负责监督选举事项的人员须尽力保障人民能安然地推选他们最信赖的人，不受任何外力干涉。所以，我也责成你们注意，所有政府官员和机关，不得对议会代表的选举施加丝毫的压力。"大体来讲，这条训令被遵行了。因为我对于布里根通告的精神是完全赞同的。斯托雷平内阁倒的确放弃了不干涉的政策，所以1908年的选举只是一个笑柄。

权利而创立的。由于你的勤奋与谨慎，这些新的制度已经形成，即可公布，尽管有一些破坏分子在企图阻挠，你以你所特有的毅力与决心在与这些破坏分子作斗争。同时，由于你在财政事务上的经验，使我国成功地借得一笔外债，而在使国家的财政来源得以稳定方面做出了贡献。在准许你最诚恳的请求时，我念及你对国家所做的巨大贡献，在此向你表示我最真诚、最衷心的谢意。为表彰你的这些功绩，我授于你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钻石〔这几字是皇帝亲笔写的〕勋章。

我饱含敬意并真诚地感谢你。〔最后几字是皇帝亲笔〕

尼古拉

第二天我正式上朝向皇帝道谢准我辞职。我也得到恩准向皇后告别。虽然皇后对我向来并无好感，但这时皇帝皇后都对我非常亲切，据说她听到我辞职的消息时，唯一的表示就是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



第十三章　斯托雷平的反动统治

在我辞去总理大臣职务以后，皇帝要我接受出任驻欧洲某一国大使的任命，并嘱咐我一旦有这样的职位空缺时，提醒他履行这个诺言。一年以后我这样做了，但没有得到皇帝的答复。皇帝又要求我把在整个当政时期，他给我的全部信件都还给他，我也答应了他的要求，但后来我很懊悔。因为这些信件能够如实地反映皇帝的思想与见解，为了后代的利益而应加以保存。

我辞职后不久就到国外去了。7月当我旅居在法国的埃克斯—累班城时接到弗雷德里希斯男爵的一封信，信中说到：

> 皇帝刚才和我谈话，我觉得有必要对你详述我在谈话中所得的印像。当我们谈到当前的政治形势而提及你的名字时，皇帝表示你现在并不适合回国。我认为应当把皇帝的这个想法通知你，以便你能做出合适的旅行计划。

这封信显然就等于皇帝禁止我回国的命令。我立即写了件奏章请求辞去我现在还担任的包括国务会议成员在内的一切职务。过了几天，我听说国家议会被解散了，我因为不愿给政府添麻烦，就把这份呈文搁置在圣彼得堡。

我在8月20日给弗雷德里希斯男爵写了如下的信：

我在接到你好意劝我不要回国的7月17日的信的第二天就寄上辞呈。但我后来想到议会解散可能引起的种种不幸后果，在这种情形下发泄个人的忧愤是种不爱国的行为，我就把这份辞呈留在了圣彼得堡。从那时到现在又过去一个多月，于是我想再提一下此事。皇帝陛下早已知道我辞去大臣会议主席的原因，当我离职的时候，我觉得我行事的方式与皇帝的意见并没有什么差别。事实上，皇帝陛下非常仁慈地批准了我的辞呈，并公开下谕表彰我的功绩，又颁予我很适当的奖赏。于是，一个新内阁组成了，但议会和大多数人民对这个内阁只是感到轻蔑与憎恨。这个内阁充当一块牢固的“岩石”（皇帝所用的词)。它默默地忍受着波涛的冲击，又不能控制局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确是一块岩石。……后来议会解散的结果是这块内阁的岩石事实上已经破碎了。

我一辞去大臣会议主席的职务，官方对我的态度就发生巨大的改变。内阁的半官方报刊立刻对我展开恶意的讥讽。大臣们在与外国新闻记者作匿名的谈话中发表他们的政治信条时趁机暗中攻击我，最后，也就是今天，在报上发表“真正的俄国人”的保皇党〔黑色百人团〕致德国威廉皇帝的电文中，把俄国的一切祸端都归罪于我，并恶意称呼我为犹太人统治者。此外我还听说皇族中的一些人责骂我，他们认为我国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动乱都是由我引起的。对于10月17日宣言发表前后的一切事件，你是一位心灵高尚的见证人，并且又是我内阁中的一员，你知道在这些非难中是多么缺少真实性。现在听说圣彼得堡城有人在写文章论证各种骚乱以及战事都是由我维特造成的……我因为职位关系，对于所有这

些指控一概不能反驳。

所有这些事情使我不由得想起你写给我的信的本意。你忠告我“在这个时候”不要回国，虽然“在这个时候”即使是外籍的革命分子也能在国内找到公开的或是秘密的藏身之地。你是了解我的，我希望你能相信，无论如何我决不愿意让皇帝感到不快，或是让他为难。我想，我完全退出各种国家职务也许并不符合皇帝的意愿。然而我的自尊心仍促使我请求皇帝准许我完全退休。由于我没有足够的资金而我又不愿使我的家庭失去往日的享受，所以我提议我可以供职于非官方的机关，这样可以维持我的生活而间接地服务于社会。考虑到当今时代的精神，加上这一句话也许是不必要的：无论我的地位如何变动都不能动摇我对于皇帝的忠心，我向来相信皇帝已成为那些原则的像征。我相信，你的性格将使你毫不耽延地回复这封信。

这个信息当然会传达到皇帝那里，但从此就杳无回音。于是在 10 月 10 日，我又给弗雷德里希斯男爵写了一封信，在这里我只节录其中的一段：

二十天以前我向你陈述了我接到你 7 月 17 日来信的心情……我认为我的信一直未见回复这一事实表明皇帝漠不关心此事的后果。因此，我请你把这信中所附的辞职申请书呈给皇帝。我恳请你帮助我，以使我及早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此后不久我就去到布鲁塞尔看望我的女婿，在那里我得到了男爵如下的回信：

在接到你的信之后，我立刻就将那信的主要内容报告给皇帝，但关于你回国的事我必须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来和陛下商量，在我们赴挪威的旅途中，我才提起了这事。我现在可以向你保证，皇帝劝你不要回国，完全是因为形势所迫。他之所以认为你不宜留居国内恐怕是因为一帮心怀恶意的分子会利用你为借口去增加对内阁的压力，而决不是出于对你个人的好恶。他现在知道你想回国料理私事，并且相信在当前的形势下你回来决不致引起多么严重的政治纠纷，所以特命我告诉你他欢迎你回国。我很高兴地告诉你，当你回来时皇帝一定会热诚地接待你，皇帝绝对希望你不要辞去公职。

我于是立刻给男爵发了一个电报，告诉他如果他认为适当的话，他可以不必把我的第二封信呈给皇帝看。他也立刻回复我，说他认为把我的第二封信和辞职申请书一同呈奏是不合适的。

我从布鲁塞尔回到了巴黎，想从巴黎回圣彼得堡。在巴黎我接到一封法文电报，署名是安德罗尼科夫公爵，他是一个介于间谍与有爵位的食客之间的人物。电报内容如下：

听说你想不久后回俄国，出于我对你的忠诚，我劝你还是在国外多住些日子。这里对于你生命的威胁比你所想像的严重得多。我最后的一句话是："要是你想寻死，那就回来吧。"

几天以后，（1906 年 10 月）我启程返回圣彼得堡。一到达那里，我就去见总理大臣斯托雷平，要求他把这副重担担到底，以便我完全解脱政务的羁绊。他对我说："如果你坚持辞职，我们当

然也不能强力挽留，不过你可知道，特别在这个时候你的隐退无异是无政府党人的一次成功的炸弹袭击。”我听了这样的话，不由得打消了请辞的想法，从此以后也没有再提起辞职的事。过了几天，皇帝召见我。他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关于他禁止我回国以及我想辞职的事，只字未提。

我现在再回头说一说我辞去大臣会议主席以来的国内政治形势。关于我的继任者戈列梅金倒没有多少事可说，因为他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官僚，他没有特定的主张，也没有多少政绩。第一届议会只存在了两个来月，而他的内阁还不如议会维持得长久，随即由斯托雷平继任了。斯托雷平是政治败坏的化身，他的阁僚也比他高明不了多少。他治理俄国时把法律规章破坏殆尽，不惜采取任何一种卑劣的手段去维持他的权力。第二届议会解散以前，他还不敢暴露他那毫无原则的、谋私利的、钻营官职的狼子野心。为了谋求赢得一部分民众的拥护，他发表了一些自由党的言论，采取了一些自由党的措施。但是，他早年就保护所谓的“俄国人民协会”等组织。到他当政以后，这个由流氓盗匪组成的团体由于政府的全面支持而变得声势日益壮大。

在我回国后的最初两年，我和斯托雷平因为公务的关系还常往来，但时间一久，往来日渐稀少起来。斯托雷平对我怀恨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在国务会议上发表言论时常毫不犹豫地攻击他。不得不承认的是，我的话在国务会议上总是很有份量的。后来，在讨论海军参谋本部问题时，我们二人间便发生激烈的争执。我揭露他为了取悦议会的多数代表，竟违反国家的根本法，意图限制皇帝的各种特权。结果他的提案虽经议会与国务会议通过，但最终未得到皇帝的批准。后来到了讨论西部各省实行地方自治制度时，我们二人又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这次冲突的结果是斯托雷平提出了辞呈。皇帝不准，因为他认为斯托雷平曾消除了革命的风潮，他的引退会引起整个内阁的

崩溃。斯托雷平所采取的使世人相信他曾稳定了国家的局势的方法可以从下面两件事看出来。

在他打算辞职后不久，有一个地方检察官在火车上被刺。这显然是革命党人的恐怖行为，但调查却是按照将此案说成是图财害命的方针进行的。后来凶手被捕获了，供认做案不讳，并声称是奉了革命委员会的命令行事的。于是便把这名凶犯押入塞瓦斯托波尔的监狱中。监守的人暗示凶犯可以逃走，但当他试图越狱时，哨兵将他击毙了，于是此案件作为政治案件的唯一证据就被毁灭了。

这件事是枢密顾问普尔泽拉德斯基对我讲的，这人是斯托雷平最亲近的部下之一。此外他又告诉我一项关于他个人的同类事件：1905 年，有一群芬兰革命党人在赫尔辛基城上升起了红旗，当时他的一个亲戚名叫库罗什的海军军官曾下令开炮轰击这些革命党人。事过六年之后，革命党人为了报复，把库罗什的 17 岁的儿子打死了。官方的调查证明这起案件系该青年自杀，虽然这个青年是由一个出现在被害人卧室窗口的人开枪打死的，而又被普尔泽拉德斯基和他的妻子亲眼所见。告诉我这一事件的人指出，当局把见证人证词案卷中的几页抽去，换上了一些伪造的证词，证明这是一桩自杀的案件。

当我对于这种做法的原因表示惊异时，普尔泽拉德斯基解释道，自从斯托雷平有意辞职以后，他就训令属下，一切政治性的犯罪案都按普通凶杀案呈报。显然这位总理大臣的意思是，在他的治理下，恐怖行动是不可能发生的。我就问普尔译拉德斯基："你为什么不向海军大臣和司法大臣申诉呢?"他说他已经向海军大臣提过此事，海军大臣虽然十分愤怒，但也无可奈何。至于谢格洛维托夫，他比斯托雷平的差役强不了多少，向他说也没有用，他是决不会有什么独立的作为的。

斯托雷平还漠视关于国家预算的规定，在他当政时期，议会

中关于国家审计官报告的讨论只是一种形式。但斯托雷平对于根本法第八十七条的处理可以最清楚地表明他是怎样随便破坏他本应维护的法律的。著名的第八十七条是由我拟定的，该条规定在议会休会期间，皇帝在大臣会议的建议下，可以采取紧急措施。但是该条明确规定，这项措施不能影响根本法以及有关议会与国务会议的规定。并且，如果议会在重开一个月之内不同意这样的规定，该规定就失效了。

斯托雷平现在以一种最特殊的方式滥用这条规定。他将这条规定十分清晰的含义加以曲解，企图按照他自己的意志来摆布国家的命运。他假借这条规定以他自己的权力通过了许多极端重要的法令。为了能这样做，他故意解散立法机关，有时只解散例如三天这样短的一段时期。他又假借这条规定颁布了一项新的选举法，而这项新的选举法本身就是一场政变，其结果是产生了那个顺从的第三届议会。他还凭借这条规定设立了一种任何号称文明国家都从未见过的军事法庭。

当我开始执掌国家权力的时候，死刑在俄国是随意判处而无统一规定的。相同的罪，有的地区就判处死刑，而另外一些地区则不判死刑。为了整顿这种混乱的现像，我就提出一个议案，想把军事法庭审理下可以判处死刑的罪行加以规定。这个议案在国务会议中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但在呈请皇帝审核时，他却拒绝批准。因此滥用死刑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变。

斯托雷平组成内阁是在议会已经由戈列梅金解散之后，他设置战地军事法庭，使地方行政官员可以完全自由地判处死刑。新的法令甚至规定裁判官可以不必由军法官充任，而由普通军官兼任。后来第二届议会反对这种规定，于是斯托雷平立刻通过陆海军会议修改了几处陆海军条例，这样就以他个人的权力来保持他所创设的军事法庭。政府开始听从行政官员任意杀戮人民。死刑，实际上成了政府人员的屠杀行为。无论男女长幼，为了一桩政治

性质的暗杀事件或只是为了抢劫了一个酒店的五个卢布，都一律处以死刑。有时候，囚犯因其在五六年以前所犯的罪行而被处死。想想看，像这样的狂乱屠戮，自从斯托雷平宣称全国已告“平定”以来，已经进行六年之久了！

斯托雷平对待议会的态度是与他执政的总趋势一致。关于议会选举法的历史，我在别处已经提过了。在革命时期，几乎全国各阶层人民都希望对皇帝的权力加以限制，唯有农民默不作声。因此便有人推测农民是忠于皇室的，于是在选举法中规定农民的议席比其他阶级多。但是不久政府就感到失望了。到议会开会时，有一定政治纲领的农民代表们都一致要求分配更多的土地，他们认为这是在亚历山大二世皇帝所实行的伟大改革——解放农奴以后的一种当然的结果。所以当戈列梅金出席议会，宣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及为了农民的利益而没收地主们的土地只是一种梦想等等的时候，农民代表们便立刻背弃了政府，转而信任立宪民主党，因为该党许诺给他们土地与交易的自由。

就在这时，一些拥有土地的贵族忘掉了他们的自由主义外衣而开始大声疾呼：“国内叛逆猖獗起来了；神圣的财产权这个所有近代文明国家的基础正在遭到危害；皇帝的臣仆们或者因为品德的败坏或者由于图谋不轨而正在背叛皇帝；凡是主张把土地分给农民的人都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简单地说，议会终于被解散了，许多代表逃到芬兰的维堡，他们在那里发表了一个空洞的呼吁书，要求国内人民在这个立法机关重开以前不要纳税或服兵役。

凡是在这个维堡呼吁书上签字的议会成员都被斯托雷平逮捕问罪。他的目的是想剥夺这些人被选入国家议会的权利。因为司法大臣不过是斯托雷平手中的玩物，斯托雷平对司法当局施加了压力，这些得罪了他的人便被判处监禁或被剥夺选入议会的权利。据当时的法官们告诉我说，那种审讯既不合法又不公平。那不是一种司法行为，而只是一种用以对付立宪民主党的政治手段，因

为这些被处罚的代表大多数是立宪民主党党员。

虽然斯托雷平巧妙地运用操纵法律的手段，阻止许多卓越的公众领袖参加选举，他们作为第一届议会的成员曾在著名的维堡呼吁书上签名；但是第二届议会仍与第一届议会的成员相差无几。这两届议会的成员都是由同一选举法选出来的，他们都主张建立一个以人民的政治意识而非朝廷奸党的图谋私利为基础的政体。因为第二届议会的性质立刻显露出来，所以政府就在它成立了大约三个月之后把它解散了，同时根据根本法第八十七条，一项被称为6月3日法的新选举法也同时公布出来，这项新选举法取消了几个边区省份的选举权，又削减了另外几个边区省份的代表人数。这项新法极大地削减了工农大众的选举权，并使行政当局得以直接操纵选举。总之，这项规定使资产阶级尤其是大地主在议会中获得决定性的优势。这个法令的目的就是要使与政府意见一致的代表在议会中占大多数。有一次我亲耳听见皮·尼·杜尔诺沃询问这法令的起草者克里扎诺夫斯基，为什么某些规定因地区而异，他很直率地回答说，这完全是从获得“可靠的”选举人着眼来安排的。这种所作所为，就表达全国民意的宗旨而言，议会则变成了一个空架子。国务会议对于第一届议会还相当地敬畏，但对于目前的（第三届）议会则毫无敬畏之意了。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公然以威逼利诱的手段来操纵第三届议会的选举。因此，斯托雷平就拨给莫斯科总督赖因博特将军一笔专款来为名义上是十月党人的候选人的古奇科夫贿选。这么做所带来的后果是：一个立法机关并不是由俄国人民选举出来，而是由斯托雷平挑选出来的。

在6月3日新选举法通过以前，弗雷德里希斯男爵曾询问我对于此事的看法。我不知道是他自己要来问我，还是上司授意他来问的。我对他指出目前政府有两种办法可行：要么耐心等待现在的议会逐渐变得合理，要么以极审慎的态度利用实施现行制度的经验，另拟定一个排除现行选举法中的各种缺点的新的选举法。

如果政府采取第一个办法，那么必须严格遵守1905年10月17日宣言的精神与规定。我的这个忠告并未被采纳。第二届议会被解散了，并且公布了仓促拟就的新的选举法。

由于我的建议，根本法中所规定的皇帝对于国防事务的权力是很大的。斯托雷平颁行6月3日选举法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顺从皇帝的议会，其中大多数代表都属于所谓的10月17日党派，政府与议会之间达成了一项默契。按照这个默契，议会可以批评政府的军事政策，但不得过问当时登峰造极的斯托雷平的白色恐怖的统治方法。如像斯托雷平在对议会的多数派十月党人的领袖们所说的一样："你们可以随意充当军人，我不管你们，尤其是我对于军事一点也不懂。但是你们不得干涉我，你们必须让我玩这套军事法庭和行刑的嗜血游戏。"

后来议会组成了一个国防委员会，煞有介事地讨论起军事问题来。当时十月党人的一些顶级演说家们发表很长的演说，抨击政府的军事预算，夸耀他们的爱国热情，抨击一些经常受到皇帝特别感谢诏书来表扬他们为国家立下丰功伟绩的亲王们。这些演说是俄国的一桩新奇的事。自然，一般民众钦佩这班演说家的勇敢而对他们怀有莫大的期望。但真正了解这些演说家的人或是熟悉军事的人则不会被这些表演所蒙蔽。亲王们往往占居军事要职，但他们一点也不称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种偏私的任用当然是一项重大的弊病。至于其他的议论，在十月党人领袖们的讲演中所包含的也不过是些道听途说的事情。古奇科夫这位在议会中谈论军事的主要讲演家，对于他所谈论的问题只有一点很有限的而且令人颇感怀疑的知识。他实际上不过是商人出身，非常喜好军事冒险。1909年议会提交国务会议一项有关海军参谋本部的法案，这项法案规定参谋本部的预算与技术组织完全由议会与国务会议管辖，这已特别清楚地暴露了议会对于军事问题毫无处理的能力。

依照宪政宣言的精神改组了的国务会议，原想与议会协调地工作，使两个立法机关互相补充。但实际上两者对于提交给他们的立法草案任意篡改，丝毫没有协调的精神。如果议会说是“白的”，国务会议中的保守派一定要说是“黑的”。

最能说明斯托雷平那毫无原则的政策与做事轻率的表现，就是他对于棘手的犹太人问题的处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几乎与我的观点南辕北辙。我始终认为限制的政策不能获得任何效果，因为从长远来说，这种政策并不能贯彻执行。犹太人在西方各国的历史就足以清楚地证明这一论断是正确的。人们可以对犹太人采取各种不同的态度。人们可以憎恨他们，或者对他们漠不关心，那是个人感情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态度却不能改变事件的自然进程，由于这种进程，犹太人既然终究是人，就应获得充分的公民权利。不过我认为废除对犹太人的各种限制必须逐渐施行，愈慢愈好。

尼古拉一世皇帝和亚历山大二世皇帝都赞同这个观点。亚历山大三世皇帝的看法则稍有不同，所以采取了反犹太人的限制政策。但这和他所做的其他任何事情一样，他的反犹太人政策虽然是坚定的，但也是温和而适度的。

有一次亚历山大三世皇帝问我：“你真的同情犹太人吗?”我回答说：“我答复陛下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反问陛下是否认为有可能把所有的俄国犹太人都投入到黑海中淹死。这样做当然是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但是如果陛下还承认犹太人有生存的权利，那就必须创造使他们得以维持人类生存的条件。要是这样的话，逐步废除对犹太人的种种限制便是唯一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

皇帝没有说什么，而且他也从未表示不赞成我对于俄国犹太人的态度。在我的全部经历中，皇帝的态度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在我担任财政大臣时，我极力反对限制犹太人权利的一切措施，但是我没有权力去废除反犹太的现行法律。这些法律大多是不公

正的，而且从整体来说，它们对于整个俄国与俄国人危害很大。关于犹太人的立法问题，我并不考虑犹太种族从某项措施中得到的利益，我最关心的是任何措施对于整个俄国的影响。

在过去十年间，所有关于犹太人的比较重要的法律规定都是作为临时措施颁行的。这些法令总是以这样的伪善的格式开始的：“在修订关于犹太人的法律期间，我们命令，等等”，这暗示这样的修订会是有利于犹太居民的。事实的情况是：拟定反犹太法律条文的人们没有勇气拟出一个根本的、明智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他们都知道国务会议可能反对这些限制的措施，或者至少也要说一些令人不快的事实给大臣们听，所以反犹太人的规定都是经由大臣委员会、特别委员会或直接由皇帝下诏颁行的。

谢尔盖·亚历山德洛维奇亲王就是与犹太人势不两立的人们中的一个。这位亲王由于他那种极端反动与短见的政策，使莫斯科陷人到革命党人的手中。他所采取的压制莫斯科犹太人的措施，连大臣委员会都拒绝批准，所以不得不改由特别委员会通过或直接由皇帝下令施行。

要想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还要花费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犹太人的种族特征才能逐渐缓慢地消失。如果政府能够仿照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对犹太人的政策，那么他们也许就不会成为我们所诅咒的革命的有害的因素之一，犹太人问题也就不会具有特别尖锐的性质，而只具有与所有那些有大量犹太居民的国家相同的形式了。

关于犹太人的全部立法的含义都极为模糊。这种情形自然引起很多任意的和自相矛盾的解释，成为各种各样非法勒索的依据。所以在全体民众中，犹太人受行政机关敲诈最为严重。在某些地区这种榨取已成为一种对犹太人征收捐税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反对犹太人政策的全部负担就落在比较贫穷的那些犹太人身上，因为越是富裕的犹太人，越能利用金钱贿赂来自保，也就越少感

到各种限制措施的压力。有钱的犹太人不但感觉不到法律限制的压迫，他们由于能够对当地高级官员施加影响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一种作威作福的地位。

八十年代早期，枢密院曾想消除对于有关犹太人法律的任意曲解，并废除各种对犹太居民非法的限制。结果内务大臣责难某些枢密官干涉行政。他们被责骂，有些比较倔强的甚至被革职，而代以较为顺从的人。结果，枢密院对于有关犹太人法律的解释也开始明显地变为反犹太的了。

这一切自然使犹太民众都倾向于革命，尤其是犹太青年，而俄国的学校正在促使犹太青年进一步革命化。犹太人在大约三十年前还是一些怯懦的人，如今却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男子和妇女，他们投掷炸弹，进行政治上的暗杀以至为革命牺牲他们的生命。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变成革命党人了。几乎全部犹太知识阶层，连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在内，都加入所谓的“人民自由党”（立宪民主党），因为这个党许诺给他们平等的权利。这个政党从它对犹太人的影响得到许多好处，犹太人给予它以精神上和钱财上的支持。

我一再警告国内外的犹太人领袖们，他们已经走上了危险的道路，很可能使俄国的犹太人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我告诉他们必须以实际行为来表现他们对现政府的忠诚，以向沙皇政府请愿的方式来谋求改进他们的现状。我劝他们不要梦想革命的自由，而应当采取这样的口号：“我们所唯一请求的是不受歧视。”但是我的这种劝告没有产生效果。由于革命狂热的蒙蔽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哄骗，他们不考虑我的善意忠告。

的确，在他们以为革命的胜利，也就是给予犹太人以平等权利的原则的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刻，他们怎能听取要对皇帝效忠的劝告！

其结果是引起了一种强烈的反应。许多原来同情犹太人或是

漠不关心他们的人现在转而痛恨犹太人了。俄国犹太人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多的敌人，他们的境况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危险。这样的局势非常不利于国家的稳定。我深信只要犹太人问题还以这样一种偏狭、报复和非人道的方式来处理，俄国就将永远处于不安和骚乱的状态。另一方面，若立刻给予犹太人以充分的权利，我又担心会引起新的暴乱和纠纷，反而达不到原来的目的。我一再说，由于种族的特点而产生的传统偏见的问题只能逐步解决。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应当避免破坏平衡，即使这种平衡是暂时的和人为的。国家本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我们在操纵它时必须非常地谨慎。

一提起1882年的反犹太立法案来便会想到伊格纳捷夫伯爵，他实行的那种无情的反犹太政策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在位时的内务大臣托尔斯泰伯爵是一个极端保守的然而却又极端明智的政治家，他不会做出像伊格纳捷夫那样的错事。他虽未能革除伊格纳捷夫的弊政，但却又不沿袭他的旧制。托尔斯泰死后，伊·康·杜尔诺沃又采取了伊格纳捷夫的政策，虽然他对几个犹太富翁十分友善。此人的学识很有限，当时宫廷侯臣盛行压迫犹太人的风气，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不过是为了博得这些大臣的欢心。但是普列维才是反犹太政策的主要人物，在伊格纳捷夫和杜尔诺沃当政期间，一切反犹太人的法律和行政措施都是由他制定的。他个人一点也不反对犹太人。这是我多次和他谈过犹太人问题以后得出的结论。他具有足够的智慧，懂得他在推行一种根本错误的政策。但是这样做博得了谢尔盖·亚历山德洛维奇亲王的欢心而且显然也博得了皇帝的欢心。所以他就竭尽全力来推行这种政策。

俄国犹太人问题的特征——集体被杀戮——在伊格纳捷夫当政时期最为猖獗。托尔斯泰伯爵继任后立即对这种暴行严加禁止。到普列维上台后这种屠杀的浪潮又高涨起来。基希涅夫的反犹太

暴动尤其残酷可恶。我不能冒然说普列维亲自策动这种杀戮，但他却不反对这种暴行，他认为这是反对革命的行动。基希涅夫的屠杀引起了整个文明世界的哗然，普列维乃开始和巴黎的犹太人领袖以及俄国的犹太法律家谈判。他对这些人这样说道："只要让你们的人不再从事革命活动，我就可以制止屠杀并废除对犹太人的种种限制。"这些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无法控制目前的局势，青年人被饥饿所驱，已经不受约束了。但我们相信如果现在开始执行一种取消压迫犹太人的政策，犹太人之中的骚乱就会逐渐消退。"普列维似乎对此信以为真，采取了对犹太人较为宽大的态度，但不久他就被暗杀了。

我愿意再说一说在我当政时期犹太人的状况。我们必须承认犹太人在领导暴动队伍，在煽动不满情绪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自然，这种情况可以归因于犹太人处于不堪忍受的法律地位和政府不但容忍而且策划对他们的屠杀，而这些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证明犹太人的上述行为是有依据的。不过无论如何，犹太人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是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

在我刚刚被任命之后，由可敬的富翁金兹布尔格男爵率领的犹太人代表团便来访问我。我接见了他们。我还记得除金兹布尔格外这个代表团之外还有韦纳维尔律师，后来他是第一届议会圣彼得堡市的代表，还有斯利奥兹贝格和库利舍尔，他们都是法律界的名流，还有就是那位著名的铁路建筑家的儿子瓦尔沙夫斯基。他们请求给予犹太人以充分的公民权，并要求我把此事呈报给皇帝。我坦白地说明了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强调废除法律上的种种限制必须逐渐施行，否则在一些乡村地区，会引起真正的屠杀。我告诉他们，为了使我能够提出给予犹太人权利的提议，以及提出在法律面前犹太人与其他民族平等的原则，犹太人也必须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他们一定要向皇帝开诚布公地说明——同时以实际行为来证明——他们要求皇帝的只是和他的其他臣民平

等的待遇。我对这些代表们说："近几年来，犹太人已经成为各种政党的领袖人物，并鼓吹最极端的政治思想。教训我们并不是你们份内的事。把这项工作留给那些有公民资格的俄罗斯人去做，你们莫管闲事。你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你们现在的行为将会带给你们以及你们的子孙有害的后果。"

金兹布尔格男爵表示完全同意我的见解。斯利奥兹贝格和库利舍尔也表示赞同。只是其他代表没有被我的议论所感动。例如韦纳维尔，就声称目前俄国人民，不分种族与宗教，都将获得政治上的自由与充分的公民权利，支持那些正在为国家政治解放而奋斗的俄国人是犹太人的义务。因此这次会谈便无果而终。

1907 年夏天我到了德国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城，在我的一位老相识富翁阿斯克纳西家中会见了当地的一些犹太人领袖。他们都是德国犹太人中的代表，其中包括著名的来自柏林的纳坦博士。我大体上对他们重述我在圣彼得堡时对犹太代表团所发表的意见。这次纳坦博士像韦纳维尔一样表示不同意我的见解。我从法兰克福到了巴黎，在那里我又遇见许多事业有成的法国犹太人。我仍旧重述我此前对俄德两国犹太人所发表的意见。这些法国犹太人表示赞同我的意见，不过他们无法对俄国犹太人施加影响。现在，我想犹太人都明白谁是正确的，是我还是那些拙劣的（温和点说）顾问。

当斯托雷平开始执政时，朝廷中正盛行狭隘的民族主义。他认为采取迫害一切非俄罗斯血统的俄国国民政策对他个人是有利的。这些国民约有六千万人，占全帝国人口的三分之一。随即实行了一些新的反犹太人的限制。1908 年 9 月 16 日，皇帝批准了一项由大臣会议拟定的关于"准许犹太教徒入学的百分比的议案"。这项具有立法性质的措施原应经议会与国务会议通过，但当时斯托雷平并不把议会当作一个立法机关，而是把它当作内务部属下的一个办公处。这项法令是斯托雷平对犹太人开战的第一枪。

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任总理大臣时期，教育大臣托尔斯泰伯爵曾提出犹太学生人数比例的问题，但他的目的是想废除限制犹太人受教育机会的那些规定。托尔斯泰在大臣会议上提出了取消这些限制的议案。我认为他所依据的理由是完全正确的，即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好办法是通过俄国的教育而实现种族同化。经过详细的讨论之后，大臣会议决定赞成这个议案。但皇帝未予批准而将它退还给大臣会议，同时声称关于此事他以后将另发训令。这件事足以表明我的内阁与斯托雷平内阁对犹太人政策的不同。斯托雷平上任之初，确曾有意废除某些现行的对犹太人的限制。他草拟了一篇备忘录呈交给皇帝，但皇帝又把这事搁置起来。1907年，由斯托雷平主持的大臣会议也讨论过犹太人的无权问题，决定必须开始逐步废除现行的各种限制，但这次会议的记录又未得到皇帝的认可。

一年以后，斯托雷平完全改变了他的政策，于是在俄国逐渐掀起了一个激烈的反犹太人运动，这个运动既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在政治上也立不住脚。目前，迫害犹太人已达极峰，我认为那些反犹分子本身都不知道他们将被引向何地以及反犹的目的是什么。一个人可以不同情犹太人，可以认为他们是一个可恨的民族，然而，他们究竟也是人，也是俄国的国民，唯一对待他们的办法就是和其他文明国家所采取的方法一样，使他们逐渐融入到当地社会中去。

1907 年 11 月美国当时的陆军部长、现任总统的塔夫脱到圣彼得堡访问。我还记得罗斯福曾以友好和称赞的词句谈到他。事实上他之所以被选为总统也是由于罗斯福的力量，因为罗斯福希望塔夫脱忠实于他，但是，事情往往不遂人愿，现在两人处于敌对的政治阵营，如果共和党占优势，两人之中谁做总统候选人的问题还正在辩论中。依我个人的看法，当然罗斯福比塔夫脱能干得多。人们知道美西战争时，罗斯福上校指挥在波多黎各的一支军

队。尽管罗斯福和塔夫脱都不是军人。据说塔夫脱在莫斯科逗留时曾觐见皇帝，在谈话间他提到美国籍的犹太人进入俄国的权利问题。

早在1905年4月，内务大臣布里根建议施行新的护照规定的同时，废除外籍犹太人进入帝国的一切限制。他指出这些限制毫无意义，只能使国际关系复杂化。议会成立之后，所有国务会议档案中保存的许多立法提案都发还给各部，以便再由各部向议会提出。布里根的提案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被发还到内务部，从此就永远没了音信。

我先前已经提过，罗斯福总统交给我一封写给俄皇的信，要求他取消对美国犹太人进入俄国的限制。这封信一直过了五年还未答复。我不知道两国间是否有过进一步的商谈，但美国仍然很是不满意。结果，几个月以前美国实在忍无可忍了，宣布废除美俄间的旧商约。俄国的强硬派自然对美国大肆抨击，但无疑是我们自己逼迫美国政府采取这一步骤的。

斯托雷平根据根本法第八十七条又颁布了一项十分重要的土地法令，这项法令只有熟谙过去五十年间俄国土地政策的人才能了解。

解放农奴的人们都赞成农民公社，那就是土地共有和共同耕种的制度。政府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是因为管理农民集体比管理个人容易，而亲斯拉夫人派与守旧派也都赞成这种政策。他们声称这种村社是俄国自古以来特有的制度，事实上是俄国人民生活的基础，违反这种制度就是破坏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完整。

成见是很难打消的，所以还有人坚持村社的主张。但大家都渐渐明白，实际上无论什么地方都有一个时期实行土地公有制，这不过是人类社会经济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初始阶段。随着文化与国家的发展，公有制被私有制所取代。在俄国这种演进的过程却受到人为的阻碍，结果是人民和国家都受到很大的削弱。

村社制也得到俄国的社会主义者的热心拥护。他们宣称农民生来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虽然以集体的经济生活方式为目标，但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失败。迄今为止，社会主义曾经成功地指出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的弱点和缺点，但是它却未能提出合理的和切实可行的沿着新的方向重建社会的原则。

亚历山大二世皇帝被刺后的反动时期村社制仍然是内务大臣所乐于称道的事物，但农民们的公民权利却被削减了许多。到革命时期，农民们处于非常可怜的状态。土地共有制仍然盛行，而种种法律上的限制使他们承受着沉重的负担。在法律上，农民们是不被当作普通人看待的。农民虽然已经不是地主的农奴，但仍然是农村行政机关的农奴，尤其是农村警察长的农奴。

在我初任财政大臣的时候，我对于农民问题的认识是很肤浅的。有一段时间，我颇倾向于担护斯拉夫人对于村社制的观点，因为我的思想总是受到一些伟大的理想家的支配。后来与现实接触，又受到了坚决反对村社制的前任财政大臣邦格的影响，才引起我对于农民问题的关注，也改变了我对于这问题的看法。我感到这种中世纪的村社制实在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要想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我觉得除了废除加在农民身上的种种法律限制以外，还必须使劳动成果成为劳动者及其子孙们的财产。只要农民知道他们所耕的土地可以随时给予村社别的人，他们的劳动成果不依照通常的法律分配而依照惯例分配，也就是往往由官吏任意处置，他们的邻人所欠的捐税也要他们来缴纳，最后，他们是完全听从农村警察长的支配，就不可能发展他们的生产效率或创造性。

自从尼古拉二世皇帝登基以来，改善农民的法律地位和经济状况便是我首先要做的事项之一。在我任财政大臣时期我竭力要废除缴纳赎身金制度，但却没有收效（“为什么放任农夫?”）。只是到 1905 年 10 月 17 日宣言公布以后，我才得以制定这项措施。

扩展农民银行的业务是我的内阁在改善农民状况方面所采取的另一举措。我们认为最好是把这个问题提交给即将成立的新立法机关之后再作进一步的打算。我们也分设了一系列地方委员会来研究土地情况，并且制定了一个土地改革纲领。这个纲领的两个基本原则是土地私有制和给予农民以充分的合法权利。从村社所有制过渡到个人所有制的转变，要渐进地而不是强制地进行。

斯托雷平的内阁和第三届议会利用了我们所拟定的法案，而与此同时却对这个法案加以歪曲，这足以导致现行的土地改革可能会引发严重的骚动。斯托雷平和我一样，想从农民中发展出一个小土地私有者阶级，但他这个人的特点是过于信赖强制手段的效能，所以他便开始执行一项强行破坏业已衰败的村社制度的政策。此外，虽然强制赋予农民以土地私有权，但新法律（1906 年 11 月 9 日法令）却没有给予农民全部的公民权利，特别是继承权。这次改革是仓促进行的，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没有对改革施行后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予以应有的重视，好像这只是一种普通的治安措施，而不是一项高于一切的全国性法令。它的结果是造成农村的骚乱与农民大众的迅速无产阶级化。

斯托雷平的独断专行、欺诈和残酷行为引起了人民大众的反对。从来还没有别的政治家招致这么多男人和女人的仇恨。例如全国的非俄罗斯民族都是他的仇敌。而且，斯托雷平失去了一切正派人的尊敬。在他初任总理大臣时，他的主要拥护者即黑色百人团的那些领袖也由于他的两面讨巧的做法而疏远了他。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看出他将遭到灾难，我看得很清楚，他这样迷恋官爵，总有一天会因此丧生。我的这种预感可以用下面的事例来说明。当著名的英国新闻记者狄龙在比阿里次拜访我并探询俄国局势的时候，我回答他说斯托雷平一定会遭遇一场大祸，从而使整个政局发生变化。

我的预言果然应验了。1911 年 9 月 1 日斯托雷平受了致命的

伤。这次行刺事件发生在基辅，当时举行一个盛大的戏剧公演，皇帝、几位公主、全体内阁大臣以及许多皇亲贵族都到场观看。行凶者是一个革命党的恐怖分子，此人同时也是特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几天后斯托雷平便死去了。皇帝对于死者夫人倍加抚恤，军国主义派的报刊同致哀悼，认为斯托雷平之死是俄国的重大损失，并且为在全国各处塑建纪念雕像发起募捐。自然，这种虚假的激动很快就消失了，接着便是对这位已故大臣在历史上的功过作了一番冷静的评价。

斯托雷平的一些友人把他的死归咎于特务机关的首领。他们指责警察总监和宪兵司令犯了很多不可宽恕的过错。我同意如下的看法，我们的警察部门尤其是特务机关在斯托雷平当政期间极为腐败而且风纪败坏。但这一点也是斯托雷平一手造成的。他作为内务大臣，任命了警察部门所有较为重要的职务，事实上警察部门的最高首脑都是由他任命的。因此，他受了他自己的恶劣统治之害，真是搬了石头砸自己的脚。

谋杀一个人固然是违法的，但是在谈论斯托雷平被暗杀事件时，人们应该想到有好几百无辜良民被处死，或者不如说遭到斯托雷平政府的任意谋杀。他的死和许多其他政客一样，他们没有用手中的权力去为人民谋福利，而是用来为自己攀权夺利。伟大的拿破仑说过："政治家是冷酷无情的。"不幸的是，斯托雷平不仅冷酷无情，而且全无心肝。他这人有个性，有勇气，但是缺乏耐力。结果他败坏了他所接触到的俄国政治生活的全部。

从皇帝的立场看来，斯托雷平可谓死逢其时。在他遇刺数星期以前，当时我正在比阿里次，我接到一封奇怪的信，信末署名是我认识多年的萨佐诺夫。这个人的经历颇值一谈。据说他在青年时代和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热利亚博夫很要好。有一次他曾给激进派的报纸写文章，但当革命到来时，他为了个人的利益又加入极端反动的阵营。他和米古林教授合作，后来又和有势力的教

士们如霍尔莫格内斯大主教、伊利奥多尔神甫以及拉斯普廷长老等关系甚密，并和拉斯普廷尤为亲近。拉斯普廷来圣彼得堡时就与萨佐诺夫住在一起，萨佐诺夫渐渐扮演着一个在给热情期待的群众表演杂技的马戏团导演的角色。拉斯普廷信徒中的那些贵族夫人都到萨佐诺夫的家里看望他。很自然，萨佐诺夫本人就成了一个重要人物，因为拉斯普廷过去在宫廷中颇有势力，也许到今天依然如此。萨佐诺夫办了一个《经济学家》周刊，他竟能从财政大臣柯科弗采夫那里得到津贴。后来他又和米古林合作，从柯科弗采夫那里获得一份开办银行的许可证，这两人随即把这个许可证以大约二十五万卢布的价格卖给别人了。由于柯科弗采夫的建议，这家银行的董事们又增加了十万卢布。萨佐诺夫用其中一部分款额创办了一份报纸，在具有进步倾向的伪装下，以印刷的文字来进行讹诈。

萨佐诺夫在他的信中告诉我，斯托雷平已经完了，皇帝已决意在基辅的仪式举行以后立即罢免他。萨佐诺夫写道，皇帝已经选中下诺夫哥罗德省的省长赫沃斯托夫为内务大臣。萨佐诺夫又说：他和拉斯普廷即将到下诺夫哥罗德去和赫沃斯托夫作最后的会谈，他们很有把握地认为赫沃斯托夫会成为一个令人钦佩的内务大臣，但是因为他年岁尚轻，是否合适继斯托雷平出任大臣会议主席，大家都觉得有点疑惑。因此，萨佐诺夫想要知道我是否愿意出任大臣会议主席以给新内阁增添声势。

我可以说，赫沃斯托夫这人是斯托雷平当政时期，最恶劣的官僚之一。他蔑视法律的程度比其他任何省长更甚。不久以前，他呈给皇帝一篇备忘录，他在其中断言俄国正处于一种潜在的动乱状态，斯托雷平虽然已将革命风潮压制下去，但若政府不采取适当措施，革命可能再次爆发。因此他建议把一切有嫌疑的人以各种方法处死。

我回答萨佐诺夫，大意说他的信我收到了，他们的提议使我

不明白究竟是他们自己神经失常，还是他们猜想我完全发疯了。

事实上斯托雷平的职位是由柯科弗采夫继任了，而内务大臣一职则任命了马卡罗夫。在最近这几年柯科弗采夫是反对斯托雷平的，所以人们期望他会实行一种公正的政策。但是这个期望很快就落空了。当柯科弗采夫第一次出席议会时，他发表了一个长篇演说。因为他善于说话，并且喜欢作长篇演说，所以莫斯科的商人们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作“话匣子”。他演说的内容是这样的：政策是由上面决定的，不会因大臣的易人而变更；当他任财政大臣时，可以不同意大臣会议主席的政见，但当他自身成为主席时，他只好延续已故的斯托雷平的政策。

一般说来，斯托雷平的政策就是要拒不实行我当政时在公布的宪政宣言中所作的各种许诺。宪政宣言许诺给予人民以不可动摇的种种公民的基本权利，如不可侵犯人身权以及个人信仰、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我们在亚历山大二世皇帝时期所制订的法律与十九世纪各文明国所盛行的法律意识是一致的。亚历山大三世皇帝登位后，因为受了他父亲被刺的影响对这些法律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他颁布了一些暂时的条例，由大臣委员会通过后实行。其中包括“非常状态”法令，这一项法令使宣布施行的地区实际丧失了法律的效力，把这些地区完全交给了当地行政机关与军事当局管理。议会与国务会议两个独立的立法机关的创立，使人们有可能希望铲除我国立法制度的缺陷，希望这两个机关可以对于现行法律的公正性与严格的执行加以监督。然而人们的希望终究是一场泡影，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我们的议会在政治上失去了理智而幻想能够在俄国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另一方面，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竟托付给斯托雷平这样的一个人。

所谓“非常状态”条例是一种临时性的法律，其条款到1906年就已失效了，斯托雷平靠了一道上谕的力量把这些条款的有效期延长了三年。第三届议会的议员们都是由政府遴选的，

所以议会假装没有发现政府的不法行为。现在，行政机关任意宣布“非常状态”，而且由于斯托雷平擅自篡改，这些条例与原作者普列维和斯托雷平当政以前三十年间那些施行这一条例的人们的原来意图相左。目前，形势变得异常令人气愤，警察可以毫无法律依据而闯入你的家中，搜遍所有的器物，攫走任何足以引起宪兵兴趣的文件，毫无理由地逮捕你，甚至把你流放到偏远边区或外国。

斯托雷平当政后扩大检查私人信件的范围足以说明现政府对个人不可侵犯原则的践踏。我记得当我就任大臣会议主席不久，有一个官吏自称奉了内务大臣之命来见我，问我关于那些将要送呈我审阅的已查看的信件有无训令。虽然我并未给他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训令，但杜尔诺沃坚持每天送交我一袋检查过的信件。我把这些信一一看过，但我承认在我当政期间，我没有发现过一封与国家或治安有关的信。

有些信含有对我毁谤的言辞，我清楚地记得一件奇怪的事。现任国务会议成员的舍列麦捷夫伯爵与我个人有深厚的私交。自从朴次茅斯条约订立之后，他对我衷心钦佩，常常写给我妻子很长的信以表达他的热情。这时在这些检查过的信件中，我多次发现有的信中言辞对我很不恭顺——温和一点来说——信末尾的署名就是舍列麦捷夫伯爵。

我认为检查私人信件实质上是一种有害的做法。它使行政当局能够洞悉私人的机密事情，从而使内务大臣插手解决私人事务。我确信斯托雷平如果不是审阅那些信件，他会更正当地对待许多人，从而他的敌人就会少些。

提到斯托雷平和他检查信件的缺点，我想起一桩很有特点的事来。有一次在国家议会中讨论邮政问题时涉及了检查信件一事。有一个内务部的代表宣称检查信件是空想的神话，不再实行了。实际上，当时信件检查正以空前的规模实行着……

检查信件的做法至今仍然存在。就在前几天我对柯科弗采夫提起此事，他坦白地告诉我，他每天接到一大堆检查过的信件。他又愤怒地说，就在那一天他碰巧发现农业大臣克里沃申对他个人作了一个不利的报告。为了使克里沃申狼狈不堪，他打电话给他，和蔼地劝他以后在通讯中说话要多加小心。

行文至此，我想起斯托雷平的另一个特性来。内阁大臣们在议会中往往被逼至绝境，而不得不对某一质问作出明确的回答。如果为了某种理由不能说真话时，大臣可以避而不答，但他通常不能以高贵的姿态说谎。至于斯托雷平，他却遵循另一条法则，他以十分肯定的态度撒了一个大谎。下面就是一个事实例证：

我做大臣会议主席时，创办了一种名叫《俄罗斯国家》的报纸，我之所以创办此报是出于万不得已，因为其他的报刊都已革命化了，政府有必要创办一种机关报来对公众发表声明并反驳充斥于各种报纸上的谣言。斯托雷平认为这份报纸并不适合对公众施加正面影响，所以把它关闭了，而接办一种已经发行的《俄罗斯报》，他认为这个报纸会更成功地制造舆论。但是这种天真的策略自然不能达到它的目的，因为全俄国都很清楚知道《俄罗斯报》是一份政府的机关报，它有政府津贴，并受政府指导。

当议会试图要知道《俄罗斯报》是否由政府供给经费的时候，斯托雷平厚着脸皮令他的一个下属克里扎诺夫斯基到议会宣称《俄罗斯报》是一家私营的报纸。直到今天这家报纸还在继续发行，当然对于舆论没有丝毫影响，其他各报都通称它为“私营报纸”。

宪政宣言中许诺给予人民以出版自由。为了履行这个诺言，1905年11月14日以上谕的形式颁布了暂行出版条例，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 在规定出版业的总的法律颁行以前，我们认为公布关于定期出版物的暂行条例是必要的，这些条例是大臣

会议根据柯别科提供的材料经过国务会议的审核而拟定的。这些条例废除行政机关对定期出版物的管制，并规定有关利用印刷品造成的违法行为交给国家法院审理。

由于许多新创立的定期出版物不按条例行事，这些规定的执行实际上受到了阻碍。因此，到第二年三月又公布了一系列补充条例。总的说来，这些新的条例并不违反暂行出版条例中许诺人民出版自由的原则，也不违反任何利用印刷品造成的违法行为必须交给法院审理的原则。在我辞去大臣会议主席以后的短短几天，关于非定期出版物的条例就公布了。

自从宪政宣言发表以来已经过去七年了，关于出版事业的法律一条都未制定出来。出版业仍奉行 1905 年公布的暂行条例。当前的局势是，由于第三届议会的纵容，斯托雷平得以违背这些规定。在头两届议会存在时期，斯托雷平还不敢大肆破坏法律。但是当第二届议会解散的时候，许多报刊出版机关便被大量地封闭了。

斯托雷平认为我当政时公布的出版法是过于宽纵了。于是柯科弗采夫在考夫曼的支持下提议应当重新拟定一套新的条例提交议会讨论。但是斯托雷平却反对这个计划。他主张还是凭借全能的“非常状态”条例，这些条例授予地方长官任意对各报课以罚金的权力，所以他认为不必再通过新的法律，只要把现行规定加以更严格的“解释”就行了。斯托雷平的这个办法是最方便不过的，因为经过谢格洛维托夫的一番努力之后，法院已失去它的独立性。虽然内阁中其他阁员都反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实际上也不合法的政策，但斯托雷平仍是一意孤行。结果现在的出版业又只得听凭行政当局的任意摆布。如果有某家报纸上的文章冒犯当局，大臣便立刻电话通知地方总督或是他的办事处官员，命令他们去对那家报社处以罚金，这种命令通常被立即执行。而且，如果他认为处罚得太轻的话，地方总督可以依据“非常状态条例”，把编

辑监禁许多个月……

一个我忘记姓名的大臣告诉我，有一次他谈到暂行出版规定的起草人柯别科时，皇帝就说："由于柯别科拟定出版法的纲领性精神，我将永远不会宽恕他。"

在我当政时，大臣会议草拟了一套精心制定的规定人民集会结社权利的法律。但这些法律后来遭遇了与出版法同样的命运。在斯托雷平当政时，尤其是在6月3日政变以后这些法律遭到比出版条例所遇到的更加肆无忌惮的破坏。这项法律只是一纸空文，并不影响政府的实际行动。行政当局可以为所欲为，这就是斯托雷平的狂言。其败坏风纪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俄国的方方面面，以致要想净化俄国政治机体的血管，非花费多年的努力不可。

最后，关于信仰自由，情况仍未改变。除了1905年4月17日和同年12月4日的两项法令以外，并没有增添任何东西，而4月17日的法令只影响到年长信徒，至于要废除宗教上的其他限制则还远未实现。事实上斯托雷平尽力限制以上两项法令所赋予的各种权利。必须承认，第三届议会关于宗教自由的法律所做的行动是非常值得称赞的。但是这些议案不是被搁置在国务会议中，就是遭到了这样重大的篡改以致完全背离立法者的初衷。

因此，总的来说，我的内阁执行了宪政宣言中许诺给予人民以公民自由权的条款，这是宣言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各立法机关都得到控制行政机关活动的权力，公布了规定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法律。自从议会与新的国务会议成立以来，"非常状态"似乎不经立法机关的批准就不能宣布。最后，宗教宽容的原则也在法律上建立起来了。然而直到我写这篇回忆录的今天，距1905年10月17日宣言颁布已经过去了七年，公民自由权仍然是海市蜃楼。事实上我们今日所享有的公民自由权比宪政宣言公布以前还要少，在过去五十年间行政机关也从未像今天这样跋扈。

有几项事实可以说明这种情况。一方面有必要考虑不光是那

些极端的革命分子，而且几乎所有自由主义党派的人都缺乏政治远见。在那些革命的日子里，他们都非常疯狂，不从现实出发来考虑问题，他们不承认政府的一切法令，认为那些法令过于保守。另一方面，这庞大帝国的大规模暴乱使许多人感到恐惧。结果反动势力趁机占了上风。这个运动获得朝廷中一些人士的支持，在它极端的一翼的行为与革命运动的表现一样狂暴。后来斯托雷平的内阁当政了，在这些当政的人们的心目中只有名利二字，对于他们来说，不管俄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还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都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所谓忠实于10月17日宣言只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事实上，他们赞成警察的专横统治。

这种事态的结果如何呢？我坚信最后俄国将会诞生一个立宪的政府，并且，像其他文明国家一样，公民自由权的原则将在俄国生根。10月17日宣言的精神不会被宫廷政治或军事暴力所毁灭。唯一的问题是这种改变将以何种方式产生：是作为和平努力的成就而来到呢，还是经过大量的流血才实现？作为一个忠诚地拥护君主制度的人，作为罗曼诺夫皇室的忠仆，作为尼古拉二世皇帝的忠诚的臣子，我对他矢志追随并满怀同情，我祈求上帝，但愿这个变化无须流血而和平地到来。



第十四章　我和德国皇帝打交道的经验

在埃姆斯城我第一次遇见了那位命中注定会成为德国统治者的人。那时正是他祖父威廉一世大帝逝世前不久，这位年轻的王子被他的祖父带到埃姆斯。这位老皇帝经常每隔一段时期到这著名的海滨胜地来休养。这次是威廉皇帝最后一次来埃姆斯。碰巧我也在那里休养。这位皇帝住在库尔豪斯大厦，并且常喜欢在他的书房中一个面临大厦广场的大窗户边办公，所以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他工作时的情形。他的孙子总是站在他的扶手椅子旁边，他的举止就像是皇帝的侍童，这使我十分惊异。年轻的王子以非常尊敬的态度启封包裹，为他的祖父削铅笔，把钢笔递给他，并勤谨地做其他一些琐事。

我第二次见到这位未来的德国皇帝是我当西南铁路公司经理的时候，那时是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当政的初期。我还记得，在一个晴朗的日子，皇帝来到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与比亚威斯托克之间一个小的火车站，当时他是在去布列斯特附近兵营检阅军事演习的途中。第二天清晨，皇帝的护卫队队长钱里文副官来见我，问我把皇帝的一套军服从圣彼得堡取来需要多少时间。他告诉我说，德国老皇帝曾听说亚历山大三世皇帝要到布列斯特来检阅军事演习，所以派他的孙子（现今的德国皇帝）来迎候。但我们的皇帝显然不愿意在检阅时看到这位霍亨索伦家族的年轻王子，所以决定到演习结束时，再到布列斯特与他会面。为了这次会见，

皇帝需要穿他的普鲁士式军服，而这套服装当时在圣彼得堡。我回复他说，以专车轮替行驶，四十八小时就可以取来。于是我就发出命令，军服按时送到了。不久之后，皇帝就协同皇后离开车站旁边他们暂住的城堡，去了布列斯特。

我当然也在御用列车上，他和威廉王子会见的情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我们的列车在德国王子所乘的从华沙开来的列车抵达前的几分钟进入布列斯特车站。亚历山大三世皇帝下车后在月台上他的仪仗队前面踱来踱去。他穿着他的普鲁士式军服，外罩一件俄国式的斗篷。当威廉王子的列车驶近他站立的地点时，他把斗篷脱下来，交给紧随在身旁的哥萨克侍从。皇帝和这位威廉大帝的孙子见过礼之后又照礼节向他介绍各随员，并检阅仪仗队。这时候，威廉王子始终跟随在皇帝身后，好像是皇帝的侍从武官一样。仪式结束后，皇帝转向这时退到后面去的哥萨克侍从喊道：“我的斗篷!”威廉王子懂得一些俄语，他这时快步走到哥萨克侍从那里，拿过斗篷，走到皇帝面前替他披上。显然他是被俄皇的威严吓住了。这位王子的举动使我十分惊异，因为在俄国宫廷这类举动是前所未闻的。后来我对于威廉的性情知道得更多一点，才觉得他这次殷勤趋奉的举动与他的信念完全相符。按照他的观点，一个皇帝就是一个超人。现在，他的弟弟亨利王子经常在向他告别的时候当着众人吻他的手，一点也不使他为难。他认为这是对他表示他理应享有的尊敬的举动……

值得注意的是，威廉继承了德国皇位之后（他的父亲继位几个月后因喉咙生癌而死），他年轻时亚历山大三世带给他的威严的印像还未完全消逝。我记得听他说过，这位伟大的俄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他有一次对我说：“的确，他才是一位至尊皇帝。”

我和威廉二世皇帝间接的接触是在俄德两国发生龃龉的时期，结果在1894年缔结了第一个俄德商约。这次冲突的经过，可以简述如下：德国政府为了在经济上剥削我国，对于我们输入德国的

货物特别是原材料征收非常高的关税，使我们的农业生产大受影响。作为报复，我们提高了对德国输入品的关税。我们的这种抵抗（我是主张采取这种政策的人们中的一个）进行得非常坚决有力，结果在两国之间的一场真正的关税战之后，德国不得不放弃其侵略计划，而同意缔结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有利的商约。

威廉皇帝在这次交涉中大体说来起了调解的作用，我们强硬的立场得到了德皇的支持，德国的外交部长卡普里维伯爵在德国国会中取消了那些新关税制度，不顾那些利益受到损害的大地主与贵族们的强烈反对而签订了新的商约。

条约签字的时候我曾觐见亚历山大皇帝。在谈话之中我提醒皇帝注意，这次商约能够得到德国议会的批准是由于威廉皇帝的协助，因此，他理应得到我们的感谢。我接着说，我曾听说德皇很希望能得到一套俄国海军大将的军服，如果陛下能够赐予他这个荣誉，他将会感到很高兴。顺便提一下，威廉一向对于各式各样艳丽的服装，尤其是陆军和海军军服怀有一种特殊的热爱。皇帝听了我的话就笑了，说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将满足德皇的愿望并嘱咐我提醒他这件事。但后来还没有等到这样一个机会到来，亚历山大皇帝就逝世了，而履行这个诺言的义务就落到了他的儿子身上。我觉得必须将此事的经过报告给尼古拉皇帝，于是在他和威廉皇帝第一次会见时，他便将那套威廉皇帝所渴望的军服赠与了德皇。

我又联想起与此类似的一件事来，那发生在我做大臣委员会主席的时候，同样是德皇要求赠他一套俄国式军服。据旁人告诉我，他这次是要求一套俄国高级副官的军服。这时正当尼古拉皇帝对我不大信任，所以我无法使德皇如愿以偿。我知道他这次是托米哈依尔亲王为他疏通，但我不知道他的努力成功了没有。

在这里可以顺便提一下，在尼古拉皇帝执政初年，他并不喜欢这位德皇。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父亲是一脉相承的，亚历山大

三世皇帝就很厌恶德皇矫揉造作的举动与惊人的夸耀。尼古拉皇帝常常不禁感到在俄国与世人眼中，德皇的地位都比他本人高一筹。即使以外表而论，德皇也比他更像一个皇帝。由于俄皇有一些过分的自负，这总是使他苦恼的原因。我记得，在两位皇帝第一次会见之后，曾发行过印有两位皇帝以友好的姿态站在一起的明信片。威廉的胳臂放在俄皇的肩头好像在拥抱着他，因为尼古拉皇帝的身材只到德皇的肩头，所以德皇的胳臂还微微有点下垂。这些明信片立即被当局没收了。

另一个促使俄皇对威廉皇帝反感的原因就是德皇对于俄国皇后与其兄达姆施塔特公爵的态度。德皇对于公爵简直是怠慢无礼，而把皇后只当成一个小小的德意志公主。总之威廉皇帝对于他的这两位德意志同族人不是以应有的礼节对待的。据说德皇最近在法兰克福附近检阅军事演习时，向当时站在他身旁的达姆施塔特公爵说："我知道你很想得到一等黑鹰勋章，只要你答复我这个问题我就立刻给你：'一个骑兵上马的时候，哪只脚先入马蹬?'"

但到近几年来，德皇对于俄国皇后与其兄的态度却有了重大的改变，我现在就来说明其中的理由。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德国首相比洛与驻俄大使曾向我抱怨说，尼古拉皇帝对于他们皇帝的礼数不周，威廉皇帝给他的信，他也回复得很迟，对他的问候，他也不作答谢等等，这种情形是有碍两国邦交的。我对他们指出造成这种状态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威廉皇帝。只要他对我们的皇后与其兄长表示一点好意，两位皇帝之间的关系就自然会改善了。德皇听从我的劝告，很容易地赢得了亚历山德娜皇后与达姆施塔特公爵的欢心。这种情势又影响到俄皇与威廉皇帝的关系，从此二人通信频繁。

他们在最初交往的时候，德皇对于我们的皇帝持一种傲慢的前辈般的态度。但不久德皇就觉察出来这种态度必然会引起尼古拉皇帝的反感。于是他就立刻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改变，开始

把俄皇当作他的长辈来对待。要知道，俄皇无论在智力方面或道德方面向来是不甘居于人下的。与他往来的人都必须比他差，或者是他自己认为不如他的，或者是知道他的弱点而故意装作比他差的，他才能心安。我们的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伯爵一再对我讲，自从这两位皇帝密切通信以来，德皇曾屡次想做对俄皇不利的事，挑拨俄皇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法国不和，所以他本人不得不时刻加以提防。这位伯爵说，如果他手中保存的秘密文件一旦公布，全世界都会为之惊异。也许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威廉皇帝非常不喜欢我们的外交大臣。

俄皇已经与德皇之间进行了多次正式与半正式的互访。德皇最初几次访问俄皇就是在俄皇举行加冕礼的时候。德皇当时是由皇后陪同在 1897 年 7 月 26 日（俄历）来到彼得戈夫宫，到 30 日才回去。他们到达俄国的时候，当然要为这一对皇室贵宾设盛大宴席。在我到达彼得戈夫宫的时候（我也被邀参与宴会），德皇的一个随员通知我说德皇愿意在宴会之前见一见我，请我到他的寓所去。

就在那个七月的下午，在宫殿的一间豪华的套间里，我第一次这么近地见到了这位德国皇帝。我发现他并未穿着全套礼服，只是准备好在我们互致问候的礼仪之后与我作一次简短的谈话。

他讲话的内容大致是说他知道我是一个聪明的政治家，为了表彰我卓越的才能，他决定赠给我一枚黑鹰勋章。于是他亲自把勋章授给我，又说照例这勋章只颁给皇亲国戚或是外交部长。显然，他对我是过于夸奖了。

第二天我在德国驻俄大使馆为德皇举行的午宴上又遇见德皇。有人告诉我：德皇愿意邀请我来参加这个宴会，因为这次宴会参与者都是俄德两国的外交官。午餐之后大家都到客厅休息，德皇对每一个来宾都很和蔼，但在举止上却像一个纨绔子弟，手舞足蹈地比划着，完全不符合一个皇帝的身份。过了一会儿，德皇邀

我到大使的书房去，在那里只有我们两人。

在我们的这次谈话中，他首先要我注意欧洲正受到来自海外的威胁。他说，美国正在靠损害欧洲的利益而日渐富强，所以有必要在欧洲周围筑一道高的关税壁垒以使美国不能用它的产品来淹没我们。我们这个大西洋彼岸的竞争者日益强大，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对我们威胁很大，欧洲各国必须团结起来，把它关在大门之外，这样就可以阻碍它的发展。这时我大胆地对德皇说，英国的利益和欧洲大陆的利益并不完全相同，所以不得不把英国排除在拟议中的欧洲国家联盟之外。德皇对这一点却不同意，他说英国对于欧洲的农业并不构成危险，我们不能排除它，因为他有意与英国建立十分友善的关系。他又说，关税壁垒只是针对美国的。

这时我指出，不论我们联合英国与否，要对美国进行经济战是不可行的，因为许多欧洲国家都不会赞同。以俄国来说，我们就不愿接受陛下的意见，因为自从美国内战以来，我们同美国的邦交一向很好，我们不想与之发生冲突。

这样打消了德皇的计划以后，我又进一步对他表明我对总的政治形势的看法，直到今日，我仍持当时的那种看法。我先说明政治权威与经济力量是密不可分的，我对这位皇帝说，在当今世界各国之中，我觉得欧洲像一位衰弱的老妪。我继续说，除非发生根本的变化，欧洲不久就会把它在世界上的主宰地位让给海外新兴的帝国。欧洲大陆将被人们以礼相待，就像有礼貌的人士对可尊敬的老人所做的那样，这个时刻已经不远了。再过几个世纪，如今欧洲的伟大对于地球上的居民来说，也将如同罗马的宏伟、希腊的光荣以及迦太基的强大对于我们一样。

这位德国皇帝被我的话所深深打动，他问我有什么计策来对付我所预测的不幸。于是我说，“请陛下相信另一个欧洲，这个欧洲不把它的鲜血和财富浪费于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为进行互相残杀的战事而维持几百万人的军队，它也不是一个由一些与其

邻国争斗的国家构成的武装阵营。这个欧洲是一个政治实体，一个大的帝国。这样，我们自然会更富庶，更强盛，更文明。欧洲不但不至于因为内斗的损耗而渐趋衰朽，而将成为真正的世界的主人。为了达到这个理想，我们应该设法组成一个俄德法三国的坚固同盟。只要这三个国家一旦坚定地联合起来，所有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无疑都会加入这个中心的联盟，于是我们就可以组成一个包罗所有国家的大陆同盟，这个同盟将使欧洲不至于为了互相损害的竞争而消耗实力，并在很多年里保持着对全世界的统治。”

德皇以极大的兴趣倾听我的评论，他在和蔼地向我告别时说我的见解很有深度，并且很有意思。在我下一次觐见尼古拉皇帝时，他把德皇在离开彼得戈夫宫时交给他的一张简短的字条交给我。这个字条的内容就是德皇对我讲过的，他关于有必要对美国进行一场经济战的意见。我就向皇帝说明，我和德皇已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也把我对于此事的意见重述了一遍。皇帝听了表示十分赞同，就命我按照我的观点写一个对那张字条的答复。我以未署名的备忘录的形式写成这封复信。皇帝说他将再写一封私信，与这份备忘录一同寄给德皇。值得注意的是，当西奥多·罗斯福当选总统的时候，威廉皇帝开始和他熟络起来，两个元首间这种突如其来的友谊颇引起世人的注意。

在德皇逗留彼得戈夫宫的期间，发生了一桩给俄国历史留下深远影响的事件，这件事是后来阿列克塞·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告诉我的。俄皇告诉这位亲王，有一次两位皇帝一同乘车到乡间闲游，德皇问俄皇，中国的胶州港对俄国有没有用处。他又说，他想占据这个港口作为德国船舶的基地，但他不愿意在获得俄皇许可之前采取这个行动。皇帝并没有明确告诉亲王他是否默认德国占据胶州。他只说他的客人让他很为难，因为他对整个事件都极为反感。据我推测，我们的皇帝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他当时

不能直截了当地拒绝客人的要求，对方就把这种态度当成是默许了。

以后不久德国军舰就开进胶州港。我注意到当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我们的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伯爵好像并不感到十分意外。德国这次夺取胶州成为我们占领旅顺口与大连湾的借口。事实上这个事件仅仅是一个开始，随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最终引起那场灾难性的对日战争。

要占领这两个中国港口就会严重违反我们对中国的誓约，并且背弃我国传统的远东政策。当我听说他们不顾我坚决反对已经决定这样做的时候，我就径直去见德国大使契尔斯基，要求他打电报给德皇，说为了德俄两国的共同利益，我热切地恳求他在严惩凶犯之后，撤走胶州的德军，如果他认为合适的话，不妨要中国赔偿一笔军费；否则他的这个行动将引起最不幸的结果。几天之后，契尔斯基把德皇的复电拿给我看，上面这样写到："告诉维特，从他的电报判断，关于这个事件的一些很重要的情况他根本不知道，所以我不能听从他的劝告。"

到这时我才想起阿列克塞·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所告诉我的，在彼得戈夫宫发生的关于胶州的故事，同时也明白了为何穆拉维约夫伯爵在得知德军进入胶州时那样泰然处之。过了不久穆拉维约夫又与我谈论我所反对的占领旅顺口的事情，这时他吐露了真情：他承认我们已经——用他自己的措辞——"轻率地认可德国占据胶州了"。

此后连续发生的种种事件——我在本书的前面部分中已详细叙述过——使我确信德国外交政策和德皇本人的意图就是千方百计地把我们拖入到远东的冒险行为，以便把我们的部队转移到东方去，从而使他们在欧洲得以肆意妄为。在这里可以顺便提一下，威廉皇帝应该为布尔战争的爆发承担一定的责任。他发给克吕格尔总统一封露骨的、极具挑拨性的电报，用嚣张的口气鼓励他拒

绝英国的要求。而当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却谨慎地躲到后面去了。结果德兰士瓦（南非）共和国被毁灭了，而英国也暂时大为削弱。对于那些极端崇奉民族主义的人来说，威廉皇帝可算是一个最理想的杰出君主。凡是有利于他的国家与他所统治的人民的事，他都为之奋斗到底。

说到威廉皇帝为了他本身的利益而影响俄皇的思想的方法，使我想起一件事来。那是在1902年的夏天，两位皇帝出席检阅在真发尔举行的军事演习，当演习结束的时候，两国皇帝照例以两个御用游艇互发信号告别，德皇突然向我们的皇帝发出这样的话："大西洋的海军上将向太平洋的海军上将致敬。"——这句话的意思的真正意义在于："我设法去支配大西洋，你呢，我劝你去试图成为太平洋的主人，我愿意助你一臂之力。"很奇怪的是我们的皇帝在1903年给阿列克塞耶夫海军上将的信中，把他加以隐蔽的欲望泄露出来，那就是要获得主宰太平洋的地位。我觉得皇帝这个招致灾难的方针无疑是受了德皇威廉的影响。

我有理由认为皇帝在一定程度上察觉到德皇是为了德国的光荣事业而欺蒙了他。1903年两位皇帝在波茨坦会见的时候，尼古拉皇帝慎重地拒绝讨论任何政治问题，尤其是远东问题，这使得德皇大跌眼镜。看来对日战事的危险直到最后一刻，皇帝都没有深切地感觉到。就在日俄冲突开始前不久，威廉皇帝警告俄皇说日本正在狂热地备战，我们的皇帝却回答说，战争不会发生，因为他不希望发生战争。

战争刚一爆发，威廉皇帝就赶快向俄皇保证他对俄国的热忱，并保证俄国西部边界的安全。然而在他给俄皇的一封私人信件中，他要求改订刚到期的1894年德俄商约中的许多条款，以作为不从西线侵略俄国的补偿。这些条款的改变对于我们的工业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所以我坚决反对，并主张维持对德经济关系的现状。但可悲的是亚历山大三世时代已成过去，我们不得不让步

了。这件事随后在一次由我主持的大臣特别会议上加以讨论，会议得出的结论是：为了避免与德国决裂，我们不得不屈从他们的要求。于是朝廷任命我与德谈判，并训令务必取得进入德国金融市场的机会作为我们让步的补偿。这时候，我做财政大臣时所积蓄的基金已完全用尽，为了支持战争和平定革命风潮，我们急需一笔外国贷款。

这次谈判是在德国的诺尔德奈举行的，德方的代表是比洛首相。我在这个岛上过了两个星期，大部分时间都和首相在一起。他的夫人有时饭后也和我们在一起。她很喜欢看托尔斯泰的著作，当时她正读一部关于十二月党人的书。比洛问我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日俄战争有什么见解，我说在海上进行战争，我们将遭受挫败，但在陆上我们将获得最后胜利。我的这位主人力图使我感到德皇正在竭尽全力取悦于俄皇，他已经表现出他是俄国的一位真正的朋友。至于我们的谈判，我不久就察觉出来，他确实感到我们将对德国让步……他一定已从圣彼得堡方面得到消息，知道我已经接受指示：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使谈判和平结束。我们也有过许多争论，但终于达成协议。我不能说我是自由行动的，因为我不能忘怀俄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最不幸的战争，同时我们的西部边境实际上也是毫无防御可言。

远在会谈结束以前，我就和比洛谈到在德国发行一笔俄国公债的事。我说如果我们这次条约能够签订，我们希望德国的金融市场能对我们开放。就他个人而言，他觉得这事没有什么妨碍，但是他指出德皇的一句格言：“德国的钱只能给德国人用。”为了证明他的这番话，他拿出好几件德皇给他的电报文稿给我看。当条约即将签字的时候——我们为此事去了柏林——通过我的据理力争，终于获得德皇的正式许可，允许我们在德国的金融市场上发行公债。

由于我们对日战争，德国不但削弱了我们的实力，同时也间

接削弱了我们的盟友法国的实力。如果当时不是英法两国开始改善关系的话，即使德皇多么的不安分，在他获得以上这种成功的结果之后，德国本该保持一个长期的安静。英法两国关于他们各自在摩洛哥的势力范围达成了一项谅解，并签署了一份正式文件。德国就抓住这个事实，宣称它在摩洛哥有着自己的商业利益，它必须保卫这种利益，而且，无论英国还是法国在没有得到德国同意以前，都不能在摩洛哥采取任何行动。接着就发生了一场外交纠纷，德国的态度非常蛮横，看来德法关系有决裂的可能。这是因为柏林方面提出这样的意见：只要负责谈判英法摩洛哥协定的德尔卡塞还担任外交部长，德国的外交家们就不会妥协，结果德尔卡塞辞职而由内阁总理鲁维埃兼任他的职务。

1905 年，我赴美国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中途在到达巴黎前不久，我发现法国政府处于惊慌状态。人人都希望战争赶快结束，以便把我们的注意力从遥远的满洲转移到维斯拉河盆地上来。普遍的恐惧因德俄两国皇帝突然在比耶尔克会见而增加了。我离开圣彼得堡之前与拉姆斯多夫伯爵见了最后一面，他之所以未向我提起这次会见的事情，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此事。皇帝本人并没有和他谈什么，虽然他知道不久就要与德皇会见。对凡是问我这次会见情况的人，我都使他们确信这次会见毫无政治意义，不过我仍向拉姆斯多夫伯爵发电报询问。伯爵立即回复我说这次会见纯粹是私人的往来，我于是把电报给鲁维埃看，以打消他的疑惧。

罗斯福总统在朴次茅斯对我说，全世界的人都热切地希望日俄之间恢复和平。我问他是否包括德皇在内，他以加重的语气回答说，“是的”。的确，当俄日签订和约的时候，威廉皇帝向我们皇帝热烈祝贺。他这时自然更容易感到兴奋，因为他不是借助了比耶尔克协定而把俄国拖入到比这场战争更恶劣的混乱中去了吗？

我在从美国回国的归途中，在巴黎停留下来，因为我有重要

的事情要处理。在我上一次访问巴黎的时候，我已和鲁维埃谈到俄国在法国借款的事，鲁维埃向我保证，只要我能促使战争快点结束，他就可以帮忙签订借款协定。于是这次我以更加肯定的语气对他重提这件事，他却说在摩洛哥事件没有和平解决以前，借款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他很诚恳地要求我尽力设法使德国在与法国谈判时稍微退让一点。为了报答我的帮忙，他答应我全力协助借款事宜。我也同意他的这种办法，从法国外交部出来，我就径直去见德国驻法大使拉多林公爵，我们两人私交很好。我不提摩洛哥事件，只是对他指出德国应该采取一种较为缓和的态度，否则鲁维埃内阁势必倒台，而后继的内阁可能更难打交道。同时我也提到俄国很希望法国以及全欧洲都保持和平，因为我们有意进行一项大规模的金融交易，如果欧洲证券市场总是像目前这样不安定，这项交易就会受到妨碍。出乎我的意料，拉多林公爵认为法国的要求是十分正当的，依他个人看来，法德的这场纠纷容易和平解决。可是他又说，因为他在柏林被认为是一个亲法派，所以这次谈判并不由他负责，而是由一个名叫考夫曼的人负责，这人的确是一个好争执、倔强的人物。于是我立即经人介绍与这位全权代表见面，不久我就发现不能指望他作出什么让步。

第二天，我又去拜访鲁维埃。他对我开诚布公地说，他个人并不认为德国所坚持的要法国在摩洛哥事件上作出让步是件大事，但是德国的态度坏极了，如果他对德国的那些要求让步，他的内阁就会被迫辞职。我于是建议，他可以和德方先就一些次要问题达成协议，然后向德方提议由一个国际会议来解决主要的问题，并附有决议双方都有服从这个国际会议的义务的谅解备忘录。我又说，这样一来，现内阁就可以避免担当摩洛哥事件结局的责任。鲁维埃说他也曾想到这个计划，但被德国全权代表拒绝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英国的爱德华国王希望见我。同时也接到威廉皇帝同样的邀请。我回答他们说很抱歉，在我向我国皇帝报告以前不能遵命前往。但是后来我接到去见威廉皇帝的训令。我在出发赴柏林以前，拜访了法国总统卢贝。我也告诉拉多林公爵和鲁维埃，我将试试劝告威廉皇帝把摩洛哥纠纷交付国际会议仲裁。

我在罗明滕一座普鲁士式的城堡中见到了德皇，这地方接近俄国边境，离维尔日博洛沃不远。我在一个清晨到达附近的车站，奥伊伦贝格老伯爵代表皇帝前来迎接我。我们一同坐他的车子到城堡去，他告诉我说皇帝对我有很好的评价，他很赞赏我在朴次茅斯和会取得的成就，并盼着与我会面。

德皇在几个随员陪伴下到城堡前来迎接我。他很和蔼地说了一些话，便命宫廷大臣领我到住所去。不得不说，罗明滕的城堡实在与它的名气不相称。这城堡是在一座小山上，只有两座简朴的二层楼房，山下散布着一些村舍。两座楼房由一个带棚顶的走廊连接起来，其中一所此另一所更简陋。皇帝的家属、随员与宾客住在楼房，附近的村舍则供仆役住宿。在离城堡相当远的地方有一座村庄，四周全是森林，也就是皇帝的猎场。皇帝、他的一些侍从和宾客都穿着猎服——我们必须记住，威廉皇帝对于各种式样的制服情有独钟。城堡中的生活很简单，屋内陈设也很朴素，但到处都表现出德国人所惯有的清洁与整齐。

一会儿功夫我就到了我住宿的屋子里，奥伊伦贝格伯爵接着就来拜会我，顺便说一下，他是德皇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也是宫廷侯臣中的著名人物。我们谈到国际政治形势、俄德的邦交以及一些与此类似的问题。伯爵还告诉我说德皇一直没有忘记几年前我和他在彼得戈夫宫的谈话，我则对于我的话未能实现表示遗憾。伯爵含糊地回答说，我的话的实现速度也许将快得超过我的想像。

在早餐的时候，德皇介绍我与皇后公主相见，我曾经荣幸地

见过皇后，公主是他们唯一的女儿，她相貌平平但很讨人喜欢，看来她的父母非常宠爱她。我也被介绍与其他诸人相见，除了奥伊伦贝格伯爵之外，还有海军大臣、一位将军和两位年轻的副官。进餐时，我坐在皇后旁边，我们只谈了一些礼仪性的闲话。皇后还告诉我，德皇几年以前并不喜欢摩托车，但近来却变得非常喜欢，并且把车开得极快，有时真让她担心。

早餐以后德皇把我带到一边，我们才开始谈正经的问题。他对于我在朴次茅斯的功绩简单地称赞了几句便谈到欧洲的政治形势，后来又提起我们在彼得戈夫宫的谈话。我一再表示我深信德俄法这三个欧洲大国实现普遍和解是可取的，这种和解可以逐渐形成一个紧密的联盟，自然，其他欧洲国家会加入这个联盟。欧洲一旦免去军费的负担，就能够建立一支控制全世界的强大海军。德皇说他十分赞成我的意见，然后宣称我的这个计划在他和俄皇于比耶尔克会见时已经实行了。他又说，他告诉我这个秘密的消息，还是受了尼古拉皇帝本人的委托。他告诉我这个消息之后，还问我对于这种事态的发展是否满意，我当时因为不明事实真相，回答说听了他的话我感到十分高兴，之后我就起身告别。

当天傍晚德皇打猎归来以后，我们又谈了一次话。我先谈到今后如果能采取一系列深思熟虑且有条理的措施，法国的舆论是可以逐渐接受与德国和解的想法的。但我感到遗憾的是过去并未这样做过，并且近年来两国日趋疏远，致使法国投入到英国的怀抱，结果产生出那个著名的摩洛哥协定。在我最近这次访法期间，我发现反德舆论高涨，而市场严重混乱，甚至于有人谈到对德战争。显然在此耶尔克协定以后并未做什么促进德法两国和解的工作。德皇承认直到当时为止的确没有做什么工作，不过他说将在适当的时机采取必要的措施。我觉察到他闭口不谈有关比耶尔克协定的内容，并且显然不让我看到文件。我想也许是他认为应当由尼古拉皇帝对我讲这些事情。

在我们的谈话之中，德皇强烈地斥责着法国政府，说它对德国以及他个人总是怀着敌意。他说他曾一再想主动与法国建立和谐的关系，但法国当政者可悲地缺乏善意与机敏，成为法德和解的障碍。他对于德尔卡塞与英国订立摩洛哥条约的行动尤其愤怒。他说德国外交家们原本知道英法间进行谈判，但他们并不感觉恐慌，因为他们以为一旦缔结条约，两国会把条约的内容通知他们。鉴于英法两国连一个字都没有告诉德国，德国政府就以为他们的条约根本影响不到德国。但到条约原文发表时，我们才发现这个条约有许多直接牵涉德国利益的事项，因为德国在摩洛哥已有既得的商业利益。德皇最后说道，这使我们不得不表示：凡有关涉及德国利益的条约如果未经德国同意（更不待说没有通知德国）都不能成立。

听完德皇这一段激昂的言辞，我就说，我看到法国已表示它热诚地希望消释那个不幸事件的嫌隙。德尔卡塞不是已经被迫辞职而由一位热切期望和平解决此事的人继任总理职务了吗？我引用拉多林大使的话，说鲁维埃已表示只要德方的要求合理，他愿作一切让步，并且大体说来，法国政府的态度是很圆通的。我也请德皇注意这个事实：鲁维埃很愿意德法达成协议，如果交涉失败，他的内阁很可能由不赞同这种想法的人来继任。我对德皇作了很详细的解释，因为我发觉德皇对于他的全权代表在巴黎进行的谈判并不完全清楚。我于是重述我曾对拉多林大使说过的以国际会议仲裁此事的办法，我说拉多林大使与鲁维埃都赞成这个计划。如果法德由于现在的谈判而达成一种谅解，其他国家，例如美国也许会反对你们的协定，而使德法双方都很为难。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仲裁会议是最有可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德皇歇了一下以后，写了一封给比洛首相的电报，又把它拿给我看，他说道："我被你说服了，这事情就依你的意见解决吧。"

我们接着又谈了一会。德皇带着蔑视的口吻谈起俄国驻英大

使本肯道夫伯爵，据说他的主要的外交任务就是陪英王打桥牌。他问我对于俄国国内的局势有何看法，而据他所知，俄国是危机四伏的。我对他豪不隐讳这个事实：由于我们内政上的一些错误做法与这场不幸的战争，国内民怨沸腾，政府的权威丧尽殆尽。我说我认为将来势必要实行宪政。德皇认为对于人民要求的某些改革是应当让步的，但是一旦认为必要的改革施行了，那就无论如何不要再作退让。他说他的这个意见也曾对尼古拉皇帝说过。德皇避而不谈日俄战争问题。我想这是因为他还未曾忘记在德国占据胶州时我托契尔斯基大使给他的电报。

我告别德皇以后回到我的寝室，宫廷大臣拿来德皇赠我的两件礼物。一件是装在一个金色像框内的德皇肖像，上面有御笔题字："朴次茅斯—比耶尔克—罗明滕。威廉皇帝。"另一件是红鹰勋章链。像片上的题词总结了自从我们决定开始和谈以来，威廉皇帝所实行的政策的过程。我们谈话以后，显然他对于以下的情况已不再怀疑：一方面，俄国的失败使他在东方可以自由行事；另一方面，朴次茅斯和约与比耶尔克协定意味着德国借助俄国扩大了其在西欧的势力。想不到德国人竟不流一滴血，不费一文钱而得到这一丰厚的收获！这真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至于德皇赠我那特殊的勋章——红鹰链一般只赠给君王或皇族——大概是因为我已经有了一枚德国的最高级勋章——黑鹰勋章，他找不出别的表彰功绩的徽章给我的缘故。尼古拉皇帝所以想起封我为伯爵，德皇这次给我的崇高荣誉必定也是原因之一。

宫廷大臣告诉我，如果我愿意取悦于皇帝，进餐的时候就要把红鹰链佩在身上。这个要求却使我大感为难，因为我知道在美国用不着穿制服，所以未曾把制服带在身边。我和宫廷大臣商量的结果是，我把红鹰链佩在平常衣服上面，宫廷大臣则去向皇帝解释我为什么不穿制服也不佩其他的徽章。

到晚餐时候，我向皇帝道谢他赐我的厚礼。同席的人还是我

在前面所提到的诸人。进餐以后年轻的公主和那两位副官都退去了，我们走进隔壁一间房子里。大家坐在舒适的扶手椅上，喝着咖啡和啤酒，吸着烟，一点也不拘束或做作。晚间我们轮流讲故事，说笑话，这显然是罗明滕城堡中的集会常有的情形。皇帝比任何人都爱大笑，比任何人都喜欢说诙谐的话。他总是坐在奥伊伦贝格伯爵所坐椅子的扶手上，好像用他的右臂搂着伯爵一样。所有在场的人中只有奥伊伦贝格伯爵的举止表现得像是一位君主。到大约十点钟皇帝才向我们道别，集会方散。

第二天我又和德皇与皇后同进午餐。我对于他们生活的简朴与他们和蔼可亲的态度有着极其深刻的好印像。在政治生活方面，德皇是不免有点举动粗鲁，眼光挑剔，但在私人生活方面他却是惹人喜爱的。午餐后我和在座诸人告别，并准备向皇帝辞行时，他出乎我意料地说他要我乘他自己的汽车并送我去火车站。他请我坐在他的身旁，而那位时刻不离的奥伊伦贝格伯爵则坐在前面。车行不过十分钟光景，我们只交谈了几句话。我还记得德皇劝我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经由奥伊伦贝格伯爵和他通讯。他说："写信给他就如写信给我一样，他的复信也就是我的复信。"德皇一直陪我走上月台，在那里我向他告辞然后登上火车。德皇则直到火车出站时还站在月台上。

车中既无他人，我于是赶快写了一封短信给法国驻德大使，由陪着我的俄国财政部驻德办事处的仆人送去。信中我请他立即通知鲁维埃，说我已调解了摩洛哥事件，威廉皇帝已对比洛首相发出必要的训令。这封信是很重要的文件，足以证明在1905年我防止了德法之间的一场冲突，可惜原信我未能找到了。但是在1907年我终于得到用电报发给鲁维埃总理的我的原信的正式抄件。这封电报是1905年9月28日（新历）以我的名义从柏林发出的，那就是在法国大使刚刚得到我的信之后。原文如下："关于摩洛哥问题我已荣幸地向德皇陈述了我的意见，德皇善意地告

诉我，他无意让法国政府为难，他将发出对此问题的必要训令……”

到达圣彼得堡后的第二天，我就在停泊于芬兰海岸外的御用游船“标准号”上觐见了尼古拉皇帝。皇帝在他的房舱里接见我，对于我在完成他所委托我的艰巨任务（朴次茅斯和约）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我准确执行了他的训令表示了诚恳的谢意。因此，为了表彰我对于他个人以及国家的勋绩，他封我为伯爵。在我们随后的谈话中，皇帝说他曾接到威廉皇帝的信，德皇在信中对我大加称赞。他知道关于对德订立比耶尔克协定一事，我的意见与之一致，这一点也使他很高兴。当时我就插口说，我一向主张在法国、德国和俄国之间成立协定。皇帝就说他知道我在几年前就和威廉皇帝谈到过这个问题。但皇帝却并未给我看那份神秘的比耶尔克协定。

第二天我遇见我们的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伯爵。在一番寒暄与祝贺之后，他就以不能抑制的愤怒而带点颤抖的声音问我：“你真的赞成比耶尔克协定吗?”

我回答说是的，接着我又说我认为俄德法三国缔结协定有好处，他打断我的话，说道：“可是你看过比耶尔克协定了吗?”

我说我还没有看过，于是伯爵就把协定条文拿给我看，说他是昨天才得到的，要我一阅，他神色非常激动和苦恼。我看完条文之后，才明白他激动的原因。这协定的内容是俄德两国在对其他欧洲国家（因此，包括法国在内）发生战争时，有互相保卫的义务。俄国愿意尽力争取法国也加入这个联盟（但无论这个目的是否能够达到，德俄两国间的协定总是有效的）。这协定自朴次茅斯和约正式批准之日起生效。（也就是说：如果战争还在继续，一切都好，如果战争停止，俄国将被拖入一场更糟的混乱之中。）这个文件由两国皇帝亲自签字，德方由某一个官员副署，他的名字我不记得了，我方则由海军大臣比里列夫副署。

此协定的含义就是如果德国要对法国作战，我们就必须去保卫德国，但这毫未顾及这样的事实：我们从九十年代开始以来就与法国达成一项谅解，如果法国和德国发生战争，我们有保卫法国的义务。另一方面，德国只承担在俄国与任何其他欧洲国家作战时保卫俄国在欧洲的地区的义务，这项条文实际上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因为我们唯一的弱点是在远东，但是在这个地区德国却让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

我对拉姆斯多夫伯爵说，这个条约无论如何必须废除，我宁愿继续对日战争也不批准朴次茅斯条约以使比耶尔克协定生效。

我大声说："这是荒诞的。这个条约让我们在法国人眼中信誉扫地。你没有参与而且一点也不知道这一策划，这是可能的吗？"

拉姆斯多夫伯爵一再说，一直到前一天他还是对此事一无所知。

我又问他："皇帝是否知道我们和法国曾订过一个条约？"他回答道："皇帝当然知道，但他也许是忘记了，也许更可能的是他的头脑被威廉的辞令给迷惑住了，所以不能把握事实的本质。"

于是我们就合力筹划一个办法以解决这个困境。依伯爵的见解，这事最困难的一步就是如何使皇帝同意将协定取消。我们可以在这个协定中找出一些法律上的缺点，然后据以正式向皇帝请求将条约废除。最后，我们决定提出下列几个论点：第一，此条约未经外交大臣副署；第二，这条约与我们以前与法国订立的条约相冲突；第三，在批准比耶尔克协定之前必须先与法国订立相应的协定并作为必要的法律根据。如果这些论点都不能成立，我们就决定宣告俄国宁可不批准朴次茅斯和约也决不承认比耶尔克协定。我们认为这个协定应缩减成一个简单的声明，即我们遵循俄法德成立协约的原则，并愿意承担实现这一原则的义务。

担任大臣委员会主席使我在公务上没有接近皇帝的机会。至于拉姆斯多夫伯爵对于这样重大的事情是否有影响皇帝的能力，我是没有多大把握的。所以我决定去求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亲王帮忙。我知道这位亲王一则因为他和神学有关系，二则因为他对皇帝尼古拉的耿耿忠心，所以他对皇帝能施加有力的影响。我有充分理由相信亲王比外交夫臣更早知道协定的内容，但到后来我才证明这种猜测是正确的。亲王很认真地倾听我的诉说，并且似乎能抓住这一协定对于皇帝根本就是耻辱的关键一点。我告诉他我和他的任务只是如何让皇帝取消此项协定，其余的事则由拉姆斯多夫伯爵去做。亲王答应去和皇帝商议。

我在无意中遇到的第二个人就是比里列夫大臣，即是在比耶尔克协定上签名的那位先生。

我问他："先生，您知道您在比耶尔克签署的是什么文件吗?"

这位大臣坦白地承认他不知道。他解释说："我不否认我在某种显然很重要的文件上签了字，但这文件谈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当时的经过是这样的：皇帝召我到他的大厅，直截了当地问我道：'阿列克塞·阿列克塞耶维奇，你相信我吗?'当然，对于这问题只能有一个答复。于是皇帝接着说道：'既然相信我，你就在这个文件上签字，你看，这文件已经由德国皇帝和我签字，并且有德国外交大臣的副署。德皇要求我们方面也要由一位大臣副署'。当然我便在那文件上签了字。"

过了几天，皇帝召我到彼得戈夫宫去。我发现尼古拉亲王和拉姆斯多夫伯爵已经在那里了。皇帝同时接见了我们三个人，就在这个会议上决定取消比耶尔克协定。虽然皇帝颇感为难，但经过一些争辩之后，他终于同意把协定废除，并授权拉姆斯多夫伯爵采取必要的举措。德方对于我们的第一次照会的答复还有点推诿，它的大意是：事情已经那样办了，你们不能背弃协定。于是我们又发出第二次照会，这一次我们的措辞毫不含糊。后来我被

委任为总理大臣时，我询问拉姆斯多夫伯爵此事进行得如何，他回答我说："谢尔盖·尤利耶维奇，你放心吧，比耶尔克协定已不存在了。"由于这事件，我们的外交大臣遭到德皇的仇恨，有人告诉我，德皇从此也不再赞扬我了。自1905年以来，我们已逐渐接近英国，并有订立盟约的趋势。就在这一年，德俄两国皇帝又在施维钠谬德会面。据我们的参谋总长告诉我，这次会见虽然未订立成文协定，但两位皇帝确定了此后两国以比耶尔克协定的精神行事的意向。这也许只是一句空话，但我确信如果我们不使威廉皇帝真正满足，他将永远暗中怀恨我们。

解决摩洛哥纠纷的国际会议幸而在比耶尔克协定废除以前召开了。如果这次会议延期的话，那恐怕永远就不能召开了。因为这个会议是由我发起的，在比耶尔克协定废除以后，德皇很可能无意听从这个会议的决定。这次阿尔黑西拉斯会议（这次会议在阿尔黑西拉斯举行）所要达到的目的对于俄国意义重大。我已经提到过，在摩洛哥事件未解决以前，我们要与法国订立借款协定是不可能的。所以为了我们的利益着想，会议越早结束越好。另一方面，德国则有意要拖延谈判的进行。它奉行由来已久的德国外交原则："争论愈久则收获愈多。"此外，德国这么做还出于两种方面的考虑：第一，增加俄国的财政困难；第二，报复俄国废除比耶尔克协定。至于法国的鲁维埃，他很清楚我们在会议中的地位，为了迫使我们的代表卡申站在法国的一边，他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这时，我们的财政状况正在迅速恶化，对一笔外国贷款的需要也越来越迫切了。

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就求助于奥伊伦贝格伯爵，请他写封信给威廉皇帝，请求德皇使阿尔黑西拉斯会议能够加速进行，好让我们得以早日签订急需的借款协定。我并且向他说明我们必须在第一届议会召开之前签订借款协定，以便政府不至于完全依赖新成立的立法机关。威廉皇帝的复信口气很是和善，但并未答应

我的要求。显然德皇我是指望不上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德皇让奥伊伦贝格伯爵转给我一封信，要求我对法国人施加压力让他们再作出一些让步。同时他写信给尼古拉皇帝，说我的借款努力将会失败，因为犹太银行家们会拒绝参加。至于鲁维埃，他仍重申只要那个该死的会议一旦结束，他愿意协助我们发行债券。在这种情形下，我继续积极筹划，以便会议一结束，便能毫不耽延地进行借款。

在会议上，随着德国越来越得寸进尺与蓄意拖延，我们的代表便更加强烈地支持法国。最后会议结束，法国由于我们和英国的支持终于获得完全胜利。德国政府为了报复俄国在这次会议没有支持他们，就禁止德国银行界参与对我们的贷款。德国人在愤怒之下甚至采取了更强烈的报复行动。本来在我逗留美国期间，我已经和以摩根为首的银行团商妥，请他们参与贷款。这是因为摩根和德皇的私人关系很好，他的银行团虽然最初参与贷款谈判，但最后到德国政府强令德国银行家们不得参加这项贷款时，摩根银行团也退出了。这就是德国对我们的友谊！然而，我竭尽全力挫败了威廉皇帝对俄国的报复，终于借得了近代欧洲各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外债，这笔外债对于俄国的重要性是难以言表的。整个借款的经过以及其中几次重大的事件，我在前面都已经详细叙述过了。

1906 年 4 月，取我代之的戈列梅金内阁所做的种种施政，简直是故意要玷污我在世人眼中的形像，尤其是在威廉皇帝眼中的政治声誉。我敢断定，他们一定是怕我在政界东山再起。他们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对我个人以及我的政策写成一份告发状，委托前奥国驻俄大使埃伦塔尔男爵呈给德皇。一年以后这份报告发表了，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它是在《评论周刊》杂志上发表的。我有理由相信这份报告不会对德皇产生什么影响。然而在报告之外，又有基辅一个黑色百人团的首领写给德皇一封信，其中有一两个

得自其上级的暗示，让德皇明白，如果他再对我优待，他就会让尼古拉皇帝不愉快了。的确，在报告未发表很久以前，我在柏林已不再是受欢迎的人了。事实上，我认为在我任总理大臣的后半期里，俄皇对于我的政策那种吹毛求疵的态度，部分就是受到威廉皇帝的影响。无论如何，自从罗明滕那次历史性会见以后，我就再也没见到过威廉皇帝。1906 年的贺年片是他送给我的最后一张。虽然如此，有人告诉我，说他每当谈到我的活动时，他总表现出对我的敬重，称我为俄国最有才智的人。1911 年 5 月初，德国太子弗里德里希与其夫人来到皇庄。在圣彼得堡的那次聚会中曾经有人介绍我与他见过面，这次我们又同赴德国大使主办的招待会和音乐会，大厅中人山人海，他也没有找我谈话。这种情形是否出于偶然我就不晓得了。

1907 年 9 月，俄国与英国缔结了一个关于波斯、阿富汗和西藏问题的条约。这个协定标志着我们联英政策的开始。因为我们并未放弃传统的联德政策，所以局势变得颇为暧昧。这时我们试图适应这种局势，对德国保证我们与它的关系最密切，对英国不过是表面敷衍，而对英国则说与此相反的话。我相信，我们不久就要为这种两面政策付出代价。

我们与英国亲善，又与法国结盟，结果产生与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三国同盟相对立的三国协约。这个三国协约结成的经过如下：我自朴次茅斯归来，途经巴黎的时候，遇到我们驻英大使馆的首席秘书科泽尔—波克列夫斯基，他带来英王爱德华要我去访问他的邀请，我因为没有得到皇帝的明确许可，未曾接受他的正式邀请。同时我们的驻法大使伊兹沃尔斯基又交给我一份与英国协定的草案，其内容和后来正式订立的英俄协定完全相同。我当时托科泽尔—波克列夫斯基转告英王，如果我回俄国执政的话，我一定尽力建立与英国的友好关系。但是我说，我坚决反对伊兹沃尔斯基向我述说的那种条约，因为我们双方最好不要被条

约所束缚。我恐怕与英国订约要引起德国人的嫉妒，结果我们也许不得不与德国也订立一个条约而最后受到欺骗。由于我的反对，英俄在 1907 年以前未能缔结协定。

这次英俄协定主要是关于波斯问题，可算是英国外交的一次胜利。波斯北部最富庶而人口最密的地区自古以来就在我们的势力范围之内。因为我们征服了以前是波斯与土耳其的一些省的南高加索，波斯北部自然就好像注定要成为俄帝国领土的一部分。为了应对英俄可能的战争，我们付出了大量的鲜血与金钱，但这个协定却让我们以前的一切牺牲白费了。根据这个协定，波斯南部归入英国的经济势力范围，而我们则控制北部。至于波斯的中央政府则由俄英两国共同管理。因为波斯中央政权所在地德黑兰是在北部，所以英国的势力如同在南部一样，也伸入到北部。

俄国并不打算吞并阿富汗。我们只想保持现状，作为俄国与英属印度之间的缓冲国。条约中也明确规定保持这种现状，但又规定阿富汗应当完全受英国势力支配并由英国保护，所以我们甚至不能在那里派驻外交使节。这意味着我们同阿富汗政府进行的任何谈判都得通过英国当局。在这种情形下，所谓缓冲国差不多成了一支对准我们的枪。英俄双方约定都不派使节或军队进驻西藏。我们也放弃了对于波斯南部各港的一切要求。

条约中并没有提到其他国家对波斯的要求。因此英俄分治波斯实际上是无用的。果然条约刚一发表，德国就开始设法保护它在波斯的经济权益。早在 1904 年德国政府就命冯·比洛向我提出抗议，说我们妨碍了他们向波斯输送商品的自由。1911 年我们与德国缔结协定，同意它把波斯北部的铁路和德国的巴格达干线连接起来，并允许它自由地向波斯北部输入商品。总的说来，我们获得了什么呢？同英国签订条约，使我们在政治上不能兼并波斯，同德国签订条约的结果，又让我们在经济上失去了波斯，因为我

们在平等条件下同德国进行经济竞争，我们是一定会失败的。总之，波斯已经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下。目前（1912 年）我们只能在波斯政府逐渐强大到足以恢复治安之前，在那里扮演警察的角色。



译 后

维特伯爵是近代俄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与中国也曾有过密切关联，可是国内对他的了解似乎并不够多。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商务印书馆曾经出版过一本由傅正先生翻译的经亚尔莫林斯基整理的《维特伯爵回忆录》，在当时还系内部发行，今日坊间已难见到，殊为憾事。这次有机会能够将《维特伯爵回忆录》再度翻译并出版，译者感到颇为荣幸。

本书翻译的具体分工如下：柳思思博士负责翻译序言、第一章到第四章，肖洋博士负责翻译第五章之后的所有章节。全书最后由肖洋统稿并校正。在此感谢傅正先生的译稿给我们的启发。时隔近 40 年，我们的新译稿在信达雅的基础上力求对作者生平及相关历史事件进行客观与全面的表述，不过，由于译者学识有限，功力不逮，译文粗疏浅陋，错谬失当之处在所难免，尚望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虽然相隔近一个世纪，本书中译本的问世似乎晚了一点，但鉴于本书在国际关系史中的经典地位，其学术价值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相信这本书的问世对于国内中俄关系史与一战史的研究会有极大助益。最后，在译作付梓之际，我们还要感谢所有为本书的出版付出努力与心血的同仁。希望本书的读者不仅仅只是纯粹的国际关系学者，在译者个人看来，读完本书之后，普通读者也能从这些影响国际关系史的著名政治家的成长

经历中收获启发。

肖　洋、柳思思

2010 年 8 月于北京·外文学院